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史料选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编

11

新疆人民出版社

顾 问 赵予征
李书卷

主 审 万卫平
王诚道

主 编 王 黎

编 辑 王 黎
王炳虎

F324.1

(W)3

11

0086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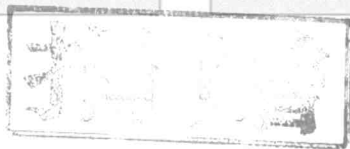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史料选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编

11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8614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赵予征 李书卷

主任 张庆黎

副主任 王贵振 胡兆璋 华士飞 王崇久

王诚道

委员 万卫平 焦明启 杨振华 潘仁源

刘刚 陈献政 柴峻茂 张秉刚

李志荣 张书恩 张维梁 何若群

王志刚 顾烈峰 刘富超 曹国琴

阎龙喜 伍及孝 汪艾翔 梁富仁

王春辉 郝佩祥 焦春华 沈炜珍

吴玉昆 庄超群



1958年9月18日，朱德副主席视察阿克苏。前排左起：杜宏鉴、田仲、张秋实、林海清、贺劭南、张希钦、赛福鼎、朱德、王恩茂、包尔汉、左齐、康克清、玛依努尔、赛力曼·塔力普娃。



1965年10月，贺龙副总理在农七师车二场视察棉田。右起：张仲瀚、王恩茂、赛福鼎、史骥、陶峙岳、贺龙，左一为贺龙夫人薛明。



1958年，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前二排右5）视察农五师时与干部职工合影。



1960年3月，王震在塔里木开荒工地与农一师职工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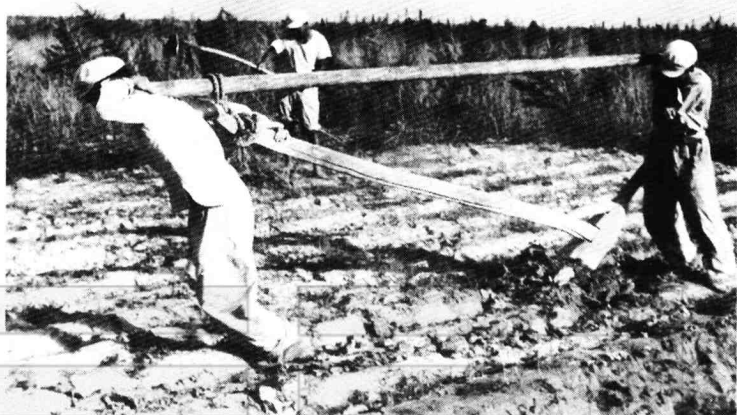


50年代，兵团副政委张仲瀚（右2）在农七师与师政委史骥（右3）、师长刘振世（右1）、参谋长朱耀臣（左下）研究水利规划。



1961年7月，陶峙岳（右3）、张仲瀚（右1）、史骥（左1）与来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右2）及夫人张晓梅（左3）、李维汉夫人（左2）在农七师西果园合影。前排中为劳动模范马新才。

► 1950年3月，农七师前身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战士人拉犁开荒。



▼ 1950年，军垦战士人拉自制工具耙地。



◀ 1951年，二军五师十三团（现农四师七十二团）在割草间隙休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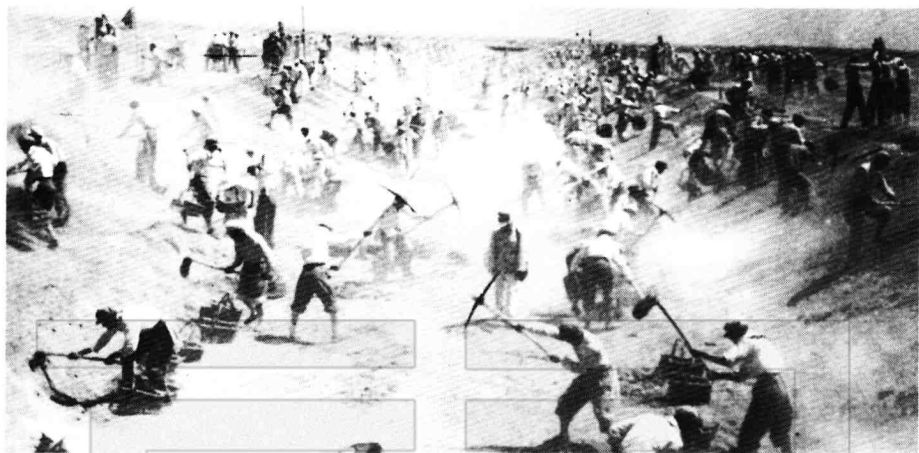
1955年，农一师青年突击队进入喀拉库勒荒原开荒



▲ 1951年二军五师十三团（现农四师七十二团）军垦战士田间娱乐。



◀ 1952年农二师十七团（现二十一团）在开都河畔开荒



▲ 1951—1954年，由二军五师在戈壁荒滩挖筑的胜利渠全长102公里

◀ 50年代农二师五团（现二十一团）军垦战士开挖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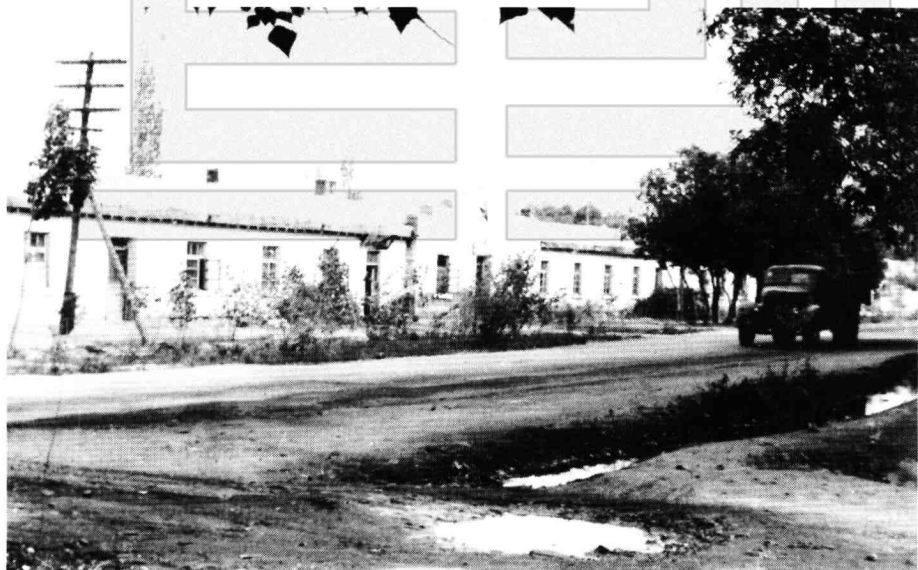
► 1961年，北屯三十渠动工，1963年建成，为组建北屯三场奠定水利基础



◀ 1953年农五师建成的新疆第二渠——红星二渠在哈密开闸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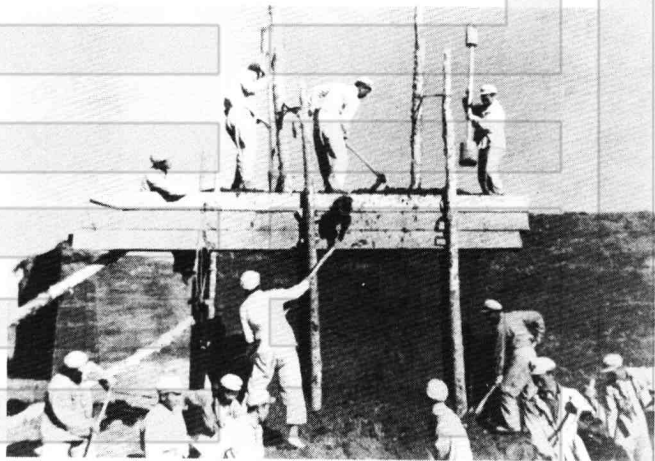
▼ 1959年，农十师成立于巴里巴盖（后一八一团团部），同年11月师部迁北屯。图为巴里巴盖临时师部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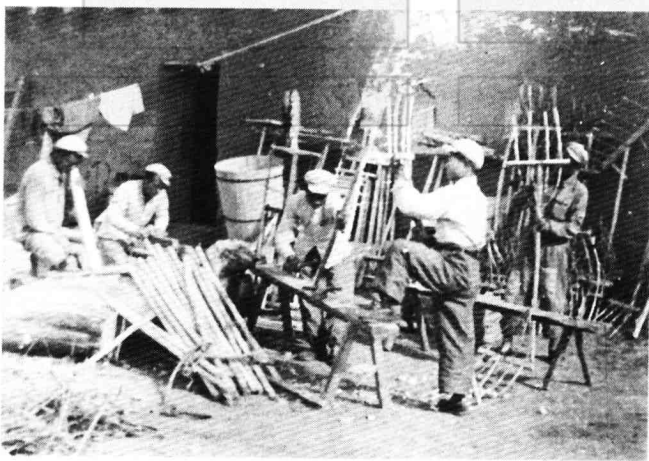


◀ 1952年，军垦战士的住房。

▶ 1952年，军垦战士“干打垒”建房



◀ 50年代初，军垦战士自制农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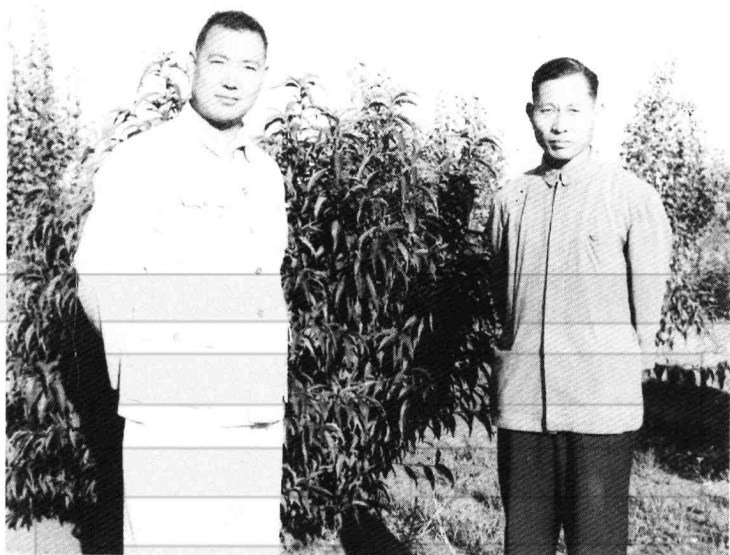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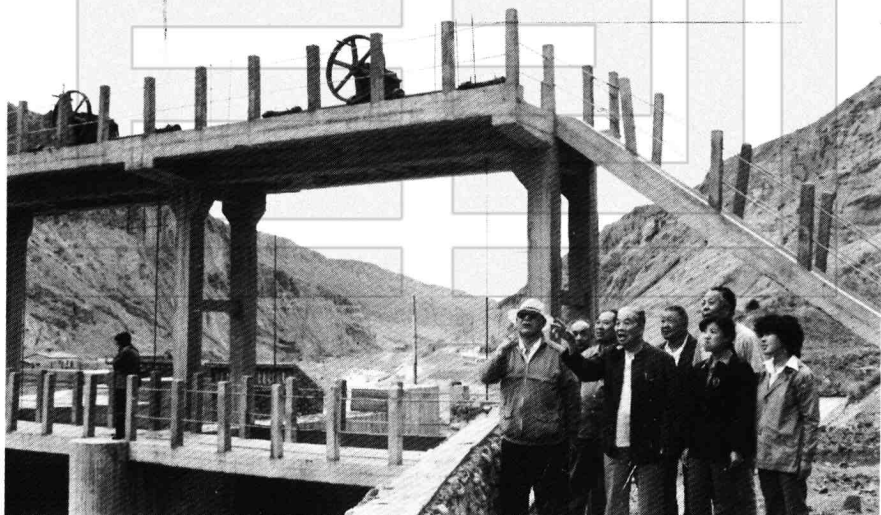
◀1983年11月20日，
兵团副政委史骥（前左）
与兵团第一任司令员陶
峙岳（前右）合影于长沙
市六堆子陶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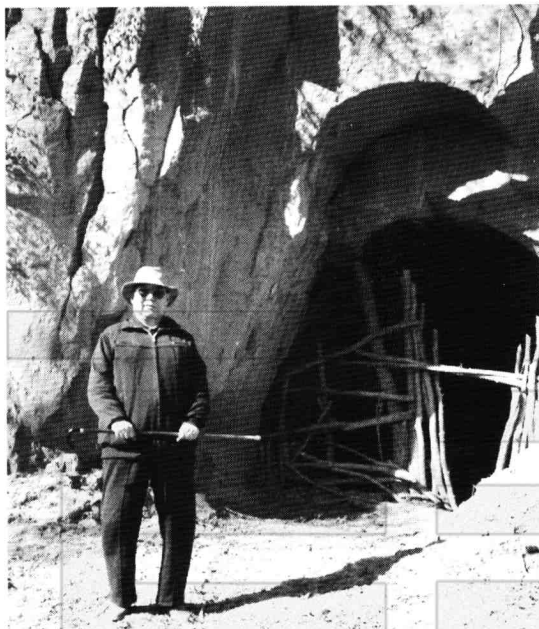
▶1946年5
月，中原突围前夜
合影于湖北宣化
店。左起：陈海林、
赵站华、傅志华、
史骥



1960年农七师政委史骥（左）与园艺专家张钊教授合影于师西果园



1989年，兵团顾问史骥（前排左1）与农七师师长王云龙（前排左2）视察奎屯河新龙口



◀ 1990年10月，史
驥重返延安，在40年代
参加大生产时住的窑
洞前留影。

▼ 1990年10月，史
驥偕夫人李葆华重返
南泥湾



本辑照片
提供：农一、二、
三、四、五、七、
八、十师史志办
公室，李葆华、
刘希疆。



1946年，新四旅十六团团长袁学凯（前排右）、政委常祥考（前排左）率员在陕西马兰合影。后排左1为供给处经建股股长刘志申。



◀ 1946年，刘志申（左）在瓦窑堡和战友汪田（中）、吴镇壁（右）合影。

▼ 1951年刘志申夫妇携幼子摄于伊犁惠远五〇团。





1953年刘志中(下右1)和六军十七师的战友周栋焯(下左1)、赵怀周(下左2)、李甫成(下右2)、芦振汉(上中)、张建功(上右)、李芳泽(上左)合影于迪化



1983年冬,兵团司令部顾问刘志中(前排中)与工程师卫生祥(前排右1)、赵宏礼等视察南山煤矿



80年代，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谢高忠（中）、副司令员毛乃舜（右）视察农二师二十二团



1995年10月自治区40年大庆时合影 前排左起：高焕昌、熊晔、王恩茂、罗元发、宋汉良、张希钦及夫人、郭刚。后排左起：刘双全、金忠藩、李廷智、曾继富、刘志中、肖凤瑞、罗泉源。

前 言

1991年9月5日,兵团党委批准编纂出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以下简称《史料选辑》)。

《史料选辑》是兵团第一部从1949年起记载兵团发展史的权威性历史资料丛书,它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按兵团的前身、组建、发展、壮大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发展阶段、各个行业、各个方面循序分辑广泛选编有价值的史料。征集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区到兵团,从部门到个人。全书所含类目有题词、图片、文献、组织沿革、图表、史话、专题、回忆录、人物、大事选记等,记载兵团执行“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任务,发挥“四个力量”(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作用的光辉业绩。资料的出处均有翔实的注明,文献资料的公开发表均经有关部门审批,主要史料经由重要历史当事人或权威人士考证,在编辑和文字处理上保持了历史面貌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了使某些资料集中,便于利用,亦不定期地选编各种专辑、特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六军的大部、五军(民族军)的大部、二十二兵团的全部集体转业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二、六军是从红军、八路军延续下来的英雄部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坚力量。兵团精神,就是红军、八路军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的继续和发展,就是南泥湾精神的弘扬和光大。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二、六军,在新疆和平解放后又坚定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新疆万顷亘古荒原上谱写了屯垦戍边的壮丽史篇,拉开了新疆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序幕,并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7万起义官兵,他们的英雄业绩留芳千古。

本辑重点征编了王震、邓力群、张仲瀚、谢高忠、史骥、刘志申、杨兆元等7名老红军、老八路的回忆录、专题、专稿、日记;通过6个图表总揽了兵团师级单位及农牧团场的组织序列、组织沿革、发展状况、变迁状况;特别收编了反映新疆和平解放历史实况的8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历史的抉择》台本,并征编了历史见证人刘锡宠撰写的《解放前新疆高级官员概况》,选编了二十二兵团第二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6名典型人物的资料。

在征集、考证、撰写、筛选的过程中,本书得到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新疆及兵团工业建设的亲历者周世昌、

李庚元、刘持谋、于继利、刘城治、任嘉祥、雷正纲等同志通力合作，认真回忆，潜心组稿、撰稿，通过回忆刘志申，铺写出兵团工业的奠基历程，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兵团作家郭培中应邀合作，撰写了电视台本《历史的抉择》；赵予征、王士珍、郭书森、杨一青、南文英等兵团及部门老领导，古稀之年伏案撰写回忆录；刘效弟、武耀中、漆开元、刘希疆、杨李、梁德元等同志积极提供资料、撰稿、研究考证、造表制图，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2000年11月

目 录

【回忆录】

- 新疆往事回忆 邓力群(3)
- 将军传奇故事 赵予征(22)
- 深深怀念张仲瀚 王士珍(35)
- 商河忆旧
——缅怀老友刘一村 叶尚志(44)
- 坚强的党性 光辉的业绩
——深切怀念谢高忠 郭书森 杨一青(51)
- 轶闻趣事话谢老 南文英(63)
- 兵团工业先驱刘志申 周世昌
李庚元 刘持谋 于继利 刘城治 任嘉祥 雷正纲(68)

【史骥专题】

延安行 史 骥(91)

南泥湾行 史 骥(106)

关向应政委的一席教诲 史 骥(113)

奎屯小城的诞生 史 骥(116)

勋业光华耀丰碑 李书卷 张万安 杨新三(126)

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郭书森(145)

【日记】

杨兆元日记选 (159)

【史话】

三五九旅留守陕北部队走马出关记 武耀中(191)

北平抗日救亡活动亲历记 刘锡宪(198)

【小资料】

枪杆诗

——新四旅西北战场战地文化一翼 赵予征(205)

王震在库尔勒对二十七师及十八团部分官兵的讲话
..... (234)

军垦第一个战役 陶峙岳(236)

垦区第一个女机车组	黄登来(239)
女机车组竞赛挑应战书	(241)

【纪录片台本】

历史的抉择

——8集电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本

..... 特邀撰稿:郭培中(245)

【名人踪迹】

解放前新疆高级官员概况

刘锡宠(301)

程砚秋的南疆之行

刘锡宠(311)

艾青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田文俊(314)

【人物】

模范旗帜蒲根桂

黄友胜(341)

一级劳模李彦西

张迪平(343)

特等功臣王月云

黎肇文 何光铨(345)

棉花高产纪录创造者姚象荣

陈 誉(347)

小麦丰产能手王伯生

黄友胜(349)

水稻丰产能手李大兴

白宏勋(351)

【图表】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师级单位沿革示意图 (1949~1987)	(355)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前后农牧团场以上组织 序列沿革示意图(1949.11~1956.12)	(35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变迁情况一览表	(359)
兵团撤销期间(1975~1981)自治区地、州、市农垦局 国营农牧团场一览表	(379)
兵团(含军区时期)农牧团场发展状况统计表 (1950~1974)	(38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10辑勘误表	(383)



回 忆 录

新疆往事回忆

邓力群^①

1949年6月,正当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英勇进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党中央得到可靠消息: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正在策划一个阴谋,让西北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的主力退到新疆,与新疆的反动势力结合,搞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宣布与中国脱离关系。这个阴谋如果得逞,人民解放军进疆就会引起国际争端。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作出了解放军提前进疆的决策,以加速统一祖国的进程,挫败帝国主义的阴谋。8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马步芳主力4万余人被消灭,胡宗南、马步芳残部向河西走廊溃逃,妄图退入新疆。这时,王震同志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攻占西宁以后,日夜兼程,冒着严寒,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在河西张掖、酒泉打了一个大胜仗,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大批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面对我大军压境的形势,新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加速了分化。军队以警备司令陶峙岳为主,包括保安副司令赵锡光以及陶的族弟、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党有联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政府以省主席包尔汉为主,包括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外

^① 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交特派员刘泽荣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主张和平谈判,接受我党提出的“二十四条款”。而蒋介石、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势力,最反动的两个军长叶成和马呈祥以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则反对和平谈判,妄图在星星峡设防,阻挡人民解放军进疆。由于人民解放军直叩新疆大门,国民党军队里和政府里接受和平谈判的人越来越多。

在人民解放军加速西进的时候,中央决定我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名义,带了三个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去新疆与“三区”革命^①的领导人接头,建立“三区”同志同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此行得到了苏联朋友的帮助。我从莫斯科经苏联的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5日到达伊犁,17日就同“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当时民族军司令)三个人见了面,由阿巴索夫担任翻译。我说明了中央给我的任务,转达了中央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并奉中央之命,口头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们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艰巨的任务中,还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三区”,并派人来联络,感到很兴奋,愿诚意地服从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无保留地介绍了“三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财政、民族等各方面的情况,前后一共谈了五六次。我还通过新疆的进步地下组织和人士,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编制、番号、驻区和每月兵力部署的变化情况,以及迪化和平运动的情况。这一切,我都整理后通过带来的电台报告了中央,报告了西北战场上的彭德怀同志。

我到达伊犁不久,就接到中央发来的毛主席正式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三区”同志对邀请信中说的“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句话,非常满意。

^① 1944年秋,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史称三区革命。

8月20日,阿合买提江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说:“蒙你向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和阿山的老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加上迪化的罗志(汉族)一共5个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们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特别高兴的是能够见到毛主席,并借此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意,也表达新疆各族人民愿意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为此,他们专门同我谈了一次话。他们说,依照当地的民族习惯和礼节,到一个新地方,应当向当地的亲戚朋友与尊敬的人赠送礼物,表示自己的敬意。他们问我,到北平时应当准备什么礼物送给我们党的领袖。我说,你们带去的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即是最好的礼物,请你们不要准备什么礼物。阿合买提江当即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贵党领袖一定会把我们带去的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当作最好的礼物,但如因此而抛弃民族的习惯和礼节,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不安。此次有千载一时难得的机会去见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心里非常高兴,极愿以礼物来留下一个永远的纪念。他们一再希望我提出意见,送什么礼物为好。我完全理解他们的真诚之心。我说,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中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和礼节,既然此间有必须遵守的民族礼节,我自然应当依照党的民族政策来尊重这个民族礼节。至于送什么礼物为好,我说只有一个意见,希望带有民族的特点。他们表示很高兴听到我的这个说法,他们将使礼物既带有民族的特点,又能表示目前民族的心理和要求。

阿合买提江等5位代表,于8月22日离开伊犁,很不幸的是,来北京途中发生了飞机失事的事件,这些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殉难在来京的途中。中央知道后,发了唁电,对他们的家属和同志

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并且希望继续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烈士遇难后，新疆第二次派出了代表，他们是新疆民主同盟常委、阿合买提江走后“三区”的实际负责人赛福鼎，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和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教授。他们于9月7日离开伊犁。很值得庆幸，他们赶上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烈士的遗体运回了伊犁。11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发表了阿合买提江等5位代表遇难的讣告。各族人民怀着巨大的悲痛，按照民族习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阿合买提江等同志为祖国的统一，为民族的团结献出了生命，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我在伊犁整整呆了一个月。从“三区”同志介绍情况中，我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新疆是帝国主义争夺的一个重要地点，1917年以前，沙俄、英国、日本都先后参加过对新疆的争夺，后来德国、美国也参加进来了，谁都想在新疆插一手，谁都想从新疆捞一把。在这个背景下，新疆统治者之间，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的斗争，互相进行仇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加剧了争夺，利用新疆进行反对苏联的活动。苏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新疆的进步力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新疆历史上多次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即使是民族中的进步势力，也没有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

在国民党驻军内部正在发生分化、起义和反起义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中央指示我到迪化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接头，并发来了张治中9月10日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报中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

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我9月15日秘密到了迪化，住在包尔汉家里，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进行了交谈。我向陶、包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表达了我们党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他们表示了决定和平起义的心愿，谈到了准备工作的情况。他们说，起义要拖一下时间，主要是要把主张打的人送走。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我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要我转报中央。我看过后问他们，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他们说，该件不是此间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新疆问题如何解决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我中央决定。他们又肯定而明确地说：“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9月19日，包尔汉通过我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9月20日后，陶峙岳把最反动的军长叶成、马呈祥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20多人，分批经过南疆送走。

9月25日、26日，由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领衔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新疆省政府，通电和平起义，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10月2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嘉勉，电报中说：“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

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对送走叶成这些反动的高级官员，有些人很有意见，事先不止一次提出要我向中央反映，事后还主张派民族军去南疆堵截。中央出于对新疆全局的考虑，没有接受这种意见。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迪化人民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陶峙岳、包尔汉和我，都参加了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在群众场合公开出面。我参加完大会后，于10月4日从迪化回到了伊犁。

新疆和平起义后，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顽固军官先后在哈密、库车等地制造骚乱，抢劫银行，杀戮群众，社会秩序混乱，人心动荡不安。彭德怀同志和王震同志10月7日在刚解放的酒泉会晤了陶峙岳将军，商谈了解放军加速进疆、起义部队接收改编等问题。

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的先头部队一个加强团抵达迪化。罗元发、张贤约率领的六军，得到苏联的运输机的支援，进入了北疆的各个战略要地；郭鹏、王恩茂率领的二军，主要靠徒步行军，到达了南疆的各个重要城市。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从而结束了历史上反动派对新疆各民族压迫的历史，开始了新疆各族人民平等、民主的新时代。

二

1949年10月12日，还在王震同志进疆途中，党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同志为书记，徐立清、饶正锡、高锦纯和我为常委。王震同志于11月上旬抵达迪化，11月12日就到了伊犁，同赛福鼎和我见了面。我向王震同志详细汇报了“三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三区”革命领导人的主要情况。王震同志兴致勃勃地讲了进疆的一路情况，并告诉我，中央决定留我在新疆工作。他要我担任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也谈到了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民族军改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等重要问题。他说，新疆复

杂的民族问题给我们工作增加了困难，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地进行社会改革，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我们就能站住脚，打开局面。

王震同志到达伊犁后，亲自参加了纪念伊犁革命五周年大会，到阿合买提江等遇难烈士家里进行慰问，找各界人士谈话，作调查研究。王震同志在伊犁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于11月19日回到迪化。至此，我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联络员任务，于11月22日同赛福鼎一起到了迪化。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张治中于11月28日来到新疆，研究和解决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的重大任务。彭德怀同志在迪化亲自主持召开各界人士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驻军的代表和迪化民主人士共30多人。彭德怀同志在会上说：“新疆已和平解放，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一切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在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会议开了11天，经过充分协商，一致通过了改组新疆省政府、整编军队、解决财政经济等三个问题的具体方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于11月17日正式成立。包尔汉为省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为省政府副主席，刘孟纯为省政府秘书长。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为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为第一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改组军队的方案，新疆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民族军改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二十二兵团由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下属5个师，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每个师的政治干部，都由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派干部担任。第五军由列斯肯任军

长、顿星云任政委，下辖 3 个师，一个师驻伊犁，一个师进驻迪化，一个师进驻南疆。二十二兵团和第五军分别于 12 月 29 日和 31 日在迪化和伊犁举行了成立大会。从此，三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军队，都在新疆军区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待遇供给，统一教育训练。

在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共 10 条。《施政方针》是在彭德怀、王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的。在制定《施政方针》时，彭德怀同志特别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彻底实行民族政策，一是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革，一是公务人员必须在思想观点和作风上来一番改造。《施政方针》中的一些内容，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下，结合新疆的情况更具体化了。比如，《共同纲领》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施政方针》根据新疆的情况，增加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内容；又比如，《共同纲领》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施政方针》根据新疆具体情况，增加了“宗教不得干涉司法行政”的内容，等等。《施政方针》公布后，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行动纲领。

彭德怀同志在迪化期间，同我有过多次交谈。他谈到了新疆分局领导成员组成所根据的原则，谈到了在新疆工作要注意的问题。有一次，彭德怀同志观看话剧《刘胡兰》，导演修改了剧本原有的情节，在舞台上出现了群众打死那个杀害刘胡兰的被俘军官的剧情。彭德怀同志看了很生气，演出结束后，严厉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指出这是违反党的俘虏政策的，为了求得一时的痛快而歪曲党的政策，是决不能允许的，责令他们立即改正。

张治中将军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起义部队的干部作了一个《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结合自

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变化,对起义部队改造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造讲了很多好的意见。他针对起义部队中一些顽固分子制造的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烧、杀、抢、奸事件,严肃地指出:“我们确认现在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部队里还是不免存在着反动顽固分子、特务分子,我们要赶快从事肃清,不要让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危害人民,拖累我们的信誉。这是丢脸出丑的事件,你们再不能优容姑息了!”“军队改编为兵团以后,便同王震司令员领导的兵团一样,都是人民解放军。不过,光是改为解放军的名义是不够的,我们要名实相符,在实质上不愧为人民解放军,从制度上、思想上、教育上、经济方面、纪律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彻底加以改造,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人民解放军看齐。一切的一切,都要不愧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光荣胜利的旗帜。”他对起义部队的改造,概括为四句话:改造思想,改变领导方式,改变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讲话,对改造起义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

新疆分局成立后,王震同志十分重视做好少数民族中领袖人物的工作。他提出,要尽快地把基本上够条件的民族领袖人物及时吸收到党内来。他说,“三区”也好,“七区”^①也好,都有一批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其中有的已经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参加了多年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因此,可以采取破格的办法吸收党员。他所说的“破格”,一是不要候补期,一是入党后就可以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当委员。这是一个很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

王震同志从伊犁回到迪化后又提出,一些民族领袖人物有入党要求,要快点吸收,快点办手续,在1949年底把手续办完,使他们填

^① 当时新疆行政区划为10个专区,除“三区”外,其余“七区”指:迪化专区、哈密专区、焉耆专区、阿克苏专区、喀什专区、莎车专区、和阗专区(现和田地区)。

表时能多一年党龄。经过个别审查和两个正式党员的介绍,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第一批党员。分局吸收了一批,南疆吸收了一批,乌鲁木齐吸收了一批,伊犁吸收了一批。我当时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那里也吸收了两三个。第一批共吸收了四五十个党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如包尔汉、赛福鼎及南疆的伊敏诺夫。包尔汉由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入党,赛福鼎由王震和我介绍入党。他们入党以后,就担任新疆分局的委员,参与了新疆分局的领导。

王震同志提出采用“破格”的办法,是充分考虑了新疆实际情况的。第一,抗日战争开始后,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等同志先后在新疆工作过,红军中的一部分人也到了新疆,他们在新疆各民族中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除“三区”的革命力量外,“七区”有三个进步的地下组织:一个是少数民族组织的,为首的努斯哈提,是包尔汉的儿子;一个是汉族青年的进步组织;一个是散布在新疆各地的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干部,形势好了,互相联系后成立的组织。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人已具备了入党条件。第二,新疆和平解放后,“三区”的民族军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三区”革命的领导人有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官员,有的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把他们中间基本够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可以使他们更直接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中国共产党纪律的约束,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好地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

1949年12月底,新疆分局为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王震同志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讲了话。他说:“新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立了包括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的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一支由各民族子弟组成的强有力的民族军,并组成了一个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新盟。伊、塔、阿三区现已成为在新疆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部分,民族军现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同志们入党以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

要通过同志们加强对第五军的领导,使第五军成为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成为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下的军队,成为忠于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新盟现已拥有5万多盟员,它今后则是在党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广泛组织,同志们入党以后,不但不要退出新盟,而且更要加强对它的领导。”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王震同志在新疆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抓紧发展民族领袖人物入党的深远考虑。

当时,发展民族领袖人物入党,是持慎重态度,很有原则的。阿山有个专员是个大巴爷(牧主),曾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对要不要马上吸收他入党,曾有过意见分歧,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的意見是暂时还不能吸收其入党。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确实不够格。

四

1949年12月,毛主席对西北少数民族发出了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新疆在三年内要培养出一万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主席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干部训练班,主要从少数民族中招收学员,用几个月的时间,消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培养各族人民的革命干部。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同志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当时的计划是,分局办的每期招收1000人,训练期为一年;区党委办的每期招收300~500人,训练期为4个月至半年;地委办的每期招收100~150人,训练期为2~3个月;县委办的每期30~50人,时间一个半月。按此计划,就能完成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培养一万少数民族干部的光荣任务。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民族干部已有3600多人。当时,为了建立地方党委和地方政

权的需要，从进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大批师、团、营、连、排干部和一部分战士做地方工作。他们带着干部培训班毕业的民族同志，参加各种社会改革的实践，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党入团。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了。这是新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任何其他阶级和政党都没有采取过这样严肃负责的态度来培养民族干部。

经过干部训练班培养的民族干部，成为积极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骨干。1950年6、7月间，我从北京带回了一个中央关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草案。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满足于民族区域自治，提出了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在王震同志的主持下，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对中央的草案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经过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民族干部，同党站在一个立场上，用刚刚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反对一些人的错误主张，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从而使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大气候。

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采取了由下至上的步骤，前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土地改革以后，首先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然后再在县一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直到1955年10月1日，我们共和国诞生6周年的时候，经过中央批准，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五

1949年冬季，惯匪乌斯满同国民党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相勾结，纠集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在奇台东北的大草原上掀起了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是美国领事馆原副领事马克南策动的。这些叛匪以残酷的手段，裹胁了草原上的一些哈萨克部落，袭击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城镇，劫掠烧杀，企图攻占哈密和乌鲁木齐。王震同志决定对他们采取坚决歼灭的方针。

乌斯满是个老土匪，刁奸险恶，人滑极了，一个时期投靠这个，一个时期又投靠那个。他多次窜扰到苏联边境，苏联红军一打，又跑回新疆，对他无可奈何。国民党也长期对付不了他。在叛乱发生后，苏联朋友表示了想给以支援的意愿。王震同志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不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且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请朋友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他在军事上采取坚决消灭方针的同时，根据当时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哈萨克部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要在政治上采取争取的政策。当时跟着乌斯满叛乱的哈萨克部落群众，都带有自己的畜群，每个畜群有几千只羊、百把匹马、几十头牛，由于人民解放军穷追猛打，他们只能一边打一边走，来不及把畜群带走，都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了。这些被缴获的畜群一律不没收，谁回来仍归谁所有。哈萨克群众手里用来保护畜群免受野兽侵害的枪，允许他们继续保留，而且每枝枪还可以发给5颗子弹，多余的枪支，人民政府用砖茶、盐巴交换。被裹胁的群众回来后，政府一视同仁，一概不予追究。采取这些政策后，被裹胁的绝大部分群众，包括一些部落的头头，都很快陆续回来了。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只剩下几百人，窜逃甘肃、青海和新疆交界的山区，最后被人民解放军活捉，在乌鲁木齐枪决了。

乌斯满被消灭后，新疆只剩下少数零散土匪了。到1951年，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巩固了地方的社会治安，巩固了祖国的神圣边防。

六

1950年1月23日，王震同志根据毛主席发出的军队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向部队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动员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就地屯垦。他要求部队有60%的人力投入生产，每人要开6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60万亩，并响亮地提出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许减少”的号召。王震同志从长期

观点出发,把军队屯垦看成是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屯垦一开始,王震同志带着陶峙岳以及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部队驻地,勘察土地,调查水源,制定规划,组织实施。当时的条件困难极了,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冰雪封地,气候严寒。没有房子住,就挖地窖;没有蔬菜、肉食,经常煮麦粒和包谷吃;没有种子,就用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省下来的粮食到几十里、上百里外的老百姓那里换种子。那种困难的条件,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经过广大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斗,部队屯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0年国庆节前,王震同志写了《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他说:在新疆的三个不同历史条件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都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的气概出现在劳动战线上,春季共开垦荒地85.2万余亩,完成并超过预计生产60万亩的计划。秋季又垦耕冬麦10万余亩,耕种总数已超过了100万亩。在迪化、焉耆、库车、伊犁、塔城、喀什、阿克苏、莎车等地,修建水渠32条,共长123.5万余米,可灌溉土地127.7万余亩,当年收获粮食93.6万余市石(1市石=100升),油料540.6万公斤,蔬菜1745万公斤;养牛6200余头,羊8.29万余只,猪8600余口。

王震同志写的初步总结在报纸上发表后,收到了张治中将军写来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说:“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给您来诉说我的意见和感想。”“您那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在这一年中,驻新战士所表现的忘我的献身精神,发挥的高度的军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鼓舞起的漫溢天山南北的生产热潮,在新疆的现实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这变革几乎是以奇迹的姿态出现的。”“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模部分地

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10年、20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畜牧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部队的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群众的负担，不只是一要出钱、出粮，更沉重的是要出“公差”。南疆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多则要半年。群众给部队运一次给养，能不能安全返回，都是一个问题，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新疆起义官兵有8万多，加上家属号称10万人；民族军有一两万人，加上王震同志率领进疆的部队有10万，三支部队加起来20来万人。如果军队不开展生产运动，什么给养都仰赖于当地少数民族，在新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落后，地域十分广阔，交通异常困难的地区，480万各族群众是吃不消的。如果人民解放军进疆以后，人民的负担比原先还要重，那就会给那些主张民族分裂的人和反动分子以口舌。现在人民解放军艰苦创业，不仅没有加重人民负担反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疆前，群众缴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而1950年只缴了44万石粮食。这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

王震同志领导部队屯垦，雄心勃勃，有长期的打算。他经过调查研究，拟定了一个5年（1950～1954）兴修500万亩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除军队耕种150万亩到200万亩外，其余的用来援助各族人民，使我们的军队成为彻底拥护土地改革的军队。

为了使屯垦战士扎根边疆，王震同志亲自到上海找陈毅同志，请他帮助动员上海男女青年支援边疆。在生产有了一定基础后，利用农闲时间，给部队干部、战士放假，让他们回各自的家乡找对象，使战士能够在边疆成家，生儿育女，安心创业。

到 1952 年底,部队已建立了近 30 个大规模农场,开荒播种了 160 万亩土地,超过了原先要求 1954 年达到的耕种 150 万亩的最低指标,实现了部队粮油自给有余,而且有大量棉花运到内地,支援轻工业的发展。这些农场,在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方面都给新疆各族人民起了示范作用。

我和王震同志相处 3 年,总感到在他面前没有困难,最困难的任务他也要千方百计地去完成。他经常说,他在战争中遇到过许多大困难,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只要坚持下来,就能胜利。王震同志率部进疆时,困难大极了。部分干部战士面对着沙漠戈壁,语言不通,有畏难情绪。王震同志在动员大会上指着旧中国出版的地图说:“北边一块独立了。新疆这一大块地方占全国六分之一,帝国主义正在策划阴谋,想把它同祖国分开。如果这一大块地方被搞走了,我们的国家还成什么样子!”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和感染广大指战员,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夜以继日地向新疆挺进。在新疆组织大规模屯垦,开始有些干部不赞成,有怨言,担心部队从此脱离国防军序列。王震同志善于集中代表人民和军队中的先进思想,只要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就坚持干到底,决不动摇。他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贯彻中央的指示,在全疆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屯垦戍边的伟大序幕。我听一位老同志说过,王震同志进疆也是争来的。他参加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回到部队,起草了一个贯彻会议精神的决议,要求“到最困难的任何边疆地区去”。通过这个决议时,有的干部有意见,不满意,说中央又没有命令你去边疆,抢着去干什么?王震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

王震同志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想干出一番事业的雄迈个性,是他的长处。但长处中也有短处,他说自己“急躁、粗暴”,这往往容易遭到非议和反对。毛主席对他这方面有公正的评价。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一位高级干部说,在共产党员身上要有三个“我”字:追求真理的“我”,不怕牺牲的“我”,自尊心的“我”,但不要惟我独尊的“我”。王震

身上就有前面三个“我”，追求真理的“我”很强烈，不怕牺牲的“我”很坚决，自尊心的“我”过了一点，但没有惟我独尊的“我”。

七

在军队大规模垦荒的同时，王震同志又明确提出，要节省军费开支，筹集资金，在新疆兴办现代化的工业。当时迪化只有一个小硫酸厂和一点土煤窑，根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王震同志的想法是，工厂办起来了，招收少数民族群众进来当工人，培养新疆的工人阶级，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壮大少数民族中党的队伍。在王震同志的号召下，解放军指战员节衣缩食，把津贴费也节省下来存入军人生产合作社。1950年一年，平均每个人节约了20元银元。那时，解放军的生活真艰苦啊！王震同志用这些钱，加上缴获敌人的一些银元，在上海、香港购买机器设备。当时铁路只修到兰州，其中宝鸡一天水一段还不通车，运输很困难。当设备运到西安时，有的部门制造种种理由，想把设备扣下来自己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用汽车把设备运到新疆。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到1952年，就建起了钢铁厂、纺织厂、面粉厂、发电厂、汽车修配厂、煤矿等现代化企业，培养了新疆的第一代工人阶级，为今后新疆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2年5、6月间，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来乌鲁木齐办理公务，专门在新疆多停留了几天，参观了各项建设工程。他看到新疆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极为兴奋，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

建设新疆的思想，王震同志早就胸有成竹。他在进疆途中，亲自到武功农学院、西北工学院做工作，动员了一批知识分子随军西进。这批知识分子进疆后都成了新疆建设的骨干。

为了新疆的建设，王震同志有一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为党惜才，为国用才。当时，新疆有一些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个问题”、“那问题”不被信任，但王震同志大胆从这些人里挑选人才，

待之以诚，给以信用。国民党时代的新疆地质研究所所长王衡升是李四光的高足，有名的地质专家，当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王震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亲自作了了解，认为王衡升可以信用，便派自己的车把他接来，向他请教，让他为新疆的建设出力。王衡升提出了在迪化开掘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同志亲自同他实地勘察，决定立即动工。经过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辛勤劳动，只用了一年时间，露天煤矿就建成了，并在那里建起了坑口电站，解决了当地的电力供应。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王震同志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像农学教授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纺织专家刘钟奇，都是王震同志在领导新疆建设中的高级参谋。他们为新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八

1952年减租反霸结束后，全疆农村开始了土地改革。王震同志出于把新疆建设搞快一点的考虑，提出全疆工作要早一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土改的同时，在牧区也进行改革。当时，我正在南疆调查，了解到很多地主同时也是牧主，他们占有的牲畜占南疆全部牲畜的百分之六七十。农民说，土地改革了，巴爷还是巴爷，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牲畜，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还不能彻底翻身。郭鹏同志说了一个意见，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了，牲畜不动，他们带着畜群进了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回乌鲁木齐后，把调查的情况和郭鹏同志的意见向王震同志作了汇报。新疆分局搞了一个文件，提出在土改同时一起搞牧区改革，既上报也下达。中央知道后，批评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新疆的工作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干部的积极性要保护。毛主席还对王震同志说，不是不要改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你们主张改革是对的，但你们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全局。全国当时正在进行土改，牧区改革要放在第二步。你们搞了就会打乱中央的部署。随后，一个检查团到了新疆，

几乎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有的同志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上屯垦,把节衣缩食兴办现代化的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功过完全颠倒了。

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王震同志于1952年底离开新疆。担任新疆分局书记的王恩茂同志,努力消除这一曲折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的消极影响,直到1956年,经济工作经过恢复重新向前发展。

是非曲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段新疆历史上的小插曲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

(1987年7月17日定稿 兵团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组)

将军传奇故事

赵予征^①

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犹如流星一样，匆匆而过，一闪即逝。也有的人一生为群众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人民很久很久地思念着他。王震将军虽已逝世了，但许许多多的军垦战士都深深地怀念着他们的老司令员。我亦是其中的一位，特写几件跟随王震将军的往事，来悼念军垦事业的开创者——王震司令员。

在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群众中和部队战士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王震将军脍炙人口的故事。在人们心目中王震将军是一位传奇英雄。

1944年初，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我随部队从抗日前线太岳区调往陕甘宁边区，一路紧急行军，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跨过敌占区，连续行军90公里，到达晋绥根据地。稍事休息后，又继续行军，过黄河，到了盼望已久的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部队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绥德县是一个较大的县，县城街道干净整齐，秦始皇长子扶苏墓就在城的西北。部队决定在此休整一下，洗洗澡，补补衣服，整整齐齐地进革命圣地延安，干干净净地去见中央首长。我们住在一姓张的老百姓

^① 赵予征：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副政委、兵团顾问组副组长。

家中，他家一排三孔石窑洞，老少三代一起居住。听说我们是从抗日前线来的，一家人非常热情，常来看我们，请我们讲战斗故事，询问敌后抗日情况，要我们介绍彭德怀、刘伯承、陈赓等抗日名将的英雄事迹。我们从上午谈到下午，他们听得非常入神，时而惊讶，时而敬佩，时而啧啧称赞。我问起老房东：“你知道南泥湾大生产那个王震旅长吗？”张老汉十分敬佩地说：“那可是个英雄，对咱绥德人民有大功劳！”张老汉打开话匣子，从绥德地区的历史开始讲起：1939年前，这里是两个县长进行管理，国共合作，一个县长是共产党派的，一个是国民党派的。而臭名昭著的反共专家何绍南当了绥德地区专员后，倒行逆施，专搞磨擦，破坏抗日，肆无忌惮地逮捕共产党员，地主恶霸反攻倒算，欺压群众，老百姓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那时共产党派的分区司令员，人很正直，打仗勇敢，但面对擅搞阴谋诡计的何绍南束手无策，特别是蒋介石给何绍南的军衔是“中将”，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每到意见分歧的关键时刻，何绍南就把“中将”的牌子搬出来压制人，横行霸道，谁也奈何不得。反共分子愈来愈猖狂，共产党员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共产党派的县长也没法干下去了。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发电报，调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从前线回边区驻绥德兼军分区司令员。入城的那天，三五九旅的将士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机枪大炮列队前进，极大增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绥德群众倾城出动，夹道欢迎。

一天，王震司令员突然接到专员公署副官送来的一张请帖，请司令员开会，后边落款是绥德专署专员、中将何绍南。王震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冲着副官说：“什么中将、少将、芝麻酱、豆腐酱，老子不吃那一套。回去给你们专员说，我现在忙着哪，不去。”副官灰溜溜地走了，何绍南也无可奈何。过了几天，召开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群众、部队，还有各界代表和开明士绅参加。在会上何绍南肆意攻击八路军，说八路军不服从蒋委员长军令，游而不击。一名三五九旅干部愤怒地举左臂高喊：“反对制造磨擦，坚持抗战；反对造谣污蔑八路

军，坚持团结！”何绍南气急败坏地转身向主席台上的人说：“你们看，共产党多左，喊口号还是举左臂。”王震司令员当即义正辞严地进行反驳：“你们知道刚才的那位干部喊口号为什么举左臂吗？因为他的右臂被日本鬼子给打掉了。他是把日寇少将旅团长击成重伤的战斗英雄。刚才何绍南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完全是造谣，你们看三五九旅那么多三八式步枪是从哪来的？是从抗日战场上缴获的。那么多歪把子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是哪来的？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谁破坏抗战，绝没有好下场。”接着，王震司令员当场宣读了群众的检举材料，搞得何绍南当众丢丑，狼狈不堪，带着几个亲信溜走了。何绍南气急败坏，回西安密谋后，又潜回绥德策动保安部队发动叛乱，企图偷袭三五九旅旅部。王震得悉后，指挥部队进行平叛。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将叛乱迅速扑灭。何绍南无奈，只身逃往榆林。国民党派的县长、书记长等人也逃之夭夭。趁此机会，王震司令员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何绍南及其爪牙制造磨擦，破坏抗战，欺压群众，敲诈勒索的罪行。在此基础上，选出人民信赖的县长，建立起抗日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从此，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以后，绥德地区的群众一提起王震，个个称赞是英雄。张老汉一口气讲完，围听的同志不禁拍手叫好，对王震将军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交口称赞他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传奇英雄。

二

1949年，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那时，我在十七师四十九团工作，这是一个红军团，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中的许多重大战役，功勋卓著，部队上上下下充满革命斗志。1949年11月底我们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城市，保卫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天，团长和政委召开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拉石头修和平渠。因为十七师要开垦迪化以北的一片荒地搞生产，原来的和平渠输水量

甚小，必须整修扩大才能满足需要。当时没有水泥，专家们提议用片石砌，共需 7 000 多方片石。采石场在迪化以南的三屯碑，距工地 25 公里上下。师里没有载重汽车，也缺少牛马车，怎么办？师党委决定用人拉。新疆冬季雪大严寒，冰冻路滑，正好用爬犁拉运片石。团政委穆博彦刚讲到这里，干部们就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了：“咱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打江山，九死一生，现在革命成功了，咱们也该享享清福了。”“身上穿了这么多窟窿，还要拉石头，想不通。”“自古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现在要开荒生产当农民，回家算了。”……正在这时，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袁学凯陪着王震司令员进入了会场。

王司令员听了团长政委的汇报，笑着说：“你们四十九团是鄂豫皖红军部队的底子，打仗像老虎，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就说在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嘛。你们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沙家店、瓦子街战役你们打得很出色；解放西安，你们首先进城；扶眉战役、兰州战役你们都打得很顽强。四十九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王震将军这番话博得了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的同志掉了热泪，有的巴掌都拍痛了。

稍静，王震又接着说：“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兵团进疆，新疆和平解放，成了人民的天下。”有的同志就说了：“我们久征疆场打天下，该享享清福了……”

会场一阵骚动，同志们瞪大眼睛等待王震司令员的反应。

“不行啊！”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解放了新疆，还要建设新疆，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进疆部队有 10 万人，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和民族军有 10 万人，再加上旧政府工作人员 4 万多人，需要 10 万吨粮食供应。可是 1949 年粮食总产才 16.96 亿斤（此处指市斤），每人平均粮食才 391 斤，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所剩无几，要保证供给显然是不可能的。粮食回

题不解决，解放军在新疆就站不住脚。若从关内运粮，路途遥远，运输费等于粮价的7倍。若从苏联进口，每吨粮食300卢布，共需3000万卢布。我们国家还很穷，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呢？还是毛主席说的办法，走南泥湾之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部队的官兵，大多是劳动人民出身，不仅在战场上是英雄，在生产战线上也一定会是英雄。新疆水土资源丰富，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的未来。不仅要解决20万大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要创办现代化的国营农牧场，办工厂，办商业，为新疆各族人民造福！大家赞成不赞成呀？”

“赞成！”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司令员诚挚地说：“办农场、办工厂是好事，但这需要钱呀，没有钱怎么办呢？向毛主席要吗？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不能伸手呀，我不当伸手派。向新疆各族人民要吗？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从群众身上刮。怎么办呢？我就从你们身上打主意。”

大家疑惑不解，我们无非就是一个背包一枝枪，有什么主意可打？

司令员说：“我们一年发两套单衣，两件衬衣，减一套行不行呢？破了补一补嘛。”

大家一想，行啊！鼓掌，通过了。

司令员又说：“我们现在一年发一套棉衣，在华北的农民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不要求你们穿九年，两年总是能办到的吧！”

大家笑了，在座的大多是华北人，在家哪有一年穿一套棉袄的，于是爽快地回答：“就这么办。”笑声和掌声表达了大家对首长号召的响应。

司令员不无风趣地说：“大家看，我们的领子是翻的，我们的老祖宗的领子就不翻嘛，把这片布节省下来行不行呢？”

“行啊！”

“还有，我们的衣服上有四个口袋，哪有那么多东西可装啊，我看，节约一半，变成两个吧！”

“同意！”

司令员笑了，师团首长笑了，干部们也拍着巴掌笑了。

王震司令员的讲话迅速在全师传开。虽然此时正值塞外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但指战员们热情高涨，一个气势磅礴的“拉石头会战”开始了。由老红军程悦长师长、袁学凯政委带头，5 800 名解放军战士每人拉着一爬犁石头，像一条巨龙，滚滚向前。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也拉着爬犁来了，特别是先后负伤 7 次、体弱多病的王震司令员也拉着爬犁来了。这一举动轰动了迪化全城，饱受苦难的新疆人民何曾见过这样的军队，何曾见过这样的“大官”还躬身拉石。老百姓倾城出动，欢迎与围观这支奇特的队伍。有的啧啧称赞，有的热情地送茶送奶给司令员和战士们。不久，青年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市民也纷纷加入这一劳动大军的行列。

“拉石头会战”是解放军进疆后献给迪化人民的见面礼，群众从实际中认识到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战士们也从人民的赞扬声中认识到自己所负使命的光荣与伟大。

三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当成农六师头号“走资派”被打倒。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上纲上线的诬陷，被关押、“专政”、毒打是家常便饭。一些原来一起工作的同志纷纷和我划清界线，站到“革命派”一边。

1970 年的一天，原在政治部保卫科工作的小柳突然来到我房子，看看周围没人，神秘地对我说他见到王震部长了（王震当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我一听说王震，精神马上就来了，忙问：“老司令员怎么样？”小柳告诉我，兵团派他们几个人到专案组专门搜集师以上主要领导的“罪行”材料，我的名字亦列其中。一次，兵团“革命领导”×

××派他和另外一个同志到江西向王震部长调查这些人的“罪行”材料，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江西一个农场，看到一个瘦瘦的老同志背着猎枪走来，他们二人赶上前去问道：“老同志，王震部长住哪里？”那老者看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从哪里来？”“从新疆来。”那老人听后气得哼了一声，斜视了他们一眼，再没答理他们，径直往前慢慢走去。他们没办法，站在原地等另一个老同志过来，上前问道：“王震部长住哪里？”那老人哈哈大笑说：“前边过去的就是王震将军嘛。”小柳感到事情不妙，急忙寻找到王震部长的住处，王震正在洗脸。他们就把要调查的名单和问题给王老的夫人王季青说了。王季青对王震说：“你看小伙子们老远的从新疆来了，你是不是见见他们。”王震气呼呼地拿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小柳他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前面。王老喝了一口水，目光炯炯，满腔怒火地喊道：“丁盛和×××不是好东西，把我带进新疆二、六两军的干部都打倒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跟我进疆的一兵团干部，都是经过严酷战争考验的，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反动派，有什么错误？他们是功臣，为什么要打倒？进疆后，在戈壁荒原垦荒生产，节衣缩食，艰苦创业，办农场，办工厂，为国家增加财富，他们是好样儿的，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有什么错误？说他们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一边说，一边用手使劲在小桌子上拍。小柳看到王老气得不说话了，赶紧趁机问了一句：“×××是不是在陕甘宁边区做过生意？怎么八路军还做买卖？”王震瞪了小柳一眼，气冲冲地回答：“做过，那是我叫他们做的，毛主席叫他们做的，怎么样？你们年轻人不晓得，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却拼命反共，用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经济上严密封锁，企图困死我们，那时候相当困难啊！怎么办？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全军立即动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做出了榜样，开荒种地、养猪养鸡，还做生意，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解决了困难啊！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大功一件。懂吧？”小柳一边记录，一边回答说：“王部长给

我们上了一堂课。”小柳紧接着又问：“听说×××犯过错误？”王震说：“犯过。回去告诉你们那些‘革命领导’：我王震的部下，如果犯大错，早枪毙了；犯了小错，早处理了，用不着你们来翻老账。我累了，我要休息了。”说着起身慢慢向自己住房走去。

我很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和我一块受难的老兵们，同志们听了异常感动和惊讶，在那“四人帮”横行，人妖颠倒的年代，谁敢为我们这些“走资派”们说句公道话呢？听到的都是骂我们什么“三反分子”呀，“走资派”呀，“刘少奇的代理人”呀，一派诬蔑之词。而王震将军则仗义直言，说这些人是功臣，是好样儿的，特别是王震当时亦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处境也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他的老兵们，敢于坚持真理，为他们讲公道话。同志们个个深受感动。这和一些人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昧着良心给自己的部下造谣污蔑，捏造“罪状”，无限上纲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更令同志们惊讶的是，对“革命领导”丁盛和×××竟然敢指名道姓地批评，而当时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办事组是明白表态支持丁盛等人的。因受林彪的信任，丁盛升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当时在兵团谁要敢批评丁盛和×××，就被定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被打倒，被“专政”。听到王震将军义正辞严地说他们“不是好东西”，真是大快人心，王震司令员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四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王震率中央巡视团来疆视察，住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当时，我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负责联络与陪同。一天，王震突然接到区党委报告：27日凌晨，喀什地区伽师县发生了一起抢劫县武装部武器库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暴乱头子艾山·司马义（维吾尔族）纠集“东土耳其斯坦燎原党”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离县城7公里的县武装部武器库，砸开库门，抢走了六五式半自动步枪、全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五四式冲

锋枪 150 余枝，子弹近 3 万发。暴徒们抢到武器弹药后，企图攻打县城，杀异教徒，夺取政权，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王震将军听到报告，怒火冲天，当机立断，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身份，命令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立即派出重兵将暴徒包围，准备发起强攻，同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与部队紧密配合，另外通过当地知名人士及暴乱者亲属对叛乱分子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瓦解，迫其投降。暴徒们看到自己已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抵抗无望，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纷纷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共捕获暴徒 149 名，其中投案自首的 43 名。“东土耳其斯坦燎原党”的主席、书记全部缉拿归案，无一漏网。这次平叛，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干净利落地打了一次漂亮仗，受到了中央的表彰。

一次晚饭后，在谈到新疆的稳定时，我说：“老司令员指挥的这次伽师平叛打得好啊！迅速及时、干脆彻底，无伤亡，干部和群众反映非常好。”王震将军笑了笑说道：“对这类暴乱事件，要搞什么‘伊斯兰共和国’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呀，就是要坚决镇压。决心要大，行动要快，打他个措手不及。磨磨蹭蹭，怕这怕那，是要误大事的。其次要出重兵，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如果部队人少了，再争取也不顶事。只有重兵包围，他们看到抵抗无望，一发动政治攻势，他们就投降了，这样伤亡小，效果好，政治影响大。”

五

1975 年 5 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被撤销，兵团解体了，这样，兵团所肩负的“屯垦戍边”的使命就只剩下了“屯垦”，关于“三个队”的任务工作队和战斗队无力承担了。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忧心如焚，出于对新疆稳定的考虑，他大声疾呼：“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

80 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愈演

愈烈，他们狂叫“汉族人抢了少数民族的饭碗”，“兵团人占了少数民族的资源”。反汉排汉，一浪高过一浪，民族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动乱和暴乱事件，1980年4月9日的“阿克苏4·9事件”、1981年1月的“叶城1·13事件”、1981年5月的“伽师反革命武装暴动”、1981年10月的“喀什10·30事件”等等。这些恶性事件震动了新疆各族人民，震动了中央，新疆局势动荡，人心浮动。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王震照管新疆的工作。

王震将军这时已年逾古稀，且重病在身。但他为了边疆的稳定，祖国的安宁，不顾年老体弱，立即起身赴疆。从1980年9月到1982年5月，先后4次来疆，做了大量的工作。老人风尘仆仆，飞南疆、赴北疆，走喀什、访伊犁，或组织座谈，或个别访问，对受害群众进行慰问，对受蒙蔽群众进行教育和劝说，对罪大恶极分子给予严惩，耐心细致地做稳定和团结的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王震将军态度严肃、语气坚定地表示：“对那些要搞什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人及打砸抢首恶分子就是要抓起来，实行专政，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长治久安。”他对一些反汉排汉、攻击兵团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有的部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战功赫赫，老帅们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冬进疆，剿匪平叛，参加土改，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他们搞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有什么错误？”接着他针对一些人对兵团造谣污蔑，慷慨激昂地正告：“对兵团绝不允许破坏，什么‘抢了饭碗’、‘占了资源’，胡说八道。有人还要追什么后台，我就是后台，我王震就是农垦的后台！”这次义正辞严的讲话，对当时非常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当头一棒，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对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兵团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经过细致的、大量的工作，新疆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但是，这次

新疆政局动荡，对王震触动很大，他深感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才能保障边疆长治久安。经过反复思考，他作了如下决定：第一，向中央推荐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第二，给邓小平写信，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邓小平看到信后，感到这是关系到祖国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于是次日迅速作了指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做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王震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中央做决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8月，王震陪邓小平来疆视察，在听取了动乱情况的介绍，进行了大量调查，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邓小平非常郑重地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和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10月，邓小平接见王恩茂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严肃地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6月1日，自治区党委主持召开了隆重的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王震将军专程来疆出席大会，并代表中央作了重要讲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产业大军，是国防军的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强大警备新疆的后备力量。要坚决贯彻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方针；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和保卫边疆……”广大农垦战士和新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一致赞扬王震将军为边疆办了一件大好事，功在祖国，永垂青史。

六

在王震来疆期间，我有一次向他汇报时谈到，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太了解新疆解放初期的历史，不太了解艰苦创业史，王震将军回忆说：“1949年底，我率一兵团这支部队进疆，迅速占领了全境，把红旗

插遍天山南北，插到了阿尔泰、插到了帕米尔。那时起义部队中，有些人就是不听命令，不服从指挥，甚至发动叛乱，我就撤他的职，解除他的武装，管他什么旅长师长。不管哪里发生叛乱，随时镇压，消灭叛匪。有个乌斯满匪帮，到处煽动叛乱，烧杀抢掠，给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哈族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呀！我就指挥部队，坚决剿匪平叛，穷追猛打，最后彻底歼灭。各族人民之所以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因为给他们铲除了祸害。解放军还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土改，减租反霸，民族军也参加了。特别是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拉石头，兴修水利，开荒生产。那时没有拖拉机，主要是靠手挖，苦得很哪！还节衣缩食办工业，挖露天煤矿……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每年都要讲，要一年一年讲下去，历史学家以及我们的老同志，要把这些写成书，写成历史，使我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使我们肩负的屯垦戍边的使命，一代一代传下去。”老司令员语重心长的嘱托，使我感触很深。

1987年我退到二线后，肩上的担子轻了，时间也充裕了，可以翻阅资料研究些问题了。于是我下决心研究新疆的屯垦戍边，从西汉开始研究历代屯田的历史背景、规模和主要经验教训，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创业—发展壮大—遭受挫折—振兴军垦事业的全过程，兵团人屯垦戍边的伟大功绩和无私奉献精神。我要写成书，告诉军垦战士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要自觉地高举起屯垦戍边的大旗，代代相传。

经过3年的努力，《新疆屯垦》于1991年4月出版了，受到了学术界和军垦战士的好评。

1991年5月中旬，兵团副政委倪豪梅要到北京开会，我请她给老司令员送两本《新疆屯垦》。倪豪梅亲手将《新疆屯垦》呈送给王老后，王震将军异常兴奋，仔细地看了图片，并要倪豪梅给他念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转业的命令，周总理、邓小平的题词，古代名人曹操、朱元璋、李贽、左宗棠等人“论屯垦”，并读了前言和目录。王老听得十分认

真,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提笔写了:“这本书很好,读后我将写读后感,1991年5月20日。”并签名,给了《新疆屯垦》以很高评价。

1991年8月,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王震来疆视察,会见了当年与他一起开发建设新疆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军垦、老模范和知识分子,他们互相问寒问暖话家常,老司令员非常开心。临走的那天,我到机场去送他,他看到我笑着说:“你的书写得很好,这是一件好事。”我说:“祝老司令员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他哈哈大笑说:“只要身体好,还要来看你们。”谁知这一别,竟是诀别。将军一去不复返。天山南北许多老兵得知王震逝世的消息后,失声痛哭。

王震将军永远活在军垦战士心中!

(原载《新疆党史》2000年第1期)

深深怀念张仲瀚

王士珍^①

在热烈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45 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思念含冤逝世 19 周年的张仲瀚政委。19 年来物换星移，人世变迁，兵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一个老军垦，每当思念兵团创始人之一张政委时，总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传奇将军

1949 年我在步兵第五师十五团（现和管局四十七团）五连当战士，我们刚进入阿克苏，师首长就命令我团迅速进军和田，并且决定不走大道走捷径，以争取时间防止那里发生暴乱，维护祖国统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捷径就是出阿克苏经阿瓦提，沿和田河故道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目的地。12 月 5 日由黄诚政委率领，我们徒步进入了“死亡之海”，一路上全是露营，吃水也靠打冰饮用，“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因我识几个字，同志们戏称秀才。当我们正在琢磨这浩瀚沙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副班长温仲云突然问我：“这塔克拉玛干为啥又叫瀚海？”我也说不清楚。但既是“秀才”，总得胡诌几句，便顺口说：“古人云‘流沙似水’，其实沙漠无水，既干又旱，而且又大又软，你看

① 王士珍：原兵团司法局局长。

我们在沙上好似水上行舟，所以人们又把沙漠称为瀚海。”说罢便在他手上画了个“瀚”字。这一来他似触了电：“这我就明白了，瀚海原来是咱们七一九团张仲瀚团长那个字，早在南泥湾我们就学过了。他呀，可是个英雄，能文能武，能打仗，会练兵，说笑话，还唱戏，风趣得很呢！这些你秀才就不知道了吧？”

我确实不知道十五团前身是七一九团，更不知道七一九团还有位张仲瀚团长，听“尔哥家”（温的绰号）这么一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路行军，一路打听，始知他是一位传奇将军，我军能文善战的指挥员。他虽出身官宦世家，但爱党爱国，在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又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同党失去了联系，仅凭形势确定自己的任务。他拉队伍高举抗日义旗，在博野组成了一支“河北民军”，经吕正操将军启发，实行政治建军，并请来老共产党员齐健秋到民军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机会阻击日军进攻，打了不少胜仗。后来晋察冀军区成立，他把“民军”编入冀中军区第一师，自己又于1938年回津南地区另组织了一支“津南抗日自卫军”。1939年春，贺龙元帅率一二〇师到冀中指挥齐会战役，“自卫军”参加了战斗，然后他又主动把队伍编入一二〇师，在冀南、冀中连续作战后进驻平山，参加百团大战。后到陕甘宁边区守卫河防，他担任七一九团团长，到延安晋见了毛主席。1941年他率七一九团到南泥湾生产，功勋卓著，深得中央领导的信任，出任南泥湾垦区区长，还到延安亲自为中央领导登台演戏。抗日名将续范亭陪同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时，曾咏《风云庄巡边》，用“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来赞誉张仲瀚。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他又到山东扩军，组建了一支8000余人的队伍，称渤海军区教导旅，1947年归建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为独立第六旅，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的历次战役战斗。

12月21日我们走出“死亡之海”，进入和田居民区，为搞清城内情况，大部队在伊斯拉木阿瓦提休息待命。团里乘机传达中央《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连队做些生产准

备，砍柳条、编筐子、修扁担。我们连长王晓丑讲话说：“咱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不打仗了就要生产，做群众工作。当年，老团长张仲瀚就领导我们在南泥湾生产过，毛主席、周恩来、朱总司令都去视察，都说搞得很好。从今以后，我们非走南泥湾道路不可了。”

12月25日我们进驻和田大营房，过完元旦就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开拓创业的张政委

1950年我任六连文教以后，由于业务关系担任了团油印小报的通讯员，接着又被聘为师、军报纸和《生产战线》报的通讯员。随着部队生产的发展和撰稿工作的需要，读报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那时部队报刊很少，遇有报刊送到连里，几乎是一字不漏地把它读完，因而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国家大事、部队生产，更深一步了解了久已仰慕的张仲瀚政委，对他开拓创业、发展新疆屯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想找个机会见见他的风采。现在回忆，那时从报刊上读到的他的事迹主要有以下几点对我教育最深。

一是共产党人风范，团结、教育部队共同前进而不是嫌弃他们。张政委早年以身许党，进疆后扎根边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生产建设的事业。他不为名，不为利，总为部队全心全意发展新疆的建设事业而打算，不让任何人落伍、掉队。可是，当时部队许多人想的却是要离开新疆或改做其他工作，尤其不愿放下枪杆子、拿起锄把子，认为当兵嘛，搞什么劳动生产，还不如回关内好。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有些同志还编出“扛起锄头放下枪，脱下军装着农裳，军不军来民不民，何必当初把兵当”的顺口溜来贬低屯垦。对此，张政委忧心忡忡，认为团结、教育部队扎根新疆，建设新疆是件大事，是稳定新疆之需要，是巩固国防、保卫边疆之需要，更是部队继续前进、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之需要，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共产党人岂能丢掉大众！因此，他无论在六师、九军、二十二兵团还是生产建

设兵团，都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团结、教育、帮助全体干部战士牢记自己的身份和历史使命，切不要离开党的事业而去。为此目的，他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团结、教育起义部队和生产部队。特别对一些领导干部，更是谆谆教导，反复启发，清楚阐明部队生产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党我军的伟大创举。“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由于他的循循善诱，率先垂范，广大生产部队同新疆结下了深厚情谊，同屯垦戍边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只自己安下心来建设边疆，而且动员亲朋好友、故旧同事也来参加新疆的建设事业。五湖四海，举家搬迁，屯垦事业迅速扩大，全疆的生产部队由初时的十来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据1965年统计，兵团屯垦总人口已达129万，是1952年的10倍。

二是开拓创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去争取胜利而不是寸步不前、固步自封。开拓进取，不避艰险，勇于创造，永不停步，是张政委的固有素质。进驻新疆时，他一如既往。当时，他曾向王震司令员表态：“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都愿意到新疆去。”部队进疆时，六师被安排为后卫，他却急切地率一个先遣小分队提前到达驻地，立即开始勘测荒地，备耕生产，提出生产建设“一要争取时间，二要克服困难，三要创造条件大发展”的指导思想。连刚起义尚未整编的国民党部队都被调动了起来，配合解放军拾粪积肥。特别是他到哈拉毛敦荒原时，见到大片可垦土地如回到了童年，高兴地竟拉着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跳了起来：“老谢呀，高兴吧，这可比南泥湾棒多了！这千年荒原，半壁江山，咱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而此时的谢高忠副团长想的是：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部队到达后住哪里，吃什么，怎么也跳不起来。他察觉后不予批评，反予鼓励：“你十七团司令部就扎在这里，背靠虎拉山，侧依开都河，南去铁门关，北通迪化市。有地、有水，有关隘险要，有省会依托。昔日左宗棠在边疆种柳三千棵，诗人赞誉‘留驻春风在玉关’，今日我们在边疆，要植树种地亿万

亩，‘留驻春风在边疆’。艰险是少不了的，战士、你我也都是血肉之躯，但我们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干部，当年你老谢在南泥湾是顶呱呱的人物，今日在哈拉毛敦也定会战胜艰险，夺得胜利。”是啊，我们生产兵团、农二师、谢高忠都是以这样的精神走过来的，一片荒原，白手起家，克服艰险，建成了一片片绿洲，一个个垦区，一座座新城。在现实面前，我们钦佩他那卓识、远见、智慧、毅力以及开拓创业、不畏艰险的魄力。他有功不居功，有荣不显荣，从不凌驾于同志和组织之上，仅凭自己善于把正在进行的事业同历史紧紧结合起来的作风，引导部队看到先前无法看到、理解不了的事物本质，而勇往直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今日与此有关，我们个人之今日更与此相联。

三是建设石河子新城，给生产部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归宿。生产之初，部队远在荒漠之中劳动，离开城镇乡村看不到前进方向。我们十五团又在边疆之边，更是摸不着方向在哪里，大家都在找呀找。1951年的一天，突然在报刊上见到关于石河子新城的报道，说军区党委1950年就决定要在石河子建设戈壁新城，由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兼任新城建设处处长，九军政委张仲瀚兼任政治委员并负责设计施工工作。城市的规模相当宏大，有行政区、文化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农作区，还有花园、医疗卫生设施，将来还要发展成交通中心和贸易物资交流中心。对此部队反响强烈，认为是给生产部队指明了前途和方向，也安排了归宿，而且树立了榜样，石河子就是将来垦区的模范。十五团政治处十分重视这个报道，要各连文教把它剪贴起来，作为教材之用。1956年我奉命到兵团乌河水利工程处工作，同志们特别嘱托我到北疆以后一定要到石河子去看看。我深深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所以报到之后，马上坐长途汽车到了玛纳斯。次日一早，当我走上玛纳斯河大桥，遥望石河子景色时，简直使我惊奇不已。凝聚着张仲瀚政委多年心血，体现了广大军垦战士希望的石河子新城的确名不虚传，繁花似锦，堪称戈壁明星。我兴高采烈地走在林荫大道上，迎接着来往穿梭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近处是鲜艳夺

目的花朵，远处是浓郁苍劲的林木。站在高处鸟瞰，它如一颗巨大的绿宝石镶嵌在天山脚下，整齐规则，光彩晶莹。一条条林荫大道把整个市区分隔成棋盘式的方块，喧闹的工业区，繁荣的商业区，幽静的行政区、文化区和医疗卫生区各居一格，错落有致。我思索着，想念着，竟然走进了行政大楼去看仰望已久的张政委。经过打听，才知他早已搬到乌鲁木齐市兵团机关办公了。我要告诉张政委，石河子新城这件事您办得太好了，千秋万代，屯垦战士都会怀念您。

平易近人的领导者

1956年9月初的一天，我在乌河水利工程处保卫科值班。科长通知说：下午兵团首长要陪专家来水库检查工作，苟成富处长让我们去个人做保卫，科里就派我去。

午饭以后我即刻上了猛进水库大坝，检查过安全工作不久，两辆小汽车就到了。苟成富处长迎上前去同客人一一握手，当他走近一位身材魁梧、衣冠整齐、文雅潇洒的客人时，一面握手，一面说：“张政委来了，有些日子不见面了。”我才开始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张政委就在面前。我终于见到了日想夜盼的兵团首长、传奇将军张仲瀚政委。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仿佛要在一瞬间透析他传奇的历史和在屯垦事业上的业绩。此时的张政委正在忙碌之中，他同工程技术人员谈话，向苟处长问东问西，听专家们评比论证，处处都是平易近人的态度，一点都不强加于人。他们没喝一口水，更没有坐下来休息一分钟，一直忙了近两个小时。末了张政委转向我们工作人员，我借保卫工作之便，站在离他较近的地方。他在同我们一一握手时，一面问了几位同志的姓名、工作，一面打趣地说：“‘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今后五家渠要成为江南鱼米之乡了。”他又转向苟处长说：“猛进算是建成了，农六师放水使用后你们还得到别处去建设水利工程，在新疆水是农业的命脉，搞水很辛苦。你们大家都要为今年兵团积极分子大会提出的十年发展设想而奋斗。祝同志们创业成

功！”

傍晚，张政委一行回兵团机关了，我却久久地站在水坝上，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回味着他那传奇的历史，回味着石河子新城的美好景色，更回味着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从心底里呼出：屯垦戍边，建设新疆，艰难创业，勇往直前，张政委呀，你还将要付出多少心血。

要把困难留给自己

1958年我调到兵团保卫部，凑巧分配到二科做经济和机关保卫工作，有了更多接近首长的机会。我的老战友宋金玉负责首长警卫，同张政委警卫员王季平等来往很多，我也乘机同他们成为朋友，目的是多见首长，聆听教导。宋金玉对我说，张政委还是很好接近的，平时他爱说笑话、好幽默，身边也无妻小儿女，办公室就是他的家，休息日只要他有空，我们一块去他那里玩。

1960年前后，我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困难，有天灾、有人祸，还有苏联的背信弃义。突出的表现是闹饥荒，人民生活紧张，不少地方出现了缺乏营养的综合性病症，还有饿死人的。兵团粮食是够吃的，1959年总产粮食24 156万公斤，1960年总产粮食25 094万公斤，1961年总产粮食28 314万公斤。但要从全局着想，要上缴国家，要支援灾区，要替国家还债，还要留种子饲料发展生产，根据中央指示，还得安置自流人员和“移工就食”人员，总之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把粮食拿出去支援国家。因而全兵团得过紧日子，苦日子。为此，张政委整日整夜地同师局领导计划、算账，做思想工作，尽量拿出粮食支援国家，尽量安排好兵团的职工生活。他不断地调查研究，审批报告，下发文件，要求在职工生活上绝不能出问题，并且拟定了一些应急措施，发动群众“瓜菜代”共渡难关。当时我在农二师破案，张政委通知保卫部让我们在下面的同志关心职工生活，做调查研究。我专程到二管处各团场去了几十天，在六团（现二十九团）见到职工生活确实艰苦，衣服单薄，定量很低，吃不饱肚子，不少人都备有“瓜菜

代”，把野生稗子打回家去壳作粮食补充着吃，因而体力还好，有信心渡过难关；干部则与职工相同，只是“瓜菜代”的品种多一点，副食也较职工稍好些，但都能同职工同食同劳，关心、体贴职工的疾苦，如有的干部在挖排碱沟时让职工在上面，自己下沟底站在水里挖泥。我如实地将这些见闻写报告寄张政委亲收。后来，他见到我时说那个调查写得好，既写了让人忧心的地方，也写了让人放心的地方，有指导意义。还说：“农二师这支部队是很顾全大局的，为大局宁可牺牲自己。1948年荔镇战斗，十八团团长陈国林就是为挽救大局而牺牲的。我们机关的同志始终要记住，一定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别人。”

1961年春，我又跟随政治部王季龙主任到农七、八师检查职工生活，见到职工生活依然紧张，成群的肥猪、成车的果品被外贸运去还债了。同时还安置了甘肃等地的“移工就食”群众，部队生活就更紧了。情况反映到张政委那里，他还是那句话：“粮食事关大局，困难要留给自己，我们的职工吃了些苦，但保住别人也很应该。”是呀，我感到农七、八师的同志们确实是吃了苦，但心里却很甜，大都是笑笑说：“张政委哪，总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顾全大局，真是王震司令员说过的，‘他张仲瀚的长处就是有全局观念啊’。”

总有说真理的时候和地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南泥湾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具体体现，她在新疆屯垦戍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重视和支持她，都到兵团视察指导过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却百般破坏，离间她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鱼水关系，打击、迫害她的领导干部。诬陷张仲瀚政委冤狱就是证据之一。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曾见过张政委几面。那时他已身不由己，但仍为兵团的事业而抗争。他说：“（1966年）7月中旬新华社记者从北京到兵团，传达了《人民日报》要在8月间用8个版面的大篇幅报道兵团的决定，以推

动毛主席、周总理设想的在全国发展生产兵团的计划，可是不到半年，她竟成了罪人？”“我们的政法工作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怎么成了黑线专政？”“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着生产兵团，怎么成了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他越说越悲愤，我也越听越难过。我说：“我们都想不通，但是什么原因，暂时谁也弄不清楚，还是先安心休息。您说过，‘总有说真理的时候和地方’，相信会有有一天能实现。”他点头送我而别。他还有个特点，每次总是拉着你有着说不完的话，嘱咐这、嘱咐那，要你回去一定要问候一些同志好，安慰大家，别过于想不通而把身体弄坏了。他越是嘱托，我心里就越是难受。往往不是我安慰他而是他安慰我。因此，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高大了。多么坚强的人哟！

但是，张政委终因8年冤狱而身心不支，于1980年3月9日12时35分在北京逝世。十年干戈老，四海痛哭深。同年3月1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在八宝山主持追悼大会。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致悼词，他说：“张仲瀚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长期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患心脏病，虽经长期精心治疗，终因循环功能衰竭医治无效而逝世。”这句真切而实事求是的话既揭开了我们心中十几年的谜底，又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也应验了张政委自己预言的“总有说真理的时候和地方”。“道远知骥，世伪知贤”，1983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表彰他的业绩，由国务院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张政委，我们愿您在天之灵安息吧，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屯垦职工一定会把您开创的事业搞得更好，进行到底！

（写于1999年5月）

商 河 忆 旧

——缅怀老友刘一村

叶尚志^①

老友刘一村 2000 年 9 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逝世，因地址变动、邮路耽误，我在 2001 年新春才得到噩耗，非常悲恸！不禁回想 56 年前我们在山东渤海军区相遇、初识、共同工作、共同生活的一段难忘的历史，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一切，令人怀念不已。

我和一村的故乡原是近邻，他是安庆桐城人，我是安庆宿松人，又在安庆市成长。但我在少年时就离开故乡，抗战爆发前后外出求学过程中在党领导下做救亡工作。到八路军总部（山西）参军，调到延安抗大学习、工作，然后又过黄河，返回山西、太行，又到山东敌后方工作。

我与一村初识是在 1945 年秋季，山东渤海地区商河县，其时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部队政委；他是随新四军北撤分配到这个县，前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是县委委员。初次见面是在经过我军一个多月包围新近打开的商河县城内一个汉奸司令的住宅，这时已是县委机关大院。我因离开故乡长江一带已历 9 年，一村又是一口桐城乡音，还因为我的长兄抗战初从八路军总部学兵队（山西）随彭雪枫将

^① 叶尚志：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刘一村的老战友。

军组建新四军四支队，8年阔别，我对新四军在我的家乡坚持抗战当然特别关心，南方来人特别亲切，所以对一村有一种像见到亲人的异常亲切之感。在我住的北屋见面开始交谈时并非先谈工作，而是畅谈抗战整个过程家乡的情况变迁，之后就与县委的同志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这时正是日寇投降不久，全国盼望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到来，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却被蒋介石撕毁，发动内战，正处于紧张阶段。县里的工作有土改、参军、支前、剿匪、反霸，这些工作一环扣一环，是互有联系的。党政军民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争取前线的胜利”。县委委员有县长左栋周（前几年在烟台逝世）；工农青妇救国会（简称各救会）主任是阎华文，当时兼组织部长，以后由刘一村接替，他任县委副书记（前几年在济南逝世）；宣传部长张永和（前几年在北京逝世）；组织部副部长王玉文（现在仍在北京）。部队政委由我兼任。一位副政委刘天祥为县委委员，他在解放战争后期打金门时表现英勇，是师职干部，于登岛后，因海潮阻隔，援军失掉联系，全团伤亡，他重伤被俘，被敌军杀害。我们至今痛惜、怀念不已。县委几位委员都很精干，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又很团结，除分散下基层工作之外，每日生活在一起，吃大锅饭，既谈工作，又谈家常，有说有笑，非常乐观，干起工作有如生龙活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与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也有关。我当时26岁，一村比我大9岁，左栋周、阎华文、张永和、刘天祥年岁相仿，比我大4岁左右。王玉文比我小一岁，现在只有我和他幸存健在，都年逾八旬了。其他同志牺牲的牺牲，逝世的逝世，只能在梦中常常见到这些亲如兄弟的战友了。

一村与县委办公室的秘书韩建成以及组织部的干事马学普、宣传部的干事张振礼，就住在我的对面南屋，朝夕相处。我们的工作方式非常战斗化，这与我们都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也与我和一村原来就是部队出身有关。我们全县所有工作由县委统一安排，各委员都要参与中心工作，分片负责，然后按自己的职务在中心工作中开展自己

分管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大家一齐做，是不必分工的。那时早已实行党委领导一元化，我除了负责全面工作、协调各种工作关系之外，常领着部队剿匪，在剿匪过程中土改、反霸。那时所谓土匪一是投靠国民党的汉奸部队，一是土改后的逃亡地主武装起来的“还乡团”，二者常常集结在一起，结队从济南出来，学了我們过去打游击战争的一套，骚扰革命根据地和边境结合地带，杀人越货，袭击区乡，乃至县城，危害极大。为此商河、惠民、济阳三县边境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指挥部由三个县的县委书记（都兼部队政委）参加，惠民是马晓泉，一位抗战前入党的老同志，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马颊河；济阳是傅科，红军时代老同志，后在辽宁工作；商河是我。经过近两年的清剿，在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中终于平定下来了。这在当时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和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这便是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大背景。

我与一村相处，觉得他有许多优良品质。他出身贫苦，养成朴实、勤劳、节俭、谦虚、和善的品格，他态度平易近人，作风细致踏实，深得干部的好评。他虽然操一口南方乡音，却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埋头苦干，从不声张，不放空炮，不作惊人之语。他虽然学历不高，但来自桐城文化之乡，勤奋自学，新旧知识都有积累，文化水平不低，写得一手清晰、工整、秀丽的好字。他常参与县委一些文字的起草、校订工作。他对人关心、爱护，适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是一位好组织部长。

大约是1946~1947年冬春之际，渤海区党委和军区下达指示，要在已经完成数批征兵任务之后，再次发动参军；并介绍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北第一野战军派来的一个接兵组来到商河。接兵组的组长也是团长是陈实，政委是于侠，还有一位团政治处主任，以下还有营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个团的架子，只待新兵到齐，就成为一个团建制。接兵组到商河由我和县长及县委全班人马接待，当然待如贵宾。从此我和陈实、于侠结成了长期的友谊。

这个接兵组原来是陕北南泥湾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的老人马。

我原来在延安抗大，1938年分出第一分校约5000人渡过黄河东迁挺进山西太行山时经过南泥湾、金盆湾，他们从驻在那里的老部队来，我感到特别亲切。在商河除了商谈接兵工作外，我和陈实、于侠谈得较多，增加了互相了解。特别是了解到陈实是随周恩来新近到南京、上海与国民党谈判，他是军事参谋，从他谈吐中得知谈判和周恩来的一些情况。据他说，周恩来当时工作之繁忙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像的，他不但睡眠时间很少，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还不规律，也无保证。周恩来为了革命工作不眠不休是有名的，据说他常常是在汽车里手托着头或吊着扶把打个盹，下车照样神采奕奕地面对各种场合和人物。陈实是知识分子型的军事干部，善于言谈，处事果断。于侠则是一位老红军工农出身型的政治干部，为人厚朴、稳重，寡言少语，办事扎实，他们二位是一对好搭档。

我原在另一军分区两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是1944年就调到商河来的，经历了根据地时期的减租、反霸、典当回赎、雇工增资、合理负担的群众运动，以及基层政权改造和建党一系列工作，日寇投降后配合主力部队，发动民兵、带领县区部队围攻商河城，歼敌一万人，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工作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迎来解放战争新阶段。这时全县已经发动过两次大参军，第一次有数千人，充实到紧急开赴东北的杨国夫、龙书金为正副师长的渤海主力师；第二次是通过参军，将大批补充兵员输送到县部队升级的军分区主力部队，加入新成立的第三野战军宋时轮为司令员的渤海纵队。这次大参军是第三次，补充一个团，充实西北第一野战军。

发动这次大参军的工作是在一野派来陈实、于侠为首的接兵组之前，与开展土改运动的同时进行的，已经部署、督促、检查，取得了成果。开始是由全县区脱产干部和乡村未脱产干部总动员，进行一系列宣传、组织工作，硬是落实到每个村、每个家庭、每个人，把参军和带队的名单都搞好，新兵家庭问题、家庭困难都解决好，一一落实，然后编成班、排、连、营、团，成建制地按规定时间到县里集中。各村形成

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送、亲友送别，新兵骑马、挂上红花，敲锣打鼓、大扭秧歌等动人情景，一时农村形成大参军热潮。参军新兵都是18岁到20岁左右的青年小伙子，都是在历次群众运动中翻身的家庭输送出来的，一色的贫下中农和雇农，对我党我军有很深的感情。他们都当过民兵，在农村是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经过了斗争的洗礼、组织的锻炼和民兵的训练，其中有不少是农村党员，有一些是这次参军表现突出新近入党的。所以新兵的质量过硬，这样的青年组成的部队在部队党的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统帅下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呢？我原来就是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朱德、彭德怀正副总司令麾下的一名老兵，对于新兵即将能够在彭德怀司令员麾下行军作战、克敌致胜有一种特别的深情，寄予殷切的期望。

为了加强部队新兵工作，按上级部署，经过县委酝酿讨论和自愿报名相结合，要抽调一位县委委员带领新兵加入新兵团，最后选定刘一村，与团部商定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二区老区区长周德彰担任营长，还商量决定了一些连排长。一天上午，在临时搭起的简易露天主席台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参军大会。由我和县长、接兵组的陈实、于侠讲话，表示热忱欢送和欢迎，然后宣布编制和任命，介绍团、营、连干部，最后由新兵代表讲话、宣誓。记得是一位新任连长的优秀农村党员干部梁渐和作为新兵代表，他捧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讲话不多，突然跪在主席台上面对新兵和参加大会的干部群众，举拳领着广大新兵向毛主席像宣誓。宣誓词大意记得是：热爱部队，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他感情激动，感染力很强，全场宣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情绪热烈。大会结束后，就由团长、政委率领部队序列从会场出发，还没有穿上军服，就开拔到训练营地去了。临别时，我们依依惜别陈实、于侠，特别是刘一村，互道珍重，胜利时再见。许多参军的乡村干部和新兵团，与县委和全县干部本来就熟悉，是地地道道的子弟兵，临别时握手道别，不

少人流了惜别之泪，有些新兵像孩子一样哭了，情景感人，至今 50 多年回忆起来，仍不能忘。

直到建国那年，我调到北京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才得知我所熟悉的渤海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大批转业干部从王震任司令员的铁道兵转业到新疆、宁夏；从商河参军的新兵经过培训，立即行军作战，参加了河北、山西、陕西一些著名的战役和战斗，一直打到新疆，直到和平解放新疆，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不论是在战争中或是在建设中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后来不断得知大批年轻干部和战士都茁壮成长，令我万分欣喜。刘一村一直在兵团领导机关做领导工作，周德彰担任了一个州的负责人，梁渐和担任了一个局的负责人。虽万里迢迢，但也互通过信息，还见到过他们几位。

我于 1956 年第一次到新疆，那时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任务是调查研究民族干部问题，在乌鲁木齐喜逢一村。我到过昌吉、石河子、伊犁等地，处处都遇到过山东商河参军的同志。又相隔几十年，我于 1986 年陪外宾重访新疆。这次到了南疆喀什、吐鲁番（火焰山所在地）和哈密，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待宴会上又见到老友陈实和刘一村，真是喜不自禁。这次重逢距初次在商河相逢已有整整 40 年了。陈实已从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一村已从兵团副政委岗位离退下来，回想过去相识大家都年轻，现在都步入老年，不胜感慨。大约是 1990 年前后，一村在南方各地参观、疗养，经过上海来到蓬舍，又一次欢逢相会，更是喜出望外。在此前后，我们偶有书信往还，不料，今年元旦前后突然接到一村逝世的恶耗，天涯远隔，遥洒老泪，惟有寄上心香一片，悼慰于一村之灵了。

过去老友相逢，无话不谈，但从不及自己的荣辱。这次看到寄来的悼念册子，反倒使我对一村于阔别之后在新疆部队建设的政治工作中，在生产建设的艰难困苦中，在“文革”这场特殊斗争中和在改造俘虏和犯人的工作过程中表现的优良品质和突出贡献，更有了一

些了解。这与我们过去在一起工作时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养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正如在延安中央同志为五老祝寿时所说：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最难得的是一生的品德和表现，都是表率（大意如此）。一村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共产党员，他永远活在我们这些老战友和熟悉他的干部和群众心中。

（2001年2月1日脱稿 于上海寓次）

坚强的党性 光辉的业绩

——深切怀念谢高忠

郭书森 杨一青^①

谢高忠在他七十有二之年因病逝世，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骤然离去都感愕然，痛惜不已。几个月来，我们怀着对谢高忠依依难舍的思情，敬读了他的遗著《铁流挥戈五千里》。联想到他生前的做人与对我们的关怀和教益，我们都为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形象所感动，更加激起了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谢高忠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党的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22年生于山西原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年仅15岁的谢高忠于1937年10月毅然投身革命参加八路军，成为王震将军领导下三五九旅的一个战斗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历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州委书记，在屯垦戍边中，成长为自治区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赫赫战功，而且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和兵团农垦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① 郭书森：原兵团检察院院长，曾任农二师公安局局长。杨一青：原兵团计财局副局长，长期跟随谢高忠工作，曾任谢高忠的秘书。

南征北战 舍生忘死

在战争年代,谢高忠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三五九旅南下北返及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他基于出身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军旅生涯的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敢为天下先的气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青年时期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后,都想争先进,夺第一。”1940年三五九旅从华北抗日前线奉命返回延安,驻扎南泥湾地区。当时谢高忠在七一九团十二连担任班长,为了部队冬季取暖被派到二垆山烧木炭,他带领全班选用硬质木柴,扩大了土窑容量,烧出的木炭数量多、质量好,受到上级的表扬。当时部队没有运输力,靠人工背粮,谢高忠所在的班用自己的毛毡当口袋,粮食装得多,人跑得快,被评为运粮先进班。1941年,三五九旅响应毛主席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号召,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金盆湾开荒时,谢高忠以身作则带头劳动,一天开荒四五亩,全班人均种地30亩,年人均产粮1500公斤,圆满完成了“耕一余二”的任务,被评为模范班,他本人被旅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1943年冬和1944年春,西北联防军贺龙司令员命令边区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谢高忠第二次在旅教导营学习并担任排长。他勤学好练身先士卒,坚持和学员一起爬、摸、滚、打,投弹射击,超越障碍,跑步翻山,并向每个学员示范三大技术中每一个动作。三五九旅举行全旅技术战术大比武时,谢高忠被推选为典型代表参加了比赛,实弹射击3发子弹打了27环,得到“特等射击手”称号;投弹58米,荣获“贺龙投弹手”称号;刺杀在全旅夺魁,获“朱德刺杀能手”称号;全副武装完成三大技术合成动作比赛全旅第一名。由谢高忠组织的班进攻训练演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并作为典型在全旅推广。谢高忠这种不甘落后、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成为他特有的思想品格。

谢高忠作战勇敢,打过不少硬仗、苦仗。1939年三五九旅挺进华

北抗日前线,在对日作战的上下细腰涧战斗中歼灭日军近千人。这时谢高忠在旅教导营当班长,他奉命带领一个班单独作战,在连续7天的战斗中,他们班时而出击,时而阻击,不断袭扰敌人。战斗近结束,他们班配合七二八团打扫战场时,阵地上有几个日军藏匿在石缝中用机枪射击顽抗,谢高忠用借来的一颗手榴弹向石缝口准确地投去,炸死敌人,缴获日式机枪一挺。1946年7月,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北返途中,他担任七一九团四连连长,在河南淅川荆紫关战斗中,为了夺取制高点,保证大部队安全突围,他带领全连经过5次拼杀,攻占了敌人截路的前哨山头。后由攻变为守,激战了4个小时,在上千敌人的包围中,他用反包围的战术以佯退的动作迷惑敌人,当敌人离开工事追至一条河沟时,全连出击,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荆紫关。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谢高忠随三五九旅一批干部赴山东渤海建军,组成教导旅(独六旅),他在独六旅十一团二营当营长,在西北战场先后参加了运城、瓦子街、黄龙山、荔北、扶眉等重大战役。特别是在1948年11月著名的永丰镇战斗中,谢高忠率领的独六旅十七团二营执行突击营的攻坚任务。在扫清外围的战斗中,二营首先攻占了永丰镇北面的南庄据点,配合十八团三营捣毁了敌人高碉群。在对壕作业中,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轰击,谢高忠被爆炸的浮土埋住了身子,震聋了右耳。我军向永丰镇敌七十六军发起总攻击后,他带领二营与十八团三营首先冲进突破口,夺取敌人的山炮阵地,生俘了300多个敌人。谢高忠将第一批俘虏押送到城外后,为多捉俘虏、多缴枪,他组织二营在城外待命的部队,第二次冲进永丰镇,与从永丰镇西门打入的四旅十团一营一起包围了敌二十师师部,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巷战,又生俘敌900多人。正当他与二营部队押送俘虏、搬运着两门山炮通过突破口时,突然遭到敌七十六军警卫营的疯狂反扑,这时谢高忠执行命令带领四连第三次冲进永丰镇,配合十七团三营和十八团一营,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在围追敌人的巷战中,谢高忠手持冲

锋枪射击，投掷手榴弹，与战士并肩冲杀，狠狠惩罚了敌人。这次战斗谢高忠三次负轻伤不下火线，他带领二营三进三出永丰镇，以全营伤亡 150 多人的代价，俘敌 1 300 人，缴获山炮 2 门，82 迫击炮 6 门及大批轻武器和弹药。由于谢高忠作战有功，这次战斗结束后晋升为十七团参谋长。

在战场上，谢高忠不仅身先士卒，作战勇敢，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智勇双全，指挥有方。担任十七团参谋长后，在 1949 年 6 月的陕中战役中，我西野部队为抗击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联合反扑，在二军战略撤退中，军首长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歼灭进犯至金渠镇地区的敌三十六军及其二十师、一六五师。当敌一六五师先头部队四九四团进犯至南塬村庄时，被我六师十八团、十七团和五师十四团三面包围。在激战中，十七团按照指定位置沿秦岭北麓向敌三十六军侧后迂回时，与敌一六五师相遇，金仲藩团长和谢高忠发现北面法流嘴村附近有敌吉普车走动和重炮集结，分析可能是敌师指挥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紧急情况下，金团长与谢高忠立即指挥十七团向敌师指挥部发起突然袭击。一营首先冲进村庄，攻占了敌一六五师指挥部。十八团一营三连陈官印战斗小组在敌人溃散时活捉了敌一六五师少将师长孙铁英。这次金渠镇战斗，金团长和谢高忠抓住战机，指挥果断，英勇主动地袭击敌人，打了胜仗，歼灭了敌一六五师大部，俘敌 2 000 余人，缴获山炮 1 门，生俘敌师长。时隔 40 年后，金仲藩从成都军区返回新疆，一次去农二师二十一团（前身即独六旅十七团）时，陈炳昕谈及金团长指挥有方，活捉孙铁英的故事，金谦虚地说：“不是我指挥得好，一是有你们这些山东好汉能打硬仗；二是有谢高忠这个好参谋长，他能参能谋、有智有勇。”又说谢高忠如果不在兵团而在军队工作，理应是位难得的将军。

谢高忠青壮年时期军旅生涯，长时间在部队基层单位任职，都是在战斗的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他征战南北，挥戈东西，经历的大小战斗不计其数，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不管

战斗多么残酷，他总是舍生忘死，不畏艰险，英勇顽强，冲锋陷阵，不愧是人民的英雄。

屯垦戍边 呕心沥血

谢高忠是开创兵团农垦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导者。新疆和平解放和解放军进疆后，他曾任二军六师十七团副团长、政委、团长，二军六师司令部参谋长，农二师副师长、师长；“文革”后，任兵团农四师师长。他在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兵团农垦建设。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谢高忠当时任二军六师十七团副团长，征尘未洗又随师长张仲瀚率先遣队入疆。在稳定起义部队和焉耆地区社会秩序的同时，马不停蹄深入焉耆盆地踏勘水土资源，并从多方面了解当地的社情，为大部队入疆大生产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部队进疆后，谢高忠任十七团政委、团长。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发扬南泥湾精神。1950年和1951年大生产伊始，他就以十七团开荒生产成绩优异而受到师生产代表大会高度赞扬，驰誉全师上下。后来十七团先后在杨有才、崔振帮团长的直接领导下，连年农业丰产，被西北局刘澜涛书记赞誉“有志者事竟成”，并树为西北四十面红旗之一。这个成绩的取得，谢高忠开拓、奠基功不可没。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素有“死亡之海”之称，它的东部地区远在汉唐、近在满清，先后曾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屯垦，但时隔不久，都因河渠冲堤、风沙移动、土壤盐渍化等等原因而迫不得已搬迁，屡垦屡废，前功尽弃，只留下一片荒漠和星星落落的“无人村”废墟。因而自晚清以来，人们对这片荒漠的开垦视为禁区，谈虎色变不敢问津。1958年兵团和农二师决定开发塔里木后，谢高忠作为农二师副师长（后任师长），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进军“死亡之海”的任务，决心走前人屡垦屡废不敢再走的路。在交通运输、资金物资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是年3月1日长途跋

涉深入不毛之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开荒造田。他根据当地条件，提出了“全面规划，分批施工，水利先行”的原则。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与大家同住草棚子、地窝子，同吃窝窝头、喝盐碱水，同顶烈日风沙，开荒修渠。当时史无前例的艰辛和干劲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经过 10 个月的苦干，开垦荒地 45 万多亩，挖修渠道 173 公里，建成水库 3 座，水工建筑 637 座，初步建立起 6 个农场，为农二师大发展的规模和扩大生产打开了新局面。这 6 个新场虽然遗留工程较大，但经过调整、补课之后，都具有了生产能力。特别是全面推广二十九团种稻治碱、稻棉轮作的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蒸蒸日上，粮、棉、果、茸连年大幅度增产增收，已经成为“白金之国”和“鱼米之乡”，单产和经济效益跃居兵团先进团场之列。昔日的“死亡之海”变成了富饶的绿色走廊。在开发塔里木东部沙漠过程中，曾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人物，而谢高忠则是其中卓有贡献的一个。他作为领导，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整天奔波在生产第一线，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为解决施工中的问题，这一时期他曾 39 次颠簸在塔里木与乌鲁木齐之间，多次过家门而不入。工作告一段落后，他本来微胖健壮的身躯变得又黑又瘦，整整小了一圈。回到家时老伴见了痛惜得说不出话来，背过身去直流眼泪。

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经济恢复时期，身为农二师师长的谢高忠，根据当时劳动秩序混乱、制度不健全、农业产量低下的具体情况，长期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工作，与团场、连队干部一道开座谈会，出主意、想办法，大力推行“定、包、奖”制度，并明确地指出：“包产越具体、越和职工个人的切身利益结合得紧密，越能充分地调动职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搞好生产管理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多次深入田间与职工一道劳动操作做技术表演。因而极大的调动了广大职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文革”前的 1966 年，比 1960 年粮食总产增长了 1.63 倍，6 年平均年增长 27.2%；单产 6 年增长了 2 倍多。全师工农业生产呈现一片蒸蒸日上的形势。

谢高忠 1978~1981 年任自治区副主席兼农垦总局局长时,正值十年浩劫之后,兵团解体,人心浮动,“回城风”四起,农垦生产连年滑坡,经济亏损十分严重,1977 年亏损多达 2.4 亿多元。谢高忠面对这种局面,压力十分沉重。但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他坚信一定能改变这种局面。为了加强新疆农垦的领导,他首先抓了新疆垦区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以自治区领导为主的体制。同时,他认定只有稳定才谈得上发展生产,因而集中全力抓拨乱反正,稳定农垦局势,恢复生产秩序;狠抓了财务包干,建立生产责任制和落实政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生产基本上走上正轨,使濒临破产的农垦经济迅速回升,工农业总产值三年迈了三大步,平均年增长 11.89%,并且从 1981 年起扭转了自“文革”以来一路亏损的局面,盈利 2 000 多万元,为恢复兵团奠定了组织和经济基础。

1982 年恢复兵团建制后,谢高忠担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党委书记,主管兵团农牧业。至 1987 年历时 6 年的时间里,兵团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1983 年中央 1 号文件及全国农垦会议精神,在兵团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并根据兵团党委提出的“一主两翼”改革决策,掀起了大办家庭农场、发展庭院经济的热潮。随着改革的深化,谢高忠亲自抓点,在兵团 30 个农牧团场进行了团(场)长承包责任制的试点。1986 年,谢高忠通过长期观察和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兴办家庭农场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南疆各师(局)片会上多次提出“兴利除弊、大稳定、小调整”的措施,强调改革要围绕“提高生产、增加收益”这个中心,要根据各单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探索、选择和完善适应各自不同具体情况的组织形式,实行个人、家庭、联户等多种形式的承包。同时,还强调在“承包者自主经营的原则下,加强五统一,强化宏观调控,纠正种植失控和产品失控”。这些深化改革的意见,既有利于发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科学化、规模经营的优势,也有

利于调动广大职工家庭和个人的积极性,对兵团推动改革、促进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谢高忠在坚持深化改革的同时,狠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坚持不懈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加大农业投入,提高机械化程度,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因此,兵团农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87年比1980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95%,粮食总产提高了四成,棉花总产提高了一倍,粮棉平均单产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特别是南疆垦区师(局)农业生产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后进状态,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一年一个台阶,农业生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单产和经济效益不仅跃居全兵团先进行列,而且达到了全国农业先进水平。不言而喻,这些成绩与谢高忠的努力密不可分,凝聚着他的大量心血。

1987年谢高忠退居二线后,任兵团顾问组副组长,继续为新疆和兵团的建设事业操劳。他轻车简从,经常深入到兵团各个团场乃至生产连队做调查研究,为各级领导出谋划策。他还被兵团两个直属团场聘为顾问,每年有几个月到这些单位指导工作,甚至做技术示范,深受职工们称赞。就是在他抱病住院和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兵团的事业。

谢高忠一生58年的革命生涯中,有45年是在新疆效力于兵团的农垦建设事业。前期他从开都河畔第一犁到开发塔里木,为农二师垦区的经济发展殚精竭虑,劳身焦思,垦区的每个农场乃至每块条田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壮大开创了辉煌业绩。后期他在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机关承担着更重要的领导责任,为巩固和发展新疆与兵团农垦建设事业,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加速了兵团农垦经济的发展和农场的致富步伐,开创了兵团农垦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党性坚强 实事求是

谢高忠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矢志不渝。他坚决拥护、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开放，坚决拥护和服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无条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组织纪律性特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他严格要求自己的格言。1953年，新疆军区部队实行大整编，从组织上任务上整编为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部队——国防军和生产部队，二军六师划为驻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实行集体转业，同时抽调上百名师、团、营、连干部到关内国防部队工作。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关头，是去是留触动着每个人，特别是干部的思想。谢高忠当时担任六师司令部参谋长，论年龄才30岁，论身体条件和战斗经验调到关内国防部队本应是优选的对象，他也曾要求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他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愉快地接受党组织的决定，留在了生产部队工作，而且在稳定部队情绪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整编达到了留者安心、去者愉快。

1982年兵团建制恢复后，兵团领导班子有多次调整，无论是任第一副司令员、党委常委、党委书记，还是任顾问组副组长，直至离休，谢高忠都能以大局为重，摆正自己的位置，一切听从党组织安排，不讲价钱，不计个人得失，自觉地服从党的决定。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谢高忠党性坚强，光明磊落，在重大是非问题上从不含糊其辞，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特别是1966年8月参加自治区党委三千会时，他目睹兵团历史被严重扭曲、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痛心疾首，不顾政治风险，敢说敢做，与其他师的领导组织三千会的兵团代表开展大字报攻势，写出了“九评兵团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对林彪、“四人帮”在兵团的代理人所谓“兵团17年是修正主义路线”、“黑线专政”、“国

民党政权”、“兵团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张仲瀚是三反分子”等种种谬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用大字报的形式理直气壮地表述了“兵团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张仲瀚和兵团广大干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兵团是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方向”。这些大字报虽然是以鸣放的形式，具体是针对兵团“文化大革命”的，但它所反映的思潮则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以及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不抓经济建设的突出政治、无政府的群众夺权等一系列理论和行径的一种公开的抵制。谢高忠在党内一度形成“顺风倒”的非正常的情况下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十年动乱中，谢高忠遭受无情打击，身体也受到摧残，但是在逆境中，他也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从不改变自己的正确政治观点。他认为“打倒一切”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坚信我们的党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谢高忠的这种思想，不仅是因为他性格上秉性耿直、刚正不阿，而且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的政治品质。

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而唯实，是谢高忠思想作风的一个特点。他认真总结了“大跃进”时期头脑过热急于求成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指导兵团新的经济体制改革。1983年兵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大办家庭农场，有的农场不几天就全部家庭农场化了。谢高忠对兵团经济体制改革持坚决积极的态度，同时他实事求是地看待改革中存在的问题。1985年和1986年谢高忠跑遍了南疆，深入兵团农场、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多种形式的会议，对兴办家庭农场进行实事求是的指导。他认为兵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家庭农场是改革的方向，但是要从实际出发，在组织形式上宜独则独、宜联则联，在管理上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要搞行政命令，不要一刀切。并明确指出把国有资产廉价卖给私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他认为兵团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农业基础这个前提出发，在提高经济效

益和科学种田上下功夫,脱离开农业这个基础,忽视无农不稳,而片面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甚至提出工农兵学商,大家来经商,不种地了,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他认为兴办家庭农场要强调自主经营,但不是不要计划,没有宏观调控不行,不强调“五统一”,取消管理,到处种花花田,就会造成种植乱茬和产品失控,到头来对农场和职工都不利。他认为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实行“三定一包”、联产计酬的分配办法,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不能人为地把生产指标定得过低或过高,损害国家利益和挫伤职工的积极性,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不能把个别“万元户”作为牌子而置多数职工的贫困于不顾,更不允许钻国家改革空子的暴富行为。谢高忠通过调查研究,结合兵团客观实际拿出的正确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改革方向的,从而保证了兵团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品德高尚 廉洁律己

谢高忠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职位高低,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老八路的革命本色。

他谦虚谨慎,不居功骄傲,不突出个人。他晚年撰写的《铁流挥戈五千里》回忆录,很少回忆自己,而主要是回忆别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侧重于别人,他谦虚地说:“我自己没什么可写的,那些老革命、老首长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着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宣扬他们有利于鞭策自己,更有利于激励后人,这是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应尽的义务。”

他善于团结和尊重同志,特别关心和爱护部下。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也都感到心情舒畅,心里踏实,愿意竭尽心力地搞好工作。他对同志赤诚相待,对干部一视同仁,从无亲疏之分,在使用干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持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以诚相待,备加关心。凡是与谢高忠共过事的人,都觉得与他好相处、好

共事,因此许多同志都怀着信任感愿意和他一起工作,都愿意与他交往。谢高忠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有几任是担任副职工作,在农二师任副师长期间,他特别尊重刘克明师长、阳焕生政委,善于领会他们的领导意图,积极主动地配合和协助他们工作,因而当时农二师领导之间很和谐,工作很有生气。他担任一把手时,民主作风好,善于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非常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发挥领导成员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合力。

他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战争年代他与战士共患难,和平建设时期他与职工同甘苦。开发塔里木时,他身为副师长,长期坚持在基建第一线,与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卡拉大渠时他与工人一起担土劳动,胜过了年轻体壮的工人,工人们称赞说:“南泥湾劳动英雄又来了。”有一年春节,谢高忠年已60有余,不顾上下楼的疲劳,一天内在兵团机关就走访了70多户。平时他到医院探望住院职工是经常的事。

他生活朴素,廉洁律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干事是谢高忠最明显最具体的廉政形象。他生活艰苦朴素,不讲究吃穿,自觉地执行中央《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不搞特殊化。他出差到团场,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必须按标准结算住宿费、伙食费,农场给的土特产不付钱不收。他从不以权谋私,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并严格要求子女不做损害党和国家的事。

谢高忠已经走了,他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步伐走完了生命的途程。他带着为之献身半个世纪的新疆和兵团农垦事业光辉成就的欣悦,最后长眠在新疆这块富饶美丽的大地上。谢高忠光辉的业绩和崇高的形象,将永远名留西域,垂范后人。

(1995年12月28日完稿)

轶闻趣事话谢老

南文英^①

谢高忠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从1953年他调任步兵第六师副师长，到恢复兵团就任第一副司令员，历经42个春秋。我们相识、相知、相处，有说不完的陈年故事，其中以十年“文革”中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尤为集中。这些带血的故事虽说已经化作含泪的微笑，但它却深深地溶入我的脑海，刻在我的心里，真可谓“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谢高忠因参加“文革”初期兵团召开的“八楼会议”，被列入张仲瀚的“八大金刚”之一，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文革”打击的重点对象。他像人质一样，被造反派蒙上棉被、推上卡车拉来拉去，巡回批斗达500余次。他甚至经受了“假枪毙”这样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我亲眼看见他像伍子胥过韶关那样“一夜白了头”的人间悲剧。他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具有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高贵品格；他又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具有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就凭这，他顽强地抗击着“赤色风暴”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袭击。说也奇怪，那些运动群众“打倒谢高忠”的滚滚恶浪越是疯狂，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就流传越广，一时间街谈巷议、妇孺相告，不胫而走，深入人心。

在机关食堂的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强扼着谢高忠的头逼他

^① 南文英：原兵直工委副书记，曾长期担任农二师宣传科长。

下跪时，他的眼眶里渗出了滴滴泪花。当群众看到这位身经百战、从无畏的英雄潸然泪下时，“哗”地散去了大半，在走出会场的大门时，还连声不迭地大骂那几个打手：“坏蛋，不是人！”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操纵、运动群众的那些人，深谙个中真谛，他们唆使造反派竭尽全力从党委内部打开缺口，挖掘所谓的重型炮弹。他们找到了原农二师副师长李之琛，这是一位三五九旅的老兵，别看平时嘻嘻哈哈的，可是当造反派逼他揭发谢高忠的“三反罪行”时，他却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可不知道呀，像谢高忠这样的师长，就是在国防军里也挑不出几个来！”在“军管党委”的日子里，一次党委常委会议上，又是他，提出向上面打电话请示：“师党委还要不要工作？谢高忠还能不能工作？”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时任农二师副师长的昌生祥，起义时立过大功，在他身陷囹圄，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面对造反派的威逼，他说出了这样几句话：“我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打倒；阳（焕生）、谢（高忠）、赵（干卿）是人民的功臣，不能打倒！”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使多少正义的人们心灵为之震撼。而他却在造反派的围攻中，心脏病突发溘然离世！

原农三师副政委赵干卿，是党委核心成员，也是被造反派视为攻破党委不可逾越的“顽固堡垒”，当他被上面召见进行所谓“路线交底”（拉赵打谢）归来时，造反派不失时机地促其表态“亮相”，不料他在机关群众大会上公然宣告：“谢高忠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批判，不能打倒！”给当时“打倒谢高忠”的熊熊烈火，狠狠地浇了一瓢冷水。

更有甚者，正当“打倒谢高忠”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机关出现了一张颇为奇特的大字报，这是一位从事计划统计工作的干部，根据他的职业习惯，用表格的形式把一位“革命领导干部”和谢高忠并列对比。其中一项在前者一栏写道：“要小老婆不要党籍的花花公子”；而在谢的一栏内写道：“战斗是英雄，劳动是模范”。且不说这种对比是否合适，单就群众对上面一些人操纵群众打击迫害像谢高忠

这样的人民功臣发泄的愤激之情，还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文革”期间，“老牛”们常常被派到机关食堂帮厨，谢高忠更不能例外，造反派少不了吆五喝六地到食堂监视找茬，炊事班长小周如实反映：“谢高忠表现最好，他洗的笼布也最干净！”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革命者无瑕的品质。人们窃窃私语：谁说谢高忠的劳模是假的呢？！提起批谢的“假劳模”，还有一段趣事。那还是1953年谢高忠调任步兵六师副师长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正围着一个大铁盆子吃饭，当我吃完第二个馒头去拿第三个的时候，一转身突然发现谢高忠就站在我的背后咧着嘴笑，我不解地问道：“师长，你笑啥哩？”他就对着我们拉起家常来了。他笑着说：“我看到你吃饭的劲头，就想起我在延安时的样子，南泥湾大生产，我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模范，一天用镢头能开几亩地，吃得多点是很自然的事。谁能料到，在“文革”中会有人说他“不是劳动的模范，而是吃馍的模范”，真是可悲、可叹，也太可卑了！

农二师长期处于重盐碱地区，挖排治碱的任务十分繁重，不少单位春节不休息还在突击挖排。但是，地下水位降低是要有个过程的，所以产量一直上不去，农三师成了兵团出名的“穷二师”，部队生活很苦，粗粮多，细粮少。有人据此批谢：“你是什么师长？是吃包谷糊糊的师长！”深知内情的群众私下议论：“打倒谢高忠，我看连包谷糊糊也喝不上了！”“文革”几年，谢高忠被巡回批斗数百次。有次游斗到塔里木的一个农场，吃饭时，炊事班长把盛好的一碗饭递给了他，还当众大声吼道：“谢高忠，滚一边去吃！”吃着吃着竟意外地从碗底翻出两个荷包蛋来。有的人，大会批判慷慨激昂，到了夜晚却悄悄溜到谢家赔礼道歉。正是群众中蕴藏着的对老师长这种厚重的信任、理解和疼惜之情，温暖着他几近冰冷的心，从黑夜熬到了黎明。

谢高忠退居二线以后，仍心系农场和职工群众，常常约我到直属农场检查指导工作，还主动请缨当农场的顾问，不管刮风下雨，也不计公休节假日，说走就走。有次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退居二线

的,比我们在一线的还积极。”他笑答:“你这当过宣传部长的人,还说这种话。”为了推广植棉经验,他一年之中到过二二二团7次。1991年5月,棉苗刚出土,遭到严重霜冻,农场告急,一定要我请老司令员前去察看,这时他已是病痛缠身、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了。已经安排好去珠海疗养的,硬是改了行程驱车赶往农场。经他深入田间地头仔细察看,沉静而又很有把握地说:“用不着翻耕重播,基本上可以保证全苗。”可惜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办,结果翻耕重播的减产了,没有翻播的反而增产了。后来,团长、政委见了我感慨地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司令员说的真神哪!”

谢老文化不高,可是他硬是写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出版了。翻开一看,尽是他对王震、张仲瀚、阳焕生、刘克明等老首长、老战友的回忆文章,却很少提到他自己。作为跟随他工作多年的一位晚辈,面对深受敬仰的老首长,我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感念之情,记下了有关他的这些轶闻趣事,虽说有挂一漏万之嫌,可我觉得感念故人,对个人的灵魂也是一次净化,对自己往昔革命的经历中做过的错事、说过的错话、伤害过的战友,也是一个无言的忏悔。从谢老遭受的苦难中,我也强烈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的苦难。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抓住科学和民主这两个环节,把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真正地健全起来,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对领导的错误能够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营造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大环境,像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民请命的老帅彭德怀的大冤案,也是可以避免的,更不用说我深为敬仰的老首长谢高忠了。只有如此,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才不至于愧对故人。

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用自己的一篇诗作,表达我对谢老的一片眷恋思念之情吧!

吾爱老司令,英名传千古;
五十有七载,长征不停步。

十五从军行，慷慨赴前锋；
汗滴南泥湾，花开塔里木；
南下复北返，中原布火种。
带兵齐鲁地，转战大西北；
一身负数创，鏖战树红旗；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进兵开都河，一犁开军垦；
兵发塔里木，戈壁织锦绣。
十年遭浩劫，一夜忽白头；
无言复无泪，铁窗锁楚囚。
雨过天放晴，浩歌起征程；
身劳苦心志，运筹帷幄中，
三年三大步，妇幼皆称颂，
军垦再辉煌，老总有奇功。
三生我有幸，随队若许年，
耳濡目复染，如镜高空照；
做事最紧要，做人更求严。
此哉老司令，赤诚冲霄汉；
古稀放余热，垂暮谱诗篇。
蜡炬忽成灰，光明留人间，
三杯滴下土，芬芳满天山。

(1998年11月19日第2稿)

兵团工业先驱刘志申

周世昌 李庚元 刘持谋
于继利 刘城治 任嘉祥 雷正纲¹



每当回顾兵团农垦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位坚毅、睿智的工业建设先驱者的崇高形象。他就是兵团司令部原顾问刘志申。

刘志申 1923 年 12 月 28 日出生在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个贫苦农家。童年、少年时代，他亲身经历了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忧患。旧社会的黑暗，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恶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使他萌生了追求社会变革，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强烈意愿。1938 年 10 月，抗日烽火燃遍华北大地，年仅 16 岁的刘志申毅然参加了八路军，次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生都

¹ 周世昌：原兵团工业处计划科科长，后兵团工一师体改办主任。李庚元：原兵团副司令员杨宗胜（主管工业）的秘书，后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刘持谋：原兵团非金属矿公司计划科科长，后自治区建材局局长、兵团计委主任。于继利：原兵团工业处重工技术干部，后自治区煤炭厅厅长。刘城治：原兵团工业处计划科干部，后兵团农八师体改办副主任。任嘉祥：原兵团工业处轻工科干部，后自治区七纺集团董事长。雷正纲：原兵团工业处计划科干部，后兵团经委直属企业处处长。

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建设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刘志申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文书、团部通讯排电话员、团供给处粮秣干事、营管理员，新四旅十六团供给处经建股长。他随军转战冀南和太行、太岳山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和十多次大小战役、战斗，执行战场架线、收线和战勤供给等艰险任务，立功两次（其中立大功一次），并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立特等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六军十七师五〇团供给处副处长，随军转战陕、甘，参加了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和解放西安、兰州等战役。

刘志申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工作，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和熟悉社会经济活动。他1943年11月随军驻陕甘宁边区，奉命带领本团熟悉铁木工技艺的干部、战士，将延安旧城区一座被日寇飞机炸塌的旧屋修复，办起了“德记铁木工厂”，任厂长，并办了商店。任团供给处经建股股长后，他又负责领导本团在延安、酃县等地兴办的合作社。他指导这些厂、店、社生产、经销部队、群众急需的产品，既保障了部队供给，又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保障部队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他随军进驻伊宁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1年他调任六军十七师供给部（后改称后勤处）部长（后改为副处长），并兼任六军利民合作总社总经理、政委。总社在他主持下，兴办了酱醋坊、豆腐坊、粉坊等加工作坊，开展了对苏贸易，以新疆土特产品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汽车农机具、燃油等生产资料，对缓解当时部队、地方生活、生产物资短缺的矛盾，起了积极作用。他自己也从这些经济活动中增长了智慧和才干。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以及他率先一步取得的军队搞工副业生产的经验，使他在以后年代出色地担当起谋划、开创兵团工业的重任，同兵团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共同写就了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

兵团成立前期和初期(1953~1957)

刘志申认真执行兵团“以农业发展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出谋划策,认真组织实施,促进加工副业在兵团垦区普及、发展,为后来发展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进疆伊始,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3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疆军区将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并成立了与军区司、政、后三大部平行的军区生产管理部,统管生产部队的生产建设工作,原六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程悦长兼任部长。刘志申任生产管理部计划处副处长,主持日常工作,该处下设加工副业科,主管加工副业生产。

当时,驻疆部队于大生产运动初期在乌鲁木齐建成的19个大中型企业(包括八钢、七纺等)和在喀什地区建成的6个厂矿,已遵照1952年10月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移交地方政府领导管理,只留下34个磨面、榨油、轧花、被服、铁木工等手工作坊式小厂和小煤窑,年工副业总产值只有1500多万元,很多团场还没办加工副业。

这时刚任生产管理部计划处副处长的刘志申正值而立之年,精力充沛,为谋划全疆部队生产而日夜操劳,为发展垦区加工副业倾注了很多心血。当时生产部队办的小厂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是生产缺乏计划性,产供销也多不平衡。有的设备能力大而原料供应不足;有的设备能力小而农产品加工不完;有的厂没有备用动力,时干时停。当时刘志申派加工副业科科长马石斋等深入了解各师加工副业情况,刘志申向部领导写了报告,建议召开加工副业会议进行整顿。部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954年7月召开了有各师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首届加工副业会议。会上,新疆军区参谋长张希钦、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杨贯之作了指。刘志申在会上作了《关于加

工副业生产情况和今后任务》的发言。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加工副业生产要整顿、巩固、提高，为部队农牧业生产服务，及时解决各种农牧产品的加工，满足部队需要，并解决地方部分农牧产品加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这次会议后，大多数师、团加强了对加工副业的领导，发挥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整顿了生产组织，加强了计划管理和劳动纪律，建立了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制度，生产状况逐步好转。

1954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二十二兵团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刘志申任兵团司令部加工副业处处长。新成立的加工副业处人手少，而兵团党委赋予它的任务却十分繁重：一要全面管理兵团直属企业的党政和生产工作，二要归口管理全兵团加工副业和生产经营业务。刘志申带领全处同志认真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学习苏联国营农场多种经营的经验，以及企业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经济核算）知识；同时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到当时一些生产较好、规模较大的加工副业厂矿（如石河子加工厂、农八师师直加工厂、农七师师直加工厂）了解磨面、榨油、轧花等行业的生产、管理、设备维修、原料消耗等情况。调查研究加深了刘志申对加工副业在军垦事业全局中的地位、现状的认识，增长了生产管理知识，提高了决策建议的水平。

刘志申在调查中发现，当时一些师、团加工副业交叉管理，多头领导，互相扯皮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影响了加工副业的提高、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刘志申向兵团提出了对加工副业“统一领导，加强管理”的建议，被采纳。其后，各师成立了加工副业科，团场成立了加工副业股，统一归口管理师、团加工副业厂矿；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小型作坊则交由合作社或商业科管理。从而理顺了业务关系，首次建立了兵团加工副业的宏观管理体系。

刘志申在调查中还发现，当时仍在实行的供给制及其消极的思想影响是妨碍厂矿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巨大障碍。很多厂矿只问生产，不问成本，怕谈利润，劳动消耗无定额，成本费用无标准。刘

志申每到一处,都大讲特讲成本、利润。他说:劳动生产率、产值利润率、成本利润率都是综合指标,既可反映产品的数量,又可反映产品的质量;既可反映总产值,又可反映盈利。这几个指标数值越大,就说明经济效益越好,就说明成绩越大。刘志申结合国家政策精神,向兵团领导提出了《关于改进加工副业厂矿经营管理的意见》,建议废除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和企业经济核算制,兵团采纳实施。同时他又主持制定了《加工副业生产定额》、《兵团加工厂矿流动资金定额》、《拖拉机及修配保养一般定额》三个制度印发各师团厂矿试行。从此,定额管理在全兵团加工厂矿逐步推开,为实行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志申提出的这些建议和措施,对消除供给制的消极思想影响,端正企业经营思想,强化企业管理,起了重要作用。这以后,企业经济核算制逐步推开,成本利润作为经济杠杆被重视,在兵团厂矿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刘志申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技术落后也是影响加工副业提高、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当时,不但外地,甚至本地和兵团内部已有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兵团同行业也不能得到推广。针对这种情况,经刘志申建议,兵团召开了磨面、碾米、轧花、榨油等专题会议,交流生产管理经验,并着力推广了“李川江榨油法”等当时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加工副业厂矿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

经过刘志申的精心谋划,在兵团各级党委的正确决策和加工副业战线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加工副业在各垦区迅速发展。到1957年,全兵团加工副业厂矿由1952年的34个增加到114个,加工副业职工人数达到14672人,比1952年增加了80%;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达到10357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6倍;1955~1957年3年,厂矿上缴利润2247.98万元(1954年以前及供给制未计盈亏),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兵团加工副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156%。就投资回报率而言,这个时期是兵团工业发展最好的时期。

50年代后期(1958~1960)

刘志申积极响应党中央“全党动手,大办工业”的号召,充分发挥了司令部工业处作为兵团工业主要参谋机构的作用,促进了兵团工业的大发展,启动了传统的农场加工副业向先进的现代工业转变的进程,不但壮大了工业的实力,而且优化了兵团工业的结构。

50年代后期,兵团司令部加工副业处改为工业处,刘志申任处长。他的强烈事业心使他十分热衷于兵团工业的发展。1958年,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工业”的号召。他深受鼓舞,潜心思考,并与各方面同志共同探讨加快兵团工业发展速度的途径,提出了规划方案,建议兵团及早召开兵团第四届加工副业会议,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大办工业。兵团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会前,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张仲瀚把他找去畅谈两个多小时,听取了他对会议议题和开法的详细汇报,并对会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兵团工业的构想作了详细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当年4月召开了兵团第四届加工副业会议暨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兵团工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会议由主管工业的兵团党委常委、副参谋长杨宗胜主持并作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曾涤作了重要指示。张仲瀚作了《全党动手,大办工业》的重要讲话,他要求兵团工业总产值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或者更多一些,同时阐明了关于发展工业的一些具体政策。刘志申根据会议精神,主持工业处办公会议,之后又同司令部有关部门研究,对《兵团加工副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修改、补充,经兵团首长审定后下达执行。刘志申还建议,组织人员到几个师对列入五年计划的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作进一步的研审,并帮助编制计划任务书,上报立项。

这个阶段,刘志申为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的立项筹建,日夜奔忙,不辞劳苦。他为筹建八一毛纺厂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很

典型的例子。他推荐富有事业心、有能力有胆识的宋宪德任八一毛纺厂厂长，并亲自到国家纺织工业部去汇报。纺织工业部大力支持，积极帮助，并介绍他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毛纺厂考察，联系落实了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援，先后从纺织工业部、上海调来两位工程师和一位技术员到八一毛纺厂帮助工作。这些工程技术干部，特别是从上海来的工程师杨东升，对八一毛纺厂的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毛线毛布试生产、产品设计及工艺技术规范、操作规范的制定，起了关键作用。刘志申还为落实该厂的建设资金、建筑材料、生产原料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经过3年苦战，到1960年，全兵团建成的大中型工业企业达到34个，其中包括八一糖厂、八一毛纺厂、八一棉纺厂、八一造纸厂、农六师天山化工厂、十三户农具厂、工一师材料总厂、炼钢分厂、兵团通用机械厂、汽车大修厂、跃进钢铁厂、农一、二、七、八师针织厂。这批大中型企业的建成投产，使兵团改变了只有加工作坊，没有现代工业的面貌，跨入了工业现代化的新阶段。

刘志申在关注大中型厂矿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展团场加工副业生产。1958年的一天，刘志申得知农四师十团（现七十二团）办了一个酒坊（肖尔布拉克），就带上周世昌到农四师，在研究了拖拉机大修厂改建扩建的有关问题后，便立即赶到肖尔布拉克考察酒质、水质、原料等情况，认为这里发展酿酒业条件很好。回到兵团后，立即派学酿造的宁志振去该团帮助工作，并安排投资，对酒厂进行技术改造。同时还通过中央轻工部糖酒局与四川泸州大曲酒厂联系，获允派人去学习，并请来师傅做技术指导。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十团酒厂（即现在的伊犁酒厂）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技术明显进步，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在1962年自治区评酒会上被评为新疆名酒。此外，农六师八一农场冰糖厂（后名农建食品厂）、梧桐窝子制糖厂（后转产为合成洗涤剂厂）等团场工副业厂矿，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多次得到他的直接帮助。

1958年，张仲瀚提出“上山找宝”，发展采矿业，刘志申积极响

应,他不仅要求工业处重工业科大部分同志下去协助各师找矿,自己也深入第一线参加找矿。1958年,农五师参谋长王增普和师工业科科长马志恭反映,星星峡附近有铜矿。刘志申第二天同周世昌乘飞机到哈密,与王增普、马志恭会合,次日就坐车到星星峡,看矿未果。途中意外发现了土碱和芒硝,资源还相当丰富,而当时国家造纸等工业用碱紧缺。刘志申旋即赶到北京向轻工部汇报,得到部领导重视,轻工部当即派供销局西北供销办事处庄主任来新疆现场考察,随后就组织了几十辆汽车到哈密来拉运土碱。仅此一项,就为农五师增加收入几百万元。刘志申听说农六师八一农场附近有芒硝,就立即派人会同农六师工业科和八一农场深入北沙窝踏勘,证实确有很大的优质芒硝储量,便建议兵团大力扶持农六师开发芒硝矿,并以此为原料基地,建起了天山化工厂。

“二五”初期,在“上山找宝”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行业是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刘志申为此倾注了心力。1958年秋冬之后,农一、二、七、十师及原工一师在西昆仑山、阿尔泰山、中部天山、东南阿尔金山等地发现了丰富的云母矿和水晶、石棉矿。当时,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自治州的一些地方社队和新疆军区部队也有人在上述地域找矿、采矿。刘志申从国家建工部了解到,云母是国家急需的工业原料,我国基本依靠从外国进口(主要是印度),因而对云母的开采十分关注,便安排本处重工业科余源等三位技术员专管云母生产。经刘志申联系、沟通及农十师邀请,国家建工部非金属局于1959年夏派云母处处长林成等到农十师矿区进行考察,并到兵团与杨宗胜、刘志申等交换了意见,其后,国家建工部将兵团云母生产纳入了国家计划。此后,兵团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得到建工部大力支持,特别是资金、技术扶持,为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志申曾几次到四川雅安云母加工厂考察、学习,掌握了较充分的技术经济资料,其中包括印度云母加工生产的技术经济资料。他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在缺乏统一规划、管理的情况下,由兵团、地方的许多单位无秩序地乱采

乱挖,将造成云母矿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会大大降低经济效益。为此,他向兵团领导提出召开云母生产专业会议和对原料云母进行深加工的建议。在兵团首长办公会议上,他对比分析了新疆、四川和印度因原料云母加工技术水平的差距而造成的经济效益上的巨大差距,汇报分析得有根有据,精辟入理。在他的提议下,兵团于1960年召开了云母生产专业会议,并在兵团被服厂(后改为云母厂)建立了云母车间,加工厚片、薄片、电子管片、电容器片,农十师、农七师等单位也组织了云母加工生产。当年全兵团生产云母厚片397吨,薄片0.59吨。这以后云母生产一年上一个台阶,可谓蒸蒸日上。从1959年到1963年,全兵团累计生产工业原料云母11000多吨,水晶1000多吨。国家急需的工业原料云母及其加工品不再依靠进口。这既为国家节约了外汇,也为兵团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1959年到1962年,全兵团云母、水晶销售利润达到8500多万元,约占同期兵团工业利润总额的20%。

“二五”前期兵团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工业战线对资金、物资、技术的需求急剧增长,缺口很大,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刘志申没打“退堂鼓”,而是竭力争取四面八方的支持。他每年都积极争取参加国家轻工部、纺织部、化工部召开的厅局长会议,以及农垦部的有关会议,积极主动汇报情况,争取支持。1959年初,他参加了轻工部召开的厅局长会议,利用休会时间,在自治区轻工厅厅长陈进路陪同下,向孔祥祯副部长(部党组书记)汇报了兵团轻工业情况,孔副部长当即表态要对兵团给予支持。在参加其它几个部的有关会议时,他也争分夺秒地找部领导汇报请示。在刘志申的努力争取下,轻工部、纺织部、化工部、农垦部都先后派领导干部来兵团调研,其中有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及计划司司长,轻工部计划司司长杨成,化工部基建司司长,农垦部基建局高局长。他们调研后都表示对兵团工业给予支持、帮助。刘志申对自治区委、办、厅、局也十分尊重,积极参加他们召开的会议,平时也与他们加强联系,并要求本处各科主动到对口厅局汇报请示

工作,按时报送统计报表,使兵团司令部工业处与自治区计委及各工业厅局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当时自治区轻工厅厅长陈进路、纺织局局长刘钟奇、化工局局长韩毓琦、电力局局长段尚志、经委孔副主任都成了刘志申的挚友,兵团工业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这就为兵团工业发展赢得了—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对解决当时工业建设中的资金、技术、物资短缺的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3年(1958~1960年)的艰苦奋战,全兵团建成大中小型工矿企业233个,兵团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60年工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36611万元,比1957年增长2.5倍;工业总产值占兵团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31%,提前两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实现利润1.5亿多元,相当于1957年的15倍。兵团工业结构也由以农牧业产品加工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包括冶金、电力、烧炭、机械、炼油、化工、化肥、建材、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及制糖、纺织、仪器制造等产业的多元结构,形成了主要以垦区农牧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与同农业关联性大的重工业相结合的,有兵团特点的工业体系的雏型。

60年代前期(1961~1964)

刘志申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兵团工业内部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的逐步调整和工业经济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9~1960年,由于天灾危害和经济发展决策的某些失误,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针对当时的严峻形势,1961年1月,党中央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要求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按农、轻、重的次序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优先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总结“二五”前期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英明决策。刘志申组织工业处全体同志反复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兵团的实际,认真讨论,深刻领会,在全处统一思想认识。当时兵团

有的同志片面地理解中央精神，误以为兵团农业上不去的原因是兵团工业搞多了，挤了农业，提出撤销工业处。刘志申在张仲瀚等领导的支持鼓励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面顶住了“工业要大下”的压力，维护“二五”前期兵团工业建设的巨大成果，另一面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兵团工业调整方案，报兵团党委批准后下达执行。这一阶段，刘志申认真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和兵团工业调整方案，坚决排除阻力，抓了三件大事：

（一）认真抓调整。对一些重复建设、产品质量不好、原材料不落实，以及太土太小、技术落后的厂矿坚决关、停、并、转。各单位的土法小型炼铁高炉，安全隐患大的小煤矿，一律关闭。执行结果，全兵团第一步调整方案中列名的151个企业（车间），保留115个，合并10个，转产2个，迁厂1个，停产23个，共精减职工24125人。这一有力措施，缩短了工业战线，造成了有利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环境。

（二）认真抓提高。刘志申根据“工业七十条”的精神，抓企业管理，特别是抓企业的基础工作基层建设（主要是班组建设）。经他主持研究，工业处向兵团呈报了《关于在兵团工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和《关于在企业整顿中贯彻技术责任制的报告》，均经兵团批准下达执行。前者对工业企业增产节约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后者则以对比数据分析了兵团工业企业技术经济指标与全国、自治区先进企业的差距，并提出了整改措施。为了贯彻落实报告精神，刘志申亲自带人到企业督促、检查、抓典型。他在八一毛纺厂召开了成本分析会，总结了抓经济成本分析的初步经验，向面上推广。他要求兵团直属企业带头抓成本分析，按月报送统计报告，并附文字分析材料，其中要有劳动生产率、产值利润率、成本利润率的分析对比。随后，他又把各厂领导找来开经济活动分析汇报会，交流经验。这些做法对改善企业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倡导学先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1963～1964年，

兵团工业战线先后派出 9 批人员到上海对口企业学习。刘志申亲自负责这次学习的全盘部署,并派副处长辛勤带队到上海组织学习。派员学习的都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学习人员有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先进生产者、技术工人,共 300 余人。学习收获很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技术素质。在学外地先进经验的同时,刘志申还狠抓各行业内部的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开展同行业产品质量评比,定期通报竞赛评比情况。一个学先进、找差距、争上游的群众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刘志申在兵团工业战线贯彻八字方针所做的艰苦细致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素质都有实质上的跃进,产量上升,消耗减少,成本下降,质量提高。兵团工业在自治区工业产品质量评比中基本上消灭了三类产品,大部分二类产品升为一类产品,部分产品的质量和成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先进水平。其中硫化碱、机制糖、白酒、饼干、糖果、21 支、23 支、32 支、42 支棉纱、斜纹布、2321 市布、女线呢、有光纸、油毛毡等 20 多种产品在自治区和西北工业产品评比中获第一名。八一毛纺厂的毛布一等品率达到 88%,毛线一等品率达到 99.39%;天山化工厂的硫化碱按部颁标准合格率 100%;八一糖厂白砂糖质量合格率 99.12%,超过了国家指标。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了显著提高。在企业减少 51 个、职工减少 2.4 万多人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却增长到 55 357 万元,比 1960 年增长 16.9%;独立核算企业劳动生产率比 1960 年提高 56%,实现利润 8 300 多万元。这表明,这时兵团工业经济的素质、效益,同调整前比已上到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对支持兵团农业、财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兵团工业发展的历史看,从 1953 年到 1964 年的 10 年间,兵团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一切从零开始,困难巨大,但这十年发展速度最快,投入产出的比例最高,而且不少产品在自治区占有主导地位,如煤、机制糖、机制纸、毛布、毛线、硫化碱、云母片、水晶、

石棉等等。兵团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兵团和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对发展新疆经济、稳定政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60年代中期(1965~1967)

刘志申临危受命，担任兵团非金属矿公司政委，以令人惊羨的胆识和毅力，为振兴新疆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兵团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的大发展之后，进入低谷。以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农十师阿勒泰云母矿为例，其原料云母产量1960年度曾达到1944吨，到1962年则降至192吨。1959~1961年，该矿每年盈利均在1000万元上下，而1962年却出现亏损，以后两年也只获微利。其他云母采掘加工企业的情况大同小异，很不景气。其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调整，市场需求量减少导致云母产品标准提高、价格下降，而兵团云母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一时还跟不上。二是以阿勒泰地区为主产区的云母矿藏，经过几年的开采，表层的基本上已采光了，要稳定生产或增产，必须转入深层开采，这将导致投资加大，成本急剧提高。三是采掘加工技术落后，回采率、出成率低，适销对路的产品少。四是体制上的障碍，宏观、微观管理都比较紊乱。兵团、地方、军队共有几十个大小单位采云母，大都是打游击式的小规模开采，遍地开花、乱采乱挖，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当时新疆对非金属矿开采加工工业的行业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有时无人管理，有时又政出多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行业管理政策和统一的行业生产发展规划。

1964年夏天，国家建材工业部派副部长杨涤生(当时任非金属矿局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再次来兵团调查新疆的云母生产情况。他们深入阿勒泰山区，对农十师等矿区进行一个多月的考察，返回乌鲁木齐后又同张仲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新疆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1964年11月，国家计委、经委、

建材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行文，颁发了《关于对新疆工业原料云母生产管理的规定》。其主要精神是：自治区和兵团决定成立兵团非金属矿公司，由该公司独家经营新疆的云母生产，并赋予该公司对新疆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实行业务管理的职能。这个文件下达后不久，兵团非金属矿公司成立，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刘志申任公司政委。

刘志申面临重重困难。一是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兵团非金属矿公司机关，是由兵团司令部工业处和自治区建筑工程局各一部分人员组成的，下辖两矿（阿勒泰云母矿、706矿）、一厂（兵团云母厂）、一院（非金属矿山设计院）、两队（非金属地质勘探队、汽车队）。这些单位和人员，大都来自原来各不相同的不同部门、单位、地方，其中阿勒泰云母矿的职工就来自9个大单位的23个矿队，有些同志因本单位划入或本人调入该公司而心存抵触。建制、工作岗位的变动，引起了干部、职工思想的波动和认识上的混乱，增大了公司开展工作的难度。二是财政困难。当时已划归公司管理的企业，都是微利企业，而公司也才成立，无资金储备，应付日常开支就已捉襟见肘，更不用说进行生产性投资了。三是来自上级的压力。兵团决定，1965年公司要上缴兵团利润300万元，这个数字比1964年全兵团非金属矿采掘加工企业实际利润额提高了88%。而当时公司新组建，亟待整顿采掘、加工生产秩序，向专业化、正规化过渡，下达这样的任务对公司的组建是非常不利的。这个刚组建的、工作尚未走上正轨的新单位又被列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一位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决定、为重建公司、归并矿山做了大量工作的到职不久的公司经理退出公司返回了原单位，另一位新任命的副经理也不来报到。公司领导班子的全盘工作，就由刘志申和公司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支撑，其工作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刘志申面临严重困难，既不灰心丧气，更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以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迎着困难

上,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工作重担。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来一直从事后勤、经济工作的刘志申,竟显示了很强的政治工作才能。他针对当时公司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认识不一致的情况,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积极深入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自己也以开会动员、集体讨论、个别谈心等方式,向干部、职工讲清公司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还以身作则,勤奋自律,日以继夜地处理公司的紧迫问题。公司干部、职工逐步认清了形势,稳定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形成了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政治局面。

当时公司的首要任务,是把生产抓上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公司突出重点,狠抓矿山开拓,狠抓云母加工厂的出成。为了解决矿山开拓所需资金,刘志申经常亲自出马,到兵团、国家建材部、自治区有关部门汇报、求援;还多次深入矿山踏勘,同当地政府、有关单位协商解决矿山纠纷,同设计部门研究开拓方案,同云母矿的同志研究基建计划,费尽了心血。刘志申十分重视云母加工厂的出成,说“抓出成一通百通”。他以抓出成为中心环节,大力推动云母加工厂改善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不到一年,原料云母的出成率大幅度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也大幅度回升。

刘志申坚强有力的领导,使非金属矿采掘加工工业重振雄风,公司生产蒸蒸日上,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好。1965年,即公司成立的当年,生产工业原料云母 832 吨,完成国家计划的 154%;实现利润 682 万元。1966 年生产工业原料云母 951 吨,比 1965 年提高了 14%;实现利润 822.5 万元,比 1965 年提高了 22%。云母矿“三量”(开拓量、采准量、回采量)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云母加工品种增加了,质量也提高了。公司承担国家对云母需求的 50%~60%,从此国家对云母实行了“立足口内”的战略目标。这个曾经亏损过(1962 年亏损 88.9 万元),后来只有微利(1964 年盈 160 万元)的企业又焕发了勃勃生机。刘志申的成功实践证明:他不但在事业开拓上是能人,面对复杂

困难的局面也是政治上的强人。

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1979~1983)

刘志申在自治区建材局局长任内,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抱病之身勤奋工作,为恢复、发展新疆建材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志申遭“文革”劫难6年之后,于1973年恢复工作,任兵团非金属矿公司副经理。1975年兵团建制撤销后,该公司归口自治区建委领导。1979年,自治区决定,将该公司和自治区建工局的相关机构、人员合并,成立自治区建材局,任命刘志申为局长。

这时正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关键时刻,刘志申对三中全会拨正了政治航向极感欣慰。他虽然年已56岁,又患有糖尿病,但仍意气风发,经常深入工厂、矿山调查,同职工群众交谈,力求全面、深刻认识新疆建材工业的现状。他同局党组书记傅志华密切合作,紧密团结党组一班人,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他以贯彻落实新八字方针为中心环节,会同分管相关工作的局领导,狠抓建材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一)抓企业整顿。建材局直属企业虽然大都是老企业,曾为新疆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因为“文革”错误思潮的影响,在企业管理、劳动纪律、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严重亏损。刘志申到任后,多次深入局直企业,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向企业干部、职工群众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共同分析、研究企业管理、生产和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将所了解的情况和对企业整顿工作的建议在局党组会上作了详细汇报。会后,他根据局党组对企业整顿工作的部署,狠抓整顿,主要抓思想、路线、纪律、教育,抓企业管理制度的恢复、完善,抓技术改造、技术培训,并且一个厂一个厂地研究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主要困难。这项工作抓得很好,收效也很大。

(二)抓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厂筹建。刘志申在调查中发现,新疆建材工业同国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下决心抓技术改造。在他的积极督导下,新疆水泥厂从国外引进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窑外分解新技术;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新源、博乐等市(县)和军区水泥厂普通立窑都改建为机械化立窑。新建项目和静玻璃厂于1982年动工,历时3年建成投产,结束了新疆长期从内地大量调运平板玻璃的历史。刘志申还积极抓了新疆加气混凝土厂、艾维尔沟石灰石矿和新疆水泥厂三、四号窑的筹建工作,其中新疆加气混凝土厂、新疆水泥厂三号窑在他离任时已建成投产。

(三)抓困难企业的转产。当时建材局部分直属企业因产品缺销路而陷入困境。刘志申同其他局领导、主管业务处室多次讨论研究后,决定将这些企业逐步转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他任内已成功地转产了6个企业。新疆建材机械厂转为制瓶厂,与新疆啤酒厂配套生产耐压瓶,后来将制瓶厂移交给轻工厅;706矿人员、设备从塔什库尔干迁至哈密,为当时仍在筹建的玻璃厂配套开采石英矿(过渡期生产石米、石材),后来将其移交给哈密地区;阿勒泰云母一矿和四矿就地转产一时尚无出路,从两矿共调出600人至乌鲁木齐,组建成建材局工程大队和砖厂;云母二厂转为针织厂,后移交给自治区纺织工业局;新疆陶瓷厂由生产日用陶瓷、耐火材料转为专产建筑卫生陶瓷。这些单位合计转产的职工达4000余人。

这些重大举措,对促进新疆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刘志申离任的那一年(1983年),全区水泥产量已由1979年的83.7万吨增加到146.6万吨,红砖由14.92亿块增加到25.9亿块,都增长70%以上。陶瓷制品、水泥制品都通过技术改造增加了80种,提高了质量。涉及原兵团单位与自治区单位的矿山纠纷,大部分得到了合理解决。全区建材工业总产值已由1979年19882万元增加到30826万元,增长55%。局直企业工业总产值由2915万元增加到7468万元,增长156%;利润由245万元增加到1743万元,增

加6倍多;百元产值利润由1979年的8.4元提高到23.3元,增加了1.7倍。

离休前后(1983~2001.1)

1983年兵团党委决定刘志申担任兵团司令部顾问,协助兵团领导管工业。刘志申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为了帮助兵团工交局组建机关业务班子,他不辞辛劳,三次到建工师去商调干部,招揽人才。兵团恢复初期,从各地、州收回的原兵团工业企业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他为了尽快掌握情况,多次深入厂矿企业进行调研,写出了《关于八毛、八糖两个大型企业的危机、潜力、方向问题的调查报告》,对两个厂提出了可行性的整改意见。随后又经多次调查,于1985年4月向兵团领导写出了《我对兵团工业情况的反映和建议》,分析了兵团工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他的许多观点,如“工业生产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创新局面”;要抓骨干企业技术改造不要乱铺新摊子,要重内涵,依靠技术进步上水平;要重视市场,以市场为中心;要综合开发利用资源,把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把商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等,都具有前瞻性。

刘志申对兵团工业的关心和执着,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1992年离休后,他仍然多次到企业去考察,为兵团工业的发展奔忙。1994年、1995年,他还数次到自治区煤炭厅找厅长于继利,请他帮助办理后峡八号桥四井田焦烧矿恢复生产的审批手续。1998年夏天,刘志申病重实施手术后,于继利和原工业处几位同志去看他,尽管他身体已十分虚弱,仍然津津乐道地谈论有关兵团工业今后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的问题,并说他正在就这个问题给兵团党委写报告。他的高度事业心,令人无不感佩。

刘志申对兵团工业建设的卓越贡献,足以无愧地载入兵团军垦事业的光辉史册。他的高尚品格,也将长久地被人们所敬仰和怀念。我们这些人虽然与刘志申共事的时间长短各不相同,但对他的品格

所具有的感召力,都有深刻感受。

刘志申品格的最本质、最珍贵的亮点,是无私无畏。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从不患得患失,争名逐利,邀功诿过,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至理名言。他既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文革”中身家性命处于危急关头,他仍坚持原则,不作违心之言。工作中有了失误,也能在下级面前坦然作自我批评,不怕损失威信。

刘志申品格的一个感人之处,是关心同志爱护下级,特别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在主持工业处工作期间,他既培养重用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发挥聪明才智,又能团结教育一批旧知识分子、老工程师,发挥他们的专长。尤其难得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敢于向兵团领导竭力推荐使用一些蒙冤被判刑的人发挥专长。在反右派斗争中,他顶着批评和压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保护了一批青年免于无端受屈。他关心同志的政治进步,也关心同志的生活疾苦。雷正纲是1959年分来的大学生,1962年结婚,当时物资匮乏,他经济条件又差,刘志申为他主持操办婚礼,并在家里办了一桌比较丰盛的家乡饭,为他们庆贺。1995年、1996年原工业处谢忠武、丁主祥先后去世,他带病参加告别,并到他们家中进行慰问,使死者家属感到很大安慰。他乐于助人,平易近人,我们把他当作尊敬的领导,可信的朋友,可亲的忠厚长者。

刘志申品格的另一感人之处是宽广的政治胸怀,能够真诚地团结与他共事的人,严以律己,宽厚待人,无论是“文革”中迫害过他的人,还是在工作中排挤打击过他的人,他都不计前嫌。整党时,一位原非金属矿公司的厂长,在“文革”中是挑动群众批斗、关押刘志申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于在“文革”中的表现,党支部中大多数党员都不同意其党员登记。刘志申则出面对党员群众进行说服,并向党委说明情况,请他们将“文革”中该同志的错误多归于路线上,尽量减轻对个人的处理,为他的党员登记做了不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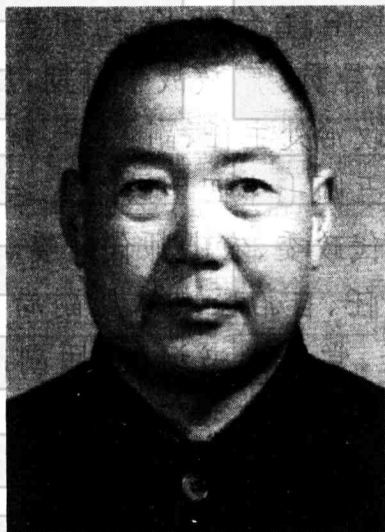
刘志申品格的又一闪光点,是奉献与廉政。他只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只知恪尽共产党员、人民公仆义务,而不求报偿,不利用职权谋一己的私利。他律身谨严,克勤克俭,生活艰苦朴素,不讲个人享受,珍惜国家的一针一线。他办事公正,不徇私情。

刘志申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顽强的斗志和永不停息的开拓进取精神。战时在火线上架线收线,视死如归;平时在工作岗位上执行任务,也把战胜困难作为人生乐事。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他甘愿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不息。

刘志申以谦虚谨慎著称,从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凡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是有胆有识的优秀干部。他的智慧来自实践,也来自学习,不懂的,只要工作需要,他就钻研、学会;他的勇气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困难再大,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要去战胜它。他的这种品格,使他总是成为他所主管的事业中的有勇有谋的领导者、组织者、开拓者。2001年1月13日,我们的好领导、好战友刘志申不幸因病逝世。他为兵团工业建设建立的殊勋将永载兵团史册。

(2000年11月完稿)

史驥专题



史骥 山西省襄陵(今襄汾)县人,生于1922年5月21日。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宣传员、剧社主任、宣传队长、组织宣传干事、技术书记、副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副主任。解放后,历任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委、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代政委、农七师代政委、政委,南疆铁路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农林局副局长、自治区农垦总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兵团副政委、兵团顾问。

1997年1月9日病逝于乌鲁木齐,享年75岁。

延安行

史 骥

山丹丹开花山鸡叫妈妈，
红豆蔻开花拦羊娃摘木瓜。

我完成了一个许久以来的心愿——回了一趟延安。

1990年10月24日，乘车由西安北行，驰骋在大关中平原的现代化公路上，目的是要经过三原、黄陵、洛川等县，到延安去。

我的心是昂奋的，激扬着感情的浪花，甚至有点疑惑，难道我许久以来回延安的愿望真的已变成现实？在车上我曾反问自己：“这不会是在梦中吧？”然而事实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确实是毫不含糊地向延安进发！你看那平坦的关中平原，已是萧飒而又成熟的秋色，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40多年前的我，风华正茂，未及而立，曾和我的战友奔波在这片大地上，当时的蒋、胡匪军已呈强弩之末，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进攻之力了。我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直下西安、兰州，翻越祁连山，穿过河西走廊，奔赴祖国西北边陲——新疆。在新疆一干就是40多年。我常常想念起延安，那里曾有过我青少年时的足迹、心血、汗水和感情。我离开延安已足有44年了，那是我们刚刚由中原突围回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留我们在延安休息了一个多月，便于1946年11月出发到晋西北去了。那么经过44年的风雨变迁，延安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它

变好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好成个什么样子却是想像不出来的。

从西安出发,预定先到黄陵参观游览。我身为炎黄子孙,理当去参拜我们的远古祖先——黄帝,这也是我多年的夙愿。到黄陵县先要经过三原,三原是当年红军改名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地方。我便绕道数公里到县城兜了一圈,算是拜访。据陈赓回忆,那天是1937年9月6日,天下大雨,他曾请示刘伯承师长大会是否推迟进行,刘师长说:“红军改编,是一件大事,说明今后斗争进入一个历史性新时期,应该风雨无阻进行大会。”当时我在山西老家上中学,闹学潮,正打算参加革命,当年红军誓师改编的景象是个什么样子对我来说还无从谈起。眼前的三原是一个繁华热闹的较大的县城,当年刘伯承、陈赓、李达等红军领导人就是从这里整装出发,赶赴韩城,渡过黄河,到侯马,登同蒲路火车北上抗日的。

行行复行行,在关中平原走了两个多小时,经过耀县、铜川、宜君后,汽车从高原上盘山旋行而下,转了几道弯就到了黄陵县。黄陵县城坐落在一个山沟里,整洁而又美丽,距西安只200多公里,我原定要在这里参观后住宿一夜,但由于时间尚早,便决定午饭后参拜黄帝陵庙,然后即向延安赶路。黄帝陵庙前遍是苍松翠柏,迎着秋风,掀起阵阵涛声,庙堂布局端庄雄伟,气势恢弘,令人顿发肃穆自豪之感,为自己伟大的中华民族能坚韧不拔克服千难万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自豪。在黄陵的轩辕庙小卖部买了《黄帝功德考》和《延安史话》,便在风和日丽中登车上路。从西安出发已走了200多公里,我开始信服陕西省顾委负责人告诉我的“公路没话说,都是平坦坦的,轿车可以畅行无阻”。车由黄陵北往,行一小时左右,向右转入一条乡村车道,走两三百米即到洛川会议会址冯家村。原来的冯家村苏维埃小学,在一个小院里坐北朝南有一排四五孔窑洞,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就是在这几孔平凡的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洛川会议是我党进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时期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我对洛川会议仰慕已久，这次能够亲临会址瞻仰访问，心中非常高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满足感。

从洛川北行就是茶坊和甘泉，也就是进入原来的老边区境内了，眼前的一切都以崭新的姿态，挺立在我的面前，好像一个温暖健康的家庭在迎接远出的游子一样向我热情招手。啊！我回到了“信天游”的故乡，不禁哼起“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八路军回来了”，“高山上跑马还嫌低，回到了边区还想边区”……亲切的乡韵，断断续续，在我心中泛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欣喜和悲戚交融。

茶坊，这对我是多么亲切熟悉的名字！回想起1943年7月中旬，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从南泥湾的九龙泉，星夜紧急开进到这里来准备迎击胡宗南的进攻。曾在这里的山坡大路边，欢迎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代表团一行数十人，从我们三五九旅全体欢迎的队列前走过，当时的气氛热烈严肃而又紧张，周恩来副主席健步边走边向两旁的指战员微笑挥手，我们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高呼口号欢迎周副主席，全旅指战员精神饱满地准备迎接随时到来的战斗。3年之后，1946年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回到这里，休息一天，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由王恩茂政委作了突围胜利的总结报告，并举行会餐。今天我乘车来到这里，已丝毫看不到当年茶坊的旧貌，而是一片楼房和绿树遍布的市镇。通往延安的铁路也已越过这里向甘泉方向延伸前去，离延安只有60公里，司机小杨对我说，明年再来就可以坐火车了。

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从甘泉到延安的路两边，基本上都是连贯的楼房，天色渐渐昏黑下来，到处闪耀着电灯的光亮，原来的三十里铺、七里铺都被一排排楼房和电灯光亮所遮拦。七里铺曾是我们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回到延安时集合整队准备进入延安市区的地方，王震司令员站在一辆大卡车上向大家讲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和延安各党政机关以及延安人民对我们的盛情欢迎，使大家深受鼓舞，突围

以来北返道路上的艰难困苦，一刹那间化为过眼烟云，而沉浸于无穷的欢乐之中。七里铺的楼房灯火，今天已使我分不出东西南北。我们团原来在这里有一个客栈，早已被新建的楼房挤得不知去向，一时间连司机小杨也说不出我们已走到什么地点，只是说，三十里铺、七里铺的确实地点已说不清了，延安就快到了。

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我们由闪耀的灯光照得通明的道路，忽然进入一片灯火的海洋，我们宛如在闪烁着金色光亮的湖泊中游泳一样，在群光争艳中进入一个庄严的大门，啊，“延安宾馆”几个大字在我眼前一闪，我们已停车在宾馆大楼门前了。延安外办的副主任张伟和接待科长崔全平已为我们准备好食宿。此后两三天，都让我们吃陕北风味的饭菜，荞面饸饹、钱钱饭、洋芋面等，真有游子到家的感觉。

回到延安我觉得延安是大变样了，一切都变得与从前大不一样了，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伟大而勤劳的延安人民把我们祖国的革命圣地建设得如此美好。昔日的延安曾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光辉崇高的记忆，也留下了它被敌人摧残破坏的苦难景象。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日寇飞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使延安这个山城化为一片废墟。抗战期间日寇飞机共轰炸延安170次，投弹1690枚，炸死214人，炸伤18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1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1座，基督教会房屋75间，并炸死牲畜197头，毁各种粮食34.5万余斤，可计算价值的物品共计损失折合边币282126万元。我在1946年底前几次来延安，其间1944年到1946年曾在延安休整集训待命，当时的延安城内是一片废墟，只有分布在各个山梁上的机关学校。总之，眼前的延安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我倍感欣慰并深受鼓舞。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延安的党政军和人民的革命情操，也都保持了抗日战争时的传统，他们待人朴实亲切，关怀备至，使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到真有回到革命老家的温暖。

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延安只能有两天进行参观、访旧，每天上午

在室内阅读一些有关资料,使我对延安的历史沿革有了粗略的了解:延安因有延河穿流而过和取安祥之意而得名,它屹立在祖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中,是幅员辽阔风景秀丽的中华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延安,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隋唐以来,一直是郡、州、道、路、府的所在地,管辖着陕北各县。秦时置高奴县,隋改肤施县,明、清为延安府治。城东南嘉岭山上有宝塔,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8年)。宋范仲淹曾为陕西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安州知府,与党项羌人李元昊所立之西夏国鏖战多年,史载杨家后代杨文广曾在范仲淹麾下任延州军中殿直,范还任命北宋名将狄青为延州指挥使,抵御西夏。以前我曾在《解放日报》上看到焕南(谢觉哉)的杂文说,狄青在城北10里杨家湾为被其俘获的敌国(西夏)贼首设水牢。当时谢老曾经实地考察,我这次回来也想看看,但因地方上同志均不知该牢地点只得作罢。南北朝时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原是延安城南万花山下的花原头村人,木兰代父从军的佳话,被人们传为美谈,并由此留下了千古传颂的《木兰辞》,后人把木兰骑马练武的地方叫作“走马梁”。据说花木兰活了80多岁,无疾而终,死后葬于万花山上,木兰的陵墓修得很大,位于山顶,墓下有石阶路,路旁有石人、石马、石狮,还有拴马桩,长时间享受祭祀,历久香火不断。昔人曾有诗咏之:“木兰陵园何处寻,延州城南万花丛。”据说1939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董必武、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兴致勃勃地来赏花。在花原头村,毛主席询问了村庄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鼓励老乡们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前线,村干部们要好好干,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1940年5月10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又骑马上了一次万花山。40多年过去了,全国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把万花山建成了游览胜地,山下修湖,山上建亭,每年花期游客络绎不绝。传说花原头村的乡亲们,年年牡丹开花季节,总有人会在万花丛中看见毛主

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像当年那样谈笑风生地赏花、和农民拉家常，这个富有感情色彩的梦幻将永远留在延安人民的心中。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16日驻守肤施（延安）城的东北军奉命南撤。东北军守城司令部参谋长布土芳和红军围城司令李景林签订了红军接管延安的协定，17日延安各界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围攻国民党肤施县政府，伪县长高景尚仓皇逃跑。当晚群众摧毁了国民党县党部。18日，红军入城，成立了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委员会，黄春圃（江华）任城防司令兼政委。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保安，经安塞沿延河支流杏河川和沿河湾，于1月13日进驻延安。从此，延安这个塞上古城就成为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革命大熔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是屹立中流的神州砥柱。大批中华优秀儿女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工作战斗成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为古老的延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驻在城内凤凰山东麓，毛主席先住李家窑院和吴家院。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城内移到延安西北约3公里处的杨家岭。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党中央在这里居住期间，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在这里的中央大礼堂召开的。1944年三五九旅南下前我们在东关集训时，曾在这里看过苏联著名话剧《前线》，那天晚上毛主席也来了，当时连手电筒也没有，我记得主席来时是由警卫员提着小马灯进场的。1946年10月，我们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归来，毛主席在这里接见了全体指战员，毛主席没有讲话，只是亲切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我想毛主席可能正在思虑着如何打败蒋介石、胡宗南的军事进攻哩。

1943年10月中央领导同志迁往位于延安城西北7.5公里的枣园。1946年以前我来过几次延安都没有能到枣园参观，这次是我参观瞻仰的第一站。这里原是一个地主的庄园，中央到延安后中央社会部驻在园内，遂改为“延园”。1942年后陆续在园内修建了几栋品字形小洋房和其他房屋，栽种了果树花草，使这个风景优美的山城林园更显得秀丽幽雅。1943年10月，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这里，社会部迁往后沟。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诸慧成、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到延安参观访问期间，黄炎培曾在枣园向毛主席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周期率的问题，意谓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都逃不脱这一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在初时都能艰苦奋斗，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及至事业成功则往往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已无法扭转，也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支配的，请问中共领导人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率，这一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这周期率可能是有效的。我联想我党取得全国政权，执政已届40余年，其间也犯过种种错误，包括“文革”那么大的错误，我们都没有亡党亡国，而是由我们党自己来纠正，来克服，这说明我们党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对于目前仍严重存在的党风不正问题，也必须由我们党逐步来克服，来纠正。现在回想毛主席与黄炎培当时的一席对话，仍然发人深思，耐人回味。

这里的一切，十分简陋，当年几位中央领导人都睡简陋的木板床，床上摆着土布被褥，桌椅也是本地木材做成，没有油漆，使人深刻领会了艰苦奋斗的真切含义。我联想到两句格言：“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眼前枣园这几孔平凡的窑洞和简朴的陈设，正是因为有伟大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指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之不断壮大，终于形成了翻江倒海的巨大力量，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受到世人景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居住期间，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领导全国军民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做了充分准备。

据说，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曾来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处，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其实这是道出了他的心病。毛主席曾在这里两孔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王家坪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位于延安的西北方向，隔延河与城相望，村子位于两座大山脚下，左边叫脑畔山，右边叫花豹山，一条山沟从村中穿过。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幽美，据说最初叫牡丹坪，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将大部土地买去才改名为王家坪。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王稼祥都曾在这里居住，军委与总部在这里领导全国军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为战胜其“重点进攻”做了充分准备。

王家坪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展览馆，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细细参观，看到有一幅原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的合照，是美国友人斯诺1936年到陕北采访时在预旺堡拍摄的，他可能由于疏忽，把孙毅（左五）说成是邓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说此事被孙毅将军的儿孙们察觉后，向孙问起此事，孙避而不答，后来有人就此事去请教聂荣臻，聂一看

照片就毫不含糊说那是孙胡子(即孙毅)。据说当时照相时,邓华不在预旺堡,另外,当时红军只有贺龙、李克农、孙毅蓄胡子。在展览馆中我看到当年延安劳动英雄杨步浩的照片,两眼炯炯有神,头扎英雄结头巾,微笑着似乎在向我打招呼。当年我在七一九团负责报道部队开荒生产情况,在九龙泉和他见过面,交谈过。我问陪同的同志:“老杨现在可好吗?”回答说:“老杨要活着也有七十好几了,不幸的是前几年延安发了一场多年罕见的洪水,老杨一家来不及往山上跑,就上了一棵树,结果洪水把树冲倒,老杨全家遇难了。”我心中顿生戚然。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这里的部分建筑物遭到破坏,全国解放后,依照原样进行了修复。我在这里参观了军委礼堂(是由三五九旅老红军战士伍积禅设计的),我们南下前在这里听取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朱总讲话,只有一张纸的提纲,讲完一个问题,用老花镜看一下提纲,再接着娓娓讲下去,听者备感亲切。这次旧地重游,礼堂内一切如旧,使人回忆起朱总司令当年的亲切教导,他老人家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1946年11月,我告别延安,随张仲瀚、曾涤两位首长,到山东建立新军(二纵队第六旅)。临行之前,我就感觉到有一场战争将要来临的气氛和预兆,果然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发动了对延安的进攻。这是由于蒋介石在将近一年的反共战争中各条战线迭告失利,不得不收缩战线,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重点放在陕北和山东。胡宗南想直捣我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所谓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准备了“告陕北民众书”,声言“解放”延安后要在陕北“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要“实行民主政治”,“豁免田赋三年”,“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并大肆宣传“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1947年3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军整一师之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闻讯大喜,亲自致电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也回电嘉奖,并说要在10日后组织中外记者团来延安参观。这使胡宗南很为难,因为他上报和宣传的是“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

余”，实际根本没有那么多俘虏，也没有打死那么多人，于是“急中生智”，造假坟，从城防部队选几百名官兵穿杂色衣服，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应付记者提问。还选了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让一个演员装成旅长，要他用共产党的口气，把“总裁”叫“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国民党是刮民党”，并让他装上假胡子，真是煞费苦心，出尽洋相。

蒋、胡匪军占领延安后，肆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仅在延安市内就破坏平房 9 548 间，窑洞 5 437 孔，摧残延安市经济，使手工作坊由 255 家降到只剩 46 家，还在延安制造了 4 个无人村，原 3.3 万亩耕地的 78% 因构筑工事而荒废，农村原有 770 俱耕牛下降到不足 100 俱，500 余头骡马剩下 70 头，延安市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360 户纺车和 53 架织布机全部被蒋、胡军毁掉，全边区被杀和抢走的青壮年 4 000 余人，劫走粮食 19 万石，宰杀和抢走牲口 100 多万头，农具家具被毁 56 万多件，砍伐树木 140 多万株，抢劫衣物 36 万多件，棉花 15.2 万多斤，布匹 6 万多丈。但也遭到延安人民的英勇抵抗，延属游击队由开始的 30 人左右发展到 5 648 人，对胡军作战 1 893 次，毙、伤、俘敌和争取起义达 10 630 人，缴获大炮 4 门，各种枪支 2 280 枝，毁敌机 2 架，汽车 24 辆……

胡宗南在延安失利消息频频传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瓦子街……损兵折将，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人民战争的刀光火海，吓得胡宗南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挨打被歼，一直熬到 1948 年 4 月 26 日，不得不仓皇退出延安，在路上又被我西北野战军三纵队堵截，毙伤 3 000 余人，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地窜回西安。1949 年 7 月又不得不退往四川，最终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从 1941 年冬到 1944 年冬，我先后到过延安五六次，其间时间最长的是 1944 年秋末到冬初南下前在这里集训待命，和中原突围后于 1946 年 10 月胜利回到延安党中央身边，这两次都待了一个多月，听了好几位首长的报告。我们住在东关，听报告大多在杨家岭礼堂和中

央党校礼堂。毛主席向我们作报告时教导我们，南征中原到湘鄂赣地区去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是一项很光荣的历史任务，“前途伟大，困难甚多”，要我们有充分的吃苦耐劳和英勇作战的思想准备；还深入浅出地教导我们，到新的斗争地区后要具备柳树一样的适应能力，和那里的人民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之中，同时又要具备松树般坚定不移的原则精神，顽强地屹立在敌顽的后方，准备迎接大反攻新形势的到来。刘少奇教导我们要和新四军五师的同志搞好团结，谦虚谨慎，“人家会称你们是老大哥，你们可不能以老大哥自居，骄傲自大摆老资格”。周恩来则向我们作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介绍了在国统区同蒋介石反动派斗争的情况和那里民主运动开展的情况，他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得人心的”。陈毅向我们介绍了新四军的对敌斗争情况，并代表新四军欢迎我们到中原去并肩战斗，以及如何正确灵活运用策略与敌人斗智取得胜利，他形象地说：“我们几年来在与敌人斗争中是芝麻糖打滚，越滚越粗；敌人则是冷水洗土块，越洗越小。”通篇讲话深刻、风趣，很受大家欢迎。此外还有聂荣臻、朱瑞等许多首长都给我们作报告，说是临别赠言，再三叮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并预祝我们战胜艰难困苦，取得胜利。这些报告都语重心长，深入浅出，使我们牢牢铭记在心。从中原突围回来后在延安受到盛大欢迎，又有好几位首长来看望我们，并在边区大礼堂欢迎我们，鼓舞我们好好休息准备再上战场。

我这次重点参观瞻仰了枣园，又到杨家岭、王家坪几个地方旧地重游，联想到40多年来党的各项事业的伟大胜利，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而对革命摇篮的这些历史性故地倍起敬仰之心。

宝塔山是延安的最高点，也是延安的象征。10月26日，我们登临宝塔山，凭栏俯瞰延安全景，只见延安城内外各式楼房鳞次栉比，街上行人如蚁，延河从脚下缓缓流过，远山近水尽收眼底，正如歌中唱的：“延安雄壮，延水湾湾，清凉山喜陵山耸峙两岸……”原来城南的新市场已分辨不清，好像成了一条新建的街道，满布楼房。1942年

我们七一九团篮球队来延安参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运动大会和当年冬天我来延安做切除阑尾手术时，住的新市场近旁的大升客栈，以及七一八团的金隆客栈、三五九旅团结合作社、中央交际处等当年较大的建筑，均已湮没在新的楼群之中，旧迹难觅了。我立在古塔脚下不禁回忆起当年脍炙人口的《延安颂》：“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心中奔腾……”当年一曲《延安颂》激起多少人的革命激情，多少青年不畏艰险，成群结队而来，为能成为延安人而自豪，多少人在延安吸取了革命的乳汁，受到革命熔炉的锻炼，奔赴前线奋勇杀敌。延安！你真是功勋的城市、母亲的化身，在你的精神鼓舞下多少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推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延安！你是新中国的摇篮，用什么歌儿歌颂你，你都当之无愧。

在延安城北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苍松翠柏环绕着傲然挺立的一排墓碑，这就是延安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1946年4月8日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3位烈士和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牺牲的关向应、张浩、朱宝庭、张思德等14位烈士。在“四八”烈士中，最惨痛者要数叶挺将军，几乎全家遇难，我对叶挺将军虽未谋面聆教，但却仰慕已久，十分景仰他的“刚毅之色，正直之姿，剑胆琴心，慧眼柔肠”的高大形象。他自“皖南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中被扣押5年，在狱中英勇不屈，1946年3月刚出狱就申请入党，立即被批准，时隔一月返回延安，眼看就要和中央首长见面，和离散的儿子团聚了，孰不知一瞬间竟被死神夺去生命，终年50岁，夫人李秀文终年39岁。

烈士们的墓碑矗立在半山坡上，我因腿疾无力趋前凭吊，由陪同人员在上面指点各烈士碑位，我则在山脚下遥遥瞻仰谒拜，心中泛起阵阵痛楚的波澜。

延河上原来并无桥，现在已有了3座钢筋混凝土大桥，这给了人

们很大方便。我驱车从中央大桥东驰，经东关去飞机场桥儿沟浏览，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首长当年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地方，接着进到我们南下时毛主席阅兵的广场。那一次大会的盛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席台是坐北向南由木板搭成，会场布置得朴素而又庄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全体在飞机场集合，列成方阵，先是各单位互相挑战比赛唱歌，你一个我一个，会场上空激荡着抗战歌声，《八路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守土抗战歌》……此起彼伏，歌声不绝。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贺龙等领导同志由王震旅长陪同，在主席台上出现时，顿时热情的口号声代替了歌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然后成分列式从阅兵台前正步走过，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任弼时和贺龙等人都在会上讲话，讲话中时时响起激昂的口号声：“坚决服从命令”、“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打到敌人后方去”、“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敌后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西北局领导也都到会为我们送行。现在从延安到桥儿沟一带都建起高低不等的平房和楼房，在车上边走边注意观察，不觉已到了桥儿沟的天主教堂。这里原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所在地，当时学员们大都在山上窑洞里住宿，在天主教堂里从事集体学习和其他活动。原来周围还有一些散乱的平房建筑物，现在都不见了，只一座教堂坐北朝南矗立着。我下车察看了一会儿，回念这所学院为我们党培养了许多文化艺术方面的英才，地方虽偏僻简陋，但贡献却是很大很大。我们1946年南下中原，出发时经过这里，鲁艺的师生们列队用锣鼓唢呐为我们壮行，情景之热烈动人，我觉得犹如昨日。我以怀念敬重的心情在教堂前肃立摄影留念，然后回车赴大砭沟内寻访八路军大礼堂。到那里却连遗址也没有找到，只在路边看到一块不足1米高的石碑，上面用篆体字刻着“八路军大礼堂原址”。我想起当年曾数次来这里观看京剧《法门寺》、《四进士》、《逼上梁山》和话剧《升官图》、

《带枪的人》的往事，顿有斗转星移、“地是人非事事非”之慨。在寻访八路军大礼堂的路上，经过大、小砭沟，这里曾是1942年西北联防军运动会的会场，当时曾进行过多少激烈的角逐，红日当空，喊声震天。如今却满是高低不等的楼屋，居民们好奇地从窗户和门口向我们投来友好的、询问的目光。我忽然想起当年在运动会上的一段趣事。那次安排我们七一九团和警四团比赛篮球，我们在前一天还来这里偷看警四团练球，想摸一摸对方的底，为第二天比赛做思想准备。看过之后，觉得他们也只不过打得平常，我们的信心很足，第二天开赛前还作了赛前动员，说今天要赢他个三四十分球回来。孰不知，我们中了警四团的“疑兵计”，开赛后对方出现的大部分不是前一天的人马，比赛中打得灵活利落，比分一直领先，我们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进攻之力，急得球队队长乱了手脚，频频换人想挽回颓势却不可能，队员们情绪也慢慢低落，干瞪眼看人家拿分。张仲瀚团长那天也来看比赛，他很有静气、有风格，看到对方进球得分他也鼓掌，弄得我们很尴尬狼狈，不是滋味。今日路过回想起当年不禁暗暗失笑。

在延安市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参观访问，看到延安市容整洁，道路宽敞平坦，人民脸色红润，面带笑容，言谈和气，衣服也整齐可体，老根据地人民的朴实热情，处处可闻可见。这里我要向伟大的老区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仅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为踊跃支援前线就出动担架民工198 653人次，运输民工1 282 409人次，修筑工事民工22 678人次，军勤民工65.5万个，押送俘虏民工11 204人次，为解放军带路11 720人次，支前牲畜1 478 707头，妇女做军鞋92.7万双，历史将会永远铭记和感谢他们。现在我得知这里的人民生活已温饱有余，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使延安以至整个陕北的经济状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其实早在汉代延安就已发现了石油，到唐代已被使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唐书中说到“高奴县（延安）石脂水（即石油）水膩泛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据延安张伟告诉我，陕北发现了大油气

田，安塞、延川、永坪、临镇一带均有石油，蕴藏量甚丰。至于延长的采油历史就更早了。1938年我由山西吉县东来路过延长去晋西北时，在延长休息一星期，曾参观过那里的炼油厂，当时由于条件所限，还是土法开采，产量不高。我们当时沿着延河行军，空气中就散发着石油的香气，河水面上也浮着油花。现在陕北已成为石油产区，除供本地使用外，还可向山西等地大量供应。后来我曾看到山西东来的车队源源不断，一打听都说是到陕北拉汽油的。

几天以来，我深深感到延安大变样了，变得更好更美了，它虽没有首都北京、古都西安那样雄伟、博大、辉煌的气势，也没有杭州、桂林那样秀丽的湖光山色，但它却别具一格，以其坚韧、朴实、亲切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延安人还是那样淳朴敦厚，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全部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所凝结成的延安精神，还活在人们心里，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使我感到延安精神的伟大和永恒，延安精神的生命力将永远发扬光大。我这次旧地重游到延安参观访问，时令虽是冬初季节，又恰逢寒流来到，但我处处受到延安人朴实风尚的感染和熏陶，有如沐春风之感。心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国家的干部，应该常来延安，接受延安精神的再教育，我建议各单位的领导和新老干部应该在组织去广州、深圳、珠海、海南岛等地参观考察的同时，也能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把保持和发扬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时代精神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别了，延安！通过这次仓促而短暂的访问，我还幸运地找回了我们所失落的某些精神。为此，我感到欣疾交加。我认为，我们队伍中有的人所孜孜追求的某些东西，正是我们愧对延安母亲之处。我希望我们所有由延安母亲哺育起来的一代人，应该珍惜自己作为延安人的光辉形象，永远做延安母亲的好儿女。我从心底呼喊：延安母亲万岁！

南 泥 湾 行

史 骥

1990年10月27日，在延安地区外办张伟和崔全平陪同下，出延安市南行，过杜甫川，谒杜公祠，由三十里铺向东拐进一条山沟，翻过万木葱茏的蟠龙山直奔南泥湾。由于寒流已过，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满山遍野树木郁郁葱葱，虽是初冬时节，却极少见落叶，纵目看去，眼前犹如展现着一幅绿黄紫红，色彩斑斓的油画。脚下的路，坦平发光，即使新疆最好的公路也犹恐弗及，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南泥湾的中心点——阳湾。当年张仲翰任南泥湾垦区区长时的区政府就设在这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曾在这里住宿过夜，朱总司令还在村前空地给我们作过生产动员讲话，当时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南泥湾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中间由三条大川组成一个“丫”字形状，垦区政府阳湾正在“丫”字的交叉点，西从延安下来的是南蟠龙川，往东走的是南阳府川，往南走的是九龙泉川，三五九旅就分布在南阳府川和九龙泉川，由东向西为七一七团（临镇）、旅部、特务团（金盆湾）、七一八团（马坊），九龙泉川由北向南为四支队、七一九团（有一个营还越过5公里左右的小山，南出到史家岔、牛武镇、交通镇），南蟠龙川则分布着八路军总部炮兵学校、中央组织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经济部、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财政厅、边区文协、中央党校、延安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十多个单位。相传在清同治年间，这里原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富饶之地，由于清朝统治阶级

挑动回汉民族相互残杀，这里才成为一个荒凉之地。经过四五十年的荏苒岁月，南泥湾面貌变化，树多了，因为人少气氛也宁静了，当年的藏龙卧虎之地如今也显得空旷而安祥。最显眼的是以阳湾为中心伸延开去的三条柏油马路，当年这里的道路都是仅可容人走车行的土路。我有一次去延安出差，是从九龙泉打赤脚步行到延安，当时有一双旧布鞋舍不得穿，快到延安市南的新市场时，才到延河边洗了脚穿上鞋进城，来回行程总在七八十公里，但当时并不以为苦。

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部队驻防这里既可保卫边区南线的安全，又可利用其自然条件屯田垦荒。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朱总司令和边区留守兵团的一些负责同志亲自到南泥湾勘察地形，部署了一场向荒山野岭要粮的特殊战斗。

1941年春，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我们三五九旅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南泥湾的山川里，摆开了大生产的战场。战士们纵情地歌唱“南泥湾好风光，火红的太阳照山岗，革命战士不怕苦，扬起镢头上山忙，开荒种地反封锁，气死日寇和老蒋”。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全旅开荒1万多亩，挖土窑洞1000多孔，盖房600余间，在南泥湾安下了家，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热火朝天的兴旺景象。我们做到了“上自旅长下至伙夫，一律参加生产，不使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从旅部到连队，都建立了生产委员会，干部战士都编入农作小组，在开荒中人人上阵、个个争先，旅团首长以身作则，带头冲在前面，鼓舞了全旅战士的斗志。

1942年纪念“七七”抗战5周年，朱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几位老人一同视察了南泥湾，并赋诗盛赞南泥湾的美好风光和巨大变化。朱德在《游南泥湾》一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稼禾，水田栽新稻。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同车来游的续范亭老人在南泥湾的九龙泉川赋诗《风云庄巡边》。风云庄是七一九团团张仲瀚根据“云从龙、风从虎”的典故为九龙泉所起的地名，以示此地藏龙卧虎，保卫边区之意。后根据王震旅长指示，更名为文彬庄，以纪念在抗日前线牺牲的七一九团政委陈文彬，后来九龙泉川南部七一九团驻地便被人们称为文彬庄。续范亭诗曰：

追随朱公去巡防，驰车直赴风云庄，
风云庄上风光好，黄杨榆柳各成行，
虎踞要隘峰峦秀，九龙泉水清凉。
窑洞满山军容化，足食足兵自种粮，
何以招待总司令，午餐共进小米汤。
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
黄河以西无敌寇，特因肘腋有强梁。

三五九旅在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政治与文化学习，使指战员的理论与科学文化知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整风运动中，指战员们认真学习文件，密切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革命觉悟，增强了团结。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识字运动。纸张缺乏，就用沙盘练字，没有笔，就用树枝代替，或用子弹壳自制蘸水笔，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自来水笔”。经过刻苦学习，许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劳动学习之余，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各剧社随时编演文艺节目，在田边地头演出。我们七一九团当时河南人多，不少人会唱京剧、河北梆子，团部盖了一栋简陋的大礼堂，过年过节时多次演出《四进士》、《打金枝》、《玉堂春》、《打渔杀家》、《古城会》等历史剧。

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经常深入连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刘连长开荒》、《潘富连赔礼》、《生产忙坏了陈团长》、《大战狼牙刺》、《小八路》等剧目，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深受指战员的欢迎。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中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战斗，取得了优异成绩，为保卫建设边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红旗。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表扬了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他说：“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好。”大会给三五九旅奖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发展经济的先锋”。

1943年，全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获细粮1.2万石，达到了粮食、被服、蔬菜及经费全部自给。1944年，全旅种地达26万多亩，收获细粮3.6万石，并上缴公粮1万石，实现了每人生产六石一斗细粮，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达到“耕一余一”。南泥湾到处呈现出“牛羊满山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的兴旺景象。战士们用勤劳的双手，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9月，毛泽东和任弼时、彭德怀等乘汽车来南泥湾视察，住在当时的南泥湾垦区政府——阳湾。毛泽东视察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时，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作了重要指示，说“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侵犯边区，我们要一方面准备战斗，一方面生产”。毛主席来时，正值张仲瀚团长牙痛，毛主席到张仲瀚住的窑洞去看他，并嘱咐马上送延安住院治疗。毛泽东还和养猪的老红军炊事员（系朱毛游击队队员）谈了话，表扬他的猪养得膘肥体壮。

原来团部前的操场现在已成一片草场，长满小树，在这里当年曾出现过多么热烈动人的场面，特别是秋收过后冬训到来时，全团大部都来这里集合操练，歌声、口令声、喊杀声震荡山谷，投弹、刺杀、越障碍、过天桥，都如生龙活虎一般。当年，我也曾幸运地获得“贺龙投弹手”和“朱德神枪手”的光荣称号。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来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演唱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著名歌曲《南泥湾》,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了南泥湾精神。歌中唱道:“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这首歌当时流行到全边区,至今也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王大化、李波夫妇合演的《兄妹开荒》,也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同来的还有著名作家丁玲,她给到会的指战员讲话、拜年。在此前后,还有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也徒步来访问,记得有天晚上在月光下,他在张仲瀚的窑洞前用小提琴演奏了许多幽美的乐曲,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于1944年10月离开南泥湾的九龙泉到延安集中学习,准备参加由三五九旅组成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南征湘、鄂、赣、粤的战略行动,屈指算来,离开南泥湾已整整46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昔年我们种植的农田很多已重新披起绿装,长满野杏、山桃、杜梨等果树,有一部分由当地群众耕种。当时山脚下断续绵延几十里的窑洞,有的还完好无损,住着当地人民,有的因年久无人居住已经坍塌,但仍然张着黑色的大口挑起我对当年峥嵘岁月和火热劳动生涯的回忆。当年龙腾虎跃般在这里劳动战斗的人们,几十年来,经历了南征北战,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涯,早已散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在新疆从事生产建设,屯垦戍边。如今他们多垂垂老矣,但在自己的暮年仍不甘虚度岁月,尽自己所能发挥着余热;有些则已随着几十年的岁月流失,安然长眠在祖国的青山绿水之中。此时此刻真令人顿生“故人生死各千秋”的感慨。我自己当年住过的窑洞门窗部位已经破损,但洞内仍完好,被当地群众作为牛圈,我缅怀旧情进去看了一遍,在洞口留影为念。

我在九龙泉的泉水旁徘徊良久,回念当年这供我们饮用的一泓清泉,给予年青的生活多少慷慨的馈赠。我参加南征去后,第二梯队的同志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亭子,把泉水集聚置于亭子中间,

又引到亭外由 9 个小孔流注的一处水泥池里供人们取用。我对着泉水俯身照看自己的影子，向泉水诉说：朋友，当年刚刚 20 出头的青少年，46 年后，今天归来与你相会，我已是年将 70 的老人了。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感情，是欣喜与老友幸会抑或是悲叹年华的易逝？离开九龙泉约二三百米处有一座烈士纪念碑，碑亭修得很好，碑上刻着毛泽东主席的题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看着碑上镌刻的我的许多战友的名字，蓦然间，我团原政委陈文彬的名字和面容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敬爱的首长，待人亲切诚恳，不苟言笑，严肃和葛兼而有之。他是湖南茶陵人，年纪很小时就和弟弟陈少彬一同参加红军，曾当过红十六师政治部副主任，1937 年红军改名时为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二营营长，次年即任七一九团政委。他是 1940 年日寇飞机袭击时牺牲在冀南平原的，牺牲时是津南自卫军政委，年仅 26 岁。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一些近现代人名辞典上都没有记载他。碑上还有一些我熟悉的战友，如组织科长陈友元，特务连长张大贵等，而今人世流转天地两隔，他们埋骨在华北的抗日战场上，英名却矗立在我们辛勤劳动的南泥湾九龙泉优美的天地里。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现在我眼前，我向它们躬身默哀，从心底向他们吟诵了两句屈原的《国殇》：“身虽死兮神犹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在天国的战友们，你们将永垂不朽！

我还参观了南泥湾大生产展览室。南泥湾虽然由于三五九旅的离去已失去了当年的热闹，但游览观光的人却不少，就在参观展览室的短短个把小时中，有几辆旅游车也到了，有在延安开会的武装警察的军官们，也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当他们得知我是曾在这里劳动过的老八路军时，纷纷过来和我亲切握手，并提出和我合影留念。我被围立在他们中间，心中充满了温馨幸福，深深感激年青一代对三五九旅的深情厚爱。

从阳湾继续东行，走过七一八团的驻地——马坊，来到旅部和特务团驻地——金盆湾。这个小市镇房屋和来往行人都比当年要多一

些，市场很热闹，当年战争的创伤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建设，已经看不见踪迹了。这里是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主要来路，敌人的大军就是从东边的宜川先到这里进攻延安的。当年胡宗南曾吹嘘，他占领延安后“要用比共产党还革命”的精神来建设陕北，可是当时胡匪军在此过路期间，金盆湾曾惨遭胡匪的践踏破坏，一位陕北诗人形容当年胡匪过后的诗句：“伤心最是劫后村，狗不咬来鸡不鸣。”金盆湾的老人们对当年的惨景想必还记忆犹新。但愿金盆湾的青年一代，多从老辈那里听取你们故乡以往曾经过的悲惨噩运，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把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从金盆湾继续东行，便是当年七一七团的驻地——临镇了，我过去只到过旅部，这一段路没有走过，但一路景象却使我十分振奋。现在这里已是石油产区，大路边上一口又一口的自采油机在运转着，像是用机械的语言在炫耀着自己和欢迎我，“咣当、咣当……”

过了临镇，就出了南泥湾，我们停车向延安地区陪同的张伟和崔全平告别，孰知他们还不肯握别，说：“你从新疆那么远地方来，我们要把你送出延安地区，一直送到黄河边上，才算完成任务，不然就失礼了。”再三道谢他们仍是不肯回去。我不禁感叹：好热情的延安人啊！

(1991年7月15日完稿于乌鲁木齐)

关向应政委的一席教诲

史 骥

1939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由当时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主持召开了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和津南自卫军合编的军人大会，两支部队各800余人，合并成为1700余人的大团，保持津南自卫军番号，暂时取消七一九团番号。那天晚上由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组织了晚会，演出的剧目是《丰收》，剧中的抗日民主政权村长是由当时战斗剧社导演黄沙（解放后在新疆重工业厅工作）扮演的，戏演得很成功。事过两天之后，陈文彬政委叫我去，交给我一封写给关政委的信，内容是要把黄沙调到我们的前进剧社来工作，另外请关政委给我们批个条子到师供给部要一些做幕布的宽面布，一二〇师刚从冀中回到冀西，带回不少这样的布。我持介绍信带了一匹马来到陈庄镇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关政委。他正在和教导团的领导谈话，记得是在一个农家大门下，门板被拿下来作铺板，上面放着关政委的行李褡子，关政委就赤脚坐在马扎子上，教导团的两位领导坐在铺板旁凳子上，不像正式开会，是随便谈话。关政委当时39岁，蓄两撮小须，端庄文雅，不苟言笑，颇具儒将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神情略带憔悴，可能与连日工作劳累有关，事后听说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看过我呈上的信，思索了一会儿便说：“我就不写回信了，你告诉陈文彬同志，就说战斗剧社是师政治部惟一的剧社，不同于旅团一级的剧社，要求演剧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要高一些，有时还要演出

大一点的剧目。再说导演黄沙并不是专职导演，他是个大学生，学的专业是理工，并不是专学戏剧的，现在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暂时放在剧社工作，是权宜之计，将来还要让他去搞重工业，现在只是临时当导演。”我觉得关政委讲得很清楚也很简洁，便答应回去向陈文彬政委复命，他给我在要幕布的问题上批了几个字，我便告别要到临村的供给部去领布料。刚想走时，关政委却把我叫住了，说：“小史主任（那时我刚满 17 岁，一个多月前才由三五九旅奋斗剧社调到七一九团前进剧社，他这样叫我使我感到很亲切），你看过战斗剧社的演出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我们应该好好向老大哥剧团学习。”他说：“你听他们的歌子唱得怎么样？”我说：“他们的歌也唱得很好。”他又问：“怎么个好法，你说一说。”我答：“最好的就是王梅丝作词作曲并亲自指挥的那首《纪念抗战二周年》歌，听了真鼓舞人心。”他说：“你具体说一说怎么个鼓舞人心。”我答：“唱歌中那个女高音领唱‘看——抗战才两周年，已转入第二阶段’，下面接着是男女声齐唱，‘日寇再没有力量进攻，我们正加紧准备反攻的条件，同胞们同胞们，胜利已不远，胜利已不远，用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努力争取第三阶段的到来，把日寇逐出鸭绿江边，逐出鸭绿江边’……”我就这样连说带唱的在关政委面前表演了一番。我正期待关政委的鼓励和表扬，不料关政委却问起我来：“小史主任我问你，学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没有？”我说：“去年冬天，我在旅部奋斗剧社学过，还进行了考试。”他说：“啊，还考试过哩，你考得怎么样？”我答：“还可以，得了 98 分。”他说：“不错么。”我接着说：“我们班里还有考得好的，一个得了 99 分，一个得了 100 分。”他听后沉默了一小会儿，说：“那么你认为我们的抗战现在是处在什么阶段？”我愣住了，一时无话可答。他又问我：“你说战斗剧社那天晚上唱的歌子很好，刚才你也背唱了一段，说是我们的抗战已进入了第二阶段，日寇已没有力量进攻，我们正加紧准备反攻，很快就要把日寇逐出鸭绿江边了，这样唱对不对？”我沉默下来无言可答。正尴尬时关政委却说：“这首歌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毛

主席说要持久抗战，现在才打了两年咱们就要准备反攻了？告诉你，日本鬼子还是有力量向我们发动进攻的，你看我连行李褡子都没有解开，就是随时准备应付敌人进攻的。”我听后一下子冷静下来，觉得这首歌确实有速胜论倾向，是有错误的，也联想到我们有的同志确实有头脑发热的毛病，而我自己也确实幼稚，没有吃透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果然事过不久，盘踞灵寿县的敌人就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被我们大部消灭，这就是有名的“陈庄战斗”。而相隔四五年后日寇还在正面战场发起了豫湘桂战役，抗日前线正面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寇一击即溃，数日之内失地千里，直至 1945 年才在各方面因素配合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关政委的这一席教诲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伟大形象给我留下永恒的记忆。1946 年 7 月 21 日在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前夕，敬爱的关政委却因病在延安逝世，我闻此噩耗，心中涌起阵阵波涛，深深为我党我军丧失这一优秀的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而感到痛惜和苦楚。

（写于 1994 年 8 月 29 日）

奎屯小城的诞生

史 骥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第二十二兵团步兵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农七师的前身)广大指战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长途跋涉,挥师炮台,铸剑为犁,投入了开发、建设祖国西北边陲的大生产运动。官兵们煮黄豆,炒麦粒,风餐露宿,饮冰卧雪,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的艰苦奋斗,铲平沙丘,引来洪水,开发出大片大片的良田,在亘古荒原站稳了脚跟。

随着对周围人文地理、水土资源的逐步了解,部队以师机关临时所在地——炮台为依托,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呈钳形展开,继1950年布点小拐,开发车排子之后,又于1955年开发下野地垦区。

1954年前,二十二兵团北疆各垦区间的界线已经初步划定。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改为农业建设第七师。此时,农七师规划趋势已无法再往东发展,只能继续向西、向北延伸。而炮台处于奎屯垦区最东头与石河子垦区的交界处,偏于一隅,出入非常不便,随着垦区的发展,显然将越来越不适合合作全师的指挥中心。

对以炮台为师部的驻地,师领导一开始就不甚满意,其间有一年半年时间曾迁小拐,后因那里条件更不理想,又再度迁回。

师部的搬迁势在必行,但究竟往哪儿搬,一直没有确定。这中间有诸多原因,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起初对周围情况不甚了解,究竟往

哪儿搬，众说纷纭，老沙湾、乌苏和独山子都曾被作为选择的对象。根据对当时地图研究分析，我认为奎屯地处沙湾、乌苏之间，是一块很有开发价值的处女地。因此，我和部分领导同志，建议在那里为师部建点。

奎屯是清代的一个小驿站，当时，到处是芦苇、红柳、芨芨草和梭梭。方圆数十里，除散居着 164 户人家外，在奎屯发电厂东头现在一三一团八连的位置上，独山子矿务局盖有一栋长方形的房舍。房舍为苏式风格，上面装有木天花板，下面铺有地板，房舍坐西朝东，中间有条贯通南北的走廊，走廊东西两侧分隔为一个一个的单间，夏季房子南北门敞开，穿堂风便使得整栋房屋比较凉爽，冬天则堵塞北门，只有南门出入，以利保暖。独山子矿务局建起了一个小农场，利用这栋房舍又住家又办公，场长阎文才，曾是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一个连长，1953 年被调到这里。这个小农场除会计（郑国芳、何梅贞夫妻）、保管等三四个正式职工外，还招收有 100 多名临时工，其中多数为哈萨克族同胞，还养着 3 000 多只羊，种有 1 000 多亩菜地。

为统一师领导内部的意见，尽快确定师部位置，以利垦荒事业的发展，1955 年 9 月中旬，我和师长刘振世，决定利用到基层检查工作的机会，进行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组从炮台启程，头一站去了小拐，尔后转到车排子，9 月 21 日驱车南下，沿着尚未铺垫沥青的独克（独山子—克拉玛依）公路，直奔独山子。

当时的独山子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秦锋热情接待了我们。宾主落座，寒暄未了，我和刘振世师长开门见山述说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打算为在奎屯地区开发农场、建立师领导机关实地考察。秦锋表示热烈欢迎。当时独山子矿务局领导，正为偌大一个矿区的肉食、副食品供应没有着落而犯愁。当即嘱托在座的矿务局副局长范子久，第二天一早陪同考察组驱车奎屯。

9 月 22 日，考察组进入了奎屯地区实地踏勘。大家见这里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水源充裕，交通便利——其时，横陈奎屯南缘的乌伊

(乌鲁木齐—伊犁)公路全线贯通,北疆铁路的修建已初步提上议事日程,在奎屯西侧,由南向北傍奎屯而过的独克公路竣工在即。大家不禁兴致盎然,喜形于色。随后,考察组从这里沿乌伊公路东上,取道三道河子(现沙湾县县城),返回炮台。

9月23日,农七师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上,我向与会同志汇报了一路考察的经过,并对各拟搬迁点进行比较,和大家商榷。

迁往沙湾的方案,使师机关位置较炮台还要偏东,理所当然被否决。

持搬迁独山子建议的同志,主要是想利用那里现成的电力——那时,独山子矿务局已建有自己的发电设施,用电尚有富余,矿务局领导曾答应我们,一俟农七师搬来,多余的电力可以供应师机关使用。

针对这种想法,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独山子土质情况较差,地势倾斜度大,不利耕作,这是问题的要害。至于暂时有电好用,当然便利。但是,从长计议,今后独山子矿务局生产发展,电力不再富余了怎么办?何况,今后我们在奎屯站住了脚,自己照样可以办电站。

至于迁往乌苏县城的方案,我认为:地方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县级政权,我们再挤进去,势必给地方增添麻烦。此外,乌苏偏离紧靠下野地、车排子的独克公路,不利于师机关对这一地区的领导,也不利于将来垦区进一步向西北塔城、额敏一带的开拓。

经过反复酝酿,我再次提出将师部迁往奎屯的建议,并得到师长刘振世和参谋长王桂秋、副参谋长朱耀臣、政治部副主任刘长进等的全力支持。农七师机关由炮台搬迁奎屯的方案,终于在师军政委员会上,赢得了多数同志的赞成。此后,又在师党委会上正式形成了决议,并上报兵团审定。为了加快审批速度,9月28日我亲自带着师党委决议,赶赴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报批。我当时认为,这个决议会很快得到批准的,因为从1952年起,我曾明确向兵团提出,炮台不适合师部驻地,在新驻地未确定前,可以不要兵团每年给师部的基建

投资，留待师部驻地确定后，再予补拨。谁知，兵团领导听了汇报后，没有当场表态支持的。主管财务的部门领导则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搬迁要花钱，当时兵团经费紧缺，一时难以筹措这笔资金。

会上事情未见分晓，会后，我直接面见当时主持兵团工作的副政委张仲瀚。张仲瀚副政委也了解具体情况，但他感到比较为难。一方面，农七师师部的确该尽快搬迁定点；另一方面，眼下兵团财政确有困难。沉思片刻，他慢慢抬起头，用商量的口气问我：“能不能再往后推两年？”我恳切而又率直地回答：“炮台偏处一隅，出入不便，实在不利于指挥全师的生产。具体情况您也清楚，我认为拖延没有必要。”

经过进一步的商讨、研究，农七师师部由炮台搬迁奎屯的决议，终于得到了兵团主要领导的首肯。

就在搬迁即将付诸实施时，又出现了波折。

那是1956年春天，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来农七师检查工作，当时我正在乌鲁木齐燕儿窝参加自治区党委组织的领导干部哲学班学习，在家的师副政委张兴汉陪同张仲瀚前往下属的团场视察。他们从炮台出发，经下野地，到车排子。当时，独克公路27公里处，通往下野地的道路还没有开通。为抄近路张仲瀚一行从下野地的十九团（现为农八师一二二团）团部驻地出发，沿着荒原上依稀可辨的人迹车辙直往西插，结果到达了当时乌苏县管辖下的三角庄（现隶属农七师一三〇团），并从那里转入独克公路，很快进入了农七师车排子地区的团场。

张仲瀚见三角庄村落稀疏，炊烟袅袅，地势平坦，草木丰盛，一泓清流由南向北蜿蜒而下，它所处的位置，东接下野地，西连车排子，正好处于农七师所属团场的中心。返回兵团后，他当即向仍在乌鲁木齐学习的我提出：把农七师师部设在三角庄。

尽管我十分尊重张仲瀚，但经过反复斟酌，仍坦陈自己的看法，认为奎屯交通、水源、土质状况得天独厚，从长远发展看，这里是农七师师部的最佳地点。

但张仲瀚认为,三角庄一带地处当时农七师下辖团场的中心地带,又有一定的开发基础,适合作指挥中心。至于交通方面,它离奎屯也不远,汽车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我提出:师机关到团场之间只要便利上下联系就好,师部在奎屯,能够依托乌伊公路和未来的国际铁路,面向团场,也便利对上对外联系。这样,事实上也利于和团场的联系。我顺便还汇报了师部搬迁的前期准备工作,告诉张仲瀚,兵团批准搬迁奎屯后,我们去年秋末就派出了建筑大队何喜东大队长率领的两个建筑工程连,进驻奎屯地区打苇子,准备开春建房用。张仲瀚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要选好点,至于打好的苇子,可以派别的用途。

就这样,我们俩反复仔细商讨,最终张仲瀚还是同意了农七师师部搬迁奎屯的方案。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等因素所限,兵团对奎屯的开发做了一些约束和规定,基本原则是规模不能太大。此后,自治区荒地勘察局和兵团设计部门为奎屯设计的开发总面积为 9 780 亩,其中包括耕地 7 826 亩,林地 573 亩,道路 185 亩,居民点 594 亩。从此,搬迁工作才按照最初的方案,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1956 年,进驻奎屯的施工部队,在现在奎屯市一中校园东侧,建起了一片不大的建筑。首先竣工使用的是师卫生科和几栋宿舍,后来相继又建起了总机房、食堂、司政后办公室、招待所、家属住宅、厕所等等。1957 年 3 月,农七师师部正式由炮台迁至奎屯。自此,奎屯进入了自己发展史上的新时期。

1958 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奎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垦区向西延伸到了中苏边界沿线的精河、博乐一带,在那儿建立了精博总场(后划归农五师),向西北长驱直入,开发到了塔城、额敏地区,组建了塔额总场(后改为三管处,“文革”中改为农九师)。向北一直发展到克拉玛依的乌尔禾以北地区。全师以奎屯为中心,进入了农垦大规模开发的时期。

面对整个垦区发生的深刻变化,1959 年我曾冒昧赋诗一首,憧

憬、赞美奎屯的未来。在这首《奎屯颂》中写道：

袖珍图上奎屯驿，如今要建奎屯城。
古驿破房数十间，新城楼屋千百幢。
东西乌伊北独克，车如流水马如龙。
国际铁路门前过，雄鹰当空马达鸣。
南面天山携独山^①，农田遍布北西东。
绿草原上牛羊多，铁马奔驰农田中。
清泉溪水养鱼鸭，蓄水发电放光明，
绿阴深处盖工厂，花果园里飞蜜蜂。
北去二百乌尔禾，湖光山色物产丰。
西行半日是精博，农牧工矿样样能。
水好地广谷粮仓，西北额敏与塔城。
野地^②、高泉、车排子，若襟若带绕新城，
绿洲良田千万亩，遍地宝藏数不清。
经营农林牧副渔，亦工亦农商学兵。
多种经营百花放，功臣榜上论英雄。
三军满怀凌云志，一心攀登共产峰。

1957年3月农七师师部迁至奎屯后，对奎屯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统一规划，计划奎屯城区人口要逐步发展到15~20万。

1958年秋，农七师成立了工业筹备处，翌年7月10日，召开了工商业联席会议，提出了兴办工业的方针，“边基建、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因陋就简，以土为主，先搞起来，逐步更新”，“工农并举，以农为主，以工养农，以农促工”。自此，造纸厂、发电厂、针织厂、化工厂、印刷厂、农机修配厂、木工厂、卷烟厂、棉纺厂、食品厂、面粉厂、机修厂等12家工业企业在奎屯相继建成投产。其中造纸厂生产的单面

① 独山：指独山子。

② 野地：指下野地。

油光纸填补了新疆空白；针织厂是全疆第一个针织企业；新疆唯一的
一家卷烟厂的建成促进了新疆烟草工业的发展。到 1966 年底，这 12
个工业企业共有职工 3 074 人，“文革”前 10 年，累计工业总产值
5 411 万元，利润 1 183 万元。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奎屯城的建设奠定
了基础。

1957 年 6 月 1 日，农七师决定成立奎屯农场规划委员会，并于
同年 7 月 30 日完成了该农场规划设计任务，在奎屯东、北、西三面，
大规模垦荒造田，发展农业。奎屯东、西区各开辟一个果园，产苹果、
葡萄、梨等各种水果及西瓜、甜瓜，养牛、猪、鸡、羊、鸭等牲畜，不但保
证奎屯城内居民肉、蛋、禽、奶、果、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而且还支援
独山子矿区。1960 年，奎屯农场改为奎屯总场，下设三个分场。“文
革”前，奎屯总场人口发展到 13 462 人，耕地面积 10.54 万亩，林带
和果园面积达 3 856 亩。“文革”前 10 年，农场共生产粮食 2 977.3 万
公斤，总产值 2 871 万元。

农七师师部搬到奎屯后，依托奎屯地理位置的优势，坚持“以商
业促工副业，以工副业保农业”的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商业和工副业，
繁荣奎屯经济。1960 年冬，七一服务大楼（现奎屯红旗商场）在奎屯
建成营业，在城区逐步形成了以服务大楼为中心的商业服务网点，除
经销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种商品外，还经常召开物资交流会，展销农
场土特产品，市场繁荣，商品丰富，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1966
年，农七师商业经营总额达 5 593 万元。

奎屯交通方便，市场开阔，农七师师部建在这里，促进了奎屯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到 1966 年底，全师有载重汽车 267 辆，特种汽车
16 辆，大小轿车 21 辆，年货运量 26 万吨，货物周转量 1 530 万吨公
里。

为支援奎屯经济建设，1959 年，兵团汽一团二连从乌鲁木齐迁
到奎屯，同时，自治区客运公司在奎屯设立了长途汽车客运站，开通
了发往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地的定期班车，当年的小驿站从此成为北

疆交通运输枢纽。

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同时,农七师按照统一规划,有计划地加强了奎屯城区社会体系建设,先后在城区内建立了七一中学(现奎屯市一中)、农七师政干校、奎屯纺校及多所小学。其中,七一中学从1961年起还办了医护班、中师班,1966年,七一中学在校学生达1500多人,农七师政干校1963~1966年共培养近700名财会、政工、水利勘测等技术干部。

兵团还在奎屯组建了奎屯农校,开设农学、农机、畜牧等专业,面向全疆招生,为兵团农垦事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农七师医院从炮台搬到奎屯时,仅有130张床位,97名医护人员,有一台150毫安X光机,化验室只能做四大常规化验。1966年,则发展到450张床位,405名医护人员,并使用了心电图、超声波等技术,外科、普外科能开展肾脏、甲状腺、食道、肺、心包、乳腺等多种手术,他们不但为本师干部、工人、群众服务,而且为乌苏县、托里县、和丰县、额敏县等地民族群众就近就医提供了方便。

奎屯城内还设有小型图书馆、展览馆,有两座影剧院,一个专业剧团。七一中学、设计队等单位在1964、1965年先后排演了《江姐》、《雷雨》及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等剧目,文化生活十分活跃。

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辛勤创业,奎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66年底,有10幢楼房在奎屯亘古荒原上拔地而起。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奎屯城区人口达2.7万余人,这里已经成为北疆的一座工、农、商、运、建、服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是农七师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奎屯小城的诞生为稳定北疆局势,繁荣北疆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引起了中央、自治区和兵团各级领导的重视与赞誉。

1958年秋,朱德和康克清视察了奎屯,陪同者有王恩茂、赛福鼎、包尔汉、陶峙岳、李铨、张希钦、张仲瀚等。

1959年秋,王震将军在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和农七师师长刘振世

的陪同下，视察了农七师所属的下野地、车排子和小拐各农场。到达奎屯时，王震对师部定点奎屯非常满意，对这一决定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0年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也到奎屯视察。

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率领国家党政代表团和解放军高级将领杨勇、陈锡联、赖传珠、梁必业、钟汉华等人和国家乒乓球队到奎屯视察慰问，都为奎屯增光生色不少。

在1958~1965年期间，先后还有肖华、南汉宸、胡愈之、高崇民、宋任穷、胡耀邦、廖汉生、罗瑞卿、徐冰、陈士渠、张宗逊、余秋里、李葆华、廖鲁言、杨成武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曾到奎屯视察访问。

在新疆，军政、军民、民族团结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这一精神也始终体现在奎屯开发建设的过程中。

当年开发奎屯，最先遇到的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动员搬迁散居于当地的164户各族居民。为了做好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当时的塔城地委书记张仲涛，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孙继堂，乌苏县县委书记罗美玉、县长阿不都哈提以及县有关领导、工作人员亲自过问，甚至亲赴现场说服、动员，加之当地各族居民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热情地予以配合，使搬迁得以顺利进行。

1956年11月30日，农七师召开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送别首批当地居民迁离奎屯，搬往村民们自愿选定的新住地——乌苏县皇宫新村。农七师派出副参谋长戴军主持欢送大会，并安排人员、车辆帮助搬迁。在皇宫新村，师领导早已派人先期为居民建起了新房，开垦出耕地，并适时播下了冬麦，使迁居的村民们一到新住地就可安居乐业。半个月以后，最后一户当地居民搬离奎屯。164户人家，共计158户迁往皇宫新村，另有6户按照自己的意愿，迁至甘家湖。

197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奎屯正式设市，这个边陲小城的历史，从此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到1990年7月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

普查截止时,全市和农七师总人口已达 226 099 人,包括 30 个民族。其中汉族居绝大多数,有 211 888 人,哈萨克族 2 577 人、回族 4 830 人、蒙古族 477 人、维吾尔族 378 人、满族 172 人。市区人口 7 万多,其余为农七师各团场居民。

1991 年春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专门介绍奎屯的风貌,使世界开始逐步了解奎屯。1990 年秋,东起中国连云港西到荷兰鹿特丹的欧亚大陆桥通车,为奎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奎屯将迈出更大的步伐,取得更辉煌灿烂的业绩,以新的更光辉的形象出现在新疆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抚今追昔,奎屯能有今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各民族的紧密团结。饮水思源,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把热血、青春乃至生命献给这块沃土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加上后来人们的努力,我们才拥有今天这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城。我坚信,在奎屯市和农七师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努力下,必将把奎屯建设成为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记录整理:谢茂胜 邓志敏 1991 年 7 月 27 日于乌鲁木齐)

勋业光华耀丰碑

李书卷 杨新三 张万安^①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气势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优秀人物若星汉灿烂，照耀千秋万代。史骥便是这灿烂群星中的一颗。史骥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忠诚和功绩卓著的实践者。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伟大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的事业和功勋永载史册，像闪耀光华的丰碑矗立在广袤的戈壁绿洲，矗立在人们的心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华儿女奋起抵抗。这年10月，年仅15岁的史骥直面家难国仇，满怀壮志，含悲忍泪走出家门，毅然投身革命，踏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从此，浴血转战，戎马倥偬，铸犁戈壁，屯垦戍边，历经难以名状的苦难磨炼而矢志不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史骥1922年5月21日生于山西省襄陵（今襄汾）县小韩村，少

^① 李书卷：原兵团副政委。杨新三：原农七师政委。张万安：原农七师政委。三人都是史骥的老战友。

年聪颖，富有正义感，是学校的优等生。13岁那年，在邓庄高小带头闹学潮，反对学校陋习。又在全县毕业会考获得第一名，升入临汾中学。上到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忍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走出家门，直奔设在邓庄学校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扩兵工作团，参加革命工作。11月，到八路军山西临汾刘村镇学兵大队当学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杨尚昆等领导亲自讲课。学政治、学军事，学兵大队成为青少年革命的摇篮。史骥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像吮吸母亲的乳汁那样吸取革命营养，迅速成长，于1938年2月结束学习后，意气风发地奔赴抗日前线。3月1日，到达黄河壶口瀑布，只见山逼两岸，层峦叠嶂，河夺一口，惊涛轰鸣。史骥更加豪情满怀，渡冰桥，转道陕北，4月到达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驻地山西省静乐县。旅宣传科长王恩茂将他分到旅政治部奋斗剧社任宣传员。当年10月，史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上旬他参加上下细腰涧战斗，围歼日寇一个联队。25日赴七一九团任前进剧社主任，剧社政治指导员为李照明（解放后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后勤部第一政委）。

1939年7月，七一九团与津南自卫军合编，沿用津南自卫军番号，张仲瀚任司令员，陈文彬任政治委员。自此，史骥随津南自卫军在华北与日寇浴血奋战，挽救民族危亡。10月，在河北灵寿县参加著名的陈庄战斗，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战斗非常激烈，史骥和战友们一次次击退突围逃跑和外来增援的敌人。经过顽强英勇的激战，将被围日寇全部歼灭。旋即开抵冀中平原，活动于河间、肃宁一带，打击日寇，肃清汉奸，迫使小股敌伪不敢离开据点出外骚扰，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至1940年2月，史骥随津南自卫军开抵冀南，讨伐叛逆石友三，于威县东南、馆陶以北对石逆暂八师及暂一八一师展开攻击，经过5次激烈战斗，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和击溃顽军5000余人，俘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随即参加东西张孟战斗，与企图援救石逆的日军展开激战，经反复拼杀，毙伤敌400余人。4月，回师冀中，反击日寇的疯狂“扫荡”。日寇采用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

政策。史骥随部队与敌反复周旋，顽强苦战，掩护群众和地方工作人员。不久，西越平汉路，整训太行山区。8月，参加震惊敌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南渡滹沱河打击敌寇。10月，津南自卫军回到陕甘宁边区，归还三五九旅建制，恢复七一九团番号，张仲瀚任团长，曾涤任政委。

史骥所在的七一九团奉命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他先后担任宣传队长、组织宣传干事、技术书记、副政治指导员，1942年5月，进驻南泥湾九龙泉，参加举世闻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3年，参加整风学习，冬季开展大练兵运动。

1944年，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对日寇的攻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王震率三五九旅大部（组成南下支队）南下湘鄂赣开辟敌后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史骥在南下支队第三支队，参加了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11月9日，告别陕甘宁边区，大军南下，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过河南灾区，抵鄂北大悟山。1945年2月23日夜抢渡长江天险。史骥在心中吟诵着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异常激动，划着小船，躲过日寇的汽艇和岸上日寇据点的射击，登上了江南岸。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祝贺。3月，进军湖南平江一带，南下支队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各大队改为支队，在日寇和伪军的夹击之中，辗转于湘鄂赣边界，浴血奋战。史骥所在三支队，转战鄂南、湘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做地方工作，进行扩兵活动。史骥在崇阳、通城两县以西的药姑山区发动群众，扩大兵员。斗争十分残酷，工作十分艰巨。5月23日，遭日军袭击，史骥受重伤，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养伤。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对我疯狂围攻。史骥于6月22日归队，继续在湘北的岳阳、临湘、平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日本投降后，南下部队奉命北返。史骥随三支队受命担任后卫掩护，在金牛镇梁子湖一带的弹丸之地，巧妙与敌周旋，完成任务，北渡长江。10月初至湖北黄陂县孙家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还名三五九旅，三支队还名七一九团。

11月至鄂北，七一九团改为特务团，史骥任组织股长。随即迎击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的进攻，在枣阳一带进行激烈战斗。1946年1月停战令公布，部队在中原军区停驻待命。2月，特务团编为七一九团二营，史骥任副教导员。

国民党政府急于消灭我中原部队，从1946年3月即进行围歼部署，到6月调集了10个师和十几个保安团，共36万之众，对我进行围歼。中原部队决定向西突围。6月26日下午，七一九团由文殊寺地区开始突围。史骥和战友们在崇山峻岭中与四面云集之敌艰苦作战，时有遭敌围歼之险，而环境又异常困难，经常以野菜野草充饥。全体指战员坚强不屈，英勇机智，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8月28日突破敌西兰公路防线，29日回到陕甘宁边区，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史骥驰骋南北，浴血奋战，备尝艰辛，英勇顽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表现了革命战士对党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一个15岁的农民的儿子，投身革命便是9年的艰苦征战。当他回到延安的时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已进入伟大的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年头。1946年12月，史骥的二营随张仲瀚、曾涤赴山东组建新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建立了由山东子弟兵组成的齐装满员、生气勃勃的渤海教导旅，史骥任一团二营教导员。1947年底，渤海教导旅奉命西调，改番号 of 西北野战军二纵六旅（后改为六师），史骥任十八团政治处副主任，投入大西北战场。

1948年1月，打下运城后，史骥与李宝华结婚。从此，这对革命的战友和生活的伴侣相许以诚，相濡以沫，共步坎坷而辉煌的人生里程。他参加了解放西北的多次战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49年9月6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史骥和战友们听说要向新疆进军，非常激动，9月16日离西宁，越大坂山，渡大通河，冒着奇寒攀上海拔5900米的祁连山，穿过百多公里的荒凉草原。祁连山上气候恶劣，天

气瞬息多变，一会儿丽日当空，一会儿雨雪交加。史骥的脚冻肿了，裂开了口子，但不能停，一停下来就会冻死。经过 28 小时连续行军，胜利翻越祁连山，经大梁，至峨堡，进民乐县城，随即侧山丹而过，27 日到达张掖。听到新疆和平起义的消息，指战员们非常高兴。12 月进军玉门，史骥接到通知被调到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工作。12 月 13 日由玉门出发，经安西、星星峡，15 日到哈密，17 日抵新疆省会迪化。经过学习和准备，29 日到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组建的三十二兵团工作。此后，他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委，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代政委，二十二兵团农七师代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代政委、政委。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命令，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带领农七师广大指战员，扶犁把剑，为兵团的发展壮大、为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骥遭受长期迫害。他对党的事业矢志不移。1975 年和 1980 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先后作出决定，为史骥彻底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后，史骥历任南疆铁路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农林局副局长、自治区农垦总局副局长、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兵团顾问、兵团文联第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席，为对兵团“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南疆铁路建设，为自治区农业和林业的发展，为兵团的恢复与振兴做了大量工作，贡献了长期积累的宝贵才能和智慧。

史骥于 1995 年离休后，仍关心兵团事业，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撰文赋诗，晚节高尚。1997 年 1 月 9 日 5 时 20 分在乌鲁木齐因病逝世，享年 75 岁。15 日，史骥遗体告别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4 月 6 日即清明节次日，遵照史骥遗愿将其骨灰撒入奎屯河。

史骥夫人李宝华是党培养的优秀干部，任兵团工会组织部部长，离休后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习丹青，情趣高雅。长子史彬在兵团劳改局工作。女儿史萍，在新疆科学院工作。次子史林，在兵团

物资局工作。三子史宏，在石河子农八师公安局技术科工作。

二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岁月中，史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王震、王恩茂、张仲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闪光的智慧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作风，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战功，其功勋永垂千古。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年代，史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功勋卓著，丰碑巍峨。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是史骥为屯垦戍边建立的第一功勋。他在《往事如潮》一文中记述了改造工作的艰难过程。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连克西安、银川、兰州、西宁等重镇，直叩新疆大门。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队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宣布和平起义。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基本按原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为二十二兵团，下辖步兵第九军及两个骑兵师，九军辖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师。史骥被任命为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治委员，一同到这个团工作的有40余名从他原来工作的六师十八团调来的政治工作干部。

起义部队曾是一支镇压人民、镇压革命的反动军队，政治成份复杂，有国民党、三青团、蓝衣社、青年党、社会党等等反动党派和青红帮、一贯道等反动封建组织，全团参加反动党团和封建组织的有505人之多。他们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蒙蔽教育，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有些军官更是包藏祸心，暗伏杀机。部队纪律涣散，吃喝嫖赌，夜不归营，开小差严重。史骥等政工干部于1949年12月29日到达部队，两天后便是1950年元旦，营区枪声大作，子弹从住房上空呼啸而过，以宣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要将这样的部队改造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任务是何等艰巨。

史骥坚决贯彻执行党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有步骤、生动地进行改造工作。首先掀起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提出彻底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既要将士兵改造为革命战士，更要将军官改造为革命干部。在学习热潮中制定进步计划，使部队稳定下来，为整个改造工作打开了大门，打下了基础。接着进行三个对比教育，即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两个政府、两个军队进行对比。通过鲜明的对比，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广大起义官兵认清了大是大非。在此基础上，史骥和政工人员深入实际，进行穷富对比和挖穷富根源，利用“谈家常”、“回忆会”等形式，掀起了普遍的诉苦运动。由于士兵们苦难深重，所以诉苦运动如烈火干柴，一烘而起。诉苦运动使官兵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便乘势开展一条心的民主运动，打破旧的人事关系，大家一条心干革命。经过一个半月的政治学习，取得了初步改造国民党起义官兵的胜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于3月1日意气风发、精神昂扬地开赴沙湾垦区，光荣地投入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史骥为之付出心血的七十四团即今天的一二三团，是农七师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团场，部队成员早已变化，却依然保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色和优良传统。

发现和决定开发车排子是史骥屯垦戍边事业丰碑的奠基石。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一个春天，史骥和他领导的部队挥师皑皑雪原，穿越茫茫戈壁，挺进沙湾县的小拐。春雪渐渐消融，一片片梭梭和荒草被开发，大家发现小拐垦区并不十分宽广，难以摆下七十四团、七十六团两支垦荒部队，但又不知何处有可供开垦的荒原。恰值此时，道路翻浆，无法通行，玛纳斯河春洪爆发，粮食运不进来，饥饿威胁着广大军垦战士。史骥经师领导批准，身负众望，亲自出外筹粮，他赶到迪化，向王震司令员紧急报告。司令员给军区后勤部甘祖昌部长写了张条子：“史骥同志的部队缺粮，望予解决。”他拿着司令员的条子找到甘部长，解决了问题，携款回团，组织专门班子：王云龙副团长带一

组人赴额敏购粮，他带一个组到乌苏购粮，顺便探求扩大垦区、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乌苏县领导对购粮给予很大的支持。史骥一边购粮，一边考虑如何扩大垦区。他得知乌苏以北有个地方叫车排子，便详细了解情况，反复分析，认为这个地方位于奎屯河下游，利于灌溉，土地广阔，交通便利，很有开发价值。他以指挥员的魄力作出决断，报请师领导批准，七十四团由小拐分批移驻车排子。经过开发，50年代便创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营农场群。今天，车排子已成为临近团场和周边地方乡镇的商贸集市中心，车排子垦区成为农七师主垦区，成为国家商品粮、棉基地。

农七师师部移驻奎屯，使史骥走向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进驻垦区后，史骥工作成绩显著，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当年11月晋升为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年任师代政委，后任政委、党委书记。二十五师于1953年改为农七师，1954年归属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此时兵团北疆各垦区的界线基本划定，农七师无法再往东发展，南面是天山，只能向西、向北延伸，1955年即开发下野地垦区。师部炮台位于垦区最东头与农八师垦区的交界处，偏于一隅，出入非常不便，随着垦区的发展将越来越不合作全师的指挥中心。师部搬迁势在必行，而且日渐迫切。师部搬向哪里，众说纷纭。史骥根据地图反复研究分析，建议将师部搬迁奎屯。为了统一领导内部的意见，他与师长刘振世于1955年9月到奎屯进行实地考察。奎屯位于沙湾与乌苏之间，是古代的一个小驿站。背靠雄伟的天山，面临广阔辽远的准噶尔盆地，乌伊公路与独克公路交汇于此，奎屯河傍身而过，规划中的北疆铁路横贯全境。考察后召开军政委员会，史骥耐心细致地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沙湾县城，比炮台还要偏东，位置太僻。独山子虽有富余的电力，但土壤贫瘠，地势坡度大，不易耕作，至于电力的富余是暂时的，况且农七师以后自己可以发电。乌苏县城条件较好，但地方上已建立了县级政权，师部再迁至此，双方的发展都会受到制约。他在《雁声集·奎屯小城的诞生》一文中写道：“经过反复酝酿，我再

次提出将师部迁往奎屯的建议，并且得到师长刘振世和参谋长王桂秋、副参谋长朱耀臣、政治部副主任刘长进等同志的全力支持。农七师机关由炮台迁往奎屯的方案，终于在师军政委员会上赢得了多数同志的赞成。此后，又在师党委常委会上正式形成了决议。”1957年3月，农七师师部由炮台迁至奎屯。自此，奎屯大发展，农七师大发展，史骥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获得充分发挥，一个个远大的战略目标逐一实现。

奎屯的崛起为古西域大地的亘古荒原和史骥的人生历程镶嵌了一颗灿烂的明珠。奎屯原为乌苏县的一个村，多苇湖、沼泽，南是戈壁滩，北是盐碱地，散居着百多户各族农牧民。师部移驻奎屯后，史骥带领党委一班人，根据实际情况，按15~20万城区人口的规模对奎屯的建设进行了统一规划。奎屯建设全面、迅速地发展。在奎屯东、北、西三面大规模垦荒造田，建立了奎屯农场，即今一三一团，农、林、牧全面发展，保证了奎屯食品供应，还支援了独山子矿区。1958年秋，成立工业筹备处，随后按照“边基建，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因陋就简，以土为主；先搞起来，逐步更新”的方针发展工业。他不仅统筹规划，有时还亲自联系设备。发电厂、卷烟厂、棉纺厂等等12家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奎屯基本形成了以轻纺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少轻工产品名扬区内。1959年夏，召开工商联席会议，决定利用奎屯优越的地理和交通环境，大力发展商业。不久，便形成了以七一服务大楼（红旗商场前身）为中心的商业服务网络。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整个奎屯根据地形、风向作了科学的布局：西区处上风向，为文化教育区；中区为党政机关、商业区；东区下风向为工业区。街道按东西、南北向等距离设计和建造，呈整齐的棋盘状。城市广植树木花草。作家刘萧无为史骥《雁声集》写的序中就对当时的奎屯予以赞赏：“那里有个史骥亲自设计的幽雅的奇景，马路两旁有的是绿树高耸，覆盖成荫，有的是相对的俯首鞠躬，枝叶连理，成拱型状。夏天，行走在这样的绿阴之下，会给人一种奇特的幽雅的舒适

感。他还在这儿修起两座花园，一名东果园，一名西果园，无比清静，几脱尘寰。”1975年9月，国务院批准奎屯设市。实行改革开放后，奎屯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七师志》记载：“奎屯，居地理之津梁，扼交通之管钥，拥物产之富饶，得市容之清秀，为改革开放中的明星城市。”

全面建设和发展农七师构成史骥屯戍边事业的辉煌大厦。奎屯迅速崛起，成为农七师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奎屯为依托，农七师迅速扩大垦区，发展各项事业。史骥胸怀大略，高瞻远瞩，带领广大军垦战士，从规模、质量、行业等各方面大力推动农七师的建设事业向前发展。他不仅组织发动，运筹帷幄，还亲自察看地形，调配干部，与地方党政领导协调磋商。他西勘高泉，北出塔额，布点开垦，聚资经商，为屯戍边事业开拓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东至炮台、小拐，北至塔城、额敏，西至精河、博乐，方圆数百公里的垦区，遍布从天山脚下到边境线的北疆。《农七师志》记载：“1959年，设立3个管理处和3个总场，管辖28个农牧团场。1960年发展到36个农牧团场，27个直属工、交、建、商等企事业单位。有人曾戏誉农七师为世界上最大的师。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高警惕，保卫边疆，平息四棵树反革命叛乱，阻止伊塔事件发展，建立边境农场带，加强值班连队和民兵建设，筑起保卫边疆的钢铁长城。广大军垦战士为地方各族群众大办好事，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医疗、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史骥非常重视多种经营。他运用事物互相联系、构成系统的哲学思想指导工作，使各项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不仅速度快、规模大，而且内涵丰富，充满生机。他牢牢把握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基本国策，又努力做到农、工、商、交多种经营，科、教、文、卫全面发展。比如他重视商业，开垦之初，便组织合作社。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在从乌鲁木齐西到伊犁、东到哈密和从独山子北上塔城、阿勒泰的公路沿线，农七师都设饮食网点，方便群众生活，繁荣社会经济，为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再如他重视教育，初到小拐垦区便成

立学校,仅有 11 名学生,条件简陋,但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热情关怀下,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在多种经营中,史骥特别重视林业。他认为:林业是百年大计,种一棵树要好多年才成材,所以遇到干旱缺水,宁肯少种田,也要保住林带、果园。每开辟一个新团场,他总是把植树造林列入建场规划。平时检查工作先检查林带,对不重视绿化工作的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由于他多年一贯地重视植树造林,所以,条田周围,道路、水渠两旁及居民点内外都树木葱茏,林带绵延,果园飘香,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七师的树,八师的路”,一时传为佳话,史骥被誉为园林政委。他曾吟诗曰:“杨柳高志参云天,枣槐清香吐嫩芽。三岁葡萄多结子,妙龄桃李果满桠。”

建设和发展兵团,史骥功彪青史。任何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都必须付出艰苦的奋斗。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治委员、兵团顾问、兵团文联名誉主席,史骥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兵团。他善于抓住一切机遇,以其对党的事业,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无限忠诚,以其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远大的战略眼光,去开拓兵团的事业和新中国的屯垦事业。他不畏艰险,不怕挫折,矢志不渝,将理想变为现实,创建了兵团现在的农七师、农九师、农八师下野地垦区、农五师沙山子垦区,创建了奎屯市。他是开发兵团、创建兵团的功臣。史骥担任农垦总局及兵团领导后,更全面地为兵团贡献力量,辛勤工作。他抓生产建设,重视发展经济。他对经济工作钻研得很深,1984 年撰写《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合作经济事业》一文,不仅追述了兵团合作经济的历史,阐述了兵团发展合作经济的重大意义,还对资金问题、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当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股份制经济的时候,我们又一次为史骥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所折服。他关心师局的建设和发展,对取得的成绩近乎喜形于色;而对挫折十分着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对造成严重损失的则抱憾终生。他极为关心并大力扶持兵团的文化建设事业。为了成立兵团文联,他奔走呼吁,多方联系,克服了种种

困难,越过了种种障碍。兵团文联成立后,他又为各师文联的成立而奔忙。他说:“要给我们兵团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建个家。”不只如此,他还关心、领导、组织兵团的文学创作活动。他对史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更是具体:论及意义,语重心长;到会讲话,循循善诱;贡献资料,宗宗件件;为志书撰写的序言受到专家的好评。史骥对兵团巨大和无私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捍卫兵团事业的勇气和才能。70年代后期,曾有一股风,否定屯垦事业的成就,甚至有的专家发表文章,说兵团屯垦戍边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史骥挺身而出,撰写《要以发展的观点处理生态平衡》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知识,阐述了科学的发展的生态平衡观,捍卫了兵团的事业,捍卫了真理。这是一位战士在理论战场和建设战场上的冲锋陷阵。

史骥贡献给兵团和全社会的还有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体现在他的讲话和文集中。他在大会上讲话,没有高级领导的架子,说古论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火花,令听者受益匪浅。80年代后期,他已过花甲之年,且有腿疾,几次到兵团史志工作会议上讲话竟然坚持站着讲,其讲话的内容与形象,令与会者终生不忘。《雁声集》是他的诗文集,近30万字,1993年出版,多为回忆录与怀念性文章,叠映历史的深邃和现实的敏锐,交融时代的风云和人生的哲理,文情并茂,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写七一九团的两篇志体文章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新旧体诗歌则在庄朴的情致中深蕴着人生的体味。三篇论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敦厚中藏着犀利,高扬着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旗帜。特别是《要以发展的观点处理生态平衡》一文,至今仍闪耀着论辩和实践的光彩。兵团作家钱明辉在1994年第4期《绿洲》发表的《史骥和他的〈雁声集〉》文中写道:“史骥的回忆录的最大特点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回顾他和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人和事;以真诚的同志间的友爱去俯视洞察每一位革命同志。因而在他的整个作品中

贯穿着一种极为真诚的人生情感。”

史骥以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功绩,将他的名字与党和人民的事业,与兵团事业、新中国的屯垦事业一起铸成伟大和壮丽的永恒。

三

在长期复杂、艰苦的战斗、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史骥陶冶了高尚的品德,养成了优良的作风,表现了出众的才华。

史骥党性很强。他总以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舍弃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能够高瞻远瞩,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农七师师部选址过程中,张仲瀚曾提出三角庄方案。史骥对自己的老上级一贯十分尊重,但他仍坦诚己见,反复商讨,最终取得共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如紧急筹粮、扩展垦区、多种经营、克服困难创建文联等等,都体现了他高度的党性原则。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决定,不谋私利,不搞小圈子,严格地按组织原则办事。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力戒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史骥善于带领党委一班人工作。他长期担任农七师党委书记,牢记毛泽东当好“班长”的教导,使党委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他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分工去办。他牢记毛泽东“弹钢琴”的教导,做工作不是巨细都抓,而是遵循原则,讲究领导艺术,善于使用干部。他使用干部的特点就是知人善任。首先是信任,把工作交给下级去干,副书记刘长进、常委朱耀臣、杨新三等都是他党政工作的得力助手。其次是支持,从各方面关心、鼓励、支持干部的工作。第三是承担责任,干部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他不埋怨。

史骥善于团结干部共同工作。在干部问题上,他有特点。对新调来的干部,他都亲自谈话,了解情况,关心生活,然后安排适当的工

作。他特别注意一视同仁，量才适用。1955年，农九师并入农七师，他对原农九师的干部都作了很好的安排。他特别尊重国民党起义军官。五六十年代，党内职务由从人民解放军派来的干部担任，军政领导多由起义人员担任。为了团结，为了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在重大问题上史骥总是先召开军政委员会议，然后再召开党委会议作出决定。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很慎重，很得体。一次，参谋长李雪谷（起义军官）发脾气，打了史骥的公务员一耳光。事后，李雪谷既懊悔，又惊恐，向史骥认错，要求给予处分。没想到史骥却安慰他说：“认识到错误就行了。”并亲自对政治部主任张羽交待：对此事不要再作处理。相比之下，他对同他一起从一兵团来的干部，要求很严格。离休后，他对兵团在职干部都非常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又绝不越位进行干预。他以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和气度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使各方面的干部都无派别之分、亲疏之感，愿意与他共事，顺心、大胆地工作，团结奋进，共同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史骥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他做事很扎实，总是深入到团场、厂矿、连队、田间，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他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批评干部不批评群众。到基层检查工作，往往先到第一线，到现场，亲自察看，向群众了解情况，然后再听取领导干部汇报。发现问题，查找领导干部的责任，进行严厉批评。群众有事找他，他总抽空接见，态度很随和。他任兵团领导后，仍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到师局，到团场，详细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1992年，他不顾70岁高龄，深入一二八团连队、田间，调查改革开放的成就，回来后，热情地撰写了散文《前山一枝花》。史骥的足迹踏遍奎屯河畔、天山南北。他的心与广大群众一起跳动，他的感情与兵团职工喜忧与共。

史骥作风雷厉风行，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党委决定的工作，一定要做，克服任何困难也要坚决完成。做任何工作，总是一抓到底，有始有终。五六十年代搞多种经营，养殖安哥拉兔，有个团的政委没有完

成任务,他给予严厉批评,在后来的一两年内都经常联系此事。平时找人谈话,开会,做任何事情,规定几点钟就是几点钟,自己从不拖延,也不允许别人耽搁。居兵团领导高位和退下领导岗位之后,与人谈话办事,也从不延误,更不毁约。他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令行禁止的作风和极强的时间观念。

史骥善于科学管理,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他在兵团及早年在师、团,行政职务是政委、副政委,党内职务是书记、副书记,都是政治工作干部,却非常重视经济建设,重视科学管理。在管理方面,他勇于实践,大胆实验,具有超前意识。早在1953年4月,他所领导的农七师即颁布按劳记分和评功记分方案。第二年,兵团要求各部队进行试点,责令农七师全面推广执行。1955年1月,农七师全面实行定额管理和经济成本核算制度,班、排、连三级核算,连为基础,全师的经营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两个月后,兵团派工作组到农七师,在二〇团(今一二三团)进行定额管理测算试点,编写出《农业生产定额管理条例》和《农业生产各项作业定额标准》,向全兵团普遍推行定额管理。50年代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兵团也安排农七师率先实行。1984年他任兵团副政委时,在《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合作经济事业》一文中,对兵团的合作经济及股份制提出了6条经营管理原则,至今仍具实践意义。

史骥注重兵地关系和民族团结。他在实际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生产建设兵团的事业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业,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持。他非常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和少数民族同志,与塔城地区的张仲涛、孙继堂、哈森别克,博尔塔拉的谢玉田、格尔夏等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响应毛泽东主席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号召,积极、全面地支援地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无保留地向地方输送干部,仅1952年就从农七师选调38名团、营级干部到地方工作。支援技术,支援良种,支援农机具;送医,送药,培训医护人员;办教育,文艺演出,节假日慰问,等

等,成为经常性活动。史骥每年都要检查与地方上的关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兵地关系、民族关系不断加强。他身为兵团领导,每次到农七师检查工作,总要去看望奎屯市的领导,致力不断增强师、市团结。

史骥对兵团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热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热爱为之献出人生韶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与兵团同悲欢,他与兵团共命运。这种诚挚的感情,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屯垦戍边的具体实践长期融合的结晶。还是1954年,他有到内地海陆空军的想法。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张仲瀚与他促膝谈心。这位他敬仰的首长和战友语言很轻,情感很重。他感到非常难过和惭愧,以后再也没有过离开兵团的念头,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他对事业、对兵团总是充满信心。也就是那次谈话后的第二年,他到兵团开会时到张仲瀚房中叙谈。张仲瀚递给他一张便笺,上面写的正是那首后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七绝:“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史骥热爱兵团的感情体现在工作上,渗透在生活中。对不爱兵团的人,不管职位高低,也不与之交友;对为兵团做出贡献的人,他都敬重有加,视为挚友。在他的《雁声集》中就有5篇怀念在兵团共事的首长和战友的长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不尽的情思。在《燕赵男儿贵姓张》一文中,写张仲瀚的功勋,写张仲瀚的才华,写他们惨淡的诀别,读之令人心颤涕零。史骥在患病住院期间和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兵团事业。遵照他的遗愿,逝世后将骨灰撒进流经他长期工作过的农七师垦区的奎屯河。史骥为兵团献出了生命和一切。

四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作为终生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祖国的强盛和繁荣而战斗和工作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史骥有着博大的胸怀,豁达的性格,不管阴晴风雨,生活总是充满意义,心中总有灿烂的阳光。

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平凡中蕴含着丰富的意味。1950年10月，垦区的第一个秋天，金实累累，瓜果飘香。史骥把远在迪化的妻儿接来垦区的新家。他带着妻子，背着一岁的儿子，逛小拐的街道，看连队的庄稼。干部、战士们用自己生产的西瓜、甜瓜接待他们，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他的生活和事业融合在一起，平常，朴实，充满生机。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他更注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以率先垂范、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和教育下一代。他晚节高尚，读书著文，修养品格，不贪享受。生前向党组织请求，谢世后丧事从简，不收受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的挽幛、奠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嘱咐家人不向组织提出其他要求。

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是一种人格的修养，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尊重。50年代，自治区陈西夫处长到基层检查工作，在奎屯停歇，刚住下，史骥就去看望。陈处长在感动之余，不免忖度：来前未打招呼，史政委怎么知道呢？原来史骥为了主动提供方便，把上级和兄弟单位来人必须汇报作为招待所的制度规定下来。七十五团团长在镇反时被抓，放出来后流落街头做小买卖，度日艰难，史骥发现后主动为其安排工作。他任兵团领导后，对师、团来人以礼相待，尽其所能帮助解决问题。他一生以革命为己任，视事业重于生命，有理想，有抱负，待人接物很大器，不趋俗。他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对同志悉心照顾，不计个人恩怨。发现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诚心向下级认错道歉。这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人格力量，使他能够团结各方面的贤人志士，在餐原粮，人拉犁，挖地穴居，伏冰卧雪的艰苦环境中，开辟大局面，成就一番事业，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身居高位和退下领导岗位之后，都不乏群众朋友。

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不仅是领导干部应有的素养，也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远见卓识的标志。1963年，史骥在他所经营的农七师绿洲热情接待了著名的诗人贺敬之、柯岩及郭小川、杜惠两对夫妇，与诗人、作家欢聚，望大漠戈壁平畴如锦，忆当年血火岁月的相知相慕。

郭小川还为他朗诵了受到陈毅元帅赞赏的新作《祝酒歌》。80年代初，兵团成立文联，有不同意见，他与柯岩等联系，终玉成雅事。1991年，郭小川15周年祭辰之时，他积情为文，忆抗战期间两人同台演戏，忆小川的《望星空》受到批判，又记80年代杜惠在幽暗的斗室整理丈夫的遗稿，全文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读之令人情动于衷。可能由此渊源，他在工作中非常关心知识分子。60年代，一批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参加到兵团的屯垦队伍中来，他给以关怀和爱护，许多当年的知青已成为今天的领导和骨干。有一次，他和《绿洲》副主编钱明辉参加会议，钱明辉有不吃早饭的习惯，他一边让人去叫钱明辉，一边与全桌人耐心等待。饭后，他嘱咐钱明辉：青年人要爱护身体。他有许多知识分子朋友。他与原新疆文联主席、老作家刘萧无前后有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当年，他曾邀请老友到他所创建的农七师垦区做客，观赏戈壁新城的风光，品尝军垦战士的佳酿；晚年，老友以极大的热情为他的《雁声集》作序，并忆及奎屯小城初建成时的清秀和《一二九团访酒》诗的萌发。史骥与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是老战友，几十年交往甚密。穆青在赠诗中写道：“感君诗书厚边客，半日散语皆文章。”馈书长谈的友情溢于笔端。

史骥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是与他高尚的气节共光辉的。他高尚的革命气节是在为祖国为人民而战的一次次血的洗礼中形成的，是在屯垦戍边一次次令人难以置信地战胜困难的考验中养成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从塞北战斗到江南；解放战争时期，他从渤海之滨战斗到天山脚下；和平建设时期，他走遍了天山南北。他正是挺直腰，才没被艰难险阻所屈服，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押7年，被批斗200多次，仍心明如镜，信仰不移，吟有“牛鬼蛇神”凭尔骂，他年请君看白头”的诗句。晚年，愈加注重品德的修养，不谋私利，不趋世俗，惟独关心国家大事和兵团事业。

一部好书，一篇佳作，是一重天地。史骥一生受益于读书学习。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喜读历史，颇爱诗词，明志曰：“远而敬之烟与

酒，平生嗜好是读书。”大会讲话，促膝谈心，援引古今，信口有据。勤奋使他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过古稀之年，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竟能即兴引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片尾的歌词全文。工作之余，他撰文赋诗，晚年出版《雁声集》。读书学习，使他气势磅礴的屯垦戍边壮举具有明确、深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使他的个人生活氤氲一种儒将风雅。

自古把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不朽之事。史骥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屯垦事业立了功；信仰共产主义，忠于祖国和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公正廉洁，谦虚谨慎，他为今人和后代立了德；笔录历史风云、人世沧桑，纵横是非功过、情怀理想，如鸿雁之声鸣于生前身后，他为人民立了言。我们的首长，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史骥是永恒的。

底事未别去匆匆，

天国待君拓荒犁。

（梁德元执笔 于1998年）

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郭书森

史骥辞世整整一年了，每当人们谈起他的人品和才干时，都惋惜地认为他的逝世是失去了一个人才。是的，史骥是我党长期培养造就的一位杰出的、德才兼备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正如新疆著名作家刘萧无所赞：“史骥同志是有名的三五九旅的一员，他既会打仗，又会种田，既会做政治工作，又会做文艺工作，真可以说是个全才。”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史骥从15岁参加八路军，革命生涯的60年，就是他从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60年。他的经历，从宣传员、宣传干事、指导员、教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基本上是一色的政治工作职务和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从理论到实践他有丰富的经验，可称得上是政治工作的专家。我与史骥相识是在1947年8月，我随张扬带领三团宣传队到一团驻地演出，认识了当时任一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史骥，他给我留下了潇洒俊逸的印象。恰巧，1948年春史骥调十八团（教导旅三团）任政治处副主任。战争时期我在他直接领导下，战时生活我们基本上是朝夕相处的。在政治业务上我只是个参军不久的青年学生，什么也不懂，史骥以他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常常对我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我个人青年时代的成长，是与史骥的关心和教育分不开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领

领导人之一。他永远是我的师表,是我的楷模。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路线,以党的总任务为任务。实际上政治工作都是以人为本,都是做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工作。史骥做了一辈子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做了一辈子教育人、培养人、团结人和改造人的工作。今天,我以个人跟随史骥战斗和工作的经历,对他政治工作的业绩,尽我所知略加回忆,寄托我心中无限的崇敬和深沉的怀念。

—

1947年2月25日,农二师前身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阳信成立,第一任旅长张仲瀚,政委曾涤。这是为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以山东渤海地区宁津、商河、惠民、临邑等县翻身青年农民为基础,以三五九旅、晋绥军区和渤海军区地方调干的一批老红军、老八路为骨干,以胶东军政大学学员和渤海地区的几个中学的青年学生为文化力量,组建起来的一支新军。新旅组建完成时共有官兵8335人,下辖一、二、三团。史骥被任命为一团政治处副主任。是年,教导旅由阳信转移至庆云地区,开始了政治建军和军事训练。

教导旅刚组建,就其成员来说只不过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具有严格纪律性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是以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为指导,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入部队之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作为团政治处领导人的史骥,对一团部队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一方面要进行培养和选拔干部,发展新党员,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组织,另一方面要在连队普遍建立军人委员会,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保障士兵群众的民主权利。最繁重的工作是结合军事

训练,对部队有计划地进行“为何当兵,为谁当兵”、“为何打仗,为谁打仗”的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人民军队革命传统、革命纪律教育。通过忆苦形式的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大多数贫苦农民出身的新战士,认清了穷人受苦的根源,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反动军队的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从而明确了农民要翻身求解放,必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也明确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目的和正义性。使每个新战士政治上树立起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为保卫解放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而战的坚强意志,激发了积极练兵、准备参战的热情。通过人民军队革命传统、革命纪律的教育,使大多数农民意识较浓、乡土观念较重的新战士,认清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增强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性。在这些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广大新战士提高了身为解放军的荣誉感、光荣感,树立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甘愿奉献自己一切的坚定信念。

当时,一团对新战士政治教育有一个特点,就是史骥和营、连政治干部善于抓住先进典型。一团二连有个叫刘华顺的新战士,他的未婚妻曾三番五次找他回家结婚,刘坚决拒绝,并表示“不打倒蒋介石不回家结婚”。二连指导员赵干卿创造性地把“不打倒蒋介石不回家”这样一个很普通而又境界很高的思想,变为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开展了向刘华顺先进思想学习的运动。由于政治工作措施有力,该连新兵没有一个离队的。一团和教导旅党委也运用二连政治工作的经验在全团和全旅开展了向刘华顺学习运动,对巩固部队起了很大作用。赵干卿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在旅第一次党代会上还介绍了二连政治工作经验。

教导旅经过8个月的军事训练,于10月间结合“野外大练兵”向西北挺进。11月抵达河北武安县,归建西北野战军建制,编为第二纵

队独六旅，旅属一、二、三团依次编为十六、十七、十八团。政治工作也由练兵时期转为战时的政治工作。部队在坚持战时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在战斗间隙经常采用集中教育的形式，整顿部队的思想和作风。运安战役结束后，1948年春结合晋南地区土改运动，部队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西府陇东战役后，1948年6月在“三查”基础上又开展了“评斗志”（也评指挥，评工作），并结合进行评功查过活动。史骥对十八团“评斗志”做了细致的组织工作，以连党支部为核心领导，连队军人委员会组织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在动员启发、酝酿讨论、提高认识、疏通思想的基础上，采用自动报名、群众提名、领导指名的办法进行评查。接受了“三查”中过火的教训，不搞人人过关，不搞追逼，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耐心说服。十八团“评斗志”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查过与评功相结合，大力宣传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史骥亲自操作，整理和编写了十八团八连连长傅有才荔镇抗击战中在冉张家阵地指挥一个连抗击敌人三个团的轮番冲击，英勇顽强，寸土不让，坚持一天的战斗，始终未让敌人前进一步，为西野部队摆脱危机、安全转移立了大功的英雄事迹，在部队中大力宣扬。全团立刻掀起了人人表决心，立功杀敌的热潮。此时，二军也授予傅有才“模范指挥员”称号，作为先进典型在全军表彰。对傅有才英雄事迹的宣传，大大提高了部队群威群胆、英勇杀敌的战斗士气。

山东渤海地区组建的以青年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教导旅，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政治建军和军事训练，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新战士的头脑，用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传统改变了新战士的精神面貌。这支部队转战西北战场后，打了不少硬仗、苦仗、胜仗，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政治上已成熟起来，成为西北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1948年6月，二军随军记者杜鹏程为荔镇抗击战来十八团采访，当时他问史骥：独六旅这支部队组建不到两年，为什么这样巩固、

这样团结、这样有纪律，又这样能打硬仗？史骥胸有成竹地回答：一是对这支部队的建设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毛主席建军思想中，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及执行作战、生产、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提倡发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一系列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都落实于部队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二是这支部队是以山东解放区翻身青年农民为基础，向他们贯注了无产阶级思想，传授了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纪律，他们就觉悟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从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士气。三是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骨干，是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和地方老党员。这些骨干都经过了艰苦的战争考验，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熟练的指挥作战的经验，在战斗和生活上他们都能身体力行，起模范表率作用，他们善于团结士兵群众，尊重士兵群众的人格，官兵之间形成了团结友爱的关系。上下团结，官兵一致是部队的力量所在。杜鹏程听了史骥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介绍，深表折服，最后他念了一段战地采访笔记：“这是一支好部队，作风过得硬，要重视这支部队的培养和训练。这个部队会涌现很多好干部。”这是西野彭德怀司令员在荔镇战场上对独六旅张仲瀚旅长当面讲的一段话，对独六旅这支部队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新的希望。

二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一个特殊的任务，是保护解放战士、教育解放战士和利用解放战士。这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中，瓦解敌军的一个重要含义，也就是“化敌为我”，把在战场上放下武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教育改造成为解放战士，参加解放军，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我军进入国民党区域，实行无后方的或半后方的作战，一切军需必须全部或大部自己就地解决，我军提出的口号是“我们的后方在前线”、“以战养战”、“就地取给”，在作战中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兵力的补充除了解放区动员农民参军入伍外，主要依靠补充解放战士。没有这个条件就无法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史骥在战争期间，曾担任过二军解放旅五团的副团长和军官大队的大队长，也曾任过国民党军十七师警卫营起义营的政委。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改造教育解放战士的任务，一批又一批地把教育好的解放战士输入到部队，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1948年冬永丰镇战斗后十八团伤亡减员过大，就把战场上解放的800多名敌七十六军的士兵和师解放团调进的400名解放战士编入连队，结合部队整训，进行教育和融化。记得在黑池镇整训中，为了教育好全团1200名解放战士，团政治处全力以赴，史骥几乎天天下连队，不是上大课就是组织示范性的诉苦大会。那时教育改造解放战士最传统的最成功的办法是发动士兵群众开展诉苦挖根运动。史骥对十八团教育解放战士的工作抓得很细，要求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首先启发解放战士自己回忆过去痛苦的遭遇和受苦的根源，创造出有利于诉苦的气氛。然后转入典型诉苦和大会诉苦，在诉苦大会上，不少解放战士从诉地主剥削苦，联系到被国民党抓兵和在军营受军官打骂虐待，甚至残酷刑罚。有的人诉起苦来，真是字字血泪、句句仇恨，往往是一个人诉苦全场大哭，大大激了解放战士的阶级仇恨。在诉苦的基础上，解放战士普遍认识到只有参加解放军，才能为自己报仇雪恨，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自己的彻底解放，一致表示团结杀敌革命到底的决心。经过诉苦教育和军事训练，大多数编入部队的解放战士能勇敢作战，不少解放战士经过战争考验，基本革命化了，有的入了党，提了干，有的成了战斗英雄。1949年部队进军新疆前，步兵六师一般战斗连队，解放战士占多数，进疆后成了农垦战线的有生力量。

三

1949年9月，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后，为了接受整编起义部队和改造教育起义人员，当时担任十八团政治处主任的史骥奉命带领由十八团调配的4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应当说，史骥执行改造教育起义人员的任务，是党组织用到了他的长处和才能，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进疆后，史骥还未到而立之年就被任命为新疆起义部队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治委员。这个团是国民党的老部队，军官资格老，政治情况复杂，尤其是部队成员中不少人被反动党团和封建道教所控制。在宣布起义后，我政工人员未到职前，该团二营在呼图壁曾发生三个连长杀死营长发动叛乱的事件。少数军官不满起义而放弃职守，管理失控，部队如同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仅有40多名政工干部要开展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史骥坚持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并采用改造教育解放战士的成功经验，决心通过民主诉苦运动、建党建团和生产建设，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开思想改造的大门，在史骥领导下，七十四团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以两个党、两个政府、两种军队的“三个对比”为内容的学习运动，用具体事实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两个政府、两种军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革命的。并揭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实质，使大部分士兵明白了真相，从思想上与国民党开始决裂。在“三个对比”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民主诉苦运动，广大官兵根据自己的惨苦经历，以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是人民的公敌。在士兵诉苦活动时把军官单独编队，开展了“放包袱”式的坦白运动，不少军官自觉自愿地坦白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罪恶，表示悔改重新做人。也有少数军官在士兵群众的揭发下反动面目原形毕露，使其失去了继续做领导的政治地位，并

结合镇反和“三反”，从严惩处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军官。经过这些工作，起义部队中大多数士兵和军官已完全或基本向我靠拢，党组织和政工干部树立了领导权威。接着又开展了加强官兵团结的“一条心”运动和献金活动。这些做法为这支起义部队继续加强和深入政治改造，逐步清理和淘汰坏分子，促进部队内部增长进步力量，建党建团，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使用干部，加强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十四团以民主诉苦为中心的阶级教育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把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融入了部队中，用史骥的话说，“这支部队好像经过翻江倒海的洗礼，面貌焕然一新”。

1950年3月，七十四团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开赴了沙湾垦区，坚决执行毛主席“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投入艰苦的劳动中。经过10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赢得了艰苦创业第一年的大丰收，实现了“当年生产，自给自足”。当年二十二兵团九军张仲瀚政委代表兵团党委，亲手把一面镶着“建设模范”的锦旗授予史骥手中。

起义部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投入沙湾垦区生产后，仍然继续着改造教育，并有计划地进行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包括七十四团在内的新疆起义部队达到了基本改造的历史目标，基本实现了解放军化。这时史骥升任农七师（原二十五师）政委。作为师的举旗人，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指示，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以奎屯为依托，不断扩大垦区，大力发展农垦事业。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端、天山脚下的奎屯、车排子、下野地、小拐，西到精河、博乐，北至额敏、塔城，开发了一个又一个新农牧垦区，建设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工厂。如果要问，我党对二十五师这支起义部队的改造教育有什么结果？那就是生产出了完全合格的永恒的产品有三：一是用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又建设成为一支军垦大军；二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战略方针，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开发出了方圆数百公里，全兵团规模最大的原农七师垦区；三是用劳动的双手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农垦新城——奎屯市。

四

在“文化大革命”中，史骥在农七师被剥夺了领导权，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那10年，本应是史骥大有作为的盛年，而“史无前例”亏了贤人。粉碎“四人帮”后，因“两个凡是”，对史骥没有真正落实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骥才回到领导岗位，起初在自治区农垦总局任党委副书记，1982年兵团恢复后，任兵团副政委，主管党的宣传和文化工作，对兵团的恢复和重建，为兵团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了大量的工作。1983年退居二线在兵团顾问组当顾问。说来他晚年过着清闲的生活，但实际并不清闲，因兵团的顾问说是二线，实际上都在一线工作。他对兵团的改革和建设仍诚心关注，很注意过问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曾多次到兵团南北疆垦区做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史骥锐意改革，很注意全国特别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形势，非常关注兵团尤其是农七师的改革进程。记得1989年春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向他介绍党校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学习讨论的情况及该校有位王珏教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股份制问题时，史骥很敏感地从他的剪报中把1984年他署名发表的一篇《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合作经济事业》的文章交给我，我发现文章中的观点与王珏教授提出的股份制的理论根据很接近。史骥在文章中认为，兵团的经济事业是属于单一的国营经济，外国的模式，是一种不完整的经济体制，说“这种状况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文章提出兵团合作经济以股份制面貌出现，它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建国初期的合作经济，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文章提出兵团合作经济的股份制，是以职工个人集资入股，实行按股分红，在体制上实

行股东大会制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当时我感到股份制当前只是国家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史骥就作为一个改革举措提出来，说明他的改革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境界。他也曾与林海清^①一起想为兵团发展合作经济做出贡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史骥围绕兵团改革开放，曾到兵团南疆垦区作过考察，他积极支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又贴近农工利益，以兴办家庭农场为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考察中，提出兵团农牧团场兴办家庭农场中不从实际出发，搞行政命令，搞“一刀切”，甚至加上政治色彩，用一种模式否定另一种模式的做法是有伤农工积极性的，认为农工联产承包的生产指标和取费标准人为地层层加码，造成农工负担过重，形成农工工资倒挂，甚至弃耕外流的情况，是不利于兵团的发展和稳定的。他就把大批农机具折价转让给农工个人，有的单位折价转让失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问题，向兵团政委阳焕生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后来兵团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兴办家庭农场采取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措施，并采取了减轻农工负担，退利减费的办法，保证了兵团改革的健康发展。

史骥善于学政治、讲政治。酷爱看书，甚至是过目成诵。他最爱看政治性和人物传记性书籍。我与他日常交往中，他不谈生活琐事，最多的是谈政治形势和中华英才人物的历史贡献，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他很赞成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江泽民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的论点。记得有一次我陪同一个师政委去看望他，这位师政委讲到现在专业政工干部认为政治工作无所作为，普遍有失落感时，史骥以自己的认识说：“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取代谁的客观事物。”他又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三个方面哪一个方面的失调和滞

^① 林海清，原兵团副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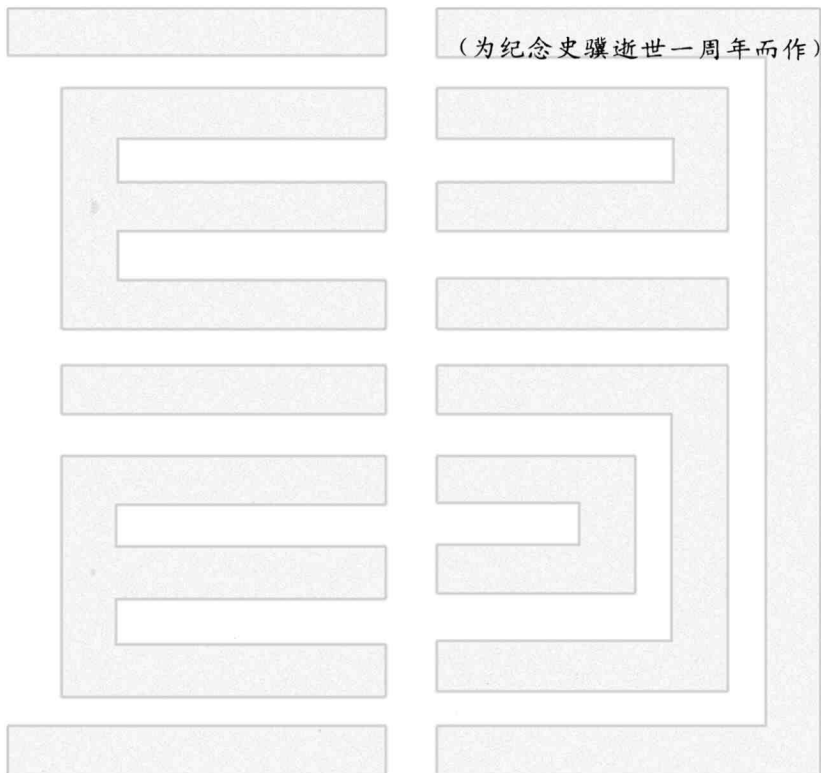
后,都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进步。因此,改革时期的政治工作,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和改进的问题。”又说,“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为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总任务服务的。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政治工作要为它服务,保证它的发展和实现。”有一次史骥同来访的一位学校领导交谈中,谈起了对青年人的理想和信念的教育问题,他说:“我们这些老人对现代青年的健康成长感到高兴。但也为不少青年人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失落而担心。”又说,“我们过去为了革命,拼死拼活地斗争,真正的精神力量,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可以说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我党的优势。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重视和加强对青年人的理想和信念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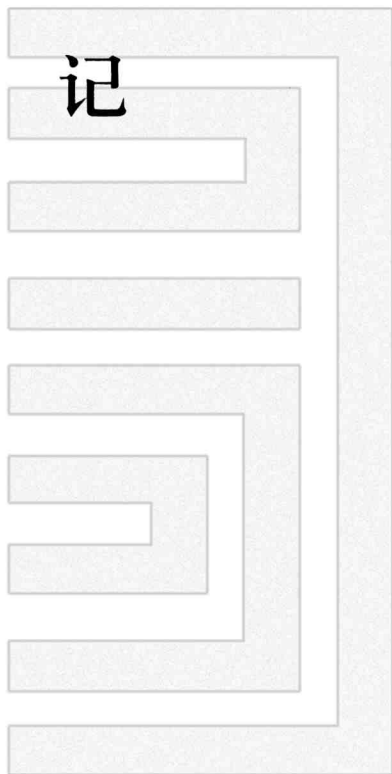
史骥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反对腐败斗争问题上他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句警世之言非常拥护,他说“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过去我在检察机关工作岗位上,他每逢看到中央文件上有关反腐败的问题,总是对我言传一番,要我保持清醒的头脑,支持我大胆地开展工作。他针对某些干部的贪污腐化错误,1993年1月曾以“晚节瑰宝”为题赋诗告诫:“个人主义不得了,欲壑岂能填得饱。名利地位莫强要,衣食住行勿高超。艰苦朴素要永保,光荣传统不可抛。非分贪图实不好,晚节清香最瑰宝。”表现了他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痛斥和对人的劝诫。

1998年1月9日是史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使我感情上不能接受的是他走得太早了。值得告慰他的是,在他逝世的同年,1997年7月1日我们伟大的祖国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实现了香港回归。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月间胜利召开了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本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这两件大事,假如史骥英灵有

知,我想,他一定会为之欣慰而含笑九泉的。

春去秋来,年轮在变,世事也在变。但像史骥的遗著《雁声集》雁过留声那样,他留在人间的高贵品质、优良作风和诚实的敬业精神,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有声有色。





杨兆元^① 日记选

1954年2月25日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的学习笔记)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毛主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以上是毛主席英明地给我们规划的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要正确地执行它，就必须首先了解我们革命的任务以及国内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共

^① 杨兆元：原兵团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在选编杨兆元日记时，编者作了必要的文字勘误。

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

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政权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不过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不是用暴力来推翻现存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

1. 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
2. 我国有极其广大的农业及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时期来改造他们;
3. 按小资产阶级方式或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那种巨大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

总之,只有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改造,也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稳步实现。

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

变国家经济状况，由落后的贫穷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

1. 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
2. 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
3. 保证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
4. 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5. 大大提高国家财政经济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把握地不断提高。

要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帝国主义在发展工业的时候，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的强度勒索以及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剥削。而我们则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正如斯大林所说：是走自己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指示，这条道路乃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应该保持艰苦作风，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三、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农业中还是小农经济占着绝对优势，其经营方式是落后分散的，手工业也同样是落后分散的。斯大林同志说：可以在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大最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落后散漫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道路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这一条就必须对于落后分散的农业与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

造。因为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同时小商品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级分化,多数人常因天灾人祸而破产,少数人则致富来剥削别人;另外这种小商品的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为一个生产单位,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制度。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对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改造是来不得半点蛮干的,列宁说:要用某种急速办法,某种命令来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加以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思想。要改造小农经济,只有采取逐渐的谨慎的办法,只能用实际模范例子来表明,因为农民非常讲究实际,又与旧式农业联结得非常坚固,要使他们作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从列宁同志的教导里,以及苏联经验,就完全了解,改造农民及手工业是何等艰苦与细致。但是对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能放任与自流的,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经济斗争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要去占领了。我们如果要占领这个广阔的经济阵地,并取得彻底胜利,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阵地,就必须走以新技术装备武装的集体化道路。

农民中的农业集体化,是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惟一道路。我们为了慎重稳步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组织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社与互助组,用互助合作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实际地教育农民及手工业者,使他们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任何强迫命令的办法都是错误的。

只有实行合作经济,才能逐步实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巨大的集体农业,即社会主义的农业。

四、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了我们国家对资本主

义是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藉以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扩大商品的流转,维持劳动者的就业,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对资本主义限制的政策,是由于他们惟利是图的本质以及无政府的生产状态,必然对国计民生发生破坏作用。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消灭之,是由于它从本质上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是不能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必须改造、直至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理由,不这样做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生产力就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可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

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只要我们全党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稳步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我们如何实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呢?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是依照国家的性质而定的。列宁对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曾作如下的论断: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是与国家关联着的,而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人民政府的监督下,用各种方式,如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代销、经销经销等方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

和合作社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为所欲为地惟利是图。当然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阶级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赢利中只不过占四分之一左右,因为其他四分之三是要为国家为工人为扩大企业设备而用去。

总之,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有计划、有区别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而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并有计划地、稳步地使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前进,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日益缩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提高,国家就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彻底胜利的保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对于保障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这种工农联盟,斯大林同志说乃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两者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

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全党通过这些努力,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1956年8月13日

(糖厂筹委会第一次会议)

这个糖厂业经中央批准,由生产兵团先办,并指定迅速编造计划。

年销甜萝卜 18 万吨,年产糖 2.4 万吨。

1956 年 10 月

副政委^① 从北京回来谈的几个问题:

一、中央同意仍以兵团名义从事生产建设。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仍应完成 1 000 万亩土地,并主张主要开发乌市以西的天山以北地带,但兵团考虑,一方面棉花为主北疆不一定完全适宜发展棉花,另一方面北疆无更多的土地开发,则不能满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

三、今年任务没有完成,明年任务开荒面积播种面积要达到 200 ~260 万亩,但从各单位报来情况来看,尚很吃力,但要争取,否则第一个五年计划则不能完成。

四、国家给钱 1 亿,今后大概就要量入为出。1 000 万亩土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完成不足者,由农垦部控制的 16 亿中补助之。

五、今后体制关系为双层领导,在生产上、技术上及人事上有农垦部管理,党政工作由地方自治区党委领导。

六、要为新疆各民族建立 200 万亩地的农场,由农垦部投资。这样为各民族多做一些好事,对进一步融洽民族关系是有好处的,干部占相当的比重。

1956 年 12 月 3 日

部^② 内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农学院^③ 专科改为本科的问题

二、农垦部要调的学员问题

三、部队整编时的干部配备问题

① 副政委:指张仲瀚。

② 部:指兵团干部部。

③ 农学院:指八一农学院,现新疆农业大学。

四、一些干部的分配批复问题

五、几个工程处干部工资的批复问题

六、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干部工作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问题

七、通盘研究干部待遇问题

八、干部培养计划的问题，及培养干部经费分配使用问题

九、干部探家问题的规定

1956年12月16日

兵团党委会张仲瀚副政委综合意见：

分析农学院产生问题的原因：农学院成员有了很大变化，领导、教学条件、生活条件，不能满足他们求知欲的要求，这是根本的问题，必须从这些问题上去解决。

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完全靠说服去解决问题，而且是要设法迅速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是说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物质上解决问题，从领导方法、教学制度去解决问题。做到既符合国家利益，又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是最好的。

这几个方面均需要立即解决一部分工作。

第一，从领导解决工作方法问题，要作一些自我检查，看看他们的材料，找一些同志谈谈话，并且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将此精神贯彻到党团组织及各群众组织。（不是专门检查领导，而是检查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领导开展民主不是不论场合地点乱说乱讲。

检查农学院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兵团党委去参加，并且要作些检讨。

第二，从学制方面来做好工作，但要做得细致，不能草率而招致不好影响。

第三，在物质上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图书和一些必要的福利生活，可先做一计划，并陆续解决之。

教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做好预算。

第四,从思想上去解决必须是分层次检查,最后要收收场,以便给予澄清思想明确问题。其次就是要端正思想,不要割断历史讲话,也要从发展观点去看待问题,同意控制得小一些,质量可以提高,物质条件可以满足。

办好学校也要有思想基础,没有这一点就难以完成任务,歪风不准泛滥。到结束时要将民主集中关系好好讲一讲,加以建设。

办学方针问题:

1. 重点、集中地办好几个系,除了合并之外,人数不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 1 500~2 000 人。
2. 要勤俭办学,逐步解决问题,要贯彻此一方针。
3. 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好的必须保持,差的坚决修正。吸收一些兄弟学校的好的方面。
4. 要民主办学,走群众路线。
5. 提一些教职员参与领导,另一方面向上级要。
6. 精简一些机构,更紧缩一些,以改善教学条件、生活条件。

1957 年 3 月

兵团召开的各师干部部长会议上,传达安子文同志去年 12 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总结及结合兵团干部工作情况要讲的几个问题。

1956 年 12 月中央召开的组织部长会议上确定今后的干部工作方针是正确的,它不但符合全国情况,也是符合我们兵团具体情况的。

中央提出的今后干部工作的方针,是稳定与提高的方针。所谓稳定就是在一定岗位、一定行业中稳定,所谓提高就是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

一、干部思想问题^①

中央组织部安部长指出,目前干部思想中存在着的比较大量、普遍的、突出的问题是某些干部滋长着做官思想、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倾向,根据此一精神检查我们的干部思想情况:

第一,兢兢业业、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依然是我们干部思想活动中的主流,没有这一点,我们党的事业就不可能前进发展。

第二,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安部长所提出的以及毛主席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指出的,有些人惟利是图、争名夺利的个人主义,这些人尤其是脱离生产、距离下层较远的人,思想生了锈,他可以拒绝党的分配,接受工作是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对私利是寸土必争,无微不至,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已失去热情而置之度外,他们公开地或不公开地对党伸手要名誉地位,要待遇。

第三,由于个人主义的滋长和泛滥,相当地侵蚀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他们将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使党的组织纪律观念松弛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第四,青年学生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喜欢大民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还相当浓厚,拒绝劳动是比较普遍的,强调个人志趣,强调个人特殊,把自己看成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人,他们不懂得服从需要是主要的,他们不懂得被迫和自愿的一致性。因此今后必须加强阶级教育与国际主义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和改造他们的思想。

二、为发挥各种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还需要具体地解决若干有关于干部政策和干部工作的问题

(一)首先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的薄弱环节,使之加强起来。1. 充分发挥技术干部和专门人才的作用问题;2. 加强领导培养新的技术人员的问题。

^① 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二)充分发挥非党干部作用的问题。兵团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杨部长^①的发言中已详细地谈了这些问题,其中主要是要尊重他们,要商量共事,在政治上和工作上信任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学习可以养成党内干部谦逊的态度,可以增加知识,可以交流感情,以达团结、教育、使用、改造的目的。

(三)民族干部较多亦较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与业务能力的问题。除四师利用冬闲加强对他们培养提高外,要注意请示自治区党委,请求上级尽量多收一些名额。

(四)妇女干部除随同其他干部不断提高她们的业务能力与觉悟水平而外,还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增加一些数量。目前兵团3万余干部中股以上的妇女干部只12名,尤其重要的是在部队提倡尊重妇女、爱护妇女干部的风气。

(五)对于老干部要看到他们是各项工作中的骨干,提高他们是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不可少的因素。师以上干部除了选送向中央党校进修外,还要向中级党校继续输送培养,还必须将一些团营干部送初级党校学习。不提高文化学习进修将是很困难的,应设法突破学习的时间问题,不突破这一问题就不能做好。

(六)正确地对待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的问题。八大少奇同志^②报告中指出,我党的方针既要弄通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方针。

加强教育和监督以防未然,同时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从爱护出发,干部克服了错误,应适时取消处分,使干部轻装前进,目前这一工作尚未结束的单位,希望能尽早地结束。

(七)关心下级干部的生活,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克服上下之间生活待遇上过分悬殊的不合理的现象问题。

中央指出工资高了要向下压,要我们干部要群众、要荣誉,不要

^① 杨部长,指兵团干部部部长杨南柱。

^② 少奇同志:国家副主席刘少奇。

爱钱,这是十分正确的。

三、对于去年大胆正确地选拔干部所做的工作估计

(一)去年规划出了12000名干部,从提的6000余名中,30%评为生产和工作先进者,模范党团员占50%以上,这些同志工作积极热情,联系群众,因此给工作带来新的气象。去年的工作努力程度超过任何一年,成绩是很大的,尤其在农业方面,是由亏损到盈利转变的一年,这些成绩的获得,当然也有干部工作的因素。

(二)最深入最广泛地进行了了解考核干部的工作。有的同志说,这是我们干部工作中一次总的进攻,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不是因为了解情况而做好的。今后我们做好干部工作,心中比较有数了,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基础。

(三)树立了自立更生就地取材的思想。各级党委都比较明确了培养干部是各级党委一项重要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任务,这对加强干部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四)去年干部规划,是根据各项事业指标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了解各项事业的情况,而了解客观需要是安排我们干部工作的依据。了解情况,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措施。

(五)创造了稳定与提高的条件。只有干部配起来了,才可能稳定与提高,否则拆东墙补西墙,是难以贯彻这一方针的。

但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一)我们对于上级的方针,确乏细腻的研究,尤其缺乏联系实际的研究。方针正确当然是带来好的结果,但如果只有好的方针,没有好的措施,也是难以办好事的。更严重的错误,就会动摇正确方针的贯彻。

由于我们研究不好,所以一年来,我们干部工作薄弱环节依然薄弱(当然有些问题是要一定时间的),臃肿的环节则更显得臃肿了。

(二)照顾了长远需要,没有照顾到财经和容纳量的可能,一句话,有些干部提拔得超过了需要,冒了一些,那时的事业指标也冒了

一些,根据土地水利资金干部等情况,1962年1700万亩土地,是多了些,我们的干部又控制得松了些,认为多了总有用处,而没有更好地更细致地去进行。

(三)没有很好地考虑精简机构、提高质量去解决干部问题,从现在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力,根据邓部长^①报告,机构将来还是要精简的。

总之成绩是主要的,但错误缺点必须引以为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

四、编余干部处理的问题

(一)回到生产中去,增加生产人员。

(二)转变培养干部的方法。

欲达此目的,必须关心他们,派得力干部去领导,经常派人去了解他们的情况,解决他们正当的要求。今后凡缺的干部应先安排他们,不得再开脱产之门。

五、干部管理问题

六、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概算

需要干部24272人,其中行政12054人,政治4190人,专业性技术干部8028人。兵团现有干部33915人,其中政治干部5285人,技术干部6000人,行政干部22630人。

1957年3月25日

兵团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干部工作要谈的几个问题。

第一,安子文部长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总结,主要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及安部长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针的全文传达和解释。

第二,如何正确贯彻稳定和提高了的方针的问题。

^① 邓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一)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理解这一方针,而不能片面地、绝对地去理解中央这一方针。所以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符合全国情况的,这就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已经形成。就兵团情况来说,位置已满,我们的干部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与革命事业对于我们干部的需要还有矛盾,我们必须依靠这个方针,才可能逐步克服这个矛盾。所谓不能片面地去理解,就是说,我们事业还是日新月异地发展着,许多新的事业还需要干部去支撑新的局面,我们必须在现有干部调整中去提拔一些干部。

(二)为了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干部队伍的调整研究工作,也只有正确方针与实际相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好的成果,如果不做调查研究、科学分析,方针如何正确都是很难做出好的效果,甚至它是可以动摇正确方针的,就好像有良药不会用,不能治好病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求从调查研究中搞清强弱多寡,分清哪些强,哪些多,哪些弱且少,然后具体规划一下,哪些是提高质量的问题,哪些是质量并重的问题,订出计划来,贯彻实施这些计划,就可以逐步地克服薄弱环节,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均衡地发展。

(三)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我们人民解放军历年来的经验,什么工作要想做得有成效,必须做好思想工作,端正认识。不论打仗和生产,这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提出,干部思想中的特权思想、做官思想、官僚主义与脱离群众的倾向是严重的。我们的干部要做事不是做官,人民的官和做事是分不开的,你不做事官也就做不成了,光做官不做事那就是官僚。当然在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的同时,不要忽视干部思想活动中的主流。

同时也要再三告诉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干部部门,必须纠正认为干部不提拔就不能发挥干部积极性的错误想法和做法,设法堵住脱产之门,设法开辟生产之门,要知道靠提拔来发挥干部积极性,思想基础是不坚实的,干部质量也是会受影响的。

(四)将干部安置在最适当的岗位上,学过专门知识的,一定要学以致用,至于学过专业过去未从事过专业,新的工作又积累了许多经验,只要他有回到原行的要求,就应支持,安下来是提高的重要方法,否则朝令夕改,干部就无法积累经验、丰富领导水平与工作水平。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临时任务,也是要人去做的,而有些同志强调安下来,而不去接受新的艰苦的工作,拒绝组织分配也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克服过去大提拔时期的习惯和军队工作中的习惯,发现好干部就向上调(当然上下必要调整还是必要的)。中央强调加强基层单位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直接率领着广大群众,直接创造财富,下面领导弱了就会出事,就会影响生产。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要轻易调动。

……(原件丢失一页)

第四,1957年干部工作的几项任务:

(一)依然是培养干部的方针,在方针上是加强领导,提高质量的方针,方法上主要是靠在职组织学习。根据需求和可能,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除了正规学校,除了在职以外,就是搞好函授。具体做法训练处写了一个指示,待党委批准后,请各单位参考执行。尤其重要的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将加强工作和提高干部统一起来,从加强干部领导着手,多检查他们的工作,多给一些指示,只有这样才可能又提高锻炼了干部,又加强了工作。

(二)做好审干工作,具体做法已有布置和安排,要求各级(干部部门)重视此一工作,因为时间短、任务重,中央要求1957年结束此一工作,工作量是很大的。目前七师八师掉队较远,应组织力量迎头赶上,否则在全国基本结束时,再去跳独脚舞就难办了。

审干分三步骤,一是摸底排队,二是调查研究,三是结论处理。第一步骤是关键性的步骤,它是开端,没有良好的开端,想着良好的结束是困难的。在这个关键性的步骤里,分清界线是重要的,严格控制

八审五不审的原则^①。因此要求各单位重新复查一次是必要的。农四师审查对象占 28%，二十八团占 31.2%，可能是多了些，据我们估计，占 11%~15%是比较可靠的，但根本的是按照中央八审五不审的原则办事。

坚持下去不要松劲，因为这个工作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又是费时间的工作。我们军队常常有这种情况，开头是狂风暴雨，尔后是稀稀拉拉。因此不要松劲，坚持下去，是取得良好结束的根本条件。

(三)授勋授奖工作也已布置，要求 7 月份将材料搞好，陆续上报，申请发给勋奖章。也希望抓紧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端正认识，一方面排除阻力。端正认识是要我们受勋受奖章的同志不能多一块牌子就多一点包袱，鼓励干部保持荣誉，珍惜荣誉，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搞好生产，回报党和国家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和关怀。端正认识是要我们认识到这是按功行赏，但不能争功争赏，尤其不能虚报功绩，骗取荣誉。

第五，关于处理编余干部应注意的问题。

兵团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发出了走向生产的指示，各师、团都陆续组建了干部生产队，据估计，通过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干部和学生，大概有 5 000 左右，组织起来参加生产，这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明确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增加收入，一方面为了储备干部，生产是培养干部的一种方法，为达到此目的，生产队应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适当地多配一些技术干部与劳动力，在完成 70%的劳动额的基础上，抽出一些时间，安排一些技术和文化的学习。

领导上不能因为有了此一门径，而采取简单粗糙的方法去处理干部，要做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正当的要求还是要解决的，并应主动地经常去关心他们。目前好办一些，时间久了，思想情况还是

^① 八审五不审的原则：指中央组织部 1956 年 11 月 28 日关于审干工作的规定。

要波动的。尤其这些干部有相当部分是能力差,或者是毛病较多的人,这些都是容易引起其他思想问题的。

去年学生的问题则更多,这是由于这些学生质量差些,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个人主义很多,有一些脱产久距离下层远的人,搞生产问题则更多。我们要反对害怕艰苦,留恋城市,生活贪恋舒适的思想 and 行为,但要承认他们这些缺点,承认这些缺点不是叫它合法化,而是应采取妥善的方法去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对一时搞不通的人给予必要的等待。

为了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变消极为积极,动员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方针,对于有关干部政策的问题,继续坚持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起义干部的方针,团结教育争取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方针。在对待妇女干部问题上,应切实克服不尊重妇女干部的倾向。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好,就可以变消极为积极。为此请求各领导同志,尤其是干部部门,将杨部长在党代表大会上有关问题的发言再阅读一下。

1957年11月11日

(学习1942年2月8日毛主席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反掉,那它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势必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就容易消灭了。

毛主席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给八股文章定了八大罪状,主席说是以毒攻毒。

第一条罪状:空活连篇,言之无物。

第二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第七条罪状：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条罪状：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我学了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报告之后，检查自己确实是有些毛病的。本来我生长在农村，读了几年小学，农民的语言懂得一些，但参加革命之后，曾有一个相当时期，很愿意咬文嚼字，用一些枯燥的词汇，将自己束缚起来。直到现在仍有些毛病，工作中缺乏细致的调查研究，人云亦云，不接触实际分析，调查事物的内部联系，当然工作就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不做调查研究，就常常为现象所迷惑，做出不切合实际的非科学的结论，这的确是危险的。

×××、×××、×××这些同志就是八股典型，这些同志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水平老提不高，其原因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

主席在将要结束他这篇演说的时候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切实领会一条粗浅的规则，把这条规则当作法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法律：当你作演说、写东西的时候，无论何时总要注意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应当时刻注意，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说话，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

1958年3月7日 星期四 天晴

（兵团工会第一次委员会会议）

1958年的工作要点：

工会干部也要首先提起干劲、钻劲和首创精神，促进各项生产高潮，并使其迅速持久发展起来。各级工会要在各级政治部门统一安排

下进行工作。

……(原文不清)开好工会小组会,这个会议又是动员会又是献策会,然后提倡议表决心发动竞赛。劳动竞赛是否可以开展得好,可摸底排队。

各级工会要研究如何包工包产开展劳动竞赛,并将这些情况及时向党委反映。

开展劳动竞赛的步骤,应有始有终,要把季节与阶段赛密切结合起来。

组织老职工话当年活动。兵团工会准备搞一次话当年征文,使农工温故知新,这就是最生动的教育。

做好职工的劳保福利工作,遵循的原则是:从6亿人民出发,从增产节约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为做好此项工作,首先要协助行政办好食堂,其次组织自建公助委员会,以解决住房问题。组织救济委员会以依靠群众解决职工的临时困难。

对供养人员进行一次清理。对不符合劳动保险条件者应请示党委或建议行政作适当处理。

劳动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建立生产中消灭或减少伤亡事故(的制度)。

普遍建立家属委员会,大力开展五好运动,组织家庭搞副业生产,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

1958年4月4日

……

(三)如何做好在职培养干部的问题。

1. 做好配备副职的工作,他(副职)的好处:

(1)学得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

(2)人熟地熟,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

但要加强每个干部的责任,像战争时期一样,培养自己的代理

人,平常要放手给予工作,并注意检查和修正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说配齐副职就算了事。

2. 每个人做一做自己的规划,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客观地看看自己有几套本事,要做到又红又专,自己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订立合同,订立实施计划。当然,进行规划的时候要反对个人主义,这是要牢记的。

兵团要订出一些人的具体要求来。

3. 树立良好的干部工作风气,选送学员必须是优秀的,提拔干部必须是德才兼备,强调阶级路线。今后选干部必须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优秀工农,必须是经过劳动锻炼的与工农建立了密切感情的优秀知识分子。为培养选拔干部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使干部能够茁壮健康地成长起来。

4. 突破函授学习中的困难,特别是要解决时间问题。

5. 提倡领导干部要很好地做人的工作,因为事情不管大小都是要人做的,做好了人的工作,就可以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如果每个领导干部重视了抓人的思想,经常进行检查总结,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提高干部的过程。

6. 必须搞好试验田的工作,取得生产知识,准确地指导部队生产,克服我们现在工作中最主要的毛病,即一般化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中央指出试验田的道路是又红又专的道路,各部队要大力提倡,并将此工作做好,只有做好了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不要求种得过多,要求搞出名堂来。

1958年4月19日

在四届干部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要讲的几个问题。

一、大会的任务和目的

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按照中央指示,在今后10年内,将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大会的任务就是商讨如何

把我们的队伍培养得又红又专。

这次大会是处在：

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形势是在全国鸣放反右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和鸣放整改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尤其是双反运动，全国和整个部队掀起了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大跃进。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兵团正在以万马奔腾之势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央提出，我们要用 15 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钢铁等主要产品方面要赶上或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要赶上日本，有些作物要居世界首位。

新疆铁路就要修通，新疆的经济面貌要起根本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生产兵团今年要开荒 300 万亩，并且要向 500 万亩以上奋斗。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开 1 000 万亩土地，并向 1 500 万亩努力，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开 2 000 万亩土地，并向 3 000 万亩奋斗，并且要开办许多糖厂、化学肥料工厂及其他厂矿。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像，形势给我们的干部工作提出了极其严重的任务，我们知道事在人为，人是伟大事业中的决定因素，干部更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没有干部，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我们不但需要补充大量的干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我们现有的干部。我们当前干部最主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某些干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矛盾，或业务能力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现有干部搞得又红又专，如何改变作风，尽快地把干部搞得红透专深。

二、大会准备开 10 天，前两天汇报，汇报的内容：

1. 下放干部的数量及思想情况。
2. 部队干部的思想情况及红专情况。
3. 其他工作的进展情况。

然后准备半天或者一天，首长们指示工作。

三、大会作报告,然后讨论,在讨论中要:

1. 检查我们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以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尤其请同志们多多检查批评兵团干部部在工作中的问题。

2. 讨论和研究干部工作跃进计划及实施措施。

3. 大会提倡敢整、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澄清问题、肯定成绩的同时,狠狠地批评工作中的问题。过去中国人很喜欢怒鞭督邮的张飞、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和大闹忠义堂的李逵,就是这些人很直爽,他们有啥说啥,一旦认识到是错误的时候,就负荆请罪。我们这次会议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更要有此精神。

会议期间,因为要保密,所以不准备用大字报,但用小报配合。好的发言,好的措施,印成文件,汇编起来发下去,作为参考。

1958年12月20日

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及武昌省委书记会议精神。传达人王恩茂。

王书记作传达报告如下: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很多,一天讲不完,因此,只能将主要精神传达,其他可看文件。

一、会议的主要精神

二、毛主席的三次讲话

三、人民公社问题

四、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五、自治区如何贯彻六中全会精神^①

一、会议的主要精神

到12月10号结束共13天,其中休息一天,主要是开小组会,占了10天时间。会议之前,毛主席召开过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为八届

① 此笔记只记到第二个问题。

六中全会做了准备工作。主要日程(议题):1. 人民公社问题;2.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以后又增加了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问题和形势问题和改进体制问题。15年建设社会主义15条,会议没有讨论,因为根据不充分,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样更稳妥一些。

武昌会议和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作了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通过了决议和通过了毛主席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议。我们根据2000万吨钢的任务,安排了其他事业,2000万吨钢只能作1400万吨钢材。这样我们原来的计划安排就要根据此精神压缩一下,这个向下调整是正确的。

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下:

1. 明确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各个地方都发生了一些紊乱现象,作了一些庸俗的解释,标准看得很低,有的认为今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想一下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有的认为只要转为全民所有制了,就是共产主义了,有的提出两年或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了,看得不妥当。有的也提出不要按劳付酬的原则了,一切包起来。有的认为不要商品生产了。他们不了解,不仅社会主义要,而且在一定时间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还要发展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时候,是否就不要了呢?现在还很难讲。比如稀有产品的生产总是有的,如要吃熊掌,不能说想吃就吃,还要拿钱买才行。如不当商品经济来解决,则很难解决。也有提出要消灭家庭等等,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回答。

2.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可以高速度发展,但是也不可能太快。这次会议认为,广泛实行工业化、机械化,尽管我们前进速度很快,需要的时间还很长,需15年甚至更长一些。可能比原来估计需要时间更长一些。这次会议认为,从现在起还需要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据我看,不需那么长时间,那么中央又为什么那样提呢?一方面标准要求高,一方面时间充足一点,总是有利,主动得

多。

毛主席说，过去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是河南同志提出的，以后变成了全国的口号，可以想到，那时才只有3 000吨钢，不能算基本改变。

3. 初步确定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是以2 000万吨钢来安排的，比北戴河提出的指标降低了，粮食要增加40%左右。计划的特点是又有中央各部，又有各省书记同志在一起讨论的。

讨论中很好总结了今年的经济，特别提出了要以2 000万吨钢为总的依据。如按冶金部门来说，明年可炼铁4 000万吨，钢3 000万吨，但煤只能供给2 200万吨炼钢的燃料，电力则更不够了。就这样经过再三推敲，才定下来的。总之表现了充分的积极稳妥。

4. 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作了足够的估计，对于缺点也作了检查。1958年的成绩是伟大的，工农业都有巨大跃进，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总和还大，钢和农业都比去年增加了一倍，总产值增长70%，基本建设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和的一半还多。这是非常兴奋的。当然缺点也有，主要是强迫命令、虚夸作假是严重的，但是是个别的，对这些人多数教育，少数严重的要给予处分。

5. 毛主席指示我们，头脑要热又要冷，这是两个统一的对立面。提起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要统一起来，否则要犯错误。一方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又要科学分析。主席说凡科学就要保护，凡迷信就要破除。

6. 毛主席指示，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当然主要的是抓生产。搞社会主义，最后归根究底还是要改善生活，生产、生活是不能分开的。

二、毛主席的三次讲话

在武昌省委书记会议上，11月21日上午在武昌讲话内容：

1.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你们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有两个方法，我们可能快一些，这样多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干。苏联已41年了，

还需 12 年，还是过渡。赫鲁晓夫同志很谨慎，他们已有 1 亿吨以上的石油，5 000 万吨以上的钢，还需要那么多年，我们是干部下放，将军当兵，他们缺乏政治，所以搞得慢一些，有些差别没采取措施去消除。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让苏联先过渡，我们后过渡。

苏联同志公布 9 000 余万吨钢，内部是要 1.1 亿万吨钢，因为苏联已 41 年，再搞 12 年即 53 年，但他们还没有讲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还没有人民公社，我们抢上去过渡，这样对苏联来说无光，……（原文不清）可比他迟 3 年过渡，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事业不利。

我们是 6 亿人口，全世界为 27 亿，我们是局部，27 亿为整体。

我们是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每人每年平均只有 60 元，说强大还没有根据，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苏联有经验。我担心我们的建设像一棵钻天杨，长得快，但不结实而引起天下大乱。

计划要按计划发展，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实际，要正确地应用它，斯大林同志做得不太好，像一条腿走路之势，赫鲁晓夫同志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的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

最近中央有 12 个报告，有的写得很好，是土洋结合。

总之，一定先让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完成社会主义，还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共产主义之实际，有实无名不可以。

古人学问很高，如孔子、墨子，谁也没给他安博士的名字，他的数学程度只有高小程度。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分析他的作为。

2. 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问题，一是明年计划问题，一是划线问题。

3. 集体所有制大概国民收入人均 200 元左右就可转全民所有制。

4. 消灭阶级的问题。

5. 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

6. 会不会泼冷水的问题。

1960年2月17日 星期六 天晴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对兵团的指示：

去年年底王震部长到了兵团，布置了兵团的任务，我看了他的报告，同意他的报告精神，要很好贯彻他的精神。

一、兵团今年的方针任务：根据主席讲话精神要缩小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确保农业大丰收。

兵团今年生产任务到底是多少，这里要先讲一下，就是要实行农业第一、粮食第一的方针，如与其他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事业要为农业让路，农业只能挤别的事业，其他事业不能挤农业。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发生矛盾时，应为粮食作物让路。

今年你们各项工作都要完成，但是首先需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农业生产任务完成了，可以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农业任务没完成，其他完成很好，提起来便不能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农业生产首先完成粮食任务，完成了可以说农业完成得很好，粮食在农业作物中是高于一切的。

具体说你们的任务：粮食 10 亿斤^①，自治区为 11.8 亿斤，就把你们数字定下来。棉花总产为 50 万担，油料 5 700 万斤，甜菜 17 万吨。其中主要完成粮食 10 亿斤，上缴自治区 2 亿到 3 亿斤。1960 年上缴 1 亿看来是不行，不行就不行，不要把明年的算今年的账，1961 年到 1962 年上缴任务一定要完成。

上缴 2 亿到 3 亿斤，最好由七、八师包了，其他由兵团支配。要完成如上任务，同志们认为有把握，但棉花觉得多了一点，在总产上保证，面积可以减少，但不要低于 1 000 万亩。这样可能妥当一些，避免种了没好产量。

为什么要强调兵团要完成 10 亿斤粮食和上缴 2 亿到 3 亿斤？因

^① 斤为市斤，下同。

为这样兵团对自治区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讲到了，就全自治区来说是大好形势，工农业是平衡的，但地区性来说，有些不平衡，比如北疆工业发展起来了，而粮食跟不上来，派3000余辆车到南疆运粮，这就严重影响了其他事业的发展。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跃进，必须解决北疆工农业不协调的现象。北疆地区吃粮问题，不要到南疆去调，我们准备三年计划一年完成，我们必须执行刘澜涛^①同志和西北局的指示。

北疆各城市(工业)需要每年5亿斤粮食，地方上只能供给3.5亿斤，如兵团能上缴2亿斤，就不要到南疆调运了。这样自治区的形势就好了。所以说兵团上缴2亿斤粮食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的跃进是很好的，对自治区和全国都是有很大贡献的。这样我们也可比较一下，生产粮食比生产棉花更重要。如果说能够多种一些棉花，挤了点粮食有一定必要，如果没有那么多棉花的土地，两头都落不到划不来。所以我们还是说农业第一，粮食第一，实现了这个任务，贡献大得了不得，光荣不胜之至，真要烧香叩头一样的尊敬你们。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力求根本改变，要兑现，今年的任务给人们留下一个新的印象。

二、要把以农业为基础粮食第一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把方针变成实际行动，而且一开始就主动自觉地完全贯彻这个方针。这次各师同志出席了自治区扩大会议，以粮为纲的思想基础比过去提高了。但是同志们又检讨到去年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完全贯彻这个思想，还是被迫一步一步贯彻下去的。同志们搞通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呢？比如去年农业战线上的劳力只占30%左右，只八师以后增加到50%。今年已由14万增加到25万人了，已由30%增加到了60%，是否还可以多增加一点，我认为还可以多增一点。农八师

^① 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增到了80%，其他师为什么办不到呢？别的师应该都这样做，起码做到增加20%以上。这是必要的，任何生产人是决定因素嘛，没这条是办不到的。

这样是否会影响其他计划完成呢？其他方面的计划，执行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除了几项主要指标而外，有的可以保持去年水平，甚至降一点都没关系。同时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可以较好地完成任务的。那些单位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方向。

减少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可能减少一些收入，发工资有问题，我看不能因为劳力减少，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做到经营农业不赔本，所有农场要做到不赔本，而且还要赚钱。中央确定增加农业价格20%，即使是这样，我们还要这样干，不能只看收到了多少钱，主要看产品，至于资金困难，请李铨^①同志支援一下，帮助解决一些。挤出人来到农业战线，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

三、今年要实现这个方针和任务，特别要强调因地制宜，精耕细作，高产丰收。去年产量这样低，单产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年。同志们检讨有天灾，有人过，有的单位人的过错占很大比重，今年是否可以减少以至消灭人过，这就首先在计划安排方面先安排好，到底种各种作物多少，还是要从实际出发。首先看到土地的实际情况，棉花当然种得越多越好，但要看地能否有好的收成。请同志们好好研究，只要你们搞到50万担就好，应给农业生产部队一点机动才好。生产指挥权下放给你们一些是好的，多种粮食当然也好，但种了不能收就不要种，去年一、四师种稻子已到7、8月，怎么能行呢？千万不要做无效劳动，那是没一点好处的。去年管理面积太大了，要有一个一般的先进管理定额，要有管理要求。

种春麦的问题，凡不适宜种春麦的地方不要种。主要担心的是夏季作物抓不到手，秋季又无保证。因此凡能种春麦的地方，还是要种

^① 李铨：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春麦，面积不宜减少太多，你们减少了 50 万亩，种子问题，地方调剂一点，播种量减少的问题原则上是不要浪费种子，到底减多少为好，应与播种质量结合起来。1. 种子要精选；2. 地要整好整细；3. 药物拌种；4. 播种要均匀；5. 要发芽浸润。现在就我们的播种水平来说，也要估计进去，鱼正东^①同志担心这点是有道理的。

要精耕细作，各个方面都要有要求，一定要实现这些要求，总之地要种好，单产要提高，有的要实行高额丰产。重要的实现单产，总产才有保证。

四、农业生产与农业基建要很好结合，搞好当前生产与生产的长期打算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要很好结合，不能只顾当前而不顾长远。当然把农业生产摆在第一位，在管好当前生产的同时，有力量要多开荒造田，准备今后的继续跃进。对现有土地要越种越好，不要越种越坏，现在有这个情况，要引起注意，不能开发一批又丢掉一批。为达到这个要求，如何进行土壤改良很重要，不仅不能使好地变成坏地，而且要使坏地变成好地，整个土地都要实行苜草轮作，采取一切措施，要使地越种越好。

劳动力体质下降是一个很担心的问题，生活上要安排好，劳动强度要适当控制，从长远利益来看，一定要注意好这一点啊。生产兵团也要有假日，要把部队体力下降情况改变过来。

牲畜不能光使用不爱护，这也要引起注意，不能这样大量死亡，也要劳逸结合。农机具的损坏也很严重。总的一个精神要发展兵团的经济，不仅要扩大财富，而且要爱护财富。

五、改进领导作风，要完成整风整场，像地方整社整风一样，兵团有些场要很好整，干部队伍也要分分类，干部整顿要把不合格的清洗出来。

工作中要贯彻毛主席指示，大兴实事求是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

^① 鱼正东：时任农八师党委书记、政委。

风。还要很好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写出各种场的完整材料,以及土水调查研究材料,以及各种作物机耕等,以及其他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同时要加强总结经验的工作,不仅场、师,兵团也要做。兵团多年来计划都是高,从今年起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做到的就不要订,能做到就订。特别是向自治区和国家所承担的任务,不讲则已,一讲就要兑现。

生产兵团干劲很好,吃苦耐劳精神很好,要保持这种作风,保持王震同志的这种作风,我们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

.....

史

话

三五九旅留守陕北部队

走马出关记

武耀中

1944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8个年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月15日中共中央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派遣王震率三五九旅挺进华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其间,毛泽东主席找王震谈了一次话。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出了三五九旅南征的意义和任务之后,要求他们分两批南下,首先由王震率领第一梯队(三五九旅一部,再加上一批南下工作干部)先走,等到达广东与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会合之后,第二梯队(留守陕北部队)再接着南下。

根据中央1944年7月15日决定,中共中央9月1日在杨家岭再次召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为尽快开展湘鄂赣边区的抗日工作,派遣王震、王首道率领10个步兵连,加上南下工作干部4~6个连,作为第一梯队先行南下。三五九旅其余部队暂留陕北,待机南下。

10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此次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问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叶剑英、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参加南征部队的主要领导列席

了会议。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此次南征部队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郭鹏任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苏鳌、邹毕兆任副参谋长,李立任政治部副主任。

南下第一支队由三五九旅抽调指战员 4 100 余人,组成一、二、三、四大队;另由南下工作干部 900 余人组成五、六、七大队。全支队共计 5 000 余人。人员抽调和组织情况如下:

第一大队,由七一七团抽调 2 个营组成,大队长陈外欧,政委李铨。

第二大队,由七一八团抽调 3 个营组成,大队长陈宗尧,政委罗章。

第三大队,由七一九团抽调 1 个营和旅补充团共同组成,大队长张仲瀚,政委曾涤。

第四大队,由旅特务团教导营和旅直参谋训练队组成,大队长徐国贤,政委廖明。

第五、六、七大队由中央调往鄂豫皖边区工作和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

三五九旅除抽调 4 100 余人组成南下第一支队远征华南外,尚有 3 000 余人由副旅长刘转连、副政委晏福生、参谋长贺庆积、政治部主任李信率领留守陕北,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任务。作为南征第二梯队,随时准备南下。

二

1945 年 4、5 月间,南下第一支队(时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正战斗在湘鄂边区。5 月 4 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王震、王首道:“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同时电告王震:九旅 3 100 余人(即三五九旅留守陕北部队)、文旅 2 100 余人(即文年生之警备

一旅),不日即可由延安出发赴湘。

5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决定:由三五九旅留守陕北的后续部队3397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3000人及南下工作干部400余人,计近7000人组成“南下第二梯队”,于6月初从延安出发,经晋绥、太岳渡河南下。

5月下旬,南下第二梯队开始组建。

(一)三五九旅留守陕北部队3397人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由刘转连任支队长,晏福生任政治委员,贺庆积任参谋长,李信任政治部主任。

南下第二支队辖第一团和第三团。

第一团以七一七团一营为第一营,以旅特务团之特务营为第二营,以七一八团的留守人员和七一七团的一个连组成第三营。周俭廉任团长,谭文邦任政治委员。

第三团以七一九团的两个营为第一营和第三营,以三五九旅警卫营为第二营。团长廖光韶,政委彭清云。

三个干部队(去广东的称“东干队”,去新四军五师的称“五千队”,三五九旅的称“九干队”)以及三五九旅留在陕北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警卫连、通讯连、侦察队、教导队、炮兵队等随第二支队行动。

(二)联防军警备第一旅一部组成“南下第三支队”,文年生任支队长,张启龙任政治委员。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南下第二梯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由文年生任总指挥,张启龙任总政委,刘转连任副总指挥,晏福生任副总政委,贺庆积任参谋长。上述人员仍兼任第二、三支队职务。

根据中央指示,南下第二梯队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除指挥部成员参加外,随军南下的高级领导干部陶铸、莫文骅、古大存、谭余保、袁任远、邓洪、程世才、伍晋南、雷经天等均参加了军政委员会,共计20余人,由张启龙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南下第二梯队组建工作结束之后，南下部队先后到达延安集结。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及谢觉哉等，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了营以上干部。6月2日，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肖克等出席了大会并检阅了部队。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要求南下全体官兵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七大”精神指引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早日和南下第一支队胜利会师。

三

1945年6月2日，欢送仪式之后，南下第二梯队即告别延安，挥师东进。途经延长、延川、清涧、绥德，从宋家川渡过黄河，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休息两日，继续东进，翻过巍巍吕梁，于7月10日前后，到达距平遥县城约20公里处的西山上，指挥部命令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息，即拟由此处徒涉汾河，跨越同蒲铁路南下。

汾河平原是日军控制区，汾河两侧，铁路沿线，有不少日军据点，组成两道严密的封锁线。为了摸清情况，参谋长贺庆积亲率支队侦察人员到平遥县汾河以西进行实地侦察。据侦察，部队南下，必须首先徒涉汾河，而后再越过同蒲铁路，汾河距铁路最近处有七八公里，渡河后，南是平遥县城，北是洪善车站，部队通过汾河后，可以从这两点之间越过同蒲铁路。据此情况，指挥部决定：部队于当夜夜间行动，下山后兵分两路，第二支队走北面，在离洪善车站2.5公里处过铁路；第三支队走南面，在离平遥县城2.5公里处过铁路；干部队随第二支队行动；由贺庆积率领一个营作后卫，掩护大部队过路。

是日，部队正准备出发，突降大雨，山洪暴发，吕梁、太行两大山脉沟沟豁豁中的山水一起向汾河涌来，平日水仅及膝的汾河，刹那间河水暴涨，深可没顶，波涛汹涌，无法涉渡。部队只好焦急地等待着。两天后，终于天晴了，水落了，可以出发了，不料却又出现了新的情

况：平遥日军似已发现我军行踪，约有1000多名日伪军向西山扑来，我指挥部在分析了敌情变化之后作出决定：原计划不变，仍于12日夜徒涉汾河，抢过同蒲铁路。要求部队尽量绕开敌人，力争在拂晓之前越过铁路。是日深夜，部队冒着强劲的山风水气，踏着泥泞的山间小路，按预定方案，分路向汾河急进。行动中，第三支队较为顺利地渡过汾河，又于拂晓前通过了同蒲铁路。但是，第二支队过路时却遇到了麻烦，由于过汾河时延误了时间，等赶到铁路边时天已大亮，日军已将铁路封锁。只见铁轨上停着一列货车，车厢里，轨道上都设置了火力点。距火车头北侧几百米处，还有一座敌人的碉堡，居高临下，以交叉火力封锁了铁道两旁的开阔地。此时，我第二支队前卫已和敌人接触，大部队则被压制在路西的一个小村子里。后卫部队又发现去西山“围剿”我军之敌调头追了上来，我第二支队已陷入敌人的前堵后击之中。在此危急时刻，参谋长贺庆积骑马赶了上来，当他了解到刘转连司令员已率领第一团去围歼据点之敌后，便立即指示三团团长廖光韶：“情况紧急，后边敌人已追了上来，不能再拖，马上组织突击队，上刺刀，准备手榴弹，打开一道口子，掩护大部队冲过去。”

三团团长廖光韶坚决执行命令，在火力掩护下，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突击队向铁路冲去。战士高声喊着，边冲锋边射击，把一排排手榴弹向列车甩去。在我军勇猛冲杀下，敌人的火力减弱了，突击队立即撕开一条缺口，我大部队便像潮水一般冲过了铁路。碉堡里敌人的机枪噼叫着，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不时有战士倒下，正在指挥作战的廖光韶团长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倒在了铁路上。中午，第二支队主力越过了同蒲铁路，在平遥县东山和第三支队会合。傍晚，刘转连率第一团也冲了过来。

在这次战斗中，第二支队牺牲了100多人，其中有曾任过军分区司令员的桂干生和第三团团长廖光韶。

四

南下第二梯队通过同蒲铁路之后，行军半个多月，于8月初再渡黄河，到达河南洛阳以西的新安地区，准备渡过洛河，继续南下。不料洛河水涨，无法涉渡，乃在新安以西之铁门一带待机渡河。

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曾电示张启龙和文年生：“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进，直达粤北，你们的目的地亦是湖南、粤北。争取在年底到达五岭与王震、王首道会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急电南下第二梯队“停止南下，就地待命”。接着，又发来第二份电报，命令南下第二梯队“下一步行动归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

遵照中央命令，南下第二梯队于8月下旬掉头北上，返渡黄河，到达河南孟县、济源县境。此时，上述两县仍被日伪军控制。其中，孟县城内驻有1000多名伪军，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张伯华的汉奸，嚣张跋扈，作恶多端，指挥部决心消灭之。经请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批准，兵分两路，由第二支队攻打孟县，第三支队攻打济源。当第三支队进至济源城下时，该城守敌见势不妙，弃城而逃，济源城不攻自破。孟县伪军张伯华则依仗其武器、粮食储备充足，负隅顽抗，第二支队在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一个团的密切配合下，激战2日，攻克孟县，顽匪除张伯华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部队进城后，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第二支队还补充了448名新兵。

部队在孟县略事休息后继续北上，经焦作到涉县，接到调往东北的命令。9月16日，奉刘伯承、邓小平命令，渡淇水，过浊漳进入太行山区。10月1日，在山西省黎城县漳南镇，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命令：南下第三支队（警一旅）开赴晋西北（后经热河进入辽宁）；南下第二支队（原三五九旅留守陕北部队）就地轻装，调往东北。在命令中特

别指出：要首先组织一批干部，集中全部乘骑，组成先遣队，昼夜兼程，抢进东北，解除日伪军武装。

根据中央命令，指挥部立即制定了行动部署，首先组成了“干部先遣队”。由于乘马数量有限，先遣队只集中 80 多人，多为团、营、连三级副职干部，其中三五九旅 56 人，干部队 30 多人，由张启龙、贺庆积带队。随先遣队先行出发的还有陶铸、程世才、伍晋南、莫文骅、古大存、谭余保、袁任远、邓洪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

9 月初，干部先遣队乘马从太行山麓出发，直插河北平原。这时，正值秋收季节，大地一片金黄。这支非同寻常的干部先遣队，以日行军 75 公里的速度奔驰在中原古老的大地上。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除了睡觉吃饭，几乎都在赶路。为了绕开敌人，减少麻烦，加快行进速度，专找敌人的间隙走。这样，经过十多天的强行军，穿过河北平原，到达平津地区，直抵进入东北的咽喉要地——山海关。尔后乘火车直奔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沈阳，受到彭真的接见。这批干部在这里领受任务后，先后被分派到东北各地，担任了重要职务。

干部先遣队出发之后，第二、三支队也立即开始行动。

遵照命令，第二支队（三五九旅所部）将重武器（92 步兵炮、82 迫击炮、重机枪）留给太行军区，轻装前进，该部 3 000 多名健儿晓行夜宿，每天以 50 公里的速度徒步疾进。途经河北邢台、深县、饶阳、河间，于 10 月 27 日出山海关，28 日在前卫车站乘火车奔赴锦州。部队在辽阳地区，经过扩编，恢复了三五九旅番号，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该部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抚顺及北满剿匪、三下江南及夏季攻势等重大战役战斗。1947 年 1 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同年 9 月，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序列，改称第二十八师。1948 年 11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第二十八师改称第一三九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

（1999 年 7 月 27 日第 2 稿）

北平抗日救亡活动亲历记

刘锡宠^①

我是1930年到北平考入河北省立第17中学的(后改为北平高级中学),次年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对中国加紧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3天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宣言,并组织了以抗日为目的的“反帝大同盟”,这是党领导的最大群众组织,反对并抗击日寇侵略中国。我校加入该组织的约60余人。但这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国民党禁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行动,并不许张学良将军抵抗日军,听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我校学生冒险参加党领导的飞行集会,发传单,写标语,还演出话剧《乱钟》。我校教师、地下党员杨绍萱(解放后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戏剧改进局局长)及许耕园领导我们进行活动。当时学校参加党领导的群众团体有百余人,占全校学生的近1/3。

当年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北平各校数千人在北平前门西站抢占了火车,并轮流卧轨,坚持南下,我校学生在学生会领导下,大部参加行动,在火车站坚持不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毓麟到现场劝阻无效,到星期六,因国际条约规定,列车必须开出,我们取得胜利,离开北平南下赴京。车行至德州车站,蒋介石命令山东军阀韩复榘扣押我们的列车,在车站又斗争了一天,我们要用工

^① 刘锡宠:农二师正师级顾问。原新疆警备司令部陶峙岳部下,军法处少将处长。1949年9月25日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总务处长(正师级)。

学院的同学自己开车，铁路局怕出大事，勉强让列车开行。晚上到了济南，同山东学生占的一列车一同赴南京，火车分批乘轮渡过江。我们从浦口徒步走到鼓楼金陵大学，天已昏黑。当晚我们睡在该校体育馆的地板上，天冷不能入梦，大家只好起来跑步，终夜未眠。次日经过交涉，搬到大会礼堂，睡到椅子上，又要来军毯、饭票，总算能住下来。

这时到南京的学生分别活动，我们大部分齐集国民政府前大厅，要见蒋介石。蒋派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出来接见我们，被撵走了。坚持很久，蒋介石出来了，我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说：“不是我不抗日，是他们（指两广军阀），防阻我抗日……”我们不同意这种狡辩，呼口号反对，这时住在中大的示威团游行到国府前，我们和他们一起举行大规模示威。这几天，我们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打了外长王正廷，和军警发生冲突，有的被推入水中。鲁迅先生以“学生失足落水”来讽刺国民党的暴行。

最后蒋介石命令军警架起机枪，包围我们住处强行押解我们回平。这次活动影响很大，更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我们回北平后，学生中抗日、反蒋、反内战的情绪更为高涨，大力宣传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抵制日货，焚烧日货，因而和军警冲突，我们据守北大一院红楼，和军警对抗了一天。为在北大三院纪念三八节，被警察包围，有40余人被捕。在杨绍萱的领导下多方奔走，营救马哲民、侯外庐教授。鲁迅先生来北平，我们对她负责保卫。

因蒋介石的节节退让，日本加紧了向冀东热河等地的进犯，爱国将领冯玉祥及共产党员吉鸿昌率部在长城古北口等地奋起抵抗日军，北平的爱国青年、共产党员亦纷纷奔赴前线，支援抗战。

这期间，我是北平高中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河北省学联的主席，秘密的共青团员，党给我的任务是领导学运，以北平救国总同盟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组织各校救国会，发动罢课。我校率先发动学潮，坚持4个多月，最后河北省教育厅撤换了同情我们的校长张仁山，派军统分子焦实斋武装接收学校，同时逮捕学生会的骨干杨沛、张臻一

等，幸我们越墙走脱。学校挂牌开除 24 名同学（解放后有 19 名是厅局以上干部），暑假中又令 50 多名同学退学，我们差 15 天没有毕业。

我埋头苦读，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这是当时左派势力最大的学院，名教授李达、陈豹隐、许德衍、沈钧儒等都在该校教书，学生中有张友渔、韩桂琴（幽相）等共产党员。

在我们同级中裴鸿昌（后甘肃省委书记）、张增智、董祚楷等都是地下党员。我们组织了“1937 读书会”（解放后张增智才告诉我这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他们推我出面，参加学院的学生会，并代表学院参加北平市学联，领导学运，参加抗敌救亡活动。

“一二·九”前夕，刘少奇来到北平，在西单辟才胡同 9 号，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加强党对学联的领导，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学联的重要领导有北大的黄敬（后天津市长）、姚依林（后副总理）、清华的陆催（后全国妇联副主席）、东北大学的高扬（后河北省长）。我代表法学院参加学联的领导工作。

“一二·九”这天学联发动数千人，要求见北平最高的国民党负责人宋哲元，宋同意在景山公园接见我们。我们被骗关在公园内，天黑才放出来，群情激愤，组成游行队伍，示威喊口号，到宣武门外，又被关在城外。宣外大街的民众十分同情我们，送吃送喝，支援我们，感人至深，我们趁机宣传。到深夜才开了城门。

“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重要院校都被军警把守。北平学联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联系，12 月 16 日举行了更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这天一早，我们学院大部分集中在法学二院，砸开后门，一齐冲到北沟沿大街，直奔西直门。途中戴逸同学被二十九军的大刀在背上拍了一下，大衣毛衣全被割破，幸未受伤，但另一同学腿部被砍伤，送入医院。我们的第一任务是到西直门内迎接清华燕京两大学的示威队伍入城。不久，两校学生已到门外，因城门关闭不得入城。我们挤到城门洞内，和军警交涉，清华的陆催趁机从城门下面空处爬进去，

这时守军已被我们劝说争取过来，站着不动，被我们打开城门，和两校学生混合组成游行大军，陆催站在一路电车的脚踏上，向军警及群众讲演，并指挥队伍游行。行动中，不断有学生加入队伍。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的二楼，这本是清华大学进城汽车车站，交通方便，面临大街，靠自行车、电车便可指挥行动。

游行人数越来越多，声势浩大，军警亦无法阻拦。下午学联得到情报：东交民巷日军，已在王府井大街架起机枪，准备屠杀学生。我们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段时，中国军警用水龙头喷射队伍并进行阻拦，队伍散了。这是有名的“一二·一六”反日示威大游行，把“一二·九”运动推向高潮，震动全国，影响深远。

“一二·一六”后学联组织南下宣传队，发动农村民众抗日，我们派董祚楷参加。途中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下的大群众组织，我们的“1937读书会”全体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的措施和条件，这是推动抗战的基本文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是时局的大转折。我们听到蒋孝先被打死了，十分高兴，以后我们当然听从党的指示，从事抗敌救亡事业。

（写于1999年8月，作者时年86岁）

小资料



枪杆诗

——新四旅西北战场战地文化一翼

赵予征

《枪杆诗》的诞生

新四旅(后编为六军十七师)的前身是红军部队,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保卫延安的战中,战必胜,攻必克。战士政治、军事素质高,部队文化生活也异常活跃。在打了几个胜仗以后,战士们围在一起议论:“在西北战场,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而我军每战必胜,毛主席、彭老总指挥打仗真神。”一个战士突然提出:“以往文人写诗,流传千古。我们解放军战士肩负着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使命,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从事着神圣而壮丽的事业,应该有诗。”大家一致赞成。但诗叫什么呢?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我们靠枪杆打天下,就叫《枪杆诗》吧。”战士们齐声叫好。《枪杆诗》就这样诞生了。虽然文字粗糙、不合韵律,但它记述着我军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战争场面,热情歌颂了我军将帅指挥的高超艺术,记载了我军将士的战场活动,展示了我军指战员在严酷战争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战地的歌谣,这是战士的心声。

真奇妙

蒋介石、胡宗南，
丧心病狂打延安。

毛主席、彭老总，
兴兵打仗赛孔明。

敌人出兵 23 万还有零，
我军只有两万五千人；

敌人飞机加大炮，
我军小米加步枪；

敌人装备现代化，
我们就凭两腿跑。

可是我军犹如神兵一样天天打胜仗，
你看奇妙不奇妙。

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若我军力量大于敌人，这个仗就好打；如敌军力量大于我军力量一倍至两倍，这个仗就不好打；假若敌军力量大于我军四到五倍，这个仗就很难打了。西北战场胡宗南指挥着装备精良的 23 万多敌军进攻延安，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我军仅两万余人，敌与我 10：1，而且我军武器弹药奇缺。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许多人都担心这一战争的前途。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宣告：“要与陕甘宁边区军民共同战斗，不打败敌人，决不过黄河。”彭德怀副总司令主动请缨，亲自指挥这场战争。边区军民，群情大振，团结战斗，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毛主席和彭老总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巧用“诱敌深入”、“以逸待劳”，让敌军钻进“口袋阵”，或“围城打援”，或“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运用“急袭”、“奇袭”等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孤立之敌。今天歼敌一个旅，明天消灭一个师，再战全歼一个军。我军由弱变强，敌军则由强变弱。不到三年时间，居然打败了凶残而强大的敌人，解放了大西北。

50 年后的今天，回忆至此，不禁拍案叫绝。若孙武、孔明再世，亦不过如此。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用兵如神”吧。

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以弱胜强的典范。

三战三捷

胡蛮胡蛮不中用，
咸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六千官兵当俘虏，
九个半旅像狗熊。

蒋军在 1947 年 3 月 19 日占领延安后，趾高气扬，狂妄得很，大肆吹嘘“胜利”。同时蒋介石命胡宗南迅速寻歼解放军主力。可是好景不长，仅隔 6 天，彭老总在青化砭布置的“口袋阵”，干脆利落地全歼敌人三十一旅。4 月 14 日，彭总抓住敌军调动失当之机，在羊马河又吃掉敌人一三五旅。不到一个月，胡宗南丢掉两个旅，两名旅长均被俘，气得蒋介石责怪胡宗南指挥无方，胡宗南大骂董钊、刘戡作战不力，严令尽快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彭总即命一支部队，佯装“主力”，牵敌北上绥德。5 月 4 日，我军主力突然包围敌人的战略补给站——蟠龙。经过激战，全歼守军一六七旅旅长及以下 6 700 余人，不仅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和粮食被服，而且大批俘虏补入我军，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这就是陕北战场著名的三战三捷。

赞英雄

黄文才，龚进文，
华阴桥上逞英雄。
团长命令“抓舌头”，
二人受命喜盈盈。

一个化装敌军官，
一人扮作勤务兵。
蒋军大队刚刚过，
零零星星又来三个兵，
一个挂皮包，一个扛机枪，
还有一个通信兵。

黄文才大声吆喝道：
“打起精神跟我快赶路，
磨磨蹭蹭怎么行？”

走到前边往右拐，
离开大道进山沟。
敌人觉得不对劲，
怎么钻进深山中？

龚答：“这里要近十里路，
只管紧跟莫打听。”

就这样：三个兵糊里糊涂跟着走，
一个一个当了俘虏兵。
敌人兵力部署全弄清，
攻克蟠龙十拿有九稳。
团长政委连声赞，
你们立了第一功。

黄文才、龚进文是新四旅十六团侦察员，他们勇敢、机智、枪法准，神出鬼没经常活动在敌占区内，出没于敌军阵地之中。抓舌头（指捕捉俘虏，了解敌情），摸岗哨，察地形，探情报，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上面的《枪杆诗》就是叙述他们在延安东北的华阴桥地方“抓舌头”的一段故事，曾被旅文工队编成剧《华阴桥》在部队演出，反映很好。

真武洞祝捷

5月14日，陕甘宁边区5万军民在延安以北45公里的真武洞举行了祝捷大会。这是在敌人重兵压境，战火纷飞的日子举行的大会。周副主席讲了话，他说：“……敌人占领延安后，仅仅45天，我军三战三捷，消灭敌人三个旅，活捉三个旅长。在敌人兵力和装备均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伟大胜利，确是难能可贵的。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全场起立热烈欢呼，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稍停，周副主席郑重宣布：“毛主席、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和大家共同战斗。”全场军民沸腾了。“毛主席还在陕北”迅速传遍边区各地，传遍全国。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坐的汽车就被敌机打坏，有的领导从安全考虑，建议毛主席东渡黄河。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这对陕北人民是何等真挚的感情，“坚决不过黄河”，在敌人重兵紧逼的形势下，是何等伟大的气魄。

大会举办了三战三捷战利品展览，摆了一大片，有美制的火炮、野炮、化学炮，还有火箭炮；有步枪、手枪、轻机枪、重机枪，还有司登式冲锋枪；有吉普车，发报机，还有大卡车。这些武器和物品上，都印着“USA”（美国）的字样。战士们仔细地参观，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每次战役冲锋陷阵、缴枪缴炮捉俘虏的情景。几个战士用自己编的《枪杆诗》向群众进行解说：

叫同志，你瞧瞧，
三战三捷打得好，
战利品，真不少，
堆在一起比山高。
美国枪，美国炮，
美国军装美国帽，

美国罐头美国糖，
还有美国白面包。
为啥都是美国货？
因为蒋介石的后台是美国佬。
这些东西怎么来？

应该谢谢“运输大队长”（指蒋介石、胡宗南）。

打骑兵

当蒋胡军大举进犯延安的时候，马步芳、马鸿逵趁机占领了边区的陇东和三边大片地区，不断进行“清剿”，大肆烧杀抢掠，施行白色恐怖。在三战三捷后，彭老总决定出兵陇东，痛击二马。

青马、宁马主要是骑兵，我军过去与骑兵接触较少，不少干部战士对打骑兵缺少经验，心中无底。针对这种情况，领导机关组织有经验的同志座谈：“怎样打骑兵”。宣传队的同志编成歌谣，教战士唱：

骑兵过来不要怕，
集中火力消灭它。
敌人骑兵冲来了，
交叉火力组织好，
目标越大越好打。
六〇炮瞄准打，手榴弹集中投，
机关枪哒哒哒，
管叫他人血、马血染黄沙。

这个办法真不错，连连打胜仗。出兵仅 16 天，消灭敌人 4 380 余人，将二马赶出陇东。新四旅十六团请战包打悦乐，在团长袁学凯指挥下，一举歼灭青马骑二旅三团，俘敌副旅长陈应权、团长汪韬。

在打马战斗中，发现六〇炮威力大，马家骑兵怕炮不怕枪。机枪朝敌骑兵猛扫，敌人虽有伤亡，但队形不乱照样冲锋；如果炮弹在敌骑兵中“轰”的一炸，马就惊了，队形大乱往后跑。十六团战士根据战

斗经验，顺口编了一首《夸夸六〇炮》：

咱们夸夸六〇炮，
要打骑兵它重要。
重量轻，威力大，
能远能近空中掉。
我们炮手技术高，
炮炮打中敌马群。
“轰”的一声炸，战马受了惊，
敌兵心胆颤，军官慌了神。
我军神速冲上去，
缴枪拉马又捉俘虏兵。

活捉刘子奇

毛主席在西北战场开始时，为了保密，化名李德胜。沙家店歼敌三十六师后，毛主席在电话中大声说“我是毛泽东”，从此再不用化名。因为这一仗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面，我军从此转入进攻。战役开始前，我军北面西面均是沙漠，东面是黄河，南面是敌人重兵，形势相当严重。毛主席、彭老总出奇兵，一举歼灭敌主力师。这是西北战场关键的一仗。是役，新四旅在常家高山负责阻击冒进的一二三旅，防敌回援钟松。在教导旅配合下，干脆利落地吃掉了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也被活捉。战后，十六团八连指战员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编了一首《活捉刘子奇》。

敌人发现黄河两岸人熙攘，
误断我军要东逃。
胡宗南急令刘戡和钟松，
南北夹击解放军。

榆林钟松甚猖狂，^①
领兵南下抢头功。
彭总调兵巧布阵，
决心吃掉这支嚣张的孤军。

我旅奉命阻敌人，
不许一二三旅援钟松。

战士跑步抢占制高点，
一看那边敌人也快到山顶。

手榴弹、排子枪，
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往后跑。

刘子奇指挥飞机炸，大炮轰，
整整打了三个十分钟，

看到山头已炸平，
命令整连整营往上冲。

我军早已撤到安全区，只留一人看敌情，
发现敌人上来了，

我军急速进入阵地中。
敌人胆战心惊爬到工事前，

连长下令狠狠揍敌人，
蒋军倒下一大片，

丢盔卸甲快逃命。
敌人冲锋六七次，

英雄昂然挺立在山岗。
总攻命令一声下，

一二三旅全报销。

^① 钟松是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师长，因“援助榆林有功”，张狂得很，大夸海口，要“一战解决陕北问题”。

铁八团^①、钢七团，
常家高山全完蛋，
四大金钢刘旅长，^②
俘虏营里去报到。

为谁打仗

由于我军连打胜仗，缴枪缴炮捉俘虏，大批解放兵补入部队，有的连竟达一半以上。他们有战斗经验，有技术，但分不清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有的说“吃谁家的粮，就当谁家的兵”，有的认为蒋介石是代表“正统”的，“受苦受难是命不好”……但他们绝大部分是被国民党抓丁抓来的，每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通过“诉苦”，挖苦根，算剥削账，挖穷根，战士们弄清了过去种种苦难来自旧社会大大小小的压迫和剥削者，总根子就是蒋介石。认清了敌人，决心为自己翻身而战，为穷苦兄弟解放而战，坚决推翻旧社会，打倒蒋介石。

四十九团战士徐世英在诉苦后，越想越伤心，激起对旧社会的仇恨，决心报仇雪恨，含泪编歌谣：

蒋介石，大坏蛋，
害得我家破人亡天昏又地暗。
一年四季吞糠菜，
夏天穿着棉衣没法换；
父亲欠债被逼死，
可怜母亲上吊把命断；
我小小年纪被抓丁，
哥哥无奈去逃难。

① “铁八团”是敌一二三旅所属三六八团，因该部在堵截和追击我中原军区突围部队时，特别积极，立了“战功”，受到胡宗南的青睐，特奖给它“铁八团”的桂冠。

② 胡宗南有四名得力战将，号称“四大金钢”，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才弄清楚，
苦根穷根都是来自你这个大坏蛋。
像我这样苦命人，
何止千千万。
我代表正义把你讨，
手执钢枪和你干。

经过“诉苦”和“三查”，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懂得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激起了革命斗志，迅速掀起了练兵热潮。官教兵，兵教官，新老兵互教。练投弹，练刺杀，还要练射击。有的战士怎么也打不准，很是着急。神枪手们坐在一块儿，共同编了《枪枪打在十环上》，通俗易懂，很受战士欢迎，迅速提高了射击技术。

沉住气，别心慌；
姿势正，端稳枪；
一枪两枪第三枪，
枪枪打在十环上。

“诉苦三查”和军事练兵后的第一仗——宜瓦战役中，我军将士个个胸中怀着深仇大恨，无不以一当十，杀向敌阵，彻底、干脆地歼灭了敌人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3万余人，无一漏网。

毛主席将“诉苦三查”誉为新式整军运动，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说刘戡^①

刘戡刘戡真风光，
进攻边区甚猖狂，
虽然损兵又折将，
占领延安趾高气扬。

^① 刘戡是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1948年3月1日在瓦子街战役中全军覆灭，自杀身亡。

胡宗南把你夸，
蒋介石给你奖，
你看风光不风光。

刘戡刘戡送礼忙，
名副其实运输大队长，
今天送来枪支弹药和大炮，
明天又送来大米洋面和军装；
送了成千上万士兵还不算，
又送了不少旅长和师长；
李纪云，麦宗禹，
还有蟠龙李昆岗，^①
沙家店送来刘子奇，
清涧送来中将师长叫廖昂^②。
彭总听罢哈哈笑，
应该给他发个大奖章。

刘戡刘戡真反动，
兴兵反共反人民。
五次围剿你积极，
丧心病狂打红军。
张学良、杨虎城，
坚持抗日你围攻。
几次内战都有你，

^① 李纪云是国民党三十一旅旅长，1947年3月25日在青化砭战役被我军俘获。李昆岗是国民党一六七旅旅长，1947年5月5日在蟠龙战役被我军俘获。麦宗禹是国民党一三五旅旅长，1947年4月14日在羊马河战役被我军俘获。

^② 廖昂是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长，1947年10月1日延清战役被我军俘获。

进攻延安你当急先锋。

一桩桩，一件件，

罪行累累数不清，

顽固至死不回头，

全军覆没命归阴。

念你抗战初期还不错，

礼仪殡葬留点情。

枪榴弹

在洛川战役中，十六团八连的任务是攻打洛川城西南的石家庄，我军利用夜间突然袭击的办法，迅速拿下了前沿阵地。但在攻击敌主阵地时，遇到了麻烦。敌人的集团工事建筑在开阔地的中央，距前沿阵地100多米，我军用机枪打，敌人钻到工事中，用手榴弹，太远炸不着。一个解放战士向我建议说：“咱们在瓦子街战役缴获了那么多枪榴弹，正好派上用场。”一试果然灵，计算好距离，枪榴弹正好在敌人的工事上空爆炸，杀伤力很大，打得敌人东逃西窜，无处躲藏。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人高举白旗投降。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一面接待投降过来的士兵，一面作了一首赞扬枪榴弹的《枪杆诗》：

枪榴弹，威力大，

打出去，头朝下，

四十八块空中炸，

你看敌人怕不怕。

火车送军打西安

宜瓦战役大捷后，我军陈兵于关中三原一线，步步进逼西安。陈谢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兵迫潼关，巧遇六军张贤约副军长带北平起义部队整编的7个团浩浩荡荡西渡黄河。胡宗南误以为华北野战军已出兵陕西，大惊失色，慌忙决定将主力撤到乾县、永寿一线，依

托秦岭布防，若形势不利，即兵退汉中、四川。我一野首长判明敌情后，当机立断，命一、二、四军赴西截击敌人；命六军解放西安。这一任务下达后部队沸腾了，人人奔走相告，战士们摩拳擦掌，长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打到西安去”，成了全军的战斗口号，决心书、请战书纷纷送到首长手中，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四十九团六连战士马成贵，激动地写了一首出色的《枪杆诗》表决心。

不怕苦，不怕难，
不怕挨饿没有饭；
不怕行军路程远，
不怕战斗流血汗；
不怕渡河有艰难，
英勇杀敌做模范；
遵守纪律政策不违犯，
打到西安活捉胡宗南。

5月20日拂晓，我军向渭河南岸的守敌发起凌厉的攻势，十七师五〇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出兵强渡渭河，抢占敌人工事，与友军协同，歼敌一个团，余敌土崩瓦解，纷纷向西安逃窜。五〇团迅速攻下三桥镇，发现车站上停着一列火车，在司机老王的帮助下，“坐上火车打西安”。我军出奇制胜，从进军渭河到占领西安，不到40小时，其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受到了彭总的嘉奖。“王师傅火车送军打西安”这段佳话，五〇团战士编了长诗以记述。

有个火车司机他姓王，
为人正直技术高。
突然来了一群兵，
丢盔卸甲把命逃，
领头的营长他姓黄，
人们叫他黄鼠狼。
横眉竖眼把老王瞧，

未曾开言就掏枪，
“老子命你快开车，
国军要向西安跑，
若是敢说半个‘不’，
叫你顷刻见阎王。”

老王低头细思量，
开口就把长官叫，
运送国军本应该，
只是车头坏了没法跑，
在这等了整一日，
急得我也心发慌，
长官不信上车看，
实实在在没法想。

黄鼠狼，干瞪眼，
领上败兵往东逃，
气急败坏认倒楣，
临走抢了烟五包。

老王抬头朝西看，
红旗招展人欢笑，
来了大队解放军，
跑步前进追敌忙。
头顶红星、手执钢枪，
一个一个赛金钢。
队中走出一大汉，
腰里挂着小手枪，
英姿勃勃雄赳赳，
大家叫他刘团长。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尊称师傅请帮忙，
我军要打西安城，
要把古都人民来解放，
若是火车送我军，
西安人民早日见太阳。”

老王听罢哈哈笑，
“车送大军理应当，
我们本是一家人，
还说什么帮忙不帮忙。
现在火车不能动，
换个零件就能跑。
快请大军上火车，
我要亲自开车送一趟。”
团长听罢喜洋洋，
代表全军谢老王，
“解放西安你是第一功，
党和人民忘不了。”
马上把令一声下，
全团快把火车上。
火车长鸣出了站，
风驰电掣向东方。

沿途收拾三股残兵和败将，
其中就有黄鼠狼。
我军神速挺进西安城，
敌人惊叹天兵来得这么早，
仓皇应战遭惨败，
只好乖乖把枪缴。

人民欢庆天亮了，
西安古城红旗飘。
火车送军传佳话，
大家齐声赞老王。

赞电话机

四十九团通讯排电话员柏洪祥，在一次行军路上背着缴获的战利品美国造电话机，重量轻、性能好，越想越高兴，边行军边思考，编了一首称赞电话机的《枪杆诗》：

电话机、被复线(战时军用电话线)，

战时通讯是宝贝，

既灵敏、又轻便，

生性喜欢上火线；

狂风暴雨和打雷，

声音照样很清脆；

山高路远隔大河，

讲话就像面对面；

大家叫它顺风耳，

打起仗来它在最前面；

连着几天连轴转，

它也不喊一声累；

上传下达快捷又清晰，

首长指挥作战挺方便；

胜利也有它的一份功，

你说这话对不对。

扶眉会战

在我军连战皆捷并解放了古城西安之际，中央军委于4月25日

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迅速由晋入陕。这时敌军兵力总共约 40 万人，但分散在陕、甘、宁、青、新五省，机动兵力仅 15 万人左右。我军则可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根据这一形势，彭总决定“钳马打胡”，组织扶眉会战，歼灭胡宗南主力于扶风、眉县地区。这一战役打好了，对解放大西北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了打胜这一仗，各级党政组织层层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炮兵战士要“弹不虚发、百发百中”；炊事员要“做好饭菜，及时送到前线”；医务工作者要“抢救伤员，不丢一个”；要求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处处做表率”。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四十九团六连人民功臣丁金安，决心率领全班，在扶眉会战中争取全班立功。他把奖状、钢笔及仅有的 400 元钱交给支部，对支部书记说：“假如我牺牲了，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文书邢普华深受感动，连夜将这件事写成《枪杆诗》，贴到壁上。

杀敌勇气高，

普遍下决心，

鲜花开满园，

单摘一朵红。

六连七班长，

英雄丁金安，

决心要争取，

全班当英雄。

军人大会上，

句句说得清：

不管敌人多凶恶，

战斗任务要完成。

抗敌守阵地，

弹尽刺刀拼，

若要攻击敌阵地，

我要带头去冲锋；
为广大穷人去报仇，
解放受压的群众；
这次大会战，
带领一班人，
亲自掌握一机枪，
准确射击杀敌人；
紧跟步兵去冲锋，
缴枪还要多捉俘虏兵；
全班都立功，
集体当英雄；
钢笔交一支，
人民币^①400整，
荔北立功书，
一一都交清；
如我牺牲了，
书信报家中；
钢笔人民币，
算作党费我的一点心。

当这首诗贴出后，震动很大，迅速变成了全连的决心。在扶眉战役中，六连猛打猛冲，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活捉俘虏100多名。

这次扶眉战役，在彭老总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部队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强大的解放军层层包围，陷入绝境。激战两昼夜，除部分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我军歼敌4个军4.3万余人。我军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进一步隔离了胡、马集团，为尔后各个歼灭胡、马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人民币：指边区人民币（边币）。

千里追击马家军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军被歼。彭总决定“钳胡打马”，坚决消灭凶残而封建的马家部队。命十八兵团牵制胡宗南部队，一兵团为左翼，十九兵团为右翼，二兵团居中，以临战的姿态，向西展开了“千里追击马家部队”的大进军。要求部队：一要追得上；二要打得赢；三要坚决执行民族政策。

在彭老总指挥下，浩浩荡荡的大军冒着烈日酷暑，向逃窜的马家军追击前进。西兰公路上，黄土飞扬，两旁雄赳赳的步兵以及中间隆隆开进的坦克部队和炮车队，汇成一股铁流，滚滚向西。战士们斗志昂扬地谈论着：“坚决消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

马家部队是骑兵，我军是步兵，要想“追得上”，必须发扬我军“铁脚板”的优势，同时要开展好体强的帮体弱的互助活动，才能避免掉队现象，整体前进。可是每人背的枪支弹药和干粮袋，负荷是很重的，再要帮别人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四十九团警卫连王炳银就是这样的模范。王得明写的《枪杆诗》记述了王炳银的模范事迹。

我们三天急行军，
吃苦要数王炳银，
天气酷热他不怕，
帮助战友挺热心。
王石生同志脚打泡，
一扭一拐难快行，
炳银上去帮他扛面袋，

感动得石生咬紧牙根往前行。

帮助本班还不算，

还帮五班六班扛枪扛面令人真感动；

机枪子弹没离肩，

面袋还背了四条整。

天气这么热，
背得那么重，
满头大汗“吭哧”“吭哧”往前走，
人人见了人人敬；
互助活动大开展，
全连没有落一人。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大家都来学习王炳银。

在进军兰州的路上，多系回民聚居区。为了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五〇团政治处干部编了《政策最重要》在部队广为传播。

进入回民区，
政策最重要；
纪律定八条，
条条要记牢：
不准进入清真寺；
不得使用回民锅、碗和炒瓢；
不准群众面前吃猪肉；
夜晚不睡回民的住房；
买卖要公平；
说话和气遇事多商量；
进入驻地先扫院；
出发前要水满缸。
这些事情做好了，
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

当回民群众发现解放军战士野地露营时，大为感动，坚决拉战士回房住。一位老阿訇感慨地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未见过这样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得民心者得天下，未来的天下必是共产党的无疑。”我军在 20 余天的追击中，前进千里，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

区。特别是我一军在固关镇全歼号称铁骑的青马骑兵十四旅后，大大打击了青马的嚣张气焰，大军乘胜追击直抵兰州城下。

赞兰州战役中的英雄——曹德荣

“西北王”马步芳血债累累，十分猖狂，他在1936年疯狂屠杀我西路军将士，1948年在西府战役中又占了点便宜，便自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他藉兰州“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加之数十年修筑的永久工事，十分嚣张地吹嘘：“不仅要保住兰州，而且要直下西安。”他的如意算盘是，青马坚守兰州，胡宗南和宁马共同配合，从侧后包围，妄图歼灭我军于兰州城下。

1949年8月25日拂晓我军发起总攻，经过指战员们英勇冲杀，反复争夺，于8月26日12时，全歼青马主力于兰州。这一战役，我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特别是董存瑞式的英雄、五〇团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五〇团向敌主阵地皋兰山发起冲锋时，被阻于敌阵地前，因前有三丈高的峭壁（敌人把山坡切成直立峭壁）难攀，明堡、暗碉组成的交叉火力难以接近，组织几次爆炸未果，部队上不去，下不来。在此关键时刻，曹德荣一下抱了三包炸药，身先士卒冲到峭壁下，手托炸药，点燃导火索，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响，峭壁炸垮了，碉堡炸飞了，部队迅速冲上山顶，在敌阵地插上了红旗。曹德荣被追认为烈士，彭总命名五〇团七连为“曹德荣连”。

战后，战士们怀念英雄曹德荣，七连集体编了《枪杆诗》赞曹德荣。

彭总下令打兰州，

全军上下齐欢腾，

二马统治太残暴，

血债累累数不清，

残害人民上千万，

曾经屠杀西路军，

今天要来算总账，
坚决消灭马家军。
六军奉命攻打皋兰山，
四九、五〇两个老团任主攻，
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一个连一个，
还有暗碉数不清，
火力组成交叉网，
内有地道相连通，
地雷埋了一大片，
削山足有三丈深。
我军攻击两次未奏效，
只因峭壁难攀碉堡火力仍逞凶，
我军被阻敌阵前，
进退两难急煞人，
指导员曹德荣，
看见此景两眼红，
一下抱起三个炸药包，
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
不顾身负六处伤，
冒着密集炮火往前冲。
只见他，
身贴峭壁下，
手托炸药包，
从容点燃线，
两眼冒火星。
只听“轰隆”一声响，
峭壁垮塌了，
碉堡也飞到半天空。

战士扛着红旗上去了，
英雄倒在血泊中。
全军齐声赞英雄，
人民永远怀念曹德荣。

河西走廊扫残敌

我军攻克兰州城，
全军将士齐欢腾，
马家父子^①坐上飞机把命逃，
千夫所指落骂名，
残兵败将欲苟喘，
慌慌忙忙往西涌。
彭总命令一声下，
调动大军追敌人；
兵团司令许光达，
率领精兵十万速西征，
残敌望风披靡举白旗；
王震大军翻越祁连关死逃跑的门。
杂七杂八数万人，
只好各自奔前程；
有远见的早起义，
头脑清醒的快投诚；
负隅顽抗被歼灭；
罪大恶极受严惩。
雄兵横扫河西走廊地，
巨手敲响新疆的东大门。

^① 马家父子指敌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及其儿子，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兰州战役时任敌方总指挥。

这是在大军所向无敌，横扫河西走廊取得巨大胜利时，机关干部边行边议论，兴高采烈地写下了这首“河西走廊扫残敌”的《枪杆诗》。

兰州决战，歼灭了长期盘踞西北的马步芳主力，这对解放大西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步芳率其子马继援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坐上飞机仓皇逃跑，残敌涌向河西走廊，妄图负隅顽抗。彭老总为彻底歼灭敌人，及时发起“河西战役”。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率三、四、六军沿兰新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追击，17天推进700公里，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二军翻越常年积雪、气候异常恶劣的祁连山，直插河西走廊，断敌退路。于9月21日与二兵团会师张掖，大军连克数城。敌人有的起义，有的被歼灭。是役共歼敌4万余人，全部解放河西走廊，直叩新疆大门。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枪杆诗》不仅记述战场情况，歌颂英雄，而且出现了自我批评的《枪杆诗》。如在战役发起前，四十九团警卫连文书潘纪文在上次行军总结会上因掉队受了批评，越想越不对头，自己年纪轻轻，背的东西又不多，还因掉队受了批评，思前想后，决心改正，于是写了一首《反省诗》，贴在壁报上。

我的名字潘纪文，
上次掉队真丢人；
人家大会受表扬，
我在会上受批评。
这次坚决不掉队，
还要积极帮别人；
文化娱乐我当先，
为了大家振精神。
不幸左脚烂一块，
抱定决心不灰心；
上次行军人帮我，
大家感动我的心；

支书帮我背面袋，
文干帮我背公文；
自己检讨又检讨，
背的总比别人轻。
这次我把决心下，
河西战役立功勋。

这首《反省诗》，在战士中反响很大，潘纪文没有食言，在追歼逃敌中表现很好。

坐上飞机进新疆

今天传来大喜讯，
我团要坐飞机进新疆，
战士笑得合不拢嘴，
祖宗三代头一遭。
过去常挨敌机炸，
今天我们也要上天逛一逛。
走进机场举目观，
大批铁鹰发亮光，
怎么这个铁家伙，
就能飞得那么高？
这个问题还没想通，
连长命令快把飞机上。
坐上飞机往下看，
好似神仙遨游云雾中，
左边是巍巍祁连白雪罩，
右边是茫茫戈壁甚荒凉。
忽然小刘一声喊，
快叫飞机停一停，

一问怎么一回事？
要想小便憋得慌。
机长听罢哈哈笑，
叫声同志听端详：
现在飞在半天空，
这和地上行军不一样，
请你稍稍等一等，
一会就到飞机场。
谈谈笑兴正浓，
不觉飞到哈密的头顶上，
这个东西真正快，
不大一会就降到迪化飞机场。
大街站着群众一大片，
锣鼓敲得震天响，
“热烈欢迎解放军，
坚决拥护共产党”。
我军步履整齐雄赳赳，
威风凛凛似金钢，
头戴美制的钢盔帽，
肩上扛着战场缴来的钢枪，
频频点头谢群众，
暗下决心站好岗。
不觉来到我团的驻地，
这是名叫“建新”的营房。
政委引着一位首长来看我们，
一瞧是师长程悦长，
他身经百战多次负重伤，
战功赫赫威名扬，

关心部下似亲兄弟，
清正廉洁威信高，
目光炯炯声洪亮，
他给大家讲情况：
爱国将军陶峙岳，
率部起义投奔共产党。

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心，
发动叛乱甚猖狂。
哈密抢了黄金一万六千两，
鄯善戕杀欢迎解放军的好县长，
这个城屠杀群众百余人，
那个城奸淫掳掠又烧房。
你团是红军老部队，
战无不胜素质高。
命令你们驻首府，
赶快布兵守城防，
发现敌人就镇压，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得安康，
对待群众要和气，
执行政策第一条。
同志们听罢心明亮，
精神抖擞去上岗。

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摧毁了蒋家王朝。我西北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消灭胡宗南的精锐。1949年8月26日攻克兰州，彻底打跨了驽悍的马家部队。在此形势下，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审时度势，于9月25日率部起义。但是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不甘心失败，煽动部队叛乱，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新疆社会动荡，人民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包尔汉主席发电请求解放军从速进疆。彭老总命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率二、六两军进疆。斯大林支援飞机40架帮助运兵。在王震司令员、徐立清政委的指挥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红旗招展铁流滚滚，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十七师四十九团全部飞机运送，以上该团警卫连战士写的《坐上飞机进新疆》就是记述的这件事。二军进驻南疆，负责组建南疆军区，并兼南疆区党委，二军政委王恩茂任书记；六军进军北疆，负责组建北疆军区，并兼北疆区党委，六军军长罗元发任书记。十七师驻迪化，师长程悦长兼迪化警备司令员并兼迪化地委书记。四十九团驻迪化，五〇团驻伊犁，五十一团驻沙湾。全军立即进行剿匪平叛，开展大生产运动，并派出大批干部建党建政，改造起义部队，肩负起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

结束前的几句话

我过去曾搜集、整理过《枪杆诗》。最近翻阅以往的笔记，发现《枪杆诗》的资料，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好像又回到50年前战火纷飞的战场。字里行间，可以隐隐看出我军统帅部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危急情况下，我们的干部身先士卒，杀向敌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战士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我军将士不悲观，不动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组《枪杆诗》既记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活动，又反映了我军内容健康、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我感到很有整理出来的必要，作为对老部队和老战友们的怀念。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能会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补 记

原新四旅宣传队长乔连川(后任兰州军区空军宣传部长)得知我在整理解放战争时期的《枪杆诗》，大加称赞，并来函称：“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于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枪杆诗》、《快板诗》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士中发展最普遍，作品最多，即使识字很少，甚至不识字的战士也都参加创作，而且每一节差不多都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这里略举一首战士作品《手榴弹》：别看我是生铁蛋，我的用处不一般；不喝水来不吃饭，冲锋陷阵我当先。大家好好把我练，投得准，打得远，轰隆一声冒黑烟，能顶几架轻机关。’这是我在1947~1948年下部队时写的，选用时未署名。有的采用时署名‘佚名’。”

其中，最后一句原为“炸得敌人飞上天”，后被人改为“能顶几架轻机关”。其实，原文较为贴切。

从傅钟主任的讲话中可以知道，《枪杆诗》在全军是较为普遍和甚为活跃的。

王震在库尔勒对二十七师及十八团 部分官兵的讲话

时间：1950年3月30日

地点：库尔勒城外

出席人：起义部队一部分官兵及解放军十八团指战员

讲话内容：司令员先与士兵谈家庭情况，并问：有无抢劫人民？

答：抢了。后问一个起义部队的连长：你连的士兵为什么要抢劫老百姓呢？

连长答：报告司令员，因为几个月没有发饷，士兵们没有知识。

司令员：这位连长说士兵没有知识，对不对？

——不对。（十八团指战员同声回答，声壮如雷）

——不对。（二十七师一部分官兵回答）

司令员：你们十八团的战士有多少是从胡宗南那里解放来的？请举手。（约90%人举手）

你们看，他们大多数战士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改造过来的，现在已经是真正的解放军了。刚才我和你们士兵谈过，你们二十二兵团的弟兄们都是农民出身的。你们怎样当了兵的呢？（答：抽壮丁抽来的。）

对十八团问：你们是怎样来的？（答：自愿来的。）

对二十七师问：你们到新疆来的时候事先知道不知道？（答：不知道。）

对十八团问：你们到新疆来事先知道不知道？（答：知道。我们开

过会的。)

你们的“蒋总裁”，蒋发财，发总财，总发财，一齐给人民打倒了。你们当中少数人烧房子、抢东西、杀人、强奸妇女，我们叫他蒋匪还有人不高兴吗？过去你们的军队是为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利益服务的，现在大家要来保护劳动人民，保护被压迫的人民了。你们过去当下级军官的，也没有什么钱，也在受苦，大部分是被压迫的。陶峙岳司令员、包尔汉主席在新疆和平起义，对人民是有功的。你们以后要接受士兵的教育，要士兵来教育长官，这是最正确的方法。我还要经常向英雄模范学习，毛主席还要向群众学习。你们官长说：“抢人民是士兵没有知识，我做长官的不负责任。”这是欺骗士兵的话。你们官长要接受士兵的诉苦和批评，才能官兵连成一气，才能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抢了人民的要自动坦白，承认错误，退回财物，接受改造。二军的部队还要分去一部分，分两路去解决西藏。你们只要在这里好好生产，你做长官的如能够了解，能够认清士兵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是有力量、有知识的，你们官长们就有法改造了。一切压迫人民的人和制度，一切旧规矩都要打倒。我要问你们，一兵团的战士们不打二十二兵团，你们二十二兵团打不打一兵团呢？（二十二兵团回答：不打。）假若官长要你们打呢？（答：就消灭他。）这些话你们做官长的赞不赞成？（答：赞成。）好的，你们都是可以进步的，你们也都是要求革命的。你们记住：一切要依靠士兵。祝你们努力！

（军区档案馆提供）

军垦第一个战役

陶峙岳

由于部队要投入大生产,诉苦教育运动匆忙告一段落。到1950年下半年,有些单位又陆续补课,这是后话。

关于部队搞生产工作,在诉苦运动之同时即已开展。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发出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后,新疆军区即于1950年1月下旬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二十二兵团的任务是种地20万亩。兵团所属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负责玛纳斯垦区,二十七师负责焉耆垦区,骑八师负责莎车垦区。

新疆春早,驻焉耆的二十七师,除八〇团在拜城、八十一团在和静就地生产外,七十九团则先于驻迪化的部队开赴焉耆垦区。二十五和二十六两个师,则于3月上旬陆续开赴玛纳斯垦区。官兵思想原来比较混乱,对生产没有劲头,通过诉苦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赴生产前线。

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除携带简单行李和少量粮食外,主要筹办生产工具。那时的生产工具是非常原始的,都是十字镐、坎土曼、土犁铧等,就连这些原始工具也不易做到人手一件。有的单位把庙里的钟也搬出来铸造生产工具。

军垦部队到达各垦区后,遇到的困难是说不完的。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烟极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食宿问题。既无民房,又缺帐篷,但有芦苇遍野,战士们乃砍伐芦苇,搭盖成棚子,或挖地窝子,以芦苇

覆盖,这样聊以藏身。但芦苇棚子并不足以避风雨,下雨时,棚里也下雨,雨停了,棚里还要继续下一阵。下雪时,晚上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也被一层雪盖着。吃的问题,不要说菜,就是麦子也没有地方磨,只好将麦粒煮一煮充饥。

到垦区后不久,玛纳斯河水涨,道路翻浆,运输中断,粮食供应困难。军垦战士们只有节食度日,开始每人每天还能分4两麦子,有的单位到后来连4两也没有了。在大拐的七十四团三营断粮达40天,后来只能挖芦根充饥。

情况好一点的单位,虽然自己也在节食挨饿,仍拿出一点粮食来支持兄弟单位。有这样一个故事:七十四团二营和直属单位,有次组织一个三四十人的送粮队去支援三营。大家用裤子装上粮食往颈上一挂,摸黑去送粮,中途遇上水洼地,他们就涉水而行,直到天亮才一步一步走出洼地稍事休息。有几个战士发现一片水洼里有鱼在跳跃,一下去抓了几十条,用柳树条子穿起来。他们说,三营的同志饿苦了,今天给他们添菜。当他们把粮和鱼送到三营时,三营的战士都激动得哭起来。师直和七十三团也曾送粮到小拐,支持断粮的兄弟部队。

尽管垦区里的生活如此艰苦,军垦战士们仍然干劲冲天,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开荒造田,挖渠引水,以赶上春播。大家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赶上春播是一个重大关键问题。

大生产运动席卷天山南北,王震司令员和各级领导无不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为广大军垦战士做出表率。据不完全统计,光二十二兵团各垦区,在1950年化雪前后,共搭盖芦苇棚及挖地窝子2000多个。到6月底,共开荒造田23万多亩,开挖整修大小渠道100多条。

垦荒面积大,所需种子的数量也是惊人的。时间紧迫,运输又困难,若从远处采购,将缓不济急。迫不得已,乃命部队每人每天节约粮食2两以作种子。又到数百里外去找老乡调换种子。但这些种子都是混杂品种,为了抢住播种期,不论质量好坏,一起播下去。这自然会影响出苗和收获。

经过广大战士的辛勤劳动,1950年这一年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无论蔬菜肉食和粮食,都可以自给或部分自给。

南疆水利条件较北疆好得多,但在焉耆垦区,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下于玛纳斯垦区。首先,他们要从喀什徒步到焉耆,有1000公里左右,旅途就相当困难。到焉耆后,则和北疆垦区差不多,一切同样是要从无到有,搭苇棚,挖地窝,这就不重复多说了。

1950年11月中旬,二十五师首届生产总结劳模大会在小拐召开,我和李铨、张仲瀚等同志都在大会讲了话。我针对断粮时期战士唱的“小拐小拐真正好,人无粮食马无草”的俏皮打油诗,朗诵了我的即兴之作:“小拐小拐真正好,劳模赛过原上草。粮油瓜菜吃不了,明年更比今年妙!”我与同志们共同享受了丰收的喜悦。

(选自《陶峙岳自述》)

垦区第一个女机组

黄登来

1952年春,兵团机耕实习农场(石河子总场前身的一部分)的拖拉机增加到13个混合台,同时调进十多名年轻女战士,她们大都是从湖南、山东参军来的。为了培养这些女拖拉机手,部队整编时特别编了个妇女拖拉机组,开一台崭新的阿特兹拖拉机。女机组由6人组成,组长唐万鹏,驾驶员刘功辉,农具员有王永兰、张翠香、黄健辉、陈庆元4人。另外,还把老驾驶员夏亭和张家炎配到女机组任技术辅导。

开始女机组的工效不高,情绪也不高。经了解是她们胆子小,操作时变速慢。她们驾车每次变速时手都发抖,变速齿轮相连时发出的响声往往吓得她们把手缩回来,不敢用力,只好将油门缩得小小的才敢变速吃挡,而吃挡后又忘了放大油门便起步,一起步就熄火。开始,她们的技术虽然不高,但个个都能吃苦耐劳。唐万鹏、刘功辉可以背近50公斤的种子袋上播种机;黄健辉人称“假小子”,发动车摇摇把一气可摇50多圈。配在机车上当辅导的男同志可为了难,女同志驾车,他坐在身边,碍于男女有别,看着她们变速的情况心里发急只好去用力推一下,或是扳一下,一天下来也累得受不了。

“不能让女机组垮掉!”机耕区队的干部亲自上车指点,把着手教,每次变速见到排挡位置对正时,就用力猛打驾驶员的手,连手带排挡一起打进位置。下班时,女驾驶员的手都被打红了,也有发肿的。

办法虽然粗野一些,但是有效,提高了姑娘们的勇力和增加了挂挡的手劲,收效很大,只有3天时间便突破了变速关。不久,女机车组的工效赶了上来。

女机车组的姑娘和男同志一样,开荒耕地吃住在地头,胆子也大,男同志敢干的工作她们都敢干。在山丹湖开荒住二工的一片高包地上,那里蛇很多,不是爬到被子上就是盘在桌上,昂着头向人示威。一天雨后,在一株柳树上有上百条蛇晒太阳。为了消灭蛇,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捉蛇。开始她们见到蛇吱哇乱叫,后来竟敢扒蛇窝,用铁钳子夹蛇,一个午休时间能捉一小油桶蛇。那时耕地全在苇湖里,一次夜班没汽油了,必须回基地取油,来回20多公里,去两个人要停车,王永兰自报奋勇一人去取,在苇湖里摸了半夜终于把油取回来。事后问她怕不怕,她说只想到不让机车熄火,根本没想到怕。

后来,女机车组逐渐扩大,又培养许多女拖拉机手,如李勤、丁凤英、金茂芳、郭文波、施美菊、孙保华等。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机耕战线上的骨干,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其中金茂芳被评为劳动模范,树为兵团的十二面红旗之一。

(摘自《石河子文史资料》第5辑)

女机组竞赛挑应战书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区广大指战员肩负着加强国防、劳动生产的双重任务。军区军直“八一”机耕农场(今头屯河农场),为响应王震司令员开荒生产的号召,掀起爱国增产竞赛热潮。张迪源女拖拉机组,于1952年4月,向梁军女拖拉机队应战,并向全国国营农场女拖拉机队提出挑战条件。至今40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读了这份挑应战书,依然感到亲切,备受鼓舞。它是历史遗迹的再现,反映了当年广大指战员无私奉献,忘我的高度劳动生产热情。

张迪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名女拖拉机手,她和战友们的先进事迹,在50年代初,已闻名遐迩。1953年春,新疆军区政治部发出通报,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张迪源学习,推动了各垦区机务人员向技术进军。

现将这份挑应战书^①辑录如下:

新疆军区“八一”机耕农场

张迪源女拖拉机组向梁军女拖拉机队应战

并向全国国营农场女拖拉机队挑战

“本报讯”黑龙江省查哈阳机械农场梁军女拖拉机队向全国各国营农场的女拖拉机队发出爱国增产竞赛的挑战书后,新疆军区“八一”机耕农场女拖拉机组,在张迪源组长领导下,以极高的爱国热情,根据农场具体情况,经过民主讨论,决定除向梁军女拖拉机队应战外,并向全国各地国营农场的女拖拉机队(组、手)挑战。她们的应战、

^① 此挑应战书原载《新疆日报》1952年4月26日头版。

挑战书如下：

黑龙江省查哈阳机械农场梁军女拖拉机队暨全国各国营农场的女拖拉机队(组、手)同志们：

梁军女拖拉机队向全国各国营农场的女拖拉机队发出爱国增产竞赛的挑战条件，我们在新疆日报上看到后，全组同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在祖国边疆农业战线上，本着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提出以下条件，除向梁军女拖拉机队应战外，并向全国各国营农场的女拖拉机队、组、手同志们进行革命的友谊竞赛。

一、我们驾驶的“斯大林八十号”巨型拖拉机，担负农场犁地的重大任务，我们兢兢业业努力不懈，保证在7000亩的耕地上，按照季节和规定都犁两遍，并犁透犁平，深度20公分以上。

二、爱护机器，节省油料，我们驾驶的“斯大林八十号”巨型拖拉机保证在百亩地内按马力标准节省油料20公斤。

三、加强学习，提高技术，保证作业中少发生故障，并及时修理，不耽误工作。

我们除了保证做好上述几点，坚决完成本组每个季节的耕地任务外，并要与其他拖拉机组密切配合，发扬互助友爱，参加田间工作组中耕工作，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胜利而奋斗！

致以革命的敬礼

新疆军区“八一”机耕农场

张迪源女拖拉机组 谨上

1952年4月23日

(乌管局史志办 田鹏轩供稿)

文献纪录片台本



历史的抉择

——8集电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本^①

特邀撰稿：郭培中^②

第一集 铁流西进

红日喷薄。巍巍太行。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在这个闪烁着历史光华的地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敌 154 万人，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质的飞跃。1949 年 3 月 5 日，这里召开了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指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作战部队仅剩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他们的方式，不外三种：即用战争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争取敌军接受和平条件，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有意识地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部队，使其暂时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再将

^① 由于上镜资料匮乏，此台本缩写为 5 集拍成电视纪录片，由新疆经济电视台联合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治区档案馆摄制，1999 年 9 月 25 日由新疆经济电视台首播。8 集本定稿时，采用了 4 家单位的部分上镜采访资料。

^② 郭培中：国家一级编剧，兵团专业作家，应邀与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合作撰写此本。

这部分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会议期间,由于王震主动请缨,中央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要王震“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蒋介石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于1949年元旦发出了求和声明,企图以和谈为掩护,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赢得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主席于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4月1日国民党当局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到北平,与我党中央进行和平谈判。几经反复,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张治中派黄绍竑和屈武回到南京,建议南京政府接受。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国共和谈完全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早已严阵以待的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500多公里江防线上千帆竞发,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占领了南京。“金陵王气黯然收”,总统府上的中华民国国旗,西风残照,颓然落下……

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另一主战场西北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第一野战军捷报频传。5月上旬,发动了“陕中战役”,歼敌2.7万多人。5月22日,占领了九朝古都西安,胡宗南退守汉中。7月10日至7月14日,发动了扶(风)眉(县)战役,一野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歼灭胡宗南4个军,共4.4万多人,解放县城9座。第一野战军兵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为歼灭青海、宁夏马家军的武装力量,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基础。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残部溃逃汉中,再无还手之力。而长期盘踞在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妄图退守甘肃、青海、宁夏,负隅顽抗。彭德怀司令员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立即作出了攻克兰州、解放西宁的战略部署。

采访王恩茂(时任一野一兵团二军政治委员),谈兰州战役。

采访王恩茂：“1949年西北战场上，在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一野司令政委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扶眉战役，消灭了西北战场上主要的敌人胡宗南的主力。接着进行了兰州战役。二兵团、十九兵团攻打兰州，我们一兵团作为预备队。攻打兰州时，需要一兵团支援的时候，一兵团去支援；不需要一兵团支援的时候，一兵团就西进，去执行解放新疆的任务。”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是我军解放大西北必取之战略要地。根据彭德怀的命令，第一野战军作出部署：以第一兵团率一军、二军及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为左路军，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守敌之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兰州战役；以第二兵团之三军、四军、六军为中路军，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洮沙，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以第十九兵团之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为右路军，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会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月9日，三路大军和15万支前民工，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临夏方向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左路军由秦安、甘谷、武山地区且战且进，直逼临夏；中路军神速挺进，解放榆中、洮沙，攻占要地九条路口、窰家山、阿干镇，如神兵天降，插入兰州城郊；右路军翻越六盘山、华家岭，沿西（安）兰（州）公路挺进，所向披靡，攻占了兰州东南的徐家营、方家泉、猪嘴岭、张中店。到20日，二兵团和十九兵团会师兰州城郊，金戈铁马，与兰州守敌重兵对垒，开始了西北战场著名的兰州战役。

采访赵予征（时任六军十七师教导队支部书记），谈兰州战役。

赵予征：“这次马步芳集中其精锐5万余人，由他的儿子马继援亲自指挥，固守兰州。马继援是个少壮派，他凭借有利的地形、永久的工事进行反抗，大肆吹嘘要决战兰州城下，要消灭解放军。气焰嚣张得很呀！”

采访李凤友（时任六军十七师五〇团团团长），谈兰州战役。

李凤友：“彭总亲自指挥打兰州。是率我们二兵团、十九兵团打的。一兵团没有打兰州，他们去了青海。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指挥了两个军在兰州，他把老窝的部队全部端到兰州来守兰州。我们三个军打，还有三个军是预备队。六个军打了一个礼拜，打得惨烈得很呀！马步芳这个部队，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能打，顽固得很，跟日本鬼子差不多，有武士道精神，宁死不投降。23日拂晓开始攻击，打到28日晚上才结束战斗，把马继援的两个军，除了跳进黄河里死掉的，全部歼灭。”

经过五昼夜的攻坚战斗，终于歼灭了凶狠顽强的马步芳主力2.7万多人。1949年8月26日，我英雄的一野将士攻克了兰州。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带领残兵败将西退到永登后，窜回西宁，于8月31日乘飞机逃到香港。1949年8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兰州十万市民倾城出动，载歌载舞，热烈欢庆兰州解放，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与此同时，左路军一兵团越过洮河，解放循化，抢渡黄河，于1949年9月6日解放了西宁。马步芳军事集团彻底覆灭，青海大部分地区宣告解放。

采访张志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副教授），谈攻克兰州的意义。

张志安：“兰州解放，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切断了新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为解放新疆和宁夏打开了门户。”

兰州战役后，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乘胜北进宁夏。我军长驱直入，解放了银川。至此，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宣告完全解放。

第一兵团解放青海后，一军留驻青海，七军随贺龙司令员入川。为了切断残余敌人西逃新疆之退路，全歼胡宗南、马步芳于甘肃境内，完成解放新疆的部署，王震司令员率领郭鹏为军长、王恩茂为政治委员的第二军，以五师为前卫，六师为后卫，四师为本队，由西宁北进。1949年9月12日，五师攻占了大通、门源后，捷取险径，跋涉了

100多公里沼泽地，然后顶风雪，冒严寒，连续行军，9月14日，进入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15日，二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是时，风雪弥漫，冰雹袭击，山势险峻，高山缺氧，再加上指战员们仍着单衣，冻死冻伤200多人。

采访刘树凯(时任二军五师十五团战士)，谈过祁连山。

刘树凯：“翻越祁连山时，艰苦得很呀！走着走着，人就冻死了，不止一个！不止一个！最后那就多了，有时候一个班一个班的……冻得不行，在那一靠，就死了！有时候准备烤火，坐那儿不一会，一个班就冻死了……”

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后，又连续急行军28小时，占领民乐，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张掖，拦头堵截了敌周嘉彬一二〇军、黄祖勋九十一军和兰州溃军西逃之路，占领了河西走廊咽喉之地。

兰州解放后，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继续西进，解放新疆。罗元发军长率领六军，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西进，追歼逃敌。敌望风败退，不战自溃。六军迅速占武威，下永昌，越乌鞘岭，走山丹，17天急行军700多公里，迫使敌一九一师骑兵团起义，九十一军骑兵团和二四六师骑兵团投诚。9月21日，我二、六军胜利会师张掖，然后又挥戈西进，兵临高台、酒泉，旌旗十万，威逼河西国民党驻军。慑于我军强大威力，力主与我军在河西决战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等仓皇出逃。9月24日，在我政治争取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率部共约3万多人，通电起义。西北军事重镇酒泉解放。

至此，河西走廊雄师云集，星星峡前重兵压境，新疆孤悬塞外。将士西望天山，砺兵秣马，枕戈以待。

第二集 风雨飘摇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像一叶残破之舟，在急风骤雨的海涛中无奈地凄零飘摇。

1933年，军阀盛世才依靠权谋取代了金树仁，自任新疆督办，执掌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他凭借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打败了两个小军阀张培元和马仲英的反盛联盟，在迪化排除异己，网罗亲信，羽毛渐丰。

1935年，受盛世才邀请，一批苏联共产党员和专家来到新疆，倾其全力，帮助盛世才整顿财政、军务和公安部门。盛世才亦成立了“反帝会”，推出“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盛世才表示拥共抗日，并于当年5月接纳了西征至甘肃高台失败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400多人，妥善安排，对外称“新兵营”。中共中央对他此举表示嘉许，派陈云、滕代远、邓发等来到新疆，迎接艰苦转战浴血河西的西路军。还派了很多共产党人，协助盛世才经营新疆，使其成为抗日的大后方。

10月，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成立，党的主要领导人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先后任办事处负责人。毛泽民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厅长。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育长。著名学者、民主人士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及当时的《新疆日报》曾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胡鉴担任过蒲犁（塔什库尔干）边卡大队大队长。

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政府和学校任职，部分人还在盛世才的部队中担任军职。赵丹等一批著名的艺术家，也纷纷来到迪化，组织剧社，进行各种抗日救亡的文化艺术活动，一时抗日浪潮涌动边城。

这时的新疆，政治上是清明的，经济文化是发展的，社会是进步的。

但是，当盛世才撕下“进步”的伪装后，形势急转直下。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秋，疯狂的德军逼近莫斯科外围，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三光政策”和碉堡进逼下，也损失过半，抗日处于低潮时期。以投机取胜的盛世才立即见风使舵，向蒋介石频送秋波。他翻云覆雨，于1942年7月制造了所谓“四一二暴动案”，大肆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杨之华、方志纯、张子意，民主人士杜重远、乔国桢等100多位同志投入了监狱，并杀害了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和杜重远，向蒋介石献功取宠。一时新疆天低云暗，阴风惨惨。

盛世才的倒行逆施，引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1940年至1944年，阿山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为反抗盛世才政府收缴牧民枪支的“清枪”活动和民族、宗教的压迫政策，不断进行武装斗争，很快发展成为阿山游击队，公开袭击盛世才的各级地方政府。1944年4月13日，围困了青河县，县长陶百川弃守县城，率残部逃往奇台。以后又出现了承化（阿勒泰）游击队、哈巴河游击队、福海游击队等，宣传、组织、动员阿山地区各县牧民、群众一起展开反“清枪”斗争。1943年3月，暴戾恣睢的盛世才，又在全疆大搞“献马运动”，强令全疆各族人民捐献军马1万匹。各地都成立了捐马委员会，指定献马数目，如无力献马，则须缴纳高于市价一倍的现金。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广大牧民身上。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新疆少数民族中受过中国共产党人教育和影响的先进分子，一部分曾经在苏联接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积极分子，自觉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秘密革命团体，和盛世才政府作斗争。

维吾尔族青年先进分子阿巴索夫等，首先在伊犁组织了“伊宁解放组织”，号召各族人民反对献马，举行起义。

金色的伊犁河浩浩荡荡，流入烟波浩淼的巴尔喀什湖，她的上游有一条清澈的支流喀什河。美丽的喀什河谷是伊犁的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1944年9月，她怀中的巩哈县（尼勒克）这时却硝烟弥漫，群情激昂，因在“清枪”中拒交猎枪而被捕的哈族牧民艾克拜尔出狱后组织领导了牧民暴动，成立了乌拉斯台游击队。10月7日，经一天一夜激战，攻占了巩哈县城，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

此前，盛世才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罗织罪名逮捕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和4个师长及以下300多人，大大触怒了蒋介石，调其去重庆任农林部长，以蒙疆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吴忠信未到任之前，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暂行兼代主席职务。盛世才要留新疆任边防督办，蒋介石坚决不允，1944年9月11日，这个新疆魔王终于乘飞机离开新疆，幽灵般地去重庆就职。

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1月7日伊宁爆发起义。乘国民党军队前去镇压巩哈起义军伊宁市空虚之机，巩哈游击队迂回至伊宁，和伊宁起义者里应外合，激战至12日，占领了伊宁。国民党残部撤至城郊鬼王庙、飞机场等地，固守待援。当日起义者即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蒋介石急忙任命通晓俄语的刘泽荣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命令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飞抵迪化，主持伊犁“清剿”事宜。

1945年1月20日，起义军猛攻飞机场、鬼王庙。28日发起总攻，中午攻占鬼王庙。接着集中兵力猛攻飞机场。30日下午，李铁军电令机场守军突围。入夜，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冒着风雪严寒从机场向精河突围，31日午被起义军包围，激战至2月1日，指挥官自杀，生者全部被俘。不久，绥定、霍城、察布查尔、昭苏、博乐、温泉等地，也先后被起义者武装占领。2月19日，蒋介石就伊犁军事作战行动失败电示朱绍良，令李铁军等“革职留任，戴罪图功”。1945年4月，起义者在打退了朱绍良精心策划的5路军事进攻后，军威大振，成立了民族军。民族军总部决定乘胜前进，分北、中、南三线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北线的民族军7月占领塔城地区，9月占领阿勒泰地区，伊、塔、阿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的民族军于8月翻越白雪皑皑的天山，一度占

领了拜城、温宿，前锋直逼阿克苏，并围城攻打了5天。蒲犁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组成的游击队，也于此时占领了蒲犁，成立了革命政府。中线的民族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9月8日克精河，下乌苏，占沙湾。9月9日蒋介石急电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嶠，令其速飞迪化，具体负责军事指挥。9月10日，国民党守军退至绥来（玛纳斯），烧毁玛纳斯河大桥，挖战壕，修工事，如惊弓之鸟。民族军追至玛纳斯河西岸，距迪化仅150公里，至此，国民党军驻三区5个团全部覆灭。当时，迪化的兵力只有6个营，朱绍良焦虑万状，8小时内向蒋介石连发3份急电求救，内有“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上报党国”等语。

蒋介石急忙从甘肃、青海调3个整编师入疆，对付已成燎原之势的三区革命。

1945年冬，各地起义的代表在伊宁召开代表会议，改组临时政府，正式组成了伊、塔、阿三区革命政府。民族军也发展到了13个团，3万余人，隔玛纳斯河与国民党军对峙。

采访王行宇（石河子红山嘴电厂党史办干部，谈玛河布防。

王行宇：“这是明朝时期的烽火台（指玛纳斯河上游烽火台），现在已一千多年了。在国民党时期，从这个烽火台一直到乌伊公路边，由国民党部队整编七十八师二二七旅驻防，旅长朱鸣刚。六七九、六八〇团就在这一带布防。玛河以东是国民党的防区，以西是三区民族军，隔河相望。”

轰轰烈烈的三区革命成为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政权。也许是新疆负荷了太重的硝烟烽火，历史选择了国民党内的和平将军张治中。

1945年9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府部长张治中一行来到新疆，在迪化以中央代表身份与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等3人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反复讨论、协商，于1946年6月6日签订了《和平条款》。1946年7月1日新疆民主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以西北行

辕主任兼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分别担任了省府委员兼副主席，刘孟纯以西北行辕秘书长兼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赛福鼎任教育厅长，屈武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

军界方面，朱绍良和郭寄峤已先后调离新疆，与张治中政见相投、私交颇厚的儒将陶峙岳任新疆警备总司令。1946年6月，陶峙岳奉张治中之命，派人护送130多位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及其子女安全回到延安。1946年11月，陶峙岳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坐镇兰州，代张治中处理日常公务，宋希濂接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和张治中政见颇多相左，任职后再次激化了民族矛盾。1948年8月5日，蒋介石根据张治中的请求，调离宋希濂，任命陶峙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联合政府的成立，三区方面出任联合政府官员的莅任，使新疆的社会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但是，枪声虽然停止，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多少。不久，张治中辞去了省联合政府主席之职，由麦斯武德继任。他的继任，遭到三区方面的激烈反对。接着又先后出现了塔城地区的“额敏惨案”，中蒙边境的“北塔山事件”，吐鲁番地区的“吐、托、鄯事件”，迪化市的“二二五大游行流血事件”，阿山的“涂禹则事件”……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等三区方面的省府委员，陆续回到伊宁，省联合政府破裂，新疆社会状况日益恶化：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之中的新疆各族人民恐惧战乱，向往安定，祈求和平，渴望幸福，深切怀念在天山南北播下革命火种的共产党人。在党的影响下新疆成立的秘密革命团体战斗社、先锋社、新疆青年民主同盟等，在李泰玉、罗志、杨天云、涂治等领导下，办报纸，出版刊物，印刷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号召各族人民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迎接新疆解放，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采访李泰玉（当时战斗社负责人），谈战斗社、先锋社。

李泰玉：“解放大军渡江以后，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战斗社就恢复了刊物《战斗》。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传单送到了警备司令部，甚至摆到了陶峙岳的办公桌上……通过做工作，先锋社还争取到新疆保安副总司令张凤仪将军的支持。他原是东北军的，思想比较进步。”

采访姚志坚（当时战斗社成员），谈战斗社。

姚志坚：“我们的刊物编发了很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到处散发，对市民，对学校宣传。我们分成了很多宣传组，几百来人，到处散发刊物，撒传单，搞得声势可大了。我们晚上还把传单成捆成捆的绑上石头，扔进学校，甚至扔进警备司令部院子……”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横扫河西走廊直叩新疆东大门之际，新疆东有解放军重兵压境，西有三区民族军隔河对峙，南有连绵的昆仑山雪峰，北有高大的阿尔泰山横亘，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处于东西夹击、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三集 英明部署

中共中央曾考虑建国以后解放新疆，同西藏和海南一起进行。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指示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挺进西北，于次年春天开始经营新疆。

但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原因，解放新疆的日程提前。

采访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员），谈访问苏联。

邓力群：“1949年6月，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团长是刘少奇。会谈中间，苏联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报，说西北的解放，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他们从各方面得到一种消息，美国正在筹划一个阴谋，他们看到西北国民党的趋势越来越不行了，就准备把西北的五马，马步芳、马鸿逵回族的军阀撤退到新疆，同新疆的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共同进行活动，想在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的共和国。这对

你们解放西北，解放新疆很不利。提供了这么个情报。因为我们在会谈中给他讲了，解放军进展很快，但是西北地域辽阔，各方面困难很多，原计划1950年解放新疆，这样就给他们有半年多近一年的时间。苏联同志斯大林建议，你们最好提前解放新疆，他们现在正在活动，趁着他们这个阴谋没实现以前，你们就进了新疆，整个西北的大解放，就可以完成。”

接到苏联方面提供的情报后，中共中央立即做出英明部署，决定提前解放新疆，挫败帝国主义的阴谋。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张宗逊：“马步芳和马鸿逵分两路退却，确有退新疆的可能，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8月31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六军为右路绕马鬃岭、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三、第四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防止敌人退至新疆带来后患。

至于用什么方法解决新疆问题，毛泽东也早有构想。早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他就曾致电彭德怀：“假如西野方面暂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1949年8月6日，又一次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陶峙岳现在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毛泽东通过张治中，对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部署和发起强大的和平攻势。

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此举对国民党影响极大，

对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震动更大。1949年5月,张治中曾接到陶峙岳、包尔汉的问候电。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准备经绥远转发回电,劝导陶、包和刘孟纯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走傅作义将军之路。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了张治中,告知解放大军已克兰州和西宁,不日将兵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能致电新疆军政当局,起义最好。还说,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张治中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但张治中自5月接陶、包问候电后,音信即断,不知怎样和新疆取得联系。

采访邓力群,谈去伊宁建立电台。

邓力群:“王稼祥同志找我谈话,说原来计划代表团的任务完成以后,王稼祥同志就留在莫斯科,加上三个秘书同他在一起筹办中国驻苏联的使馆。你们三个原来也作为筹办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现在对你(邓力群)来讲,有个临时的任务要你离开莫斯科,到伊犁去跟他们建立联系。听苏联讲,伊犁三个地区的力量,他们有联系,因此也就建议中国共产党,最好派人去跟他们进行联系。这样一来,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局势:东面解放军进疆的力量很强大,西边民族革命的力量进行牵制,形成一个东西夹击国民党的形势,这会对你们解放新疆是很好的形势。经过刘少奇同志给中央打电报请示,国内派人去新疆路途遥远,比较困难,就在莫斯科的人员中间找人,从莫斯科去伊犁。因此,就找了(你)邓力群。除了我以外,还带了三个机要人员,能够收发电报的。我记得好像是(1949年)8月9日从莫斯科上火车。”

采访赛少华(赛福鼎之女),谈邓力群到伊宁。

赛少华:“我经常听父亲说起这件事,就是说当时1949年8月份的时候,邓力群同志是从苏联这边入境到了新疆(伊宁)。当时我父亲(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他们非常高兴,就是见到邓力群的时候呢,非常高兴,很快就与邓力群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父亲经常谈到邓力群,当时三区革命所有的领导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高兴,感到跟中央取得联系,同时中央又支持三区革命,大家感到非常欣慰。”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到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张治中欣然从命。随即于9月10日向陶、包发了电报：

“今时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电文，使皆了解接受。”

9月11日，张治中又给陶峙岳专发了电文，对新疆复杂的局势和人物动向作了审慎详尽的分析、询问和告示，并鼓励陶峙岳：“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地顺利地完成也。”

在张治中致电陶、包的同日，毛泽东亦电示彭德怀：“新疆问题，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又明确指示，应“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

9月15日，邓力群携带张治中的两份电报，由伊宁飞抵迪化，与陶、包会面，并面交电文。

采访陈方伯^①（原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教育厅副厅长），谈张治中电报。

陈方伯：“新疆等于张治中将军的根据地，他打来了电报……刘孟纯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

^① 此次采访后不久，陈方伯逝世。

长,他把张治中的电报给拥护新疆和平起义的人看,偷着给大家看了一下。我当时是拥护起义的,也看了,心里很高兴。”

陶、包阅电,大为欣慰,极受鼓舞,立即回电张治中,表示等新疆主战派将领离新后,即率部通电起义。陶还单独拟电,逐项回答了张治中9月11日电询问事宜。两份电文,均由邓力群发出。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中华英才云集北平,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中,仍心系新疆的和平解放,写信给已是政协代表的张治中,委托他继续给河西和新疆的老部下做工作,尽快和平起义。

接到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转来陶、包9月17日回电后,张治中立即秉烛夜笔,于22日致电陶、包,认为二人态度正确,措施得当,毛主席阅电后亦表示嘉许。并谆谆嘱咐陶、包,尽快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特嘱陶峙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最好。陶峙岳接电后,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员曾震五作为和平使者,于9月23日飞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解放大计。曾震五9月18日回电陶峙岳,报告了会见内容。彭德怀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一条是要主战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速离部队。特别是叶,必要时可由解放军安全护送到香港。

9月19日,包尔汉致电毛泽东,表示“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毛泽东虽在新政协会议之中,立即复电: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的鼎力促成。尚望联系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包尔汉是继张治中、麦斯武德之后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任期内执行和平政策,深孚众望。

采访木拉提·夏依地(包尔汉之子),谈包尔汉。

木拉提·夏依地:“当时解放军已到兰州了。我爸爸说,新疆有百万人生命,他要负主要责任,他是一个省的主要领导,他想保住人

民的生命财产。另外，我爸爸在德国上学的时候，和朱德差一年级，那时爸爸和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一些联系。同时爸爸在苏联当过领事，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他向往着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富裕，因此他想用和平解放的方式，解决新疆的问题。”

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佑任的女婿屈武，是地下共产党员，在新疆省联合政府中，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国共谈判破裂后，这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受周恩来委托，带着张治中的口信，于6月初回到了迪化，沟通了张治中旧部，策动宣传和起义。

采访陶天白（曾任张治中秘书，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二组副组长），谈屈武返迪化。

陶天白：“屈武回来，多次在刘孟纯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策划新疆和平起义。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深：有一次，屈武说黄绍竑问毛泽东，蒋介石一律打清一色麻将，请问毛先生打什么？毛泽东说，我是见牌就和。意思是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胜利的机会，争取尽快胜利。”

屈武先后在新疆学院、汉族文化促进会演讲，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宣扬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暗喻走和平道路解决新疆问题，还多次隐约地抨击了蒋介石政权。这种宣传，无异于给新疆社会投入了清醒剂。中统特务们惊慌和恼怒之际，竟然给屈武邮寄两枚子弹。威胁和恫吓并没有压倒屈武。

采访周季南（陶晋初夫人），谈陶晋初。

周季南：“晋初认识国民党左派元老李济深，受到他的一定影响。但他最崇拜的人是周恩来。在重庆，他曾三次见到周恩来，回来对我说，想不到领导千军万马的周恩来，是那样温文尔雅，真是天人！天人！”

陶晋初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峙岳的堂弟。抗战时，曾任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后因不满蒋氏政权而辞职。赋闲重庆时，结识了乔冠华。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他两次通过乔冠华上书毛泽

东,无限敬仰地说:“自问爱护先生不亚于一切共产党员。”《双十协定》签订后,他曾由乔冠华引见,三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并指示乔冠华,做好陶晋初的工作。1948年7月来疆受职前,陶晋初曾专赴香港会见了反蒋的李济深和在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乔冠华,建立了秘密通讯联系。陶晋初来新疆任职后,乔冠华受周恩来的指示写信给陶晋初,要他“相机行事”,策动新疆和平起义。陶峙岳对何去何从深藏不露,使性情耿直的陶晋初大为不满,乃上堂兄《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凛然直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实在不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袍泽大义陈词,亲情据理规劝,此信对陶峙岳影响很大。

采访王恩茂(时任一兵团二军政委),谈彭德怀在兰州对新疆展开和平攻势。

王恩茂:“彭总在兰州也对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展开了和平攻势,多方疏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新疆和平解放。”

兰州解放后的第4天,即9月29日,彭德怀便邀请在金城的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开会、座谈。他们是蒙古王儿子侯瑞昌、儿媳师瑞兰,和三区方面有联系的大商人艾买提·瓦吉地,兰州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乌斯玛依,还有一些在兰州休假的陶部校级军官。彭德怀请他们介绍新疆情况,了解我党政策,传播新疆只能和平解放的道理。以后,即组织成立了新疆研究会,此会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兰州和西宁解放后,马步芳部队中的一些军官惊恐不安,深怕我党追究当年屠杀红西路军的罪行。但我党不记前嫌,遂化解了他们的顾虑。不仅如此,彭德怀还亲自组织驻新疆的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之叔马矿武、表弟马振武和绽福寿等,率领马呈祥部部分家属,组成“劝降团”,赴新疆现身宣传,动员马呈祥率部和平起义。

为了阻止新疆和平起义,蒋介石妄图把陶峙岳夫人从长沙劫往台湾作人质。当时陶如果北迁夫人,有暴露和平起义之嫌,陶峙岳即把夫人迁往重庆郊区,使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不疑。彭德怀得知这一情

况后,即电令入川人员,四处寻找陶夫人,加以保护。

采访陶理群(陶峙岳孙,原新疆石油学院教务处主任),谈解放军营救。

陶理群:“我那时候很小,在重庆,还记得那个场面。很乱,当时为了躲避,我们就躲到乡下去了。以后就听说是专门有人找我们,有部队找我们。后来,解放军找到我们了,又护送我们从重庆平安地回到长沙。那时一路都是坐船。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是咱们彭德怀元帅专门打电报派解放四川的解放军部队去找我们。”

此事尽解陶峙岳后顾之忧。国共对比,感触万千,坚定了陶峙岳之义举。

采访邓力群,谈新疆工作概况。

邓力群:“我是1949年8月14日到达伊宁的,带了三名工作人员和电台。向三区革命领导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意图和对他们的问候,和他们进行了会谈。秘密地飞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和包尔汉,面交了张治中敦促他们和平起义的电文。还和战斗社、先锋社负责人见了面……和三区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毛泽东在给阿合买提江的信中说:‘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使他们极为欣慰和鼓舞……这几次会谈,阿合买提江表示了一个态度:凡是我们知道的所有三区情况全部无保留地向中央汇报。报告一切我们今后的活动,今后的工作,包括到北京一切向中央请示,一切服从中央。阿巴索夫表现特别的高兴,就讲一直向往跟中央联系,一直想见到毛主席,这次去北京开会,可以亲自见到毛主席了,可以亲自给毛主席报告我们的工作,请示我们要请示的事情。”

邓力群到达伊宁后,即代表党中央,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迪化的20天紧张复杂的联络活动中,他详细、全面地向中央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情况,有关军事行动,转达了党中央和新疆军政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文,对于推动陶、包和平起义起了一定作用。

采访杨天云(先锋社负责人),谈邓力群在迪化。

杨天云:“邓力群9月14日到了乌鲁木齐。他接见战斗社负责人是在包尔汉的院子。接见我们是在苏联领事馆……”

邓力群的到来,鼓舞了迪化各地下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热忱要求给予指导。邓力群诚恳地帮助、引导,形成了迪化革命小高潮。他们把《战斗报》和传单送到了陶峙岳手中,还发展新疆保安副司令张凤仪加入了“先锋社”,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第四集 东调风云

面对强大的和平攻势,新疆军政界由来已久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由暗至明,日益激烈起来。

1949年元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一面准备和谈,一面准备再战。1949年2月,电令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边境防务外,其余全部东调进关。并召陶峙岳赴南京,共商大计。

这个电令,使陶峙岳陷入了两难之中。

到新疆担任总司令前夕,张治中在兰州双城门外兴隆山私邸与陶峙岳长谈,再一次谈到了国内实现和平的设想,向陶峙岳出示了他向蒋介石多次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与蒋介石谈话的记录。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入疆后,能够保持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和平与安定。陶峙岳这次如果服从李宗仁的命令,调兵入关,那么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广受各大国关注的中亚战略要地将成为军事中空地区,势必难以保持和平安定。如果不同意军队入关,则有抗命之嫌。

这时的驻疆部队有赵锡光为中将师长的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部驻喀什疏勒城。赵锡光还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下辖整编一二八旅,旅部驻焉耆,少将旅长钟祖荫;整编六十五旅,旅部驻阿克苏,少将旅长李祖唐;整编骑兵第四旅,旅部驻莎车,少将旅长唐井然;整编骑兵第九旅,旅部驻喀什疏附,少将旅长马平林。另有整编

七十八师，中将师长叶成，师部驻景化（呼图壁）。下辖整编二二七旅，旅部驻绥来，少将旅长朱鸣刚；整编一七八旅，旅部驻哈密，少将旅长莫我若；整编一七九旅，旅部驻迪化，少将旅长罗恕人，兼迪化城防司令。马呈祥为整编骑兵第一师中将师长，师部驻迪化老满城。下辖整编骑兵第六旅，旅部驻昌吉，少将旅长韩荣福；整编骑兵第七旅，旅部驻奇台，少将旅长韩有文。此外尚有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中将局长郝家骏，还有空军地勤人员。包括军人家属在内，驻疆部队共 10 万人。

在部队将领中，赵锡光和陶峙岳政见相投，感情较深；叶成、罗恕人系蒋介石嫡系，听命于胡宗南。尤其叶成，黄埔三期，浙江青田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警卫团大队长，其妻吴姗被宋美龄收为干女儿，又和蒋介石、陈诚、胡宗南是同乡，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马呈祥系马步芳的外甥，只接受马步芳的指挥，班长的任命都听命于青海。在驻疆部队中，能够直接听命陶峙岳的，只有几个团。因此新疆军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陶峙岳掌印不掌权，叶、马、罗掌权不掌印。”

采访堵立山（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谈陶峙岳军事实力。

堵立山：“陶峙岳所有的部队很少。他不过是名义总司令，他没有实力的，部队下面团长以上都是要听胡宗南直接指挥的。就是马家部队骑五军是能打的，有战斗力的，那是要听马家指挥的。所以他是一个光杆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陶峙岳先投石问路。

一日，他以整编部队为名，召开旅长以上官佐会议，出示李宗仁电报，让大家讨论，借机试探将领们的意向，然后相机行事。会议气氛严峻，意见分歧。赵锡光认为驻疆部队是戍边的武装力量，边防部队历来求稳，绝不能抽调一空，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坚决反对部队东调。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则认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力主迅速入关参战。会议开了两天，大家各执一词，难以议决。最后

把决定权交给了陶峙岳，由他根据形势发展，作出安排。

陶峙岳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儒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等。在担任第一军军长时，曾被胡宗南几度夺了兵权，但却深受张治中器重。他深谋远虑，有真知灼见，处事沉稳、周到、细密。陶峙岳是反对入关打内战的，用拖延应付李宗仁的战术。他命令陶晋初积极进行准备，做出东调态势：人马核实、清仓查库、储粮屯草、勘察补给线路、举办对空联络和军官训练班。在调动部队军训中，他安排亲信军官掌权：毛熙舆团驻新疆东大门安西一带；王传铎团驻巴里坤；李宗正骑兵团驻水磨沟。另派一七八旅副旅长刘抡元率两个营驻玉门油矿；派二三一旅旅长田子梅到甘肃陇东师管区接补新兵。造成备战空气和东移之势，让胡宗南、马步芳放心，让叶、马、罗定心，也乘机摸清军队实力，控制部分机动作战部队。

与此同时，陶峙岳又亲自执笔，拟定了一个庞大的部队开拔计划，借口交通不便，编造巨额经费预算，向李宗仁要钱、要车、要油，仅开拔费就要了800万银元。计划尚未发出，南京政府已经垮台。广州政府成立，李宗仁来电要陶峙岳去广州商谈，陶峙岳即把此计划托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带去广州，后无任何答复。第一次新疆军队东调入关就这样被陶峙岳挫败了。

宋希濂也加入了东调合唱：来电陶峙岳，要求将军官训练班及枪械弹药，全部调走，运到宜昌。陶峙岳当然拒绝。宋希濂来电讥讽：“新疆也有傅作义其人乎！”

为了稳住力主东调的叶、马、罗，陶峙岳用相当长的时间以柔克刚，向叶、马、罗多次进行恳谈，有时通宵达旦。谈话中，陶引而不发，导而不逼，对其要求虚与委蛇。他们虽然着急，但也无可奈何，千里戈壁，无钱、无车、无油，怎么走？

然而他们还是发难了。

1949年7月，我三路解放军进逼兰州，胡宗南、马步芳又多次来

电，命令大部分驻疆部队“东调援兰”。马呈祥急欲向马步芳靠拢，保住兰州、青海老巢；叶成、罗恕人也想和胡宗南会合，孤注一掷。叶成下了紧急行动的手令，整装待命准备作战，并把家属运至哈密；马呈祥部后勤部队业已出发，前锋进至奇台。人心浮动，局面混乱。这时马呈祥异常暴躁，约郝家骏面见陶峙岳，威胁逼迫陶峙岳下令供应局，给东调部队调拨车辆，补充给养、装备，拨发经费。这时，西北军政长官是马步芳，是陶的上级，陶在表面上无法拒绝，迫不得已，给郝家骏下了手令：调集军车 400 辆，到骑一师报到。陶峙岳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冷冷地说：“总部一分钱没有，开拔费你们自己去要。”

采访刘锡宠（时任新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少将处长），谈东调。

刘锡宠：“马步芳也来了很多次电报。我们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逼着陶峙岳写手令，陶峙岳不得不写，结果闹到郝家骏那儿，梁客浔也马上去了……”

陶晋初召集军官训练班教育长文升乔、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梁客浔、军法处长刘锡宠研究对策，决定由梁客浔找郝家骏局长谈，请他用拖延办法，挽回这个危机。梁找到郝说：“陶总下手令，并非出于本意，是迫不得已。请采取拖延办法，借口车辆分散，一时集中不起来，中央军费未拨到，粮食必须从南疆调运，一时不能办到来拖延。”梁并对郝说明其中的利害，郝欣然同意了。如果“八二六”不能解放兰州，拖延时间过长，郝家骏要负“贻误军机不服命令”的杀头大罪，这一着棋是很危险的。

兰州解放，二、六军兵陈酒泉，马呈祥关内家属下落不明，叶、马、罗更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又一次发难于陶峙岳：要陶东调部队，解酒泉之围。

9月中旬某日下午，郝家骏带领供应局运输组长吴赞荣，到陶公馆开军事会议，研究部队东调解酒泉之围事宜。3时，会议开始，陶峙岳要吴赞荣报告车辆准备情况。吴说：“供应局所辖辎汽部队，有两个团外加一个营，在编汽车 1 050 辆，而今天能动的不到三分之一。”马

呈祥插问：“为什么？”吴：“车况太糟。200多辆羊毛车，是盛世才用羊毛从老毛子那里换来的破烂，老化不堪。800辆大道奇，是二战中用于北非撒哈拉大沙漠的军车，战后美国人卖给我们时，近乎破烂。这部分车用到现在，大都成了老病号，加上零件奇缺，无法修复，几乎是坏一辆，报废一辆。”

马呈祥阴沉着脸不吭气了。叶成说：“你刚才说有三分之一的车能用，三分之一就300多辆，这些车能运一个整编旅的兵力。”

吴赞荣回答：“这300多辆车分散于各地。迪化的车子最多，也不过百辆。如果运部队入关，一次只能送走一个步兵团，要想全师全旅一次开拔，根本办不到。”

罗恕人早已怒形于色，突然吼道：“住口！听你所言，尽是困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后勤运输瘫痪到这种地步，你就没有责任吗？我再问你，命令你征雇的400辆商车呢？”

吴赞荣不卑不亢地说：“陆续征雇了150多辆，随征随交，都交军运指挥部。雇这些商车都订有合同，讲明只在新疆境内运输，后来听说运兵进关打仗，车主们就捣蛋，有的偷偷卸下难买的部件，诡称无法修理；有的丢下破车带上预支租金溜了……”

还没说完，罗恕人猛地站起，跺脚咆哮：“够了，够了，不要再讲了！今天开的是高级军事会议，姓吴的，你是给我们打气还是泄气？”说着，突然掏出手枪对着吴赞荣的胸膛，厉声逼问：“你到底是何居心？说，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罗恕人是向陶峙岳总司令发火。

陶晋初参谋长见状，起身劝阻：“有话慢慢讲，自家兄弟，何必这样。”罗恕人这才收了手枪，气呼呼地一屁股坐下。一直未动声色的陶峙岳，这时才说话：“吴组长，你请回，我们还要继续开会。”

由于东调风云，在新疆军政界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和、战两派。

军界的主和派有陶峙岳、赵锡光、陶晋初、郝家骏、梁客浔、张凤仪等；主战派有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田子梅、李祖唐，军统新疆保

密站站长饶铁珊、迪化警察局长刘汉东，省政府民政厅长王曾善为他们摇旗呐喊。

政界主和派有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省府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日报社社长谈维煦等；主战派有阿山专员乌斯满、哈密专员尧乐博斯、省府财政厅长贾尼木汗，还有联合政府前主席麦斯武德等，他们煽动宗教民族情绪，鼓吹大土耳其主义，策动分裂，极力反对和平起义。

主和派虽众，军事实权却掌握在主战派手中。罗恕人是主战派的军师，是军统特务。叶、马、罗三人常集会于迪化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互通军事情报，交流时局，讨论入关军事部署，致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已从新大楼迁到老满城之说。

和战两派，壁垒分明，边城迪化，剑拔弩张。

第五集 和战之战

在我党我军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新疆主和派深受鼓舞，信心大增。

但是，主和派无实际军权，作为主和派首领的陶峙岳，虽然赴任前在兰州兴隆山和张治中彻夜长谈后，已胸有成竹，但由于局势的复杂，为稳住部队，却长时间藏而不露，高深莫测。

采访刘锡宠，谈陶峙岳。

刘锡宠：“陶这个人深沉、谨慎、周到，不动声色，外表一点不露，很难看出他的意思来。当时起义时太不可捉摸了！现在我评论他，正是因为他的深沉，在那个艰苦复杂的环境下，才能成功。因为当时起义是很复杂的：①陶峙岳与陶晋初、赵锡光没有问题，但是，陶峙岳很难调动部队，因为部队都是胡宗南和马家军遥控的，他们的两个骑兵师是很厉害的。陶与赵都说自己是光杆司令。②新疆的特务系统特别复杂，有军统的，有中统的，有军参的，还有CC派……③这些反对起义的，再加上马家部队，兵力很强。当时没有料到迪化的城防司令

罗恕人是军统的特务头子。④地方也很复杂。西有民族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陶峙岳的讳深莫测，不到时机成熟时绝不表态的态度，使主和派内产生了误会。1948年10月，陶晋初就写信给乔冠华，要求离职去延安。1949年1月，乔冠华自香港复信陶晋初，暗示要“暂时静观”。1949年5月，陶晋初又写了《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致堂兄。陶峙岳堂弟性格直爽，怕泄密之后祸起萧墙，仍不表态。一气之下，陶晋初提出了辞职。为了和平事业，陶峙岳备了酒席，约了文升乔、总部秘书处处长李武信、堵立山和刘锡宠作陪，挽留堂弟。

采访周季南（陶晋初夫人），谈陶峙岳挽留陶晋初。

周季南：“宴会上，陶峙岳风趣地说：你要走可以，把新婚夫人留下……”

采访刘锡宠，谈陶峙岳挽留陶晋初。

刘锡宠：“陶晋初性格直爽，他写了一封信，说要走，陶峙岳就请吃饭，还有几个处长……陶晋初不讲话了，也就留下了。”

包尔汉也揣测不透。他在5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所谓国军中的将领们，几乎都是拥护国民党反动派的。从军事观点上看，这个军队是服从极端专制分子胡宗南，听从他的指挥。”

百万雄师下江南后，张治中又从北平带来口信，希望新疆能“和平交代”，并托人带来了解放军三大民主的材料，让新疆部队学习。于是，陶峙岳召开了一次引导新疆“和平交代”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和、战两派展开了第一次大辩论，陶峙岳第一次非常深沉地表示了态。

采访堵立山，谈高级军事会议。

堵立山：“1949年5月下旬，总部在迪化东花园小会议室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旅长以上军官和总部八大处长20多人参加。政工处长梁客浔奉命讲解解放军的三大民主。讨论时引发出了新疆部队为何而战的问题。主战派声色俱厉地抛出“为党国而战”“为委员长而

战”的口号。主和派同声反驳，认为这个提法太空洞，不切实际，没有用处，发的枪士兵火里烧掉，扔到河里，士兵厌战，提这样口号，军心更乱，部队更不稳。双方你来我往，争论激烈。陶峙岳冷静观察，一言不发，最后挥笔写了四个颜体大字——‘保国安边’。就是要保卫中华领土完整，安定边疆，绝不在新疆打仗的意思。陶峙岳的表明心迹，使主和派心中明亮，团结一致，努力为新疆和平起义而工作。”

主和派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首先展开了联络和宣传攻势。在军政两界，分成了梁客浔和包尔汉、刘孟纯为首的两个小团体，各自联络各族各界人士，交换动态，沟通思想，争取更多上层人士倾向和平起义，扩大主和阵营。在这中间，包尔汉为和平起义做了很多工作。

采访陈方伯，谈包尔汉。

陈方伯：“包主席主要是这样，这个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他在新疆可以说对于各民族都是同等相待的，他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所以他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儿子就是努斯热提·夏依地，他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包慕骞。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起呢？包老说我羡慕张骞。那就是说包老是拥护祖国统一，热爱祖国的这么一位，可以说是先行者。”

采访木拉提·包尔汉（包尔汉之子），谈包尔汉。

木拉提·包尔汉：“这个是听爸爸后来给我讲的。当时我爸爸在苏联斋桑当过领事，也受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有了一些联系、认识，因此他向往国家兴旺，向往民族繁荣，因此他有这个（想法）。当时就想必须要用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新疆也要繁荣，因此他想用和平解放的办法来解决新疆的问题。”

7月上旬，包尔汉邀请刘孟纯、屈武、刘泽荣和苏联总领事萨维里耶夫，去僻静的南山秘密小住，就新疆形势和和平起义事宜，交换了意见。两日后，陶峙岳、刘孟纯又邀请包尔汉和萨维里耶夫去郊外湖边游玩，再次商谈。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和谈之前,召刘孟纯至南京面谈新疆和平事宜,刘返回迪化,立即在新大楼召开座谈会,宣传和谈,多次暗喻新疆问题应走和平解放之路。为了使长期受国民党宣传教育的新疆部队和各族人民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刘孟纯指示在《新疆日报》上开辟专版,介绍苏联人民的建设和生活,宣传和平主张。不久,在部队中就有了反响,引起主战派反感。在警备总部一次会议上,叶成厉声斥责:“《新疆日报》已经在作赤化宣传,不可不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罗恕人、马呈祥接着帮腔,会议弥漫了火药味。

主战派也不遗余力地宣传。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以后,派政工主任上官业佑来到新疆,被马呈祥、罗恕人奉为上宾,请到骑一师各部大肆宣传“拼命才能保命,破产才能保产”,要官兵为马步芳当炮灰。

针对主战派的宣传,梁客浔在军政界上层和部队中广为宣传两个观点:一是驻疆部队守土有责,保卫祖国统一是军人应该遵奉的最高原则;二是“认庙不认神”的观点。

采访梁开萍(梁客浔的女儿),谈“认庙不认神”。

梁开萍:“我爸爸说他也是苦思冥想,才想了一个‘认庙不认神’的理论。要认国家这个庙,就是不管谁来掌国家的政权,我们认国家这个庙,作为一个部队当时只能这样想。这样,就在部队的政工系统重点布置下去了,往下各部队来布置这个政工任务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认庙不认神’的理论为基础,当时做起义前的酝酿工作。”

这种宣传,在军政界上层很快引起共鸣。8月上旬,梁客浔奉命视察部队进行宣传时,遭遇主战派的坚决反击。

采访陈希明(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中校督察,梁客浔秘书),谈梁客浔视察部队作宣传。

陈希明:“我随梁客浔先到老满城马呈祥师部,召集军官讲了话,讲得非常好。吃饭时,马部政工处长马次伯即反击我们说:全师官兵士气旺盛,上下拥护马长官‘拼命才能保命’的号令,解放军吃胡宗南

一个团容易，碰马家军一个连可扎手，对马家队伍劝降，是难以办到的。后来我们到了罗恕人的旅，叶、马、罗正在开会，他们没有接见我们。我们准备开座谈会，罗恕人铁青着脸，也不同意，他说：我正在看一本《我选择了自由》的书。梁客浔嘱咐罗恕人部政工主任马锡瑜，如出现异常情况，一定要顾全大局，听从总部命令。罗知道后，异常恼怒，打电话给陶峙岳，告梁客浔分化他的部队。”

迪化中央军校九分校。在军校庆典中，发生了和、战两派第一次严重的正面冲突。

这个会由陶晋初授意，让黄埔一期生、七十八师中将副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主持，刘孟纯讲话，规模要大，扩大主和派影响。梁客浔忙于公务，让陈希明筹备。庆典之日，迪化连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叶、马、罗正襟危坐于前排。

采访陈希明，谈九分校校庆。

陈希明：“陈德法上台先讲了几句话。他说现在开校庆会，庆祝黄埔军校成立多少周年，要发扬黄埔精神，怀念国父孙中山。然后刘秘书长讲话。刘孟纯上台说，现在大家都关心新疆怎么办？当前的形势如何？他讲新疆不能打，怎么打法？打不得，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讲得很严重。因此，我们必须走稳妥可靠的道路。他没有讲什么道路。走稳妥可靠道路才是发扬黄埔精神，才是革命精神，联共联苏扶助工农的精神。讲这个问题他很激动，我坐在第一排看他情绪非常激动。讲完以后陈德法宣布现在自由发言。第一个跳上去的就是五三六团团长熊毅。他一点不客气，他说刚才身为国民党秘书长的那个某某某给共产党讲话，给共产党宣传，他是干啥？黄埔精神就是头可断血可流主义不可丢，对共产党只有拼得你死我活绝没有我们跪下求和的事情，请你别作梦，你也别给共产党说话。这个军校校庆上，主战派打了信号，要打仗到底；主和派也打了信号，就是没有别的出路，什么出路你们自己想，就是不能打只能和。这两个阵营壁垒分明，已经冒出了地面。”

8月上旬,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主和派互通情报,心情振奋。总部的墙报却出现一篇不署名的评论和一幅漫画,杀气腾腾地警告:“如果新疆有人效法程潜,必将受到身首异处的惩罚。”

随着起义与反起义斗争的公开化,陶峙岳亦加快了和平起义的部署。他视赵锡光为可靠的同盟军,决定把南疆和平起义的重任全权托付于他,邀请赵锡光于8月19日至焉耆密谈。

赵锡光,云南保山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北伐时期以刚毅善战著称,抗战时期被胡宗南收编委任为师长,隶属陶峙岳的第一军,与陶峙岳交情很深。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多受排挤,1946年调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部队驻守南疆地区。他一贯支持陶峙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

丝绸之路上著名的铁门关。雄关重隘,鬼斧神工,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感叹万千,写下了名句:“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岸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焉耆国,坐落在铁门关东的绿洲上。新疆建省,焉耆成为县,钟祖荫的一二八旅旅部就设在此。《西游记》中描写的流沙河,就是这条开都河,从城边静静地流过,注入烟波浩淼的博斯腾湖。

8月15日,陶峙岳以检查战备为名,偕郝家骏、梁客浔到了焉耆,并带有发给赵部的军饷银元10万,共50箱。赵锡光是两天前由喀什驱车直赴焉耆的。

采访堵立山,谈赵锡光。

堵立山:“赵锡光(师)也是能打的一个师,四十二师。他读书的时候在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他是要学诸葛亮,要学戚继光,要学林则徐,爱国观念非常强。所以起义的时候,两个人一个在南疆负责,这个也是关键。”

采访黄文杰(时任整编四十二师特务营少校营长),谈焉耆会议。

黄文杰:“白天开会,晚上就没有事了,只有他们两个的事情了。”

我呢，具体就是警卫。他们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小院子，里边有三两间平房，陶峙岳将军就住在里面。晚上我就是奉命在门外，任何人不能接见。他两个在里边谈话，谁也不能接见，就是一二八旅的旅长有什么事情都不能见。最后马呈祥从北疆跑到南疆来，当面就骂，骂钟祖荫肉头，‘妈的，人家到你的旅部心脏里开会，你还不知道干啥的！’”

在焉耆会谈中，陶峙岳、赵锡光正式决定和平起义并商定具体的方案。他们秘约三条：一、等待解放军接近新疆时，派人接洽，迎接大军进疆；二、交出部队，解甲归田；三、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势，等待时机，率部起义。

赵锡光回到喀什以后，立即在城西的四十里栏杆，开办了军官轮训班，轮训全体将士。他亲任班主任，向将士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为和平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采访黄文杰，谈军官轮训班。

黄文杰：“赵锡光采取的是一天一个座谈会。也就是一个特务营，一个座谈会，一个工兵营一个座谈会，通信营一个座谈会，边卡部队一个座谈会。赵锡光亲自主持，不需要任何人参加，就连我这个管他们的队长，都不能参加。就是一个记录的，一个固定记录的，赵锡光亲自问，由赵锡光出题目，直接座谈。赵锡光在一个多月两个月以内，没有离开过四十里栏杆。”

陶峙岳从焉耆回到迪化后，即正面和主战派交锋。8月下旬，直接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他告诉他们，不赞成起义，就是不要和平，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新疆部队虽号称10万，但兰州、西宁相继失手，外援断绝，退路不通，垂死挣扎，死路一条。叶、马、罗也感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陷于混乱的矛盾之中。

采访堵立山，谈叶、马、罗。

堵立山：“到兰州解放，这三个人在思想上变化了，也再不提积极要进关了。而他进关的目的呢？我现在想起来，当初我也大部分看出

来，他的进关也并不是真正去打。他部队里甘肃人多，部队一进关都回家了，他没有部队了，他也走了。他用进关的插曲，忠于蒋介石忠于胡宗南这个名义，实际上也是逃，实际上也是跑。”

政界主和派也在积极工作。9月9日，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邀集各族各界有声望的人士30多人，举行座谈。包尔汉指出，本省的和平政策，上有军政机关互相谅解，精诚合作；下有广大群众的一致要求与拥护，本省和平前途的乐观在这里，本人的坚定信心与把握也在这里。

9月15日，邓力群携带张治中的两份电报，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会见，并面交电文。

采访邓力群，谈到迪化面见主和派。

邓力群：“一下飞机出乎我的意料，包尔汉来了，国民党的省主席。屈武来了，是迪化市的市长。刘孟纯来了，是省政府的秘书长。还有一个刘泽荣也来了，是外事处的处长，是国民党省政府的。都是国民党政府里头的显要人物啊。军队里头那时候没有，这点出乎我的意料。但这一点证明迪化的形势，已经明朗了，党政要人都能够接待共产党员。他们觉得在当时的形势底下，没有必要来隐瞒他们的政治态度了，这点，就是形势的反映，形势的表现。然后就分头坐汽车啊，包尔汉就把我拉到他的小卧车上面，留我在车上讲呢，把我叫作同志，邓力群同志。我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啊。哎，他叫我同志，非常亲切，这个也出乎我的意料。接着讲呢，‘你来了很好，我们早就知道你到了伊犁，就希望你来，等到今天来了。来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我的家里’。住在他的家里。”

采访木拉提·包尔汉，谈邓力群。

木拉提·包尔汉：“邓力群同志来的时候我小，我坐着车一块去的。那时候好像穿的不是军衣，穿着普通的衣服来的，而且是黑衣服我记得。就直接拉到我们家。邓力群同志来了以后，晚上就接待一些人，国民党的一些军官也有，将领也有。”

采访邓力群，谈面见陶峙岳。

邓力群：“可能是第三天，陶峙岳亲自到包尔汉家里与我见面，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条款，和平起义。同时说关于解决新疆问题，他们有个政治的意见，记不得是当天交给我，还是第二天交给我。这点上呢，我就有点警惕了，我说你们这些意见交给我，是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条件还是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你们的一些意见？这点上陶峙岳很明确，不是先提条件。我们参加和平起义是没有条件的，是按照和平条款办事的，但是在新疆工作了多年，对新疆问题提点意见，中央认为可以接受就接受，认为不能接受，就可以不接受。不接受我们也和平起义，不受这个条件接受不接受的影响。哪些接受哪些不接受都由中央裁决。”

张治中的电报和邓力群的到来，对陶峙岳、包尔汉等主和派来说如同大海里孤舟看到了灯塔，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此新疆数万国民党官兵的起义壮举和各族人民追求和平的斗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陶峙岳、包尔汉接到电报，即于9月17日，回电张治中，表示等军界主战将领离开新疆后，立即率部通电起义。陶峙岳、包尔汉在回电中说：

“……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飞离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兰州解放，胡、马土崩瓦解，主战派仍不甘心，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仍多次妄图作困兽之斗。

9月8日，叶成决定向胡宗南发电请示，但胡节节败退，竟联络不上。又改向宋希濂发电，要求宋向胡宗南请示，仍未联络上。9月14日，叶成由迪化返回景化，召集师属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准备作

战。又赶赴绥来，面示担负玛纳斯河防务的二二七旅旅长朱鸣刚、参谋长师景岳，做好战斗准备，并下了全师东移手令。9月19日，罗恕人收到胡宗南致叶成急电，责令叶成将新疆部队移至南疆待命，并表示，如果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成接电后，连夜与马呈祥、罗恕人及刘汉东等密议于骑一师师部，决定于9月20日子夜全军开拔；行动前先将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南疆，于铁门关一线设防阻击。

9月20日深夜，陶峙岳已经就寝，叶成急来叩门，陶峙岳知有要事，披衣而起。叶成开门见山地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清肖小，决定今晚把刘孟纯、屈武、陶晋初拘捕起来。抓人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先告诉你知道，所以来相告，约好在一个小时后回报。”陶峙岳心中暗惊，但仍镇静自持，问叶成第二步怎么走。叶成无言以对。陶峙岳估计他们是事急而盲动，仍可以以利害而说之，当即电话约马、罗来谈。马、罗随即驱车而来。罗恕人存有戒心，坐在电话机旁。罗恕人逮捕刘、屈、陶的部队，全副武装，在五三六团团熊毅指挥下，已在营房听候罗恕人的命令。陶峙岳一言直入地问：“你们要捕人，第三步怎么办？新疆情势特殊，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发动动乱？这样于你们有什么便宜？”叶、马、罗相顾默然，罗恕人还流了泪。良久，罗恕人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却无动于衷，讲道理，又屡次为你所屈……”陶峙岳看出他们的矛盾与苦恼，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政治因素已不主要，就因势利导地说：“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因应恰当，何以遇到问题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而立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清楚的，部队开拔要钱、要车、要油，现在一无所有，怎么走？这是10万人的生死问题，应不再设想无济于事的举动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陶峙岳晓以利害，他们平静聆听，双方终未撕破脸皮。直到东方发白，拖过了肇乱时机，陶峙岳才松了口气。

气。

第二天下午，陶峙岳恐其有变，轻车简从，一人去了老满城骑一师师部。

采访陶天白，谈陶峙岳独闯老满城。

陶天白：“洪涛（陶峙岳副官）是跟陶峙岳一起去的。回来说，哎呀，我的老板胆子真大！今天他单刀赴会，冒险到马呈祥那里去了。结果还好，还说明白了。”

当时叶、马、罗及其部属正在开会，见陶峙岳突然进来，惊异不安。待发现是一人来时，释然改容。陶峙岳乘势进一步晓以利害，比昨夜说得更深切、更具体。叶、马、罗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人身性命有陶担保，考虑解放军重兵压境，官兵从己者寡，叛己者众，同意交出兵权，离境出走。陶峙岳于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

9月22日，胡宗南分别急电陶峙岳和叶成，要其移师南疆，阻击我解放大军。致陶电是：“据报，兄已率河西和新疆部队投降共匪，糊涂！究竟情况如何，速回电报告。”给叶成电是：“责令肃清迪化叛乱分子。部队撤往南疆，今后将空投接济。”罗、叶接电，又蠢蠢欲动，但马呈祥这时已得到确信，青海家属安全逃到广州，而马步芳临难不相顾，逃离青海时，竟带走了骑一师应得军饷5万银元，非常气愤，决定快走。叶成一时犹豫不决，罗怨人长叹叶之不足与谋。三人遂罢手，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回电胡宗南，准备交出兵权，出走印度。

陶峙岳亦向胡宗南复了最后一电：“部队在新，既不能动，又不能战，职不能罔视10万生命，弃官兵死骨于戈壁滩。”

第六集 通电起义

和平起义前必须和三区方面达成互不武力侵犯的谅解，必须尽快送走叶、马、罗。早在叶、马、罗欲“清君侧”之前，包尔汉就派陈方伯等和三区方面进行了谈判。

采访陈方伯，谈三区谈判。

陈方伯：“包主席派我到玛纳斯河西和三区的代表和谈。包主席说，新疆要努力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免得人民遭灾难。我们已决定由你做代表团的负责人，努斯来提为团员，还有保安司令部的王科长，另外带一位记者，前去谈判。主要表态我们这一方绝不动用武力，希望他们也不要动用武力，这样就可以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我去的时候，刘孟纯给叶成写了信，他没有用政府的口气，而用私人感情来感动叶成。叶成看了信后，给朱鸣刚旅长打了电话，说陈厅长去了以后，要好好保护和接待，同时让他把信送给河西。河西的人第二天早晨就答复了，说可以过河谈判。接着我们就过河，桥也被烧了，所以蹚过河去。三区在河沿搭了一个临时棚子，派马尔果夫、伊敏诺夫等三位谈判。当我们把我们政府方面的意图和目的告诉三区方面后，他们表示非常赞成。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保证双方不动用武力。二、一方要把征用的骡马还给老百姓。三、通知玛纳斯到昌吉这一带的老百姓不要外逃，要安居乐业。他们提出这三条后，我就代表政府这一方同意。”

这时三区方面已应毛泽东的邀请，派了阿合买提江、罗志等五人前往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7日，途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撞山，不幸全部遇难。中共中央再邀邓力群与赛福鼎商议，组成了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三人代表团赴北平开会。9月15日，抵达北平，受到了党中央林伯渠等的热烈欢迎。周恩来两次接见了赛福鼎。赛福鼎向毛泽东敬献了袷帽和皮帽，向政协会议献了锦旗。

为了促使主战派将领快走，因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和罗恕人素有交谊，陶峙岳发电曾震五由酒泉火速入疆，共襄大举。曾震五入疆后，介绍了关内形势，劝罗恕人快走。罗恕人因和马关系较好，亦劝马呈祥快走。刘汉东要速逃，也劝马呈祥快走。包尔汉则请和叶成私谊较深的新疆保安副司令张凤仪，劝叶成尽快离疆。历时数日，叶、马、罗都向陶峙岳表示，立即移交部队，走出他国。

采访陈方伯，谈叶、马、罗出走。

陈方伯：“包主席和陶司令商量，他们现在的住宅不管是公的、私的，都要作价，把他们的汽车不管公的私的也作价，把他家里的院子里的一切设备铺店作价，这样都折合黄金，给他们拿上叫他们离开新疆。”

9月22日，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一起出逃。叶成未同走。

陶峙岳疑其有反复，要梁客浔派人探询，得知翌日将走。为促其快走，9月25日3时许，陶峙岳亲赴城南明德路1号叶成寓所，为其送行。5时许，叶成和夫人吴姗、团长熊毅等，坐别克轿车，带一辆装满财物的道奇大卡车，到了迪化城南三甬碑。梁客浔奉命前来送行，他对叶成说：“陶总请你沿途千万不要耽搁，也不要惊动部队，尽快离去。”叶成点头，车队离开迪化。

送走叶成，陶峙岳与包尔汉、刘孟纯商量，决定军队比政府提前一天通电起义，以安定人心。先召开了总部紧急会议，宣布人事命令：以骑七旅旅长韩有文继任骑一师师长，一七八旅旅长莫我若升任七十八师师长，副旅长刘抡元接任一七八旅旅长，师参谋长罗汝正调任一七九旅旅长。要求各尽其职，约束部队，防止变乱。下午，在西大楼召开了校级以上官佐会议，300多人参加。

采访陈希明，谈“九二五”通电起义。

陈希明：“到了9月25日下午两点钟，我们在西大楼听报告，他（陶峙岳）通知听报告，军官都要去。一进门的时候，有几个军官都有枪，宪兵八连连长在门口等着说，请把武器放下。这是比较奇怪的，因为总部集合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把枪卸下来的。这个给人一个预兆，好像会议相当慎重的意思，很严肃，也不知道为什么。陶峙岳讲话。陶晋初也讲了，先请总司令讲。总司令没有提起义两个字，他说现在我看是不能打哦，打不得怎么怎么，就讲这个，绕来绕去，没有提到我现在宣布起义，没有。实际上那天稿子（通电）就拟好了，稿子由李武信拟的，李武信和梁客浔拟的起义的稿，通电的稿子。”

采访陶天白，谈通电起义。

陶天白：“起义之前，陶峙岳召集我们开了会，就在现在区党委的西大楼，团长以上都参加。陶峙岳他自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写字、讲演。他说，你们看，北边是民族军，东边是共产党，西边隔一个大山昆仑山。大部队翻过昆仑山那是不容易的。翻山第一个条件是要牦牛，马都很少，到哪里去找牦牛。第二是照胡宗南的指示，我们把部队拉到焉耆、铁门关，跟共产党军队对抗，我们也会延缓一个时期，那样，三区民族军就来了……惟一一条出路就是向共产党靠拢。他也没有讲投降，也没有讲起义。这是起义之前最后一次会议。”

讲话历时 30 分钟，即告散会。会后，陶峙岳与刘孟纯在陶的办公室，签发了起义通电稿。

采访陈希明，谈发出起义通电。

陈希明：“通电稿子（弄好）以后，就马上拿到梁客浔办公室。我也在梁客浔办公室。他马上找王章全，要想办法打出去，要发出去。发不出去了，联勤总部的所有电台都没有办法发，通不了话了。王章全后来通过张家口的一个电台发出去。哎呀找了很久，王章全确实在这个问题也做得细，一晚上都守在那里。一直到接通以后，坐了个车子回来，告诉梁客浔打通了，打通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

陶峙岳代表全体起义官兵发出的起义通电，通过电波传到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以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

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同叩。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由包尔汉、刘孟纯、屈武领衔，也发出了起义通电。

参加起义通电的有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刘效蓁、陈方伯、刘永祥、白文昱、刘德恩、钟棣华、尔德尼。

采访陈方伯，谈9月26日通电起义。

陈方伯：“省政府给我们每一个委员打电话，要开紧急会议。省政府包主席给我们说，昨天部队在陶峙岳将军的领导下，已经发出去起义通电，今天我约请省政府的委员来开会，就是要通过一个起义通电。接着就把这个通电叫刘孟纯刘秘书长念了一遍，大意和部队通电内容相同。说大家如果赞成的，就请起立通过。接着大伙就都站起来，赞成。他通过决议的方式我还没经过，都是举手么，他这回来了个起立。后来我问他，包主席，你怎么发明这么一个？他说是国际上通用的。”

通电宣布：“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新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邀请留在伊犁的省府委员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必然迅速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

为了保持新疆局势的稳定,陶峙岳在起义通电发出后,又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告全军将士书》,并风尘仆仆地亲赴景化、绥来部队,进行和平起义的宣慰。在绥来部队宣慰时,秩序混乱,一个士兵提着上了刺刀的枪,把麦克风都刺烂了。陶峙岳仍从容镇静地进入会场,拍着胸脯大声说:“谁要开枪,朝这里打吧。”部队终于安静下来,听完了讲话。会后,随从劝他尽快离开这不测之地,陶峙岳为了安定军心,仍冒险住在部队。9月27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伟大的变革时期,同心协力,做到:一、不要伤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二、不要扰乱地方秩序;三、不要破坏民族团结;四、不要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五、不要抬高物价;六、不要挑拨军民感情;七、不要伤害外国侨民;八、不要损害公家财物。

“九二五”、“九二六”起义的消息一传出,乌鲁木齐全城欢声雷动,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庆祝游行,民、汉文字的彩色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第二天,省政府召开了庆祝和平大会,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采访宋海清(时为进步青年学生),谈庆祝游行。

宋海清:“我是前边贴标语的,战斗社的一个人,还有一个边宏章。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前边贴标语,跑着贴,一直贴一千多张。一个纸条各种颜色,一千多张。我们班的同学大个子都是排头兵,在游行期间,街道周围,群众,我和同学一起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情绪非常高涨。”

9月27日,起义消息传到伊宁,全市一片欢腾,28日举行了3万余人的庆祝大会和大游行,欢庆新疆历史的伟大转折。

采访李泰玉(时为战斗社在伊宁成员),谈伊宁庆祝大会。

李泰玉:“会议开得还是很热烈,而且在会场上第一次挂起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毛主席的像,戴的帽子是上面有五角星的,这个像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像画的。”

9月28日,陶峙岳、包尔汉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对和平起义通电的复电: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九月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彭德怀亦于同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

陶峙岳将军勋鉴:

敬有两电均悉。

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彭德怀申宥卯。

苦难深重的新疆各族人民,终于赶走了黑暗,迎来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占祖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将揭开历史的新篇章。

第七集 逆流浊浪

叶成一行出了三甬碑,下午到了托克逊,稍事休息,急忙翻越天山。将近黄昏时,装满金银细软的道奇卡车在天山峡谷出了故障。叶成和吴姗担心土匪抢劫,心中非常慌乱,四面派出了哨兵,不住催促司机尽快修好车。暮色浓重时,才修好了车,继续南行。深夜宿于库米什。第二天行至焉耆,已经通电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钟祖荫,带着

陶峙岳命他整修开都河大桥的3000枚银元和搜刮的财产，以去喀什开会为名，离职随叶成而去。

李祖唐任旅长的六十五旅，驻防阿克苏。

采访常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党史办主任），谈阿克苏兵变。

常炜：“农一师师部，就修建在六十五旅旅部的旧址上。这里是旅部后花园旧址。叶、马、罗逃到这里，又一次密谋，要拉来部队固守南疆，抗击我解放大军，等待国际援助。由于叶成被刺，准备逃离阿克苏时，又引起了六十五旅兵变……”

9月26日早，六十五旅在西门外大操场上举行例行朝会。升旗后，李祖唐宣布：“今后再不升青天白日旗。”便告结束。接着，全旅连以上的军官到旅部开会，由副旅长高戎光主持会议。会上，李祖唐脸色阴沉地说：“陶总已经率全体将士通电，与广州政府脱离了关系，全电尚未收到，是总部打电话告知的。”说着，竟然泣不成声。稍事沉默后，军官们便议论开了，并很快分成战、和两派。主战者搬出《沙漠作战方案》、《兵地要志》，说是有险可守、有路可退，不打就缴械，军校没有教过。有人辱骂陶峙岳，表示军人不成功则成仁，投降可耻。主和者说，补给中断，外无援兵，退到印度是死路一条。心里想和嘴上喊打的也不乏其人。上午未形成一致意见，下午继续争论，仍无结果，于是决定签名表态：愿起义者签名。很快大家都签了名，只有高戎光和一位连长未签。事态好像平静了，散会时，李祖唐说：“陶总司令和赵副总司令先后来电，说马呈祥师长和叶成师长已一前一后离开迪化，过阿克苏时，务必敦促他们离开，不得停留。”

马呈祥于9月27日白天到达阿克苏。同车来到的有罗恕人、刘汉东，骑一师参谋长张五美、政工处长马次伯。一个班的武装士兵护送。

9月28日，叶成和吴姗夫妇，还有钟祖荫、熊毅、饶铁珊，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焉耆专员左宗棠之孙左署平等，同到了阿克

苏。

采访赵永根(原六十五旅少校军医主任),谈阿克苏兵变。

赵永根：“9月28日深夜，旅部后院灯火通明，准备外逃过境的头目们聚集在此，密谋了一夜。29日，李祖唐和高戎光召集了六十五旅的紧急军事会议。李祖唐说，昨天晚上，叶师长、马师长、罗旅长、钟旅长跟我和高副旅长交换了对起义的看法。叶师长主张根据胡长官的电令，把部队拉到铁门关，固守南疆，以争取国际援助，阻挠共军推进。叶师长已派熊毅团长今天出发，去迪化拉部队，要我们六十五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制止陶峙岳投共。接着宣布：阿克苏防区内封闭所有电台，实行宵禁，检查过往车辆，控制东西要道。六十五旅一时如箭在弦上，紧张起来。到了晚上，情况又大变，出尔反尔的李祖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紧急军事会议上沮丧地宣布说，仗不打了，服从起义。原来外逃将领们意见不一致：马呈祥要撤；罗恕人老婆已在香港，也很动摇；尤其叶成夫人坚决反对，催叶成快走。这样，原来的计划就成了肥皂泡。”

叶、马、罗、钟满载金银逃跑，激怒了3个月未发饷的六十五旅官兵们，他们认为这些金银财宝都是兵血，以旅参谋室的少壮派参谋为中心密谋后，决定乘机抢劫。然而，正当这时，叶成意外被刺。

行刺叶成的是李祖唐的勤务兵任国良。

任国良的亲胞兄在北疆精河与三区方面作战时，被叶成枪杀，任国良早欲报仇。叶成进厕所，任国良便拔枪埋伏以待。叶成从厕所出来时，任国良向叶成连开两枪，子弹钻进了叶成的左肩，没有击毙叶成。

叶成被刺，外逃过境的头目们慌作一团，决定10月1日离开阿克苏。

任国良这一枪，也打乱了六十五旅一些人乘机夺占叶、马、罗、钟钱财的计划。

10月1日下午，当马呈祥等装完车准备出发时，旅直部队已荷

枪实弹，沿大道奇卡车前进的道路列队“相送”。辎重营、特务连、通讯连全部出动，墙上架的轻重机枪退了套，冲锋枪子弹上膛，士兵们手扣扳机，怒视着端坐车上的官员们，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李祖唐、高戎光见状也惊慌起来，喊叫着制止，但无人理睬。突然，一个士兵朝天开枪，队形立刻大乱，马呈祥护送卫队准备射击，兵变士兵包围了车队，一场混战即将开始。马呈祥急忙跳下吉普车，大声命令护送士兵不准乱动，指挥卡车徐徐后撤，一直退到旅部后门。外逃人员全部沮丧地下车，回到屋内。

晚间，李祖唐、高戎光率亲信人员，分别疏通，未取得士兵谅解。第二天，李、高以吉普车开道，让叶、马、罗、钟尾随，试图再逃，兵变士兵厉声鸣枪制止，再一次挡回。

下午，骑一师参谋长张五美送来了 30 两黄金和一部分银元，代表马呈祥慰劳六十五旅官兵，并请高戎光安排，约见部分士兵代表去见马呈祥。士兵委员会选出 9 人作代表，去见马呈祥。马呈祥说自己是到边境设立指挥部的，不是逃跑。大家很久没发饷了，生活清苦，他很同情，现在给弟兄们留一点钱，表示心意，请谅解。士兵代表们没有表态。

马呈祥等人仍请李祖唐和高戎光出面疏通。李、高召集直属部队主官和部分士兵代表座谈，给大家说，他们多留一天，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叶成遇刺。现在陶总和赵副总电催他们出境，再扣留下去，就没法交代了。后又派政工主任到兵变士兵中多方调解，叶、马、罗、钟等外逃的头目们，终于灰溜溜地走了。

喀什。

整编四十二师中将师长赵锡光率部“九二五起义”后，部队相对平稳。9月26日接陶峙岳电，要他妥善送走叶、马、罗诸人，以保证和平起义不受干扰。

采访黄文杰，谈叶、马、罗、钟到喀什。

黄文杰：“9月24日下午6点，赵锡光给了我了一个营两个连一个

排的兵力，叫我接过喀什城防务，当城防司令。9月25日和平起义这一天，喀什平静。第二天全师宣布摘掉帽徽。赵锡光到各个部队主持了很多次营以上的军官会议，每次30多人，宣讲《告全军将士书》，讲‘九二五起义’的重大意义。10月上旬的一天，叶、马、罗、钟到了喀什，被骑九旅守城部队挡于城郊，不准进城。后来经旅长马平林请示，赵副总以大将风度迎接了这一伙人。”

在喀什，赵锡光接收了他们上缴的武器和电台，为他们办理了出国护照，同他们一起前往疏勒四十二师师部。小住两天后，为他们饯行。酒宴中，叶成表情复杂，不住喟然长叹。马呈祥感激，表示尽快出境。为防止再生变乱，赵锡光委派四十二师副参谋长鄢烈光护送。一行人驱车到英吉沙后，已无公路，改乘了100多匹骡马。他们沿盖孜河进入陡深的盖孜峡谷，经公格尔峰下到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脚边，终于到了蒲犁县。赵锡光早已派了副团长王怀仁在此等候。

采访王怀仁（时任四十二师骑九旅十八团中校副团长），谈叶、马、罗、钟出走。

王怀仁：“二连连长给我带的亲笔信。他（赵锡光）给我派了一个骑兵连来。信上说要把反对起义的人送出新疆，因为他们有很多部下，要防止流血事件。还要我去边防线看一看。我看了信后，就带了几个警卫，每天晚上出去在外边等着，好几晚上都没有睡觉。还到边卡上看了。他们100多匹骡马都是晚上走，我告诉边卡上的连长，不要影响他们。我有了骑兵连，就先把蒲犁警察局给管住了，他们不可靠。把宪兵队长叫到县政府来聊天，害怕他们闹事。我还派了一个排监视宪兵队。叶、马、罗、钟晚上走时，我看见了，我在山沟的西边，我还派人把他们走的路修了一下。他们是从明铁盖边卡走的……”

当时蒲犁风传土匪和巴基斯坦浪人要抢劫叶成一行。叶成等也非常恐慌，骡马大队都是晚上行走。出了蒲犁60多公里，到了卡拉其古，沿瓦汗通道到了排依克，此地有一个边防排。由排依克进入明铁盖，出明铁盖边卡进入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然后到了印度。

在明铁盖边卡，新疆警备总部和田边防大队扣住了无出国护照的熊毅等十多人，后交喀什草湖解放军二军联络处。

陶峙岳苦心孤诣，领导了“九二五起义”，绝大多数官兵是拥护的，要跟共产党走的。但是起义部队中极少数反动分子和隐藏各地的特务，从9月27日起，相继在哈密，景化，迪化等10地，烧杀奸淫，策划叛乱。

9月27日深夜，驻哈密七十八师一七八旅五三三团部分官兵，抢劫中央银行哈密分行金库，劫走库存金银12箱，兰州西运的黄金16000两，一些商号也遭洗劫。当时电话线被切断，全城大火，一片混乱。

9月28日，驻景化七十八师一七九旅五三六团二营连长刘少农，因反对起义，击毙营长李明海，胁迫部分官兵向迪化方向流窜。师部派骑兵团沿景化到迪化的公路追击，并命令驻在迪化的旅长罗汝正劝阻叛军。罗汝正晓以大义，言明利害，叛军即返回。

10月5日，驻轮台四十二师一二八旅八三二团部分反动军人叛乱，抢劫、奸淫、烧杀，活埋25人。后解放军二军四师奉命赶到，严肃处理。

10月6日，四十二师六十五旅驻库车骑兵团副团长郭壁田，煽动部分官兵，携带武器冲出营房，团长苦苦劝阻，无效。这群官兵大都是土匪出身，他们抢劫银行，火烧房屋，抢马400多匹，还抢劫了县长丁一斋家，强奸了其女。

10月7日，六十五旅一九四团一营营长李先锋，带两个连乘汽车叛逃，到托克逊，托克逊一营一连坚决不随从叛逃，他们又逃至库米什一带。经焉耆一二八旅一个营堵截，大部分返回，少数向博斯腾湖一带逃窜。后由和硕警方捕押，交旅长李祖唐带回。

10月16日，解放军二军四师十二团西进至鄯善时，起义的四十二师六十五旅一九四团的一个排长和护兵，将欢迎人民解放军的鄯善县县长打死，并焚烧，抢劫。肇事者被我军全部缴械，后严惩了反动

分子。

11月18日，驻七角井七十八师一七八旅两个营，劫二军东返运兵汽车20辆，并将车人扣留。经六军多次交涉无效，其旅长也不能节制部队。19日，竟昼夜修工事，企图叛变。24日晚，我军以五营兵力包围，救出人车，惩办了主犯。

还有焉耆抢案，绥来东关抢案，迪化抢案等。

采访刘尊贤（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中校课长），谈处理抢案。

刘尊贤：“25号宣布起义，26、27号乌鲁木齐就有抢案，跟着就是南、北疆焉耆、轮台、库车、绥来都发生了抢案。再就是哈密28到29号，把黄金抢了！这是一个大问题。陶峙岳找我，给我一个大任务，要求我处理各地的抢案。他说，你处理抢案有两个原则，一要安定民心，二要安定军心。我说，我不能因为处理抢案，增加新的困难和新的不团结。他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给你一个先斩后奏的权力，你可以公开，你可以先办，用不着向我请示了。这就等于给了我尚方宝剑。第二天，乌鲁木齐就抢了。我找陈德法，他是迪化警备司令、中将。问他，他说抓了7个，这其中有抢了三四次的，有的人只抢了一次。我问他怎么办？他不吭声。我说把7个人全拉出去枪毙。他说能这样办案吗？我说现在部队正在抢。他不同意，打电话把刘锡宠找来。刘锡宠同意按我的意见办，陈德法还是不同意。他打电话找陶晋初。陶晋初表态照刘课长意见办，他没办法，第二天才拉出去枪毙。还出了布告。枪毙以后，我告诉带兵官，这一次是谁抢了我枪毙谁，下一次谁抢了，我枪毙带兵官。这样，就把乌鲁木齐抢案平息下去了。我带了一个电台、一个军法官，出去以后，有一个原则，要说老实话，要处理的人是煽风点火的人。有一个特务头子，是个中校，特别傲慢，他说我说了你把我怎么办？枪毙，拉出去枪毙了。”

当时解放大军未入疆，新疆异常混乱，刘尊贤“刑乱世、用重典”，在处理迪化抢案的同时，严肃地处理了呼图壁刘少农叛乱的5名罪

犯。在焉耆，处决了煽动抢劫的特务。在库车，召开公叛大会，处决了强奸犯，重判了郭壁田。在轮台，公开审判后，立即处决了罪犯。在哈密，拘捕了五三三团团长陈公辅等7人，追回黄金4000多两。在库米什，意外捕获了李先锋，赵锡光批示就地枪决。西进至阿克苏的解放军四师杨师长说：“国共打了几十年仗，最后这么打几枪，用不着这样枪毙，让他学习吧，改了就好。”共产党以德报怨。

驻扎铁门关的六十五旅某连，连长制止不了乱兵抢劫，拔枪自杀。连长之死，终于唤回了乱兵良知，悄然归队。以热血换和平，连长壮举，受到王震司令员赞扬。

在军法严惩的同时，陶峙岳派出总部宣慰组，赴南疆宣慰，晓以大义，稳定军心。又派出总部救济组，携带现金、物资，奔赴出事地点调查救济，安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鉴于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在酒泉会见彭德怀总司令时，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安定西陲大地。

第八集 凯歌进疆

“九二五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是新疆人心甫定、局势不稳，如何把新疆安全顺利地交给中国共产党，对陶峙岳和包尔汉是迫切的问题。10月5日，包尔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在兰州的彭德怀发电报，报告新疆的形势。在电报中，他说：“……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为了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巩固起义成果，陶峙岳急驰酒泉，面见彭德怀总司令，汇报、请示。

采访张全友（时任陶峙岳副官），谈酒泉之行。

张全友：“到酒泉的时候，到飞机场去，我也去了。彭德怀从兰州坐飞机到酒泉，一下飞机，彭德怀跟陶峙岳握手，第一句话，彭德怀讲，再不打了吧，陶峙岳就笑。”

采访孟魁武（时任二军作战科长），谈酒泉会谈。

孟魁武：“10月5日到了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当时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还有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二军军长郭鹏、王恩茂，在那会谈，他（陶峙岳）就请求让我们快速进疆。”

彭德怀对陶峙岳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又诚恳地鼓励：“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地工作。”10月9日，赛福鼎由北京飞抵酒泉，向彭德怀汇报了新疆有关情况，同时致电包尔汉，要他稳住局势。这时，新疆临时人民政府派屈武、白文昱、努斯热提等，率领新疆各族各界代表团赶赴酒泉，迎接解放大军，挺进新疆。

早在1949年9月10日，毛泽东就电示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召开了一兵团党委扩大会，对进军新疆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彭德怀、王震、徐立清等一野首长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驻守重镇，唐玄奘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路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进军计划，做好了组织工作：成立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甘新物资供应站，空运指挥所。中央军委全力支持新疆大进军，调来3个汽车团，从苏联航空公司租用运输机45架。一兵团还从河西起义部队抽调汽车450辆，各部都建立了骡马大队。10月5日，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宣布了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彭德怀、王震分别讲了话，向部队发出“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号召。接着，二、六两军出玉门关，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王震写了雄壮的战歌：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采访曾继富（时任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二营教导员），谈进军新

疆。

曾继富：“二军是到南疆，六军是在北疆。十七师就是到乌鲁木齐和兵团司令部。六军是坐飞机来的，那个飞机很落后，从酒泉上飞机，我们就走了两天才到这里。”

在向南疆的进军中，英勇的二军五师十五团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沙漠大行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徒步横穿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举。

“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意为“进得去，出不来”。19世纪90年代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新疆叶城，试图从这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途中，骆驼死了，同伴死了，探险队只剩3人侥幸逃出。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可怕，这不是生物能够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之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1949年11月28日，二军五师十五团从吐鲁番徒步翻越天山，到了阿克苏。隔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阿克苏遥遥相望的是南疆重镇——和田。当时，美英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和田一带策划“泛土耳其主义”的分裂活动。国民党和田专员安筱山，副专员王肇智，前任专员、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郝登榜等人，也在和田阴谋掀起反革命暴乱。形势紧急，必须迅速进军和田，粉碎这些阴谋。这项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起义成果的历史使命，光荣地落到了十五团身上。

十五团分兵两路前进。一路由团长蒋玉和带领近80人组成的先遣队，乘汽车以快速突击的行动，首先进驻和田；另一路由代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和参谋长白纯史率领，从和田河故道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12月5日，部队向阿瓦提进发，然后进入大沙漠。

采访高焕昌（时任二军五师十五团参谋），谈十五团横穿沙漠。

高焕昌：“二军五师十五团，是刚刚徒步行军到阿克苏。第二天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就下达了横渡瀚海、进军和田的任务。部队特别疲劳，确实是马未停蹄，人未卸鞍，就又登上了新的征途。到了沙漠的

中心，还又遇到了一次风暴，突然间狂风四起，天昏地暗，战士们的眼睛都看不到了，身子也站不稳，所以大家都是手挽着手，非常艰难的。就是在这一天，我们失去了一位战友，就是一营二连的排长李明同志。”

第12天，部队总算走出了沙漠中心地带，到了有水有柴的肖尔库勒。带先遣队先期坐车到达和田的蒋玉和团长派人送来急信，说安筱山、王肇智和郝登榜，纠合当地封建庄园主、武装匪徒，密谋暴乱。若事不成，就血洗和田，然后逃往国外。他们借慰问为名，于14日晚请驻在汉城内的先遣队参加欢迎大会，在会场内外暗伏兵丁，企图把先遣队一网打尽。蒋团长留一半人守护大本营，另一半人荷枪实弹，去赴“鸿门宴”。

采访赵文定（和田地委党史办主任），谈和田叛乱中的“鸿门宴”。

赵文定：“这是伪专员公署，安筱山就在这里摆了‘鸿门宴’。欢迎大会开始不久，一位维吾尔族青年从汉城城墙的城洞中钻进会场，向我军报告了敌人的密谋。蒋团长立即在会场内外放了荷枪实弹的警戒哨，人人百倍警惕，预防敌人阴谋，并且厉声质问安筱山。敌人一看阴谋败露，未敢下手。”

肖尔库勒离和田还有200多公里。十五团立即集中40匹马，组成骑兵突击队，由高焕昌率领，日夜兼程，第二天晚上飞驰到和田。进入城后，人不下马，铁蹄沓沓，绕和田城跑了几圈，粉碎了暴乱阴谋。12月22日，英雄的十五团全部胜利进驻和田。

18天昼夜奋战，行程700多公里，十五团终于横穿了“死亡之海”，完成了一次古今作战史上闻所未闻的壮举。25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称赞十五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采访高焕昌，谈群众支援。

高焕昌：“为了保证我们进军，群众拉着自己的马、驴、骆驼，驮着粮食、柴草支援。阿克苏是送，和田是接，这两批支援队伍确实是立了功，大家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采访白纯史(时任二军五师十五团参谋长),谈向导。

白纯史:“护送我们的,给我们当向导的,有一个维吾尔族老人,他的名字叫阿不都拉。这阿不都拉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他对戈壁滩清楚得很,替我们找路,替我们找水,没有水不行呀,就要出去找水,他是竭尽了全力。”

十五团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农场管理局四十七团。这些横穿死亡之海的勇士们留在和田已经整整50年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长眠在这里,活着的人当中有许多没有去过乌鲁木齐,没有见过那座为他们树立的纪念碑。

五师独立团从乌鲁木齐乘车到乌苏后,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徒步行军420公里,进驻阿勒泰。四师十一团一部,进驻中印中巴边界之隘口巴扎大拉。五师十五团一部,进驻通往印度之要点赛图拉。二军教导团一部,进驻塔什库尔干。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巅。从那天起,五星红旗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在高原上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途中,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陶峙岳曾给王震将军作诗一首:

将军谈笑指天山,
便引春风度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
壶浆相迓尽开颜。

采访沙德尔·吐尔沙(时为新疆学院学生会主席),谈欢迎解放军。

沙德尔·吐尔沙:“解放军从酒泉进军新疆时,我们知道了消息,我们学生里就有人,为欢迎解放军,要画毛主席像。从哪里找毛主席的照片?听说莫斯科《真理报》上有毛主席像,有一个画画的同学,叫吾甫尔·热依木的,他自告奋勇要画,就画了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去乌拉泊欢迎解放军时,我们就举着这幅像。”

10月10日,战车团由酒泉出发,红旗猎猎铁流滚滚,进军新疆。

10月20日到达乌鲁木齐。

10月20日早晨，乌鲁木齐街道上彩旗飘扬，彩车上播放着国歌，三区方面派来满载慰问品的卡车队，悬挂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标语，乌鲁木齐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包尔汉带人赶到乌拉泊欢迎胡鉴率领的解放军战车团，并致了欢迎词，他说直到今天，新疆是真正地解放了。

下午15时，威武的战车团进入乌鲁木齐市区，各族人民倾城欢迎。

采访沙阿达提（时为进步学生），谈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

沙阿达提：“解放军一来，我们很高兴，当时就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那时不光我们学生、老师，每一个家庭的人，院子的人都站在房子上面，都出来了。路上没有地方了，都上去了，看解放军，喊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的意思是解放军来，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来，就这个意思。”

翻开1949年10月的《新疆日报》，在20日的报纸上，用红色的版面向新疆各族人民传送着解放军进疆的喜讯。

11月5日，六军先遣营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6日，空运一兵团指挥部、十七师五〇团、师直及军直到迪化，当即成立了迪化警备司令部，接管了防务。11月7日，王震、罗元发、饶正锡一行40多人，从酒泉乘飞机到了乌鲁木齐。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王震庄严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

12月17日上午，彭德怀、王震、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人在南大街大银行台阶上检阅了三军入城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团由东门进城，三区民族军由西门入城，起义部队则由北门入城，三支部队在大十字汇合转向南行，经过检阅台，出南门至南梁。

采访木拉提·包尔汉，谈入城式。

木拉提·包尔汉：“我们就在这个银行，三区革命的部队来了，部队检阅。那时彭德怀同志来了。我也是跟爸爸一块去，站在那个台阶

上。那时乌鲁木齐最高的建筑就是那，就站在那个台阶上，我也站台上。站在后面就是检阅解放军、三区部队和起义部队的，他们都坐的是嘎斯 51，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解放军就是装甲车，后面是卡车。”

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王震，第二副司令员陶峙岳，第三副司令员赛福鼎·艾则孜。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

12月7日，根据中央军委复电，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

在二、六军进军天山的同时，三区民族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司令员列斯肯，政委顿星云，副军长兼参谋长马尔果夫，副政委曹达诺夫。1950年1月10日，在伊宁举行隆重的授旗仪式。

弹指一挥间，历史翻过去了半个世纪，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 50 年的艰苦奋斗，50 年的奋发图强，创造出了远胜于雄汉盛唐的一统西域。随着改革开放涌来的文明之波，团结祥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崭新的姿态走向 21 世纪……

画面迭现雄伟的天山、阿尔泰山；秀丽的天池、喀纳斯湖；壮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美不胜收的伊犁山川……

国际列车沿欧亚大动脉呼啸而去，交河古城淡入垂珠叠翠的火焰山下葡萄沟，林立的井架、塔里木油田、准噶尔油田、吐哈油田、高速公路……

戈壁高楼、民族园林新居、条田、林带、棉山、麦海、烟波浩淼的平原水库……

伊宁、喀什、库尔勒、石河子……长街华灯、车水马龙、林荫森天、

高楼巍立……

交相闪现昔日迪化与今日乌鲁木齐街景、市容……

现代化的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巨大的空中客机迎着喷薄红日、呼啸着升天而去……

辉煌的音乐。

(组稿:王诚道 统筹、审改:王黎)

参考资料:

-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 2.《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总编:贾那布尔、富文)
-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编)
-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1~9 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1999 年每年一辑,1~4 辑为内部资料准印,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编)
-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 6.《新疆屯垦》(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赵予征著)
- 7.《投向真理的将士们》(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主编:卢振云)
- 8.联合摄制单位部分采访录音



名人踪迹

解放前新疆高级官员概况

刘锡宠

解放前新疆的政治集团很多，这些集团大多建立在亲属、朋友、同学、同乡、老同事、老部下等关系上，某个集团的政治面貌，对其部下影响很大，当然也不是全部一致的。根据这些线索，可以分析研究各重要人员的政治倾向。

1946年以来，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有三大派别，即张治中派（含陶峙岳），胡宗南派（宋希濂是胡派主要代表人，但与胡不完全一致），马呈祥派（代表马步芳）。

盛世才统治新疆前期，国民党的势力没有进入新疆，抗战开始，苏联在伊犁建立“奥林匹克”空军基地（后被民族军消灭），国民党人陆续来疆，最初是李铁军的部队，盛离开新疆，朱绍良、吴忠信进入新疆。伊塔事变，朱绍良应付不了局面，蒋介石派张治中来新，以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的身份，坐镇迪化（今乌鲁木齐），陆续调入10个师，马呈祥的骑五军也调驻北疆，又组建了4个骑兵旅，新疆局面张治中可以控制起来，局势稳定下来。1946年夏与伊犁民族军和谈成功，8月张治中亲赴伊犁，9月初返迪，组成混合政府。这期间，代表伊犁参加政府的有阿合买提江任政府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赛福鼎任教育厅厅长。民族高级官员，先后有省主席麦斯武德（接近国民党）、包尔汉（先接近国民党，后又和民族军有联系），秘书长艾沙（先接近国民党，后为主要分裂分子），哈族厅长伊敏诺夫，哈族迪化

专员哈德万(女),阿山专员乌斯满,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亲国民党,维吾尔族),焉耆蒙族专员乌静彬。这些人关系复杂,政治上多变,张治中任用这些人是团结少数民族各派系,稳定新疆。

平津解放、淮海战役之后,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多认为国民党已无力统治中国,新疆的前途如何?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1948年秋,陶晋初在香港和乔冠华会面,后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新疆问题和平解决开始筹划。1949年3月高级军事会议,陶峙岳提出“保国安边”之后,主张起义的人便以此为目标做工作。

主张新疆和平解放主要人员是张治中、陶峙岳、赵锡光、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从兵力上讲是很不够的,只能掌握1个旅、4个团。

赵锡光:新疆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他指挥从焉耆到莎车的4个整编旅,地区广阔,关系重大。他是云南人,讲武堂毕业,是胡宗南网罗来西北的杂牌军,曾在西安、兰州和陶峙岳共事,直爽豪放,有正义感,是张治中要来新疆的。有一次他发现军统特务向南京汇报他的情况,他非常生气,认清蒋介石、胡宗南不信任他。他能明辨是非,有爱国热忱。他和陶峙岳对起义问题一拍即合,是领导起义重要人物。

叶成: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浙江人,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和蒋介石关系密切,因和人争夺杭州女中校花动手枪,被胡宗南网罗,派来新疆。他也最爱财,用军费做生意,积了一些金子,反动成性,不可救药。1949年3月高级军事会议上,叫嚣“新疆部队应效忠委员长,为党国而战!”

莫我若:黄埔军校毕业,浙江人,曾任军校七分分校兰州总队总队长。不多言,有责任心,驻守哈密,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不表态。

罗恕人:黄埔四期毕业,湖南人。抗战期间曾任西北训练团驻酒泉训练班主任,不得重用。在失意中,陶峙岳邀来新疆,为驻迪一七九旅旅长。按情理说,他应该服从陶峙岳,但他是反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之一，是叶、马、罗集团的军师，是“老满城会议”的主谋，是制定劫持陶峙岳、杀尽起义领导人员、破坏北疆、退守南疆的策划者，是最危险的反动头子，最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军统特务。他下边几个团长，也非常反动，他们都驻迪化市区，给我们起义造成最大困难。幸主战派副旅长罗汝正和陶峙岳接近，最后由罗汝正出头稳定了这个旅。

田子梅：黄埔毕业，山西人，是胡宗南老部下。任二二七旅旅长，驻吐鲁番，曾签名起义。镇反时被枪决。

朱鸣刚：黄埔军校七期炮科毕业。任一二七旅旅长，驻绥来（今玛纳斯）守河防，忠厚负责，生活俭约，是安定首府的重要力量。

钟祖荫：黄埔军校毕业，江西人，任一二八旅旅长，驻焉耆，夫妻均加入军统。1949年9月24日在总部向陶表示愿参加起义，陶拨给银元3000元，嘱他检修焉耆大桥，准备迎解放军入疆，他当晚返焉，次晨携款追叶、马、罗一行，逃往国外。

李祖唐：黄埔毕业，浙江人，老一师军官，性情刚直，服从性强。同意起义，但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身在曹营，心在汉。”1950年秋我奉陶峙岳命，从喀什二军联络部接他回迪化在军区任职。后因反共被枪决。

马平林：黄埔毕业。骑九旅旅长，驻喀什，不多言，与赵锡光副总司令相处颇好，明辨是非，工作负责。经赵说服，顺利起义。

唐井然：黄埔毕业。爱财如命，贪污成性，起义前因克扣军饷，引起兵变，团长洪亚东围莎车城，赵锡光亲去解决，免去其旅长职务。镇反时被枪决。

杨廷英：黄埔军校毕业，浙江人，骑八旅副旅长，对经商有兴趣，愿随陶起义。

陈德法：黄埔一期毕业，浙江人，新二军副军长，迪化警备司令。和叶成关系密切，人际关系亦好，对陶峙岳很服从，处事谨慎。起义时力劝叶成不能动武，按陶的指示说服叶成交权离疆，叶成约他同逃，他不肯，留下随陶起义，对起义是有功的。

韩际隆：陆大毕业，河北人，曾任迪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和我交往多，无反共言论。

张治中集团：

刘孟纯：广东人，有才干，是张治中政治上最主要的助手，任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完全按张治中的指示办事。他有一套秘书班子，有莫汝英、莫汝京、林永玖等，都是广东人。起义后调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

屈武：留苏学生，陕西人，国民党元老派于右仁的女婿，时任迪化市长，是张治中用以疏通苏联的联系人，经常到苏领事馆，是张治中政策的执行者，重庆谈判时是张治中和谈代表团的秘书长，最后和谈破裂，他回新疆，带来张治中的口信及一些材料。解放后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谭维熙：广东人，很有才干，原任长官公署主任秘书，后调任新疆日报社社长。人正派，思想进步，生活严肃，1948年秋和王次青（曾是共产党员）及我密谈新疆出路，主张起义。他办的报对新疆和平解放有舆论影响。解放后任陕西省副省长，政协主席。

王次青：文化人，有才能，曾加入共产党，曾任新疆日报社社长、总编，解放后调北京任出版署处长。

党必刚：陕西人，留苏学生，任长官公署高参，与屈武同为疏通苏联关系的联络人。后调任省府保安司令，是张治中派。清理共产党员被盛世才关押案重要人员之一。解放后调四川。

孙耀武：山东人，农大毕业，曾加入共产党，北伐时，任连党代表，有才干，是国民党元老派王茂功的女婿。张治中调他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长，兰州解放前逃酒泉随曾震五起义，后又来迪化。

谢超：知识分子，江西人，张治中的老部下，任长官公署政务处副处长。1949年最后一次和谈随张治中到北京，张留北京，他回迪化，带来张的口信和一些材料。

祝源开：浙江人，陆大毕业，是国民党骨干将领祝绍周的侄子，张

治中、陶峙岳都以子侄相待，任警备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

刘亚哲：山东人，留苏学生，曾任西安劳动营主任，在新疆任警备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时，曾遣送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 72 人回延安。张治中任他为迪化警察局长，后又调京沪铁路局局长，解放后是全国政协委员。

李崇正：安徽人，军校十一期毕业，是张治中的小同乡，长官公署科长，调骑兵团团长，该团是起义派的主要兵力。

王传铎：安徽巢县人，步兵学校毕业，长官公署科长，调驻巴里坤团长，是起义派的主要兵力。

洪团长：安徽人，是张治中的内侄，任长官公署警卫团长，是保护起义派的主要兵力。

刘敦：湖南长沙人，知识分子，张治中当湖南主席时，安排刘孟纯住在他家里，张治中来疆调他当省府人事科长。

陶峙岳集团：

陶晋初：（众所周知，略）

曾震五：湖南人，保定军校毕业，是联勤总部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和陶峙岳同乡同学，关系密切，起义前曾来迪化和陶峙岳密商，兰州解放前将部队人员物资转至酒泉，部队西进，又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因为他们过去相识，9月24日和河西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一同宣布起义。

汤祖坛：湖南人，湖南讲武堂毕业，陆大毕业，曾任西北干部训练团办公厅主任，后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是陶峙岳。他很想当师长，但胡宗南不同意，所以对胡宗南很不满。从各方面讲，随陶起义是必然的。解放后，任石河子农学院副院长。

崔景谟：江西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建筑工程处处长，和陶峙岳关系密切，还兼管陶的私人财产，解放前夕，驾陶的坐车来迪化。后为二十二兵团后勤部部长，石河子联合加工厂厂长。

毛继圣：湖南人，第八补给区财务处长，在酒泉起义，工作能力

强，忠实可靠，兵团成立时任财务处副处长。

陈俊：湖南人，黄埔四期毕业，是国民党进入新疆的第一个团，驻阿山，盛世才想杀了他，他不肯到迪化来，幸免于难，陶来疆后任为一二八旅副旅长，实为驿运处处长，管马车运粮。钟祖荫潜逃，他连夜赶到总部报告情况，当即被令升一二八旅旅长，立即赶回焉耆维持治安。

曾国辉：湖南人，和二陶关系密切，起义前在兰州长官公署合作社负责，能力较差，不问政治。后调农七、八师任后勤工作。

毛希舆：湖南人，自幼跟陶峙岳做文书，随陶来疆后任总部人事科长。1948年冬为准备起义调为驻安西团长，守星星峡，兼保护敦煌国宝。解放后任农五师参谋长。

文升乔：湖南人，陆大毕业，也是黄埔八期毕业生，能力强。原在128旅当骑兵团长，陶晋初来新，调升总部第三处处长，旋调九分校教育长，和我、陶晋初同住一大院内，经常商研起义工作。宣布起义后命为城防司令，维护迪化治安。

堵立山：江苏人，军需学校毕业，陶峙岳二次进疆，任为军需处长，总务处长，主管财务，是起义的核心人员之一。

黄仲仑：广东人，军校毕业，原在汽车部队当团长，陶峙岳二次来新，任为总部第四处处长，主管交通，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

朱国瑞：河北人，军需人员，起义前任总部预算室主任，起义后一直搞商业。

欧阳愚山：湖南人，陶晋初的妹夫，任总部警卫营营长。

赵锡光警备部人员：

王根僧^①：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杨虎城将军参谋处处长，同情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曾掩护党的高级干部多次住在他家。赵锡光约

^① 王根僧于1926年冬由王尔琢、文绍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党失去联系。1955年由张仲瀚、王季龙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农八师志》第760~761页）。

来当警备副司令，他是赞成起义的。解放后任九军副军长，后加入共产党。

吕公威：湖北人，大学毕业，其妻是民先队员，他也和进步人士有来往，任赵锡光的高参。1949年3月来迪化找我，去找地下党人，在公路局宿舍找到战斗社李尚志，他当时没有否认他是共产党，还给我和吕公威分了工，吕公威对起义是很积极的。

费鉴：留日学生，有进步思想，南疆警备部高参。

马建新：云南人，知识分子，高参。

杨季成：陕西人，南疆警备部政治部主任，和赵锡光配合得还好，参加起义，解放后是自治区政协委员。

丁绶南：军需学校毕业，赵锡光的军需处长。

岳奉恩：独立团副团长，赵锡光的主要兵力，解放后任农七师副师长。

供应局郝家骏及其主要助手：

郝家骏：保定军校毕业，和张治中、陶峙岳是同学，关系很密切，配合起义工作做得很好。阻止主战派东调援兰起关键作用，因为他掌握4个汽车团及粮食、被服。他是中将军衔，陶峙岳第一次调离新疆他也走了，陶峙岳二次回新疆，他又来了，贡献很大。

李甲三：供应局副局长，精于业务，勤勤恳恳，配合起义工作。

吴赞荣：运输组长，配合起义工作。

孙光甫：主管粮食，配合起义工作。

尚克武：经理组长，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给部副部长。

高朝栋：保定军校毕业，河北人，挽马团长。

潘荣立：挽马团副团长。

政府部门重要人员：

张凤仪：保安副司令，所属各保安部队加入政府起义行列。

王曾善：回族，民政厅厅长，与马呈祥关系好，随马呈祥外逃。

赵剑锋：东北人，随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疆，张治中时代任社会处

长,和各方关系均好,为人正派,工作勤奋,积极参加起义。解放后长期是政协委员。

陈方伯:东北人,南开大学毕业,曾任盛世才时代县长,张治中来新组织联合政府时任命教育厅副厅长(赛福鼎的副手)。解放前,为稳定北疆局势,陶峙岳请包尔汉派陈方伯到玛河西岸和民族军打招呼:不要用兵,新疆即将解放。这是他的贡献。

刘永祥:政府厅长,“九二六”起义。

王鹤亭:江苏人,印度留学生,是我国四大水利灌溉专家之一,领导着大批水利专家,对新疆水利建设有重大贡献。解放时对起义的态度是积极的,一直被重用。

王恒升:北大地质系毕业,是德国专家葛利普培养出来的继李四光、翁文灏之后第二代地质专家。新疆解放时被投入死牢,王震赴京要地质专家时,发现在新关押,遂放出。后调地质部任研究所所长。

王章权:邮电局长,解放时对陶峙岳和中央联系有功。

刘泽荣:幼年长期在苏俄学习,是中国最精通俄文的专家,著第一部俄华字典,曾任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教授,时任外交部特派员。张治中、陶峙岳对他十分尊重,常移尊就教。对起义有特殊贡献。

贾焕臣:司法界老人,高等法院院长,一向和张治中、陶峙岳在工作上配合很好,不反共,赞同起义。

陈希豪:浙江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省党部大权在书记长杨为手里,他无所作为,也不逃跑,未被处分。

马呈祥集团:

马呈祥:青海人,回族,马步芳的主力军,1945年入新,任骑五军军长,后改编骑一师师长,军部驻迪化老满城。好色,军统将女中校花嫁给他,以便控制。专横,不许任何人接触他的部下,只他一人和外界接触,反共态度明确。起义前和叶成、罗恕人结成集团,对付起义派人物,屡欲动手未能如愿,和陶峙岳多次长谈,促陶同意他们的计划。最后被迫交出兵权,逃往台湾。

郭全梁：青海人，骑一师副师长，非马嫡系，未随马呈祥逃走。陶峙岳欲派他任骑一师师长，他坚决不同意，回内地去了。

韩荣福：青海人，回族，骑六旅旅长，能力较强。马呈祥出走后，陶峙岳想让他代马呈祥工作，他不肯。解放后任农八师副师长。

韩有文：青海人，撒拉族，骑七旅旅长，文化很低，枪法很好，起义前由奇台来。解放后当了多年新疆政协副主席。

特务系统：

军统：

饶铁山：军统新疆第一把手，湖南人，保密局新疆站站长。因新疆特殊情况，他在任时未处理过共产党案件。出逃前陶晋初约我找他谈话，晓以大义，劝其起义，他说：“以我的身份不能不出走……”先期离新疆。

刘汉东：湖北人，迪化警察局长，军统特务。1949年9月23日晨，陶晋初约我到他家劝说他留下，他说：“我行李都打好了，实在不能不走。”

罗恕人：（见前）

军参：统部二处军师三科，属国民党总参三厅系统，任务是处理情报，收集情报，总部三处属之。

宋克今：二处处长，在二处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是保密局的人，宋克今则不是。解放前离开二处，解放后在贵州被枪决。

钟明：二处副处长，随陶起义，镇反时被判刑。

石永龄：河北人，军校特别班，政工处副处长。本随叶成出逃，在上车前被陶晋初和我劝说留下。镇反时被枪决。

中统系统：

杨为：省党部书记长，新疆中统系统的头头，在省党部是独揽大权的，但新疆的环境特殊，他不能插手有关进步人士的案子。

宪兵营：

宗孝：营长，在新疆，我有权指挥他，多次随我捕重要大案人犯。

没有大的问题,加入起义行列。

白文昱:新疆人,回族,财政厅长,兼新疆银行行长。和总部关系配合得好,服从张治中、陶峙岳对经济工作的安排。

涂治:留苏学生,农业专家,妻子是波兰人。任新疆学院院长,是战斗社的领导人,他很谨慎,少外出。解放后任农业厅长。

刘良湛:公路局长,留美学生,公路工程专家,手下有不少高级技术人员,和长官公署总部一些高级人员常有来往。解放后调西安公路学院任院长,在该院 50 多年。

李武信:湖南人,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时间在军校、西北训练团任教官,对名利淡泊,广交游。1948 年陶峙岳请来任上校秘书,后任行政处处长,积极赞助起义。

程砚秋的南疆之行

刘锡宠

程砚秋是京剧界程派鼻祖，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同期齐名，并称为我国京剧艺术“四大名旦”。1950年秋，程砚秋偕同京剧创作家、评论家杜颖毓教授及弟子李丹林来新疆游历。我以二十二兵团总务处长的身份，陪同他们和陶峙岳司令员赴南疆游览。虽事过50年，但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当时迪化秋高气爽，程砚秋、杜颖毓、李丹林及陶峙岳等一行共17人，分乘两辆车出发。当时南疆途中非常荒凉，所以车上还拉了大米、白面、油、肉、蔬菜等，还有大桶的淡水。因新疆和平解放还不到一年，车上装备了轻机枪等长短武器，以防不测。我经常在前开路，侦察情况，埋锅造饭。九军的张仲瀚政委乘小吉普车赶上来，对陶司令员说：“我去焉耆出差，正好陪你同行。”陶将军笑着说：“你这个戏迷不是陪我，是陪程先生！”逗得大家都笑了。

傍晚进入托克逊，晚饭后程先生要我教他们几句维吾尔语和一些维吾尔族习俗，我就教他们说“亚克西”（好）、“热合买提”（谢谢）、“要尔达西”（同志）等。

翌日晨出发一小时后到达天山干沟。这是通往南疆惟一的艰险路段。路面不平，转弯多，山坡陡，十分难走。我们的车像老牛一样向山上爬行。爬上一段，水箱的水就开了，不得不休息，等水箱降温。中午才爬到山顶，幸好我们有足够的凉开水和干粮。

到库米什，天已黄昏。晚饭后，张仲瀚政委唱起余叔岩派的须生腔。他天生的沙嗓子，唱得颇有韵味。程先生也和起青衣戏，一唱一和，我们洗耳恭听。杜教授就发挥所长，评论起来。陶将军说：“高水平的唱腔，高水平的评论，使我们大饱耳福。”

次晨天亮，我们才看到库米什的真面目，这是非常贫困的小镇，满目荒凉；但它是通往南疆的必经之路，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午到达榆树沟，厨师给我们做大米饭，炒了四个菜。饭后，大家稍事休息。程先生身体已经很胖了，自然容易入睡，侧身靠着山坡打呼噜，儒雅潇洒，令人佩服。

在榆树沟山中，我们发现两个晕倒的人，30多岁，经查看还有气。是粮尽水绝，饥渴交加所致。我们估计是散兵游勇，从焉耆过来的。程先生和杜教授一致提议救人，警卫取水喂他们后，就苏醒过来，又给了点食物。我们把他们扶上汽车，带到乌什塔拉，交给驻军。

当时焉耆是大城市，也是我们的重点站。我们住在二十七师部队部。师长陈俊是我的好友，这里条件、环境好，生活上随我安排。

次日，陶司令员到部队视察。我借了几根钓鱼竿，和其他人到开都河桥头钓鱼。晚上厨师给我们做了多种鱼菜，特别鲜美，客人赞不绝口。

晚上，程先生、李丹林在大礼堂慰问演出。二十七师及二十六师干部大多到场，座无虚席。虽然是清唱，但程先生的精湛艺术，倾倒了观众。

到了库尔勒，住在六师十八团。那时的库尔勒只有老城一点地方。十八团驻在现在新市区的地方。团部附近有梨园，枝头果实累累。我们买到小白杏，味道特好。

进入野云沟，景色大变：林木葱郁，枝叶繁盛，空气湿润，野花飘香，鸟蝶纷飞，使人心旷神怡，仿佛到了江南。在阳霞、轮台各住了一宿后，我们来到库车城。这里以盛产紫羔皮而闻名中外，满街都是皮货店，价廉物美。陶将军买了三个皮箱送给北京客人。程先生说：“久

闻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洋冈子’^①一枝花，可惜我们见不到庐山真面目。”妇女都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面孔。

在二十二兵团二十七师八〇团，程先生在广场临时搭的戏台上慰问演出。台上点着煤油灯，使我想起了在河南家乡看野台戏的情景。可是演员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可谓空前绝后。拉胡琴的是八〇团的战士，水平低，根本配合不上程先生的唱腔，然而倾城而来的观众，仍是掌声雷鸣。

喀什是我们此行的终点站。旧城在疏附，新城是疏勒，旧城是主城，新城是二军驻地。这里安全安静，我们四个住在军部花园内，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独臂将军副政委左齐均住花园入口附近。

疏附是喀什主城，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大街两旁有许多商铺，里面不少是印度、巴基斯坦人，他们经营衣料、香皂、各色宝石等。我们买了红、白、蓝及变色宝石，价格便宜，质量也好。二军在街上开了大门面的商店，军首长送给客人名贵的和田地毯。

中午同往喀什专员家赴宴，有烤全羊、羊肉串及各色维吾尔族特色的菜肴，十分丰盛。这是我在新疆吃过的最丰盛宴席。程先生说：“我的体重又增加了。”另一次重要宴会，是苏联驻喀什总领事设的，吃的是苏式西餐，俗称俄国大菜，极为丰富，宾主尽欢而散。

次日陶司令员和洪涛赴莎车部队工作去了，留我陪客人活动。喀什地委为程先生安排了一场晚会，地点在老城喀什大剧场。这个剧场比北京珠市口的开明大戏园还大，有转台。当时演出名剧《铁门关》，有18匹活马上台，为国内所少见。程先生、李丹林的演出盛况空前。

陶将军回来了，给北京客人送了英吉沙刀子。这是名产品，做工非常精美。

回迪化后，借京剧团的文武场面，在西大楼由程砚秋先生和张仲瀚政委合演了一场《汾河湾》。王震、包尔汉、赛福鼎等都观看了。著名的歌星康巴尔汗为客人表演了蝶舞。

① “洋冈子”，是50年代初汉人对维吾尔族少妇的称呼。

艾青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田文俊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褓姆。

——艾青：《大堰河——我的褓姆》

艾青，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诗人。

艾青，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身，在创作上勇于探索，为新诗拓宽了道路。早在 30 年代初期，他在国民党苏州监狱里发表的力作《大堰河——我的褓姆》，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此后，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这样一位有着重大影响诗人，他是在怎样的年代被迫离开北京？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垦新城石河子做了一个普通居民？他在这块绿洲上是怎样生活怎样创作的？他在天山脚下、戈壁大漠又经历了怎样的政治风浪？……

1958 年 4 月，中国反击右派的斗争，暂时打了一个小小的句号。49 岁的艾青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

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候处理。

著名的垦荒将军王震劝艾青暂时离开文艺界，到基层去生活一段时间。

那年月，中国文艺界有影响的“右派”，差不多都去了北大荒垦区。诗人艾青偕同妻子高瑛在老朋友王震将军的关照下，被分配到北大荒大兴安岭八五二农场的南垣村子林场任副场长，挂职体验生活。

王震将军要这位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老朋友订一个深入生活的五年规划。艾青经过深思熟虑后说：“我准备先去新疆……”

王震将军表示赞同……

西去的列车在戈壁飞奔。

艾青夫妇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思前想后。

长途跋涉的艾青，又走上了一条广阔而艰难的道路。他首先想到的是姚文元那篇打棍子的文章《艾青的道路》，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他把艾青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了个全盘否定，推到敌对的阶级立场。一想到这些，艾青心情很不平静。

新疆——那是一块五彩缤纷的大地。

早在50年代初期，青年诗人闻捷就把散发着草原芳香的诗作《天山牧歌》，通过艾青的双手，捧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特别是那首长篇叙事诗《哈萨克夜送千里驹》，是从乌鲁木齐直接寄给艾青的。诗人艾青一眼就看出了这首诗的美学价值，签署意见后转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这首诗发表了，果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艾青和闻捷有着深远的交往。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有过友好的关系。艾青在延安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诗刊》，闻捷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涉足诗歌创作。

更使艾青夫妇欣慰的是，在新疆有很多延安时代的老朋友、老战友，大部分都是王震将军三五九旅的老兵，他们在主持着自治区各部门的工作。艾青在延安的时候，就和他们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交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艾

青在延安就和他们打过交道。艾青曾带队慰问开发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全体将士。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艾青观看过张仲瀚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

西去的列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前进。

大西北令人振奋的雄姿，使诗人和他的夫人大大开扩了眼界。他决心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祖国西北高原和未来的新生活。他瞭望着巨龙一般的万里长城和雕梁画栋的嘉峪关城楼，那一队队南飞的大雁，那一片片沙漠中的绿洲，那一棵棵扎根在戈壁滩上的红柳树，那一座座耀眼的冰峰，那一顶顶勘探队员绿色的帐篷……这一切，都在诗人的心海里掀起了感情的波涛，祖国的大西北啊，美丽富饶的新疆，这里有写不完的诗，唱不完的歌，画不完画啊。

诗人艾青偕同夫人高瑛，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天山路，踏着左宗棠出塞的脚印，听着林则徐发配充军的铁架车颠簸的声响，步我解放军大军向西挺进的后尘，向新疆这块神秘而多姿多彩的大地走来。

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诗人艾青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尽管他头上有一顶令人望而生畏的“右派”帽子，但又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张仲瀚、陶峙岳，宣传部部长谭峰，都对他非常客气，把他当成贵宾接待。艾青一家住在兵团司令部2号小楼，一日三餐吃小灶，每逢星期六兵团机关举办舞会，总要请艾青和高瑛参加。

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季龙和宣传部部长谭峰，每一次审查兵团剧院和兵团文工团的剧目，也总是请艾青参加，认真听取他的意见。

一天，艾青和高瑛去逛大街。由于乌鲁木齐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大街上的人行道非常光滑，像平板玻璃一样。他俩一面讲话一面行

走，不小心滑了一跤，一屁股坐在大街上。艾青哈哈大笑起来，他十分风趣地说，这是新疆给他的第一个见面礼。诗人的幽默逗得妻子笑出了泪花。

三

天下的名山大川很多，
惟独天山和我的关系最深……

——艾青：《怀念天山》

50年代末，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独汽二营汽车驾驶员苏长福所驾驶的苏联吉斯150汽车，日夜奋战在河西走廊和天山脚下，创造了安全行驶50万公里无大修的突出成绩，受到了苏联专家的高度赞扬。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给苏长福发来贺电，赠送了不少纪念品。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决定树立苏长福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为了在全国农垦系统和交通运输战线宣传苏长福的特殊贡献，需要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张仲瀚提议，这个写作任务，交给艾青来完成。

艾青后来写的散文《怀念天山》中，写下了这么一段回忆文字：

“我第一次到乌鲁木齐后，接受了一个任务，写一个活动在天山一带出色的驾驶员。我几次到天山里面的一个峡谷——后峡，从住帐篷开始到住楼房，那儿有一个新建的钢铁厂，结识了不少人。我曾几次到一个4000多米高的明槽——南北疆分界的地方。”

他要亲自走一走苏长福开车走过的天山路。艾青在兵团机运处副政委冯金保的陪同下，坐车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过铁门关，越过孔雀河，沿着库尔勒公路，向天山深处走去。他们在天山半腰上新开的险峻的公路上前进。不顾坡陡路窄和塌方的危险，一直到海拔近5000米的冰峰。年过半百的艾青克服种种困难，把实地采访看作是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好机会。他在后峡苏长福所在的连队住了一个多月，亲自访问了苏长福的家庭，乘坐了苏长福的汽车，拍下不少十分

珍贵的照片，并召开了关于苏长福安全行车的座谈会，和青年业余作者畅谈文学创作。

艾青在兵团机运处写作期间，大多是冯金保副政委陪同。冯副政委尽量给艾青提供一切方便，参观，访问，看戏，出席招待会，和劳动模范合影，参加宴会……艾青夫妇很受感动，把访问智利时著名诗人聂鲁达赠送的一套烟具转送给他，冯金保感动不已。

仅仅3个月时间，艾青写出了1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经兵团党委宣传部审定后交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那个年月怪事层出不穷，艾青原稿15万字，被人砍掉了1/3，而且在新书出版的封面上不准署艾青的名。艾青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冠之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冷冷一笑，再也不愿提起这件事。

令艾青欣慰的是，兵团机运处党委给兵团党委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报告：

通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的采访和写作，说明艾青是一位平易近人、勤勤恳恳的文化人，建议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恢复他的公民权利。

四

我曾经是石河子的居民，
它原是一座田园式的小城。

——艾青为《绿星》题词

1960年夏天，那是一个火热的季节，兵团机关组织干部到石河子莫索湾帮助夏收。那一年莫索湾的麦子长得很好，齐肩膀那样高。艾青起得很早，拿着镰刀跟着大家下地割麦子。天大亮的时候，兵团机关工作队的同志们已经收割完了好几块地，准备返回场部去吃早饭，在过一道农渠时，艾青滑倒了，小腿正好跪在镰刀的锋刃上，流血不止。这是艾青到新疆以后，第一次把鲜血洒在军垦农场的大地上。

也许这是偶然的巧合，诗人艾青和石河子军垦农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8月，王震将军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兵团和平剧院召开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他号召广大军垦战士，发扬南泥湾的精神，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多打粮，为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完报告，王震将军走下台来，走到群众之中，笑呵呵地对台下的人们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时，身材魁梧的艾青立即站起来向王震将军敬了一个举手礼。

王震说：“他，就是中外驰名的大诗人——艾青同志。”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艾青。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9月，正是准噶尔大地丰收的季节。

王震要去古尔班通古特的军垦农场视察，他提出要张仲瀚、艾青陪同前往。在军垦农场的生产第一线上，王震将军会见了不少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艾青看到他们之间那种真诚的感情，心中很不平静。

在返回乌鲁木齐的小车上，王震问艾青：“对石河子印象怎样？”

艾青连声称赞：“好，这地方很好。”

王震十分恳切地说：“老艾，你就在这里安家吧！”

艾青笑着点了点头。

王震给张仲瀚政委打招呼，让他先给鱼正东、罗汝正等农八师领导谈谈话，让艾青到农八师来体验生活。

1960年的秋天，张仲瀚政委将农八师政委鱼正东请到他的住处，他一边脱大衣一边招呼警卫员给鱼政委泡茶，拿出“大前门”香烟招待鱼政委。

“老鱼啊，给你个人，敢不敢要？”

“什么人我不敢要？就是头号大战犯，我也敢要。”

“艾青，大诗人艾青，中国文艺界八大右派之一……”

鱼正东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气：

“什么要求？”

“师级干部待遇，生活上多照顾，思想上多帮助。这样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这是王震老首长交待下来的，我现在交给你。”

1960年10月初，艾青一家搬出了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2号小楼，在军垦新城石河子安了家，从此便成为石河子新城的一户居民。诗人艾青在绿洲上的生活开始了。

五

我到过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艾青：《年轻的城》

这座准噶尔绿洲上崛起的军垦新城，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同龄。它是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就的光辉缩影。

60年代初，许多中外领导人相继来到这里。每当这种时候，艾青和农八师领导也一同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王震将军、张仲瀚政委视察兵团农牧团场，总是请艾青陪同，一同就餐，一同看戏，一同跳舞……

农八师召开什么大型会议，艾青也同兵团首长、农八师领导高高地就坐在主席台上。往往在这种时候，人们观察着这位从风度到气质与众不同的人物。

艾青个头很高，骨骼很大，身材十分魁伟，俨然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家的形象，绝然不像一个文化人。他平时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浓密的头发向脑后梳去，那宽阔的前额上有一个核桃大的小包，

那张饱经风霜的四方脸盘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51岁的艾青，倒像40出头。

每天吃过晚饭以后，艾青在高瑛的陪同下，沿着师部门前的林荫大道散步。他们同时也在观察着这座军垦新城热火朝天的建设，聆听着大路边高音喇叭那令人欢欣鼓舞的丰收喜讯。

一首优美的诗篇在艾青心中逐渐成熟起来：

不是瀚海蜃楼，
不是蓬莱仙境。
它的一草一木，
都由血汗凝成。

你说它是城市，
却有田园风光。
你说它是乡村，
却有许多工厂。

苍郁的树林里面，
是一排排的厂房。
百鸟的鼓噪声中，
传来马达的声响。

.....

它像一个拓荒者，
全身都浴着阳光。
面对着千里戈壁。
两眼闪耀着希望。

.....

因为它永远在前进，
时时刻刻在改变模样。
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
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偌大的中国，没有艾青发表作品的园地。惟独在祖国大西北的天山脚下，这块小小的准噶尔绿洲上所办的一家不起眼的小报《大跃进》上，给艾青提供了一块园地，可以经常发表他的作品。这期间，艾青的创作是勤奋的。他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军垦生活的诗篇，如《垦荒者之歌》、《烧荒》、《帐篷》、《洋槐》等比较清新的短诗。

196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的文件精神给艾青等370多右派摘帽的消息。兵团党委派小车把艾青接到乌鲁木齐，向他当面宣布中央的这一决定。

艾青原来计划在新疆只生活两年，现在看来两年时间是远远不行的。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打倒一批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他虽然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丝毫没有让他返回北京并表示。看来，必须做好长期在准噶尔绿洲生活创作的准备。他决心走一条艰难的道路，用长达5年的时间深入莫索湾垦区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一个个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和征服大沙漠的故事，写一部开发建场史《从南泥湾到莫索湾》。这部史诗性的小说，它在结构上受俄国屠格涅夫《猎人手记》影响，每一章就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合起来就是一部宏篇巨著。后来定稿为《绿洲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诗人艾青对绿洲开拓者的热情赞歌。

六

我是大火中的一火星，

趁着生命之火没有熄灭。
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
把“一”和无数溶合在一起。
进行为真理而斗争。
和在斗争中前进的人民一同前进。

——艾青：《光的赞歌》

艾青是平易近人的。

诗人艾青在石河子绿洲上安家落户，好像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层层波浪，吸引了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一个个奔走相告，并且自称是艾青先生的学生，是诗人的崇拜者。每一次来，总是带着自己的习作，请老诗人指点，帮助修改，文学把他们集中在艾青门下。

在这些文艺美学的探索者中间，有《未来在召唤》的作者赵梓雄，有后来写讽刺诗的石河，有报社编辑杨树，他们当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学徒，在他们眼里，艾青是博古通今的艺术大师。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艾青家中，走进艾青的书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听他机智、聪慧、妙语如珠的谈话。

艾青的书房也是会客室。

向阳的玻璃窗下，放着一张很大的写字台，桌上架着精美的台灯。写字台上总是十分整齐地摆着一摞摞手稿和每天要翻阅的资料。写字台前的一张藤椅是他每天工作的岗位，他每天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靠墙摆着两个大书架，里面有《凡尔哈伦诗选》、《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选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泰戈尔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泽东的著作。书架上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精装本，许多书的扉页上都有中外著名作家、诗人的题字。

书架间隙还摆着不少玉器、雕塑和小工艺品，中国外国的都有。他特别喜欢葫芦、海螺、椰子壳……他常说这些小玩艺能调动作家的

创作灵感。

在靠墙角的地方，有一对古朴的沙发和茶几，是艾青休息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书架最上层一个玻璃装的镜框里，镶着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照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留念。毛泽东穿着土布棉袄，裤子上打着补丁。艾青高高的身材，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

每当讲到延安那充满民主自由而又艰苦乐观的生活，艾青总是激动得手舞足蹈。他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好感。

从1941年艾青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多次约请诗人艾青到他的住所交谈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问题，4次给艾青亲笔写信。时隔20多年，52岁的艾青，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给我们这些后生小辈滔滔不绝地背诵毛主席给他的每一封来信：

艾青同志：

来信收到，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不知你意如何？顺致敬礼，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毛泽东

艾青同志：

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

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乞酌，此致敬礼

毛泽东

.....

艾青还拿出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颁发给他的“劳动模

范”勋章……他对延安生活是十分怀念的。

诗人艾青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十分敬重。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讲述他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交往。

30年代初期,年轻而热情的艾青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到上海,和艺术界的同仁举办了一次木刻版画展览,特别邀请鲁迅先生光临指导。这一天,鲁迅先生和夫人果然来了。艾青正在画展大厅门口做募捐登记工作。当鲁迅先生看完画展后,把一枚银币交给了艾青,艾青顺手给他开了一张收据。鲁迅先生把收据在手心揉成一个纸团,丢在路边。

艾青常向我们谈起莎士比亚。

他对这位世界公认的戏剧大师有较深的研究。他能脱口而出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不少富于哲理性的台词和十四行诗中掷地有声的佳句。

他说,莎士比亚是全世界公认的伟大戏剧家和杰出的诗人。他原来的职业是剧院门前为贵族牵马的下等人。因为他经常随剧团跑遍欧洲和世界许多国家,再加上他能勤奋读书,又非常熟悉舞台艺术,才写出了那么多成功的戏剧作品和优美诗篇。

他的这些精彩论述,是那样通俗易懂,那样深入浅出。他的文学观,他的创作实践,表明艾青在沿着一条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前进。他的美学理想和追求,影响和哺育了整整一代绿洲上的文学新人。

艾青多次谈到诗人闻捷和他的成名作《天山牧歌》和《复仇的火焰》。

他说:“闻捷姓赵,江苏丹阳人。原来在延安鲁艺文工团工作,经常扮演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他平时不爱多说话。以后调到新华社做记者工作。1949年10月,我第一野战军向祖国大西北挺进的时候。闻捷随军进疆,他一头扎进天山南北的大草原,熟悉哈萨克人民的风俗和历史的变迁,热情歌颂新疆各族人民。在诗歌表现形式方

面，他学习苏联伊萨柯夫斯基的特点，既可以当诗读又可以当歌词谱曲后演唱。他写出了很有特色的诗集《天山牧歌》，我很喜欢他的表现手法……”

艾青堪称一代尊师，他知识渊博，他的头脑简直是一部世界百科全书。农八师文工团的艺术工作者，大专院校的青年教师，军垦农场的政治工作者，都把艾青视为良师益友，每排出一台歌舞或者一台话剧，首先要听取艾青先生的意见。

在艾青的书房里，飞来了一封苏联汉学家写给他的亲笔信。他要把艾青的诗作翻译成俄文，还准备写一篇论述艾青诗歌艺术的理论文章。这对诗人艾青来说是巨大的精神安慰。

从四川大巴山流浪到准噶尔的文学青年杨牧，是老诗人的崇拜者之一。那年月，艾青正准备写反映军垦生活的长篇小说《从南泥湾到莫索湾》，他多次深入莫索湾垦区召开座谈会，了解军垦战士的创业史。这时候，杨牧正在农场基建连当工人。团场宣传队准备参加师的文艺调演，把杨牧借调来写文艺节目。

有一天，莫索湾农场宣传队正在开会，宣教股长领着一个大个子走了进来，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大诗人艾青，来我们团场搜集创作素材的……”顿时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候，杨牧心中默默地思索着：原来就是中外有名的大诗人艾青……

艾青住在农场招待所里，杨牧经常去看望他。他把自己的习作捧在老诗人面前请他指正。

艾青对杨牧的不少习作给予充分肯定。

艾青有头痛病，晚上睡不好觉，杨牧跑遍农场所有老中医家，为他购买中草药。

军垦农场连队的青年男女要举行婚礼，听说艾青是大诗人，通过熟人朋友请艾青写两句诗表示祝贺。有时候，艾青忙不过来，就让杨牧代笔，送给新郎新娘。

一串清脆的婚礼鞭炮声，打破了连队农家小院的平静。老军垦的

后代正在这里举行热闹的婚礼。农场宣传队吹奏起欢快的乐曲，新郎新娘正在向亲朋好友敬酒。杨牧陪着艾青走了进来。小院里爆发出阵阵掌声。新郎新娘向艾青敬酒。艾青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他说：“我和杨牧祝贺你们新婚之喜……”

有一次，王震将军和张仲瀚政委，邀请艾青一同参加兵团农学院的开学典礼。

几千名大学生们秩序井然地坐在主席台下，院党委宣传部长正在指挥全体师生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会场突然上爆发出海啸般的掌声。院党委书记把王震、张仲瀚让上主席台就坐后，会场上才慢慢安静下来。学院院长对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各位来宾一一作了介绍。

当介绍到诗人艾青时，会场上立刻像奶茶开了锅。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全体师生起立，都想好好看一看艾青是什么模样。有的大学生干脆就站在椅子上，生怕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摄影师的镁光灯，在艾青脸上一闪一闪……这种场面使主持会议的党委领导惊呆了。这是兵团农学院历史上破天荒的盛况。这些专门攻读农业科技知识的大学生，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艾青诗歌艺术的巨大魅力，也许不大清楚艾青在中国诗坛、国际诗坛的特殊地位，但是他们十分清楚，艾青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诗人。

一位戴了帽子的“右派”诗人，而且是《人民日报》曾经点了名的“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员，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诗人艾青在新疆的特殊声誉，说明这样一条真理：不管历史怎样颠倒，人们总是崇尚知识，崇尚人才，追求真善美，是金子总要闪闪发光。

艾青是十分幽默风趣的。

农八师文工团排了一台新戏，完全是按照样板戏的创作模式搞出来的，请师首长和艾青看戏。艾青坐在那里，不到15分钟就睡着了。在座谈讨论的时候，艾青戏谑地说：“演得太精彩了，把我带进了

梦乡……”座谈会上又是一阵开心的轰笑。

有个别人是出于好奇,要看一看艾青到底是个啥模样。艾青断然拒绝:“我又不是动物园的猴子,有什么好看的?”

七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作家的幸福是为人民写作。

对于一个有着辉煌成就的作家来说,因为政治上莫须有的罪名,作品不能发表,他的心情是痛苦的。有时候,他几乎伤心地流下眼泪。

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中国的沙漠》,导演殷红请艾青写解说词。他知道艾青高深的艺术功力,又知道艾青这些年一直久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大沙漠有着深刻的研究。艾青的解说词写得很有色彩,导演已经拍板,决定用艾青的作品。

当《中国的沙漠》正式公演的时候,艾青全家去看电影。奇怪,画面和音乐还是原来的样子,解说词却换了别人的作品。艾青心情非常郁闷。

从北京调到《新疆文学》编辑部任副主编的王谷林,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大胆地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艾青几首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艾青的作品能刊登在《新疆文学》十分显著的版面,负责人

没有力排众议的斗争精神是不可想像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相反，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论，倒漂浮在上面四处泛滥。

艾青，这块中国诗坛上熠熠闪光的黄金，被历史的风暴卷到了浊浪排空的河底，埋进流沙之中。

每当暴风雨到来之前，天气总是格外闷热，天边一团团的乌云滚滚而来，树叶和花草耷拉着脑袋，蝈蝈和蟋蟀在草丛中不停地鸣叫，仿佛预言和告诫着人们，这里将发生一场令人痛心的灾难。

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书写在高大的建筑物上。

成都部队五十四军军长丁盛调到新疆，任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丁盛一到兵团主持工作，就对张仲瀚十几年的工作进行了全盘否定。他要从阶级分析入手，彻底揭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揭这盖子，石河子是一个突破口，张仲瀚在石河子有社会基础……

这座戈壁滩上的军垦新城，将失去往日应有的平静。艾青一家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几个版面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全国拉开了。紧接着，姚文元又发表了长篇文章《评三家村》，北京的红卫兵揪斗了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6年，军垦新城的春天来得晚，虽然是4月天气，然而，一阵阵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一股使人无法理解的寒流吹进了千家万户。这里的人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各种彩色的传单像雪片一样飘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

自治区文联揪出了新疆的“三家村”主将王谷林。他的主要“罪

行”是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大右派艾青的几首诗。因为是艾青写的,所以是大毒草。这座军垦新城里,“三家村”的黑掌柜自然就是艾青了,几千张大字报一个口径:

“艾青——封资修文学的吹鼓手”

“网罗牛鬼蛇神的地下俱乐部”

“与大右派艾青划清界线”

……

每一张大字报上,艾青的名字都用红笔打了叉。

艾青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每天他都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艾青总是轻轻一笑,姗姗离去。有个别文学青年,曾经自称是艾青的崇拜者,艾青的学生,在这场突然而来的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也变幻了另一张脸谱,写大字报“揭发”他。

一天早晨,艾青一家正在吃早饭,突然闯进来一群年轻人,他们胳膊上戴着红袖标,手里拿着棍子,大声吆喝着,把艾青一家赶到了外间,胡乱翻阅着艾青的手稿和藏书,把他的书房弄得乱七八糟。这些“左”得出奇的“野战军”,对泰戈尔、莎士比亚、凡尔哈伦、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著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一窍不通,甚至把毛泽东、吴玉章、张闻天、周恩来写给艾青的亲笔信也统统拿走。

艾青的家被抄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在北京点了张仲瀚的名。丁盛乘机操纵造反“野战军”,把张仲瀚强行剃了光头抹了黑脸,押上汽车在乌鲁木齐和石河子游街示众后,投进了监狱。

艾青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

他回忆着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他想到自己追求的事业,也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想到自杀,了却自己苦难的一生。他又想到妻子想到孩子,对于他们还有没有尽完的义务,所以,只有从悲观的念头

中坚强地站起来。

正当艾青的心情十分苦闷的时候，农八师机关的大字报专栏里，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艾青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艾青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打倒的一只死老虎，把斗争矛头指向艾青，是方向路线错误，根据中共中央十六条决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艾青……”

斗争艾青的热潮一下子开始降温了。

八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大地。

——艾青：《雪落在中国土地上》

1967年1月26日，艾青生活的这座军垦新城，因为两派的夺权斗争而酿成了重大的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第一枪。

4月的一天，艾青家中闯进了一伙人，他们阴阳怪气地说：“是不是要我们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呀？”不由分说，把行李和家具一股脑儿扔到门口的大汽车上，把艾青一家送到了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边沿。人们称这个地方是天山下的“小西伯利亚”。

这期间，丁盛在石河子办了两件大事，每件大事都可以说和艾青有关。

第一，举办了“一·二六”阶级斗争展览馆，把全国武斗第一枪说成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打响的。他们绘制了一张张图片，扎成一个个草人，拍摄了大量照片，从而说明兵团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讲解员点名说，艾青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

第二，请自治区一位女剧作家以“一·二六”事件为素材，写了一部九场大型话剧《石城风暴》。演出台词中点了艾青的名，声言要永远把艾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艾青预感到自己将有更大的不幸，他让妻子高瑛带着孩子以探

亲为名回东北姥姥家。再不能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坐土飞机”、戴高帽子的狼狈场面。

起初，艾青一家人住在连队两间土坯房里。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干脆把他们赶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里面没有电灯，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地窝子又矮，艾青人高马大，连腰也直不起来。他向连队领导提出：“起码得让我能直起身子……”于是，在老职工的帮助下，向地下挖下去 50 公分，才勉强可以直起腰抬起头。

起先，连队领导叫艾青管理林带。他每天拿着一把大剪刀修剪树枝。他像一位造型艺术家把长长的林带修剪得整整齐齐美观大方。

一天，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连队领导向艾青走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打扫厕所……”

于是，艾青又开始了清扫十几个露天厕所的繁重工作。严寒的冬天，艾青用一根钢钎捣着那些冻成硬块的粪便；酷热的夏季，他用大马勺把粪便舀出，倒进积肥坑里。一年四季，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劳动态度受到广大军垦战士的好评。老职工习惯地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艾青伯伯。连队的孩子们称他艾青老爷爷。

但是，也有个别连队领导吹毛求疵，批评艾青打扫的厕所里有苍蝇。机智的艾青反问道：“你家的厨房里有没有苍蝇？”一句话问得他无言对答。

“当当！”“当当！”连队的文书，半夜三更把拖拉机钢圈做的钟敲得震天响，真像是失火了。男人女人们，披上衣服，胳膊窝挟上一只小板凳，向连队大食堂集中。往往在这种时候，艾青也像一位朴实的农工，和三五成群的老头老婆走向集合地点，找个地方坐下来。连队职工到得差不多了，指导员宣布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绝密文件。

一个声音高叫着：“地富反坏右滚出去！”“艾青滚出去！”“中央绝密文件不许你们听！”艾青在众目睽睽下挟着小板凳走出会场。

原来是传达林彪、叶群、林立果叛国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的中央文件。有一位老农工，把文件从连队办公室悄悄偷出来，顶着满

星月，送到艾青的地窝子。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连队党支部知道了这件事，一场大祸从天而降，老农工成了泄露中央机密的反革命罪犯。他们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审讯。

艾青在连队劳动改造，工资却由农八师管理科发放，每月只发给45元生活费维持一家5口人生活，一日三餐吃玉米面，没有钱买香烟，没有钱给孩子们买肉吃。别人扔掉了一只冻死的小猪，高瑛把它捡回来，烧燎得干干净净，做得美味可口。

艾青一家永远忘不了在“小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中给过他们温暖、给过他们厚爱的老军垦战士和他们的下一代。就在那个经济全面崩溃的年代，连队职工省下白面，顶着月光悄悄送到艾青一家居住的地窝子里。有的职工给艾青送去了一包包新疆土特产莫合烟。有的老职工从南方老家回来，捎来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他们都给艾青送去。他们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向他伸出了友谊的双手。

上海支边青年郭建雄是艾青一家的朋友。他和艾青一家的友谊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他不怕人们风言风语的议论，经常走进艾青那间低矮的小屋，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跑到很远的维吾尔村落，去为艾青一家购买农畜产品、生活用品；到镇的新华书店为艾青购买新书；到团场的小邮电所为艾青发信取包裹……艾青的孩子们亲切地称他小郭叔叔，他把艾青看成忘年之交。

1970年，小郭结识了一位四川姑娘小杨，艾青一家为他们穿针引线，扮演红娘的角色。小郭在农场连队没有亲人，艾青、高瑛像对待自己的亲属一样，热心为他们操办婚事。

时至今日，郭建雄夫妇还珍藏着艾青、高瑛送给他们的结婚礼品，一口上海产的钢精锅。他们舍不得使用，21年过去，这口钢精锅仍然银光瓦亮。他们说，看到这件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想到艾青一家对他们的厚爱。

郭建雄的爱人小杨生孩子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分混乱的年月。那天晚上，因为连队卫生员有事不在，连队距离场部医院有

十多公里，交通又不方便，艾青建议高瑛去承担这项工作。手脚利索的高瑛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双手迎接了这个大漠上的小生命。当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艾青脸上露出了微笑。

当艾青要回北京看病，是小郭全家在连队的大路口为老朋友送行。小郭用一辆自行车送他，从连队到团部汽车站往返 30 多里。艾青深有感触地说：“小郭，真想不到，我今天是坐着你的自行车返回故里去的……”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会后，只身返回他的连队。北风卷着雪花在大漠上飘落，旷野里特别寂静。艾青双肩上落了厚厚的雪花，眉毛上挂着串串冰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家中走去。

一辆拖拉机尾随而来，开车的青年驾驶员是一位老军垦战士的儿子。他把拖拉机突然停在披着满身雪花的艾青面前，十分恭敬地说：“艾老师，快上车吧！”

“你这是……”

“我是专门赶来接你回家的……”

“你就不怕他们……”

“怕个×，顶多就是不开这个破车，有啥了不起。艾老师，快上车吧！”

他扶着艾青登上驾驶台，掏出“红山牌”香烟：“快抽根烟吧，这帮狗日的王八蛋，整你这样的老头子……”

艾青深深吸了一口香烟。

“艾老师，我读过你出的诗集，一点也不反动。他们这帮家伙不学无术，狗眼看人低。”

艾青十分欣慰地说：“小同志，我真感谢您。”

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艾青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在吃饭的时候，不懂人间辛酸的儿子小旦旦，总是把碗里的饭吃不干净，就急着出去找邻居的孩子玩。每当这种时候，艾青总是把孩子们吃剩的

饭，扒到自己饭碗里，他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一粒米一根面条来之不易。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艾青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典型教材。知识多了有什么好处，中外有名的大诗人，不是一样扛着大马勺掏大粪吗！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张发人深思的答卷》却被“四人帮”吹得天花乱坠，通过广播、报纸，飞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由于心情郁闷，由于营养不良，由于住宿条件恶劣，由于连队医疗条件所限，艾青的右眼视力锐减，经过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白内障。好心的医生说：“你是作家，不能没有眼睛。我写证明，你赶快去北京治疗吧！”

九

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
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
不是靠地球的转动，
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春天。

——艾青：《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

林彪折戟沉沙，对于盛是个惨重的打击。毛泽东当面批评丁盛，说他上了林彪的贼船。就是这个丁盛，在新疆工作期间，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建设兵团的革命和生产，相当一批老干部、起义将领、知识分子惨遭迫害。诗人艾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周总理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时候，有几个外国文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当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询问艾青的近况。

这年秋末冬初，当艾青家的地窝子升起缕缕蓝色的炊烟，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了诗人的门口。兵团组织部派干部找艾青谈话，传达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

1972年那个杨花飞絮的春天，63岁的艾青经历了5年多的“劳改改造”后，全家被重新接回到军垦新城石河子，住进师部招待所二楼的两间客房里。

那些文学青年、报社记者、大学生、文艺工作者、美术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各级领导干部、农场农工，纷纷找上门来，听艾青富有哲理而又机智幽默的谈话。

在农八师干部解放问题上，艾青是第一个。因为他是国务院关照过的人物。当时在师部机关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农八师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让艾青当班长，把所有的中央文件统统交给艾青，由他组织大家学习。

艾青的眼疾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不能读书不能写作的程度。农八师党委批准艾青去北京治疗。1973年春天，艾青在妻子高瑛的陪同下，又一次乘坐东去的列车，过长城进阳关，去寻找那失去的春天。

当时，“四人帮”还在政治舞台上猖獗。

特别是姚文元又一次挥动大棒，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点了艾青的名，指控他于40年代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是大毒草。

北京街头，高大的建筑物上，刷写着巨幅标语：

“评水浒、批宋江”

“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有些标语口号，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

这年9月，正是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艾青和高瑛离开了北京，回到了金华老家。他们想看一看大堰河的儿孙们现在是怎样生活的。艾青有30多年没有回故乡了，忘不了他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的大堰河的儿子。他怀念故乡那条滚滚流淌的小河和长满青草的河湾，他怀念童年的伙伴，他更怀念他的裸姆大堰河那黄土下紫色的灵魂，是否感到孤单和寂寞……

另一方面，他确实看到中国文坛被“四人帮”这伙恶棍所占领，他也无力与他们抗争，准备告老还乡，在金华安度晚年。金华的乡亲们多么希望艾青这个从板田村飞向全国飞向世界的才子，晚年落叶归根。

9月底，艾青夫妇告别了养育了他的故乡金华老家，又一次乘坐西去的列车，回到了这座天山脚下的军垦新城。

.....

1975年春天，美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毛泽东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参观访问。他在毛泽东主席的书房内，拜会了这位领袖人物。斯诺先生感到十分伤感，这一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老朋友。

斯诺先生率领的美国新闻工作代表团在王海蓉、唐闻生陪同下，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当交谈到在延安写《西行漫记》的趣事时，果然都很开心。

说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艾青：“他是个幽默风趣的诗人。”

周总理点点头，说：“中美两国进步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斯诺先生，你的记忆力非常好。”

斯诺先生又说：“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给予很高的评价。法国和香港都在出版《艾青诗选》，美国有好几所大学把艾青的诗作选为教材……”

周恩来说：“斯诺先生，你提供了很好的文艺信息。”

斯诺又问：“总理先生，怎么很久不见艾青发表新作了，他不写了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

周恩来说：“他在基层体验生活……”

《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美国友好人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和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中国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理论界，以及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建设

人们都心中暗暗高兴：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人群万头攒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是花圈和诗词的海洋。艾青头戴大皮帽，身着兵团农场老军垦的黄棉衣，一条灰色的长围巾，俨然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军垦职工，站在纪念碑前，眼中涌现出泪花。

事后，他饱蘸一腔沸腾的热血写成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艾青才得到彻底平反。

俄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艾青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之路，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人民的怀抱。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近五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天山脚下的准噶尔绿洲上度过的。

新疆人民没有忘记艾青，艾青也没有忘记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天山脚下那块充满希望的绿洲，在诗人艾青的影响下，正崛起一支阵容可观的文学新军。

艾青的一生是极富有戏剧性的。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六年岁月更富有传奇色彩。他的沉浮，他的欢笑，他的眼泪，总是和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息息相关。

艾青的道路，风风雨雨，光辉灿烂。

姚文元的道路，平步青云，跌向深渊。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1987年8月13日初稿 1991年6月第5稿)

人

物

模范旗帜蒲根桂^①

黄友胜

蒲根桂是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一连一排长，现年43岁，优秀共产党员。三年来，他在党的教育下，在火热的生产战线上，为人民立过3次特等功。1950年曾出席全国和兵团首届英模会议；1951年又出席西北首届英模会议；1952年在纪念党的31周年时，光荣地被评为模范党员；去年9月在兵团“速成识字训练班”学习，又被评为“甲等学习模范”；去年年终总结，再次被评为兵团“一级劳模”。

蒲根桂是我们生产战线上的光辉旗帜。1950年，他领导的班被评为“模范班”，在全国英模会上获得集体奖。1951年，他领导的排被评为“模范排”，1952年，再度被评为“模范排”，排里有一半人立了功。去年该团党委决定开展学习蒲根桂运动。全团通过蒲根桂典型人物的启发教育，大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荣誉感。该团去年就涌现了新的功臣能手416人，模范班、排19个。使全团在生产与思想上取得新的成就。

蒲根桂是生产战线上的坚强勇士，他具有科学组织的领导才能。1951年，他领导的19人小组，胜利地完成了1080亩的耕种任务，并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利用空余时间挖了16丈深的水井，开了一条

^① 蒲根桂等6位人物的资料均选自二十二兵团1953年1月第二届生产战线劳动模范代表会的原始材料。

200 多米的新渠。1952 年他们排犁地播种 7 000 多亩,收获小麦 137.57 万公斤,水稻 13.85 万公斤,杂粮 7 920 公斤。

蒲根桂深知劳动组织与技术特长相结合的重要性。去年生产开始,他就按人马强弱,技术高低,编组犁地:全排 37 人分为 4 个组,技术较好的同志配备到技术较差的组去进行指导,同时动员大家订出数量、质量全好的计划。打场时提出“摊不匀不碾,碾不净不起,抖不净不捆草,边扬边掠,大秸掠不净不入仓”的连环检查法口号。这一严密组织使 1 710 亩小麦原订 31 天打完,结果 18 天就完成了。

蒲根桂虽然连年立功,可并不骄傲自满,仍然生活在战士中间,爱护战士犹如手足,关心战士无微不至。1950 年南山拉木料,天气很冷,他把自己的皮大衣、毡筒借给同志们。今年排里王友民病了,他端水送饭,并将自己积蓄的 3 个月津贴给他买药、买食品。

蒲根桂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他经常教育大家爱护国家财产:“一粒粮食一滴汗。”“一年庄稼两年种,糟蹋了怎样对得起毛主席?”排里同志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去年的套具用的绳是用芨芨草和麻拧的,此外,从粮库角落和缝隙里扫出马料 3 000 多斤。

蒲根桂深深感到没文化的痛苦,因此,去年 9 月间在兵团速成识字训练班学习时,每天晚睡早起,集中思想,苦学苦练。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从识 85 个字提高到 2 111 个字,荣获“甲等学习模范”的光荣称号。在毕业典礼上,他感激地说:“毛主席过去使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今天又使我在文化上翻了身,毛主席的恩情真是说不完呵!”

一级劳模李彦西

张迪平

骑八师独立营副政指李彦西是出席北京全国英模大会及西北军区英模会议的特等劳动模范，1952年他又以突出的成绩与模范事迹获得了一级劳模的光荣称号。

1952年春初，他从兰州参加西北军区生产代表会议回来以后，经过短期的“三反”后，就卷入到紧张的挖渠工作中，第一天他领导的小组便创造了平均每人13立方米的最高纪录。他根据小组情况，组织体强的帮助体弱的，路近时让体强的装土，路远时让体弱的装土，挑土的人一人走一条路，互不相碍，节约了时间，同时利用文娱活动（如讲英模故事等）来鼓励大家的情绪。在迎接“七一”节日时，小组每人每天平均挖29.5立方米，每人每天需挑1245担，每担60公斤，距离是40多米，等于一天要走51公里。所以他领导的小组始终是挖玛纳斯大渠的最高纪录小组。

由于李彦西的优良品质，他不仅在生产建设中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创造精神，而且在其他工作上同样发挥着高度为人民的积极性和钻研性。在部队初来石河子时，最困难的是吃面，领导就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他对磨面工作完全生疏，而且在他未去以前，磨子是才租的，一盘磨一天磨不到4“塔合”麦子，出面率也很低，每天地上要落1厘米厚的面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李彦西与大家研究，提出了“人停磨不停，保证部队不缺面”的口号，并且他又研究了改良

箩底，杜绝了向外漏面的现象，于是一盘磨每天提高到磨8“塔合”麦子，出面率亦大大提高，每百公斤麦子磨面43.5公斤，有数次还磨到45公斤以上。

领导派他到伊犁去买马买猪，返回时用一辆大车运了11口大猪，李彦西和另外两个同志要把猪运到石河子，从伊犁到石河子需要八九天，宿营要把猪从车上放下来，清早再一个个绑起来往车上装。他们3个人在伊犁买了50个馕预备在芦草沟再继续补充，但是到达芦草沟时买不到面粉，路途又不能耽误，他们顽强地继续前进。行至新二台时他们便每顿吃个半饱，到了三台只剩下8个小馕，李彦西让其他两个同志吃，他只捡了捡馕渣渣，第三天只剩下两个小馕，李彦西仍是劝他俩吃。此刻，天气热得使得猪嘴冒沫，奄奄一息，如果不走，人饿得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彦西极力忍受着腹中的饥饿，而兴奋地讲起志愿军克服困难的英雄主义事迹，大家听了，于是愉快地前进了。直赶过190公里的戈壁滩到了五台，回到部队，他的眼中已呈现红丝，面孔又黑又瘦。他说：“这不算什么，为了祖国必须增产节约，同时也要改善部队生活。”

李彦西虽然获得了光荣的一级劳模称号，但是他非常虚心，他说：“没有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培养，没有群众的帮助，光荣又从哪里来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无论什么英雄模范，离开群众就一事无成，必须向群众学习，在群众中起三大作用。’”同时他说，“我很惭愧，谈不到功劳，缺点很多，遇事急躁，这对工作就是损失，我一定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来完成1953年的任务。”

特等功臣王月云

黎肇文 何光铨

王月云是兵直景化被服厂的一位女战士，1951年4月由甘肃武威参军来新疆。由于她勤学苦练，积极钻研，在1952年的各项工作中成绩突出，提前超额完成上级所给予的工作任务，获得了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去年5月1日被服厂正式开工，王月云被分配到鞋工厂切鞋底，全组十个人只她一个是女同志，好些同志都说：“女同志怕干不了吧？”但她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她想，男同志和女同志有什么两样？只要虚心学习，什么工作都可以学会。起初，切一天鞋底下来，腰酸臂痛，但她想到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美帝的时候，一股力量马上就来了，始终不懈地坚持着工作。由于她不断地钻研，发现磨刀的次数太多，占去不少时间，影响效率，后来她掌握了用力平磨的方法，刀也不容易钝了，每切5双才磨一次，工作效率提高了3倍，由每天切50双提高到150双，超过原定标准200%。许多工龄久的同志惊奇地说：“在工厂十几年，还没有见过男同志有过这样的纪录，别说她是女同志了。”

王月云认识到一个人做得再快再好，成绩也不会很大，只有大家把工作效率提高，对国家的贡献才大。因此她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介绍给别人。如在摊棉服里布时，最初要两个人摊才能供上一个人裁，而她一个人就能供上两个人裁。别人问她为什么摊得这样快，她说：“工

作时思想要集中,抓紧时间,动作要快,事先要做好充分准备。”大家学了她的方法后,工作效率很快就提高了。

冬天到了,领导号召突击冬服,每天加班 1 小时。王月云积极响应号召,自愿报名参加突击任务,她想到在生产战线上的战士们受冻就好像自己受冻一样,所以她订出每天裁帽 1 000 个的计划,在实际工作中,超额完成了计划,创造了 1 天裁 1 500 个的最高纪录,超过定额 50%,并节省布料 600 平方米。

为了使冬服工作顺利完成,接着王月云参加了女工厂的行棉衣工作,创造了天行棉衣 7 件又 24 对袖子的新纪录。工作效率超过一般同志两倍多。

王月云不仅超额完成各项正式工作任务,而且能抓紧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来进行其他工作。如在最迫切的裁剪工作中,抓紧时间行棉衣,锁扣眼,并经常每天早晨起来打扫工房,给同志们打洗脸水。她的模范行为,带动了全组,发起了挑战竞赛,使全组的任务顺利完成。因此该组在红旗竞赛中,夺得 4 次红旗,被评为工厂的模范组,这与王月云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棉花高产纪录创造者姚象荣

陈 誉

姚象荣是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一连班长,1950、1951年的一等功臣,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由他们10名战士和农学院植棉实习的3位女同志共13人组成植棉组,担负12亩丰产田和180亩种子田为重点和整个大田的检查、指导的任务,创全国最高纪录。

姚象荣在接受这个任务后,进行了地块的选择,确定了只种过一年小麦的秋翻地作为丰产区 and 种子区。姚象荣在1951年为连的生产干事,对于作物的生长和耕作方法都很注意,1951年秋到农业学校学习了4个月,回连后与班里在老家种过棉花的同志一起订出丰产田亩产250公斤、大田亩产150公斤的计划和耕作方法。并将全班分成两个组,以党员阎逊得为组长形成党的骨干和中心领导,团结群众进行工作,凡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先由姚象荣和阎逊得在党的小组进行研究,再和排长研究决定后才进行工作。

姚象荣对作物的轮作和土壤的配合是很注意的。丰产地是年久的荒地,只播种过一次小麦的轮作地,并为沙质土壤。在棉花地秋翻中注意了犁地深度和适时冬灌;春化后,为保墒及时进行春耙和平整土地,为丰产打下基础。

姚象荣丰产组为确保棉花丰产,狠抓了田间管理,特别是在幼苗的生长发育期长苗的控制是田间管理的主要工作。1952年5月中旬,丰产区发现地老虎和截根虫的危害,不几天,又发生绿色蚜虫,6

月初,更严重的发生黑色草虫,专吃棉心,造成了严重的缺苗现象。但在姚象荣的领导下,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地老虎先由姚象荣和代理排长李廷禄研究用油渣 10 公斤、麸皮 1.5 公斤、白砒霜 1.5 公斤混合拌入,作为毒饵挖沟埋入土中捕杀;对绿色草虫,用烟草 0.5 公斤、水 30 公斤、石灰少许混合撒手田间捕杀,田埂和树上用烟熏后再用 2% 的食盐水处理;对黑色蚜虫用“666”粉和烟草水多次捕杀都不能生效,和李廷禄研究终于发明了用 1% 辣子水,加少许卤盐撒在田间,收到全部杀伤之效,对棉田无多大伤害。采取上述措施,挽救了棉苗。

7 月上旬,棉已长到 30 公分,对真叶脱裤腿有些晚了,为抢时间提出在脱裤腿时手眼配合,先换眼后换手,每手一行的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时间。当棉结铃,花蕾每株 20~25 个,已有风长现象,为适时合理控制棉株生长,坚决进行了整枝打尖。姚象荣吸收了报纸上介绍的经验,为争取多收霜前花,采取了断根,减少了棉的吸收力,促进了棉花的早熟。

在收获前,为确保丰产丰收,在物资上、思想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收获时,全组平均达到 32 公斤,阎逊得每亩拾花 250 公斤。

姚象荣组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国增产热情,发扬了新英雄主义,并能用现有的工作条件,先进的科学栽培,获得了丰收。

小麦丰产能手王伯生

黄友胜

我军驻新疆部队，1952年在参加全国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的丰产小组。王伯生领导的春小麦丰产小组，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伯生小组的丰产地 29.27 亩，平均亩产 433.83 公斤，其中 4 亩平均亩产 526.91 公斤，超过国家农业部春麦奖励标准 1.35 倍，荣获农业部 1952 年爱国丰产奖旗一面，奖章一枚，奖金 300 元。

王伯生系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五连 22 岁的年轻战士，甘肃省武威县人。三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工作中一贯积极勇敢，热情肯干，1951 年光荣地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 年在党的生日“七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 年被评为一等功臣，去年评为特等功臣，此次出席了兵团劳模大会。

去年春天，王伯生一听到中央号召参加爱国丰产竞赛的消息，心里就盘算着：“人家也是两只手，我也是两只手，我为啥不能够参加。”后来他又想：“要是参加，完不成任务又咋办？”经过再三考虑，他想起了一句俗语：“只要有信心，铁棒磨成针。”于是他鼓足了勇气，向连领导请求，答应他参加小麦丰产竞赛，领导见他决心很大，就答应了，并派蔡国有、相洪元两同志与他一起干。他马上与蔡、相两同志订计划、下决心，向组织上坚决表示：“虚心接受先进的耕作经验，保证平均每亩产 400 公斤。”

王伯生为保证小麦丰收,达到原计划,首先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积肥。他带领着组内两个同志,白天整地,晚上就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积肥,连续6个晚上运肥1.8万公斤。领导发现王伯生两肩压肿了,让他休息,并派了一辆大车,又给他们运了1.95万公斤,很快地完成了每亩积肥1500公斤的任务。

王伯生知道,要种好小麦,达到丰产,就要做到精心管理,慎重选种,合理播种,适当浇水、追肥,勤锄勤松,细心培植,勤锄草,分散收割等工作。

在田间管理工作中,王伯生曾与自然做过顽强的斗争。6月间正是麦子长得绿油油的茂盛可爱的时候,遭到蝗虫袭击,一下子又要不到药品,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割些草,烧成灰,利用早晨麦叶上有露水的时候,撒到上面。王伯生领导着组内两个同志,天不亮就起来撒灰,终于保证了麦苗的健康、丰美。他们怕麦子被风刮倒,就用芨草筑成耙子,挨次捆成四方形的井架,把麦秆系到上面,可是没想到,一场狂风,连麦秆带架子都被刮倒了。王伯生带领组里同志重新将架子加多加厚,使麦秆又挺身而起了。

麦子快近收割期,为了不使遭受到意外损失防止坏人破坏,在夜间他们不管蚊子如何猖狂,就拿一皮大衣躺在麦地旁边,一直看守到麦子全收割完。

由于王伯生的积极带头与高度克服困难的精神,为部队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获得了丰产经验。王伯生并不满足现有的成绩,他在劳模代表大会上作典型报告时,坚决表示:“在1953年我要以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来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教育。”

水稻丰产能手李大兴

白宏勋

曾经参加全国水稻丰产竞赛的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五连李大兴水稻丰产小组种水稻 100 亩,收获稻子 44 362.5 公斤,每亩平均产量 443.62 公斤,其中 6.8 亩高产地平均亩产为 563 公斤。

全组在接受任务后即积极进行选地、积肥、整地等工作。积肥 23.63 万公斤,其中有厩肥、苦豆子、人粪尿和骨粉。根据在小拐两年来的生产经验,在南 3.5 公里处选定了多年生的芦苇地轻粘质土壤,地表约有 10 厘米厚的腐殖质土,打苇焚烧,纵横深耕曝晒,以增加地力。

李大兴和组员们在生产中还总结出以下丰产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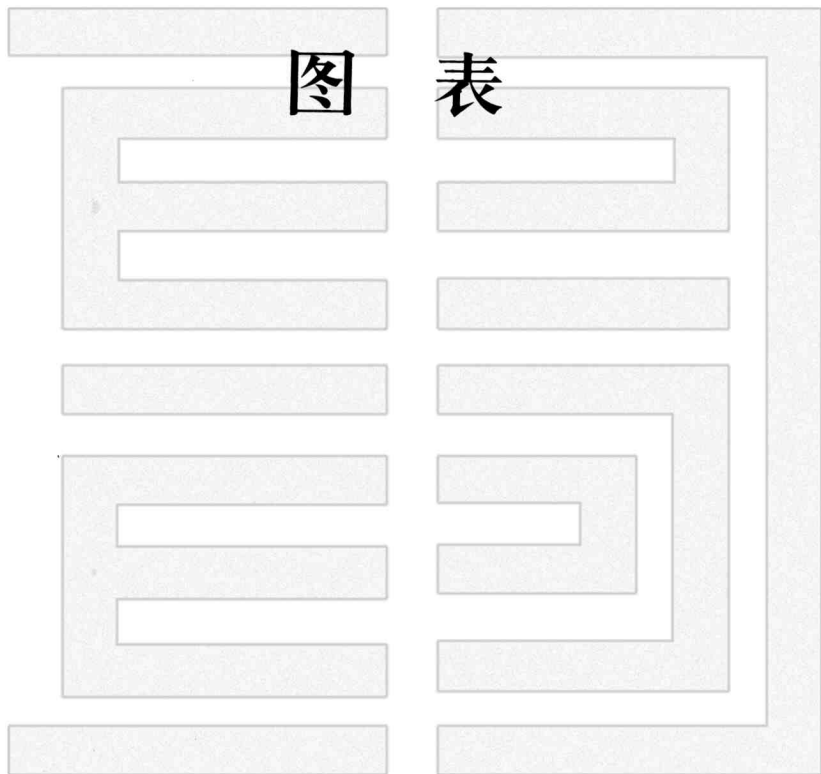
科学选种和良好的播种方法。种子是 1951 年选好的白芒品种,播种前精选机精选、浸泡、发芽试验,结果发芽率为 70% 强,确定播种量为 8~8.5 公斤。播种方法根据新疆一般经验采用标准式的泥水点播,其盘式的株行距,横直整齐,操作起来方便,易于吸收养分。

适时适量灌溉,做好保苗。适时换水,经常检查水量适度,待苗出齐后即进行查苗,如遇缺苗的地方,立即补苗,以保持应有的株数。

清除杂草,适时追肥。他们将地划为三等,不同等级施不同数量的肥料。进行一次踩秧,以促使肥料在地里充分发酵溶解,使稻苗容易吸收,并且适时排水,防止倒伏。

图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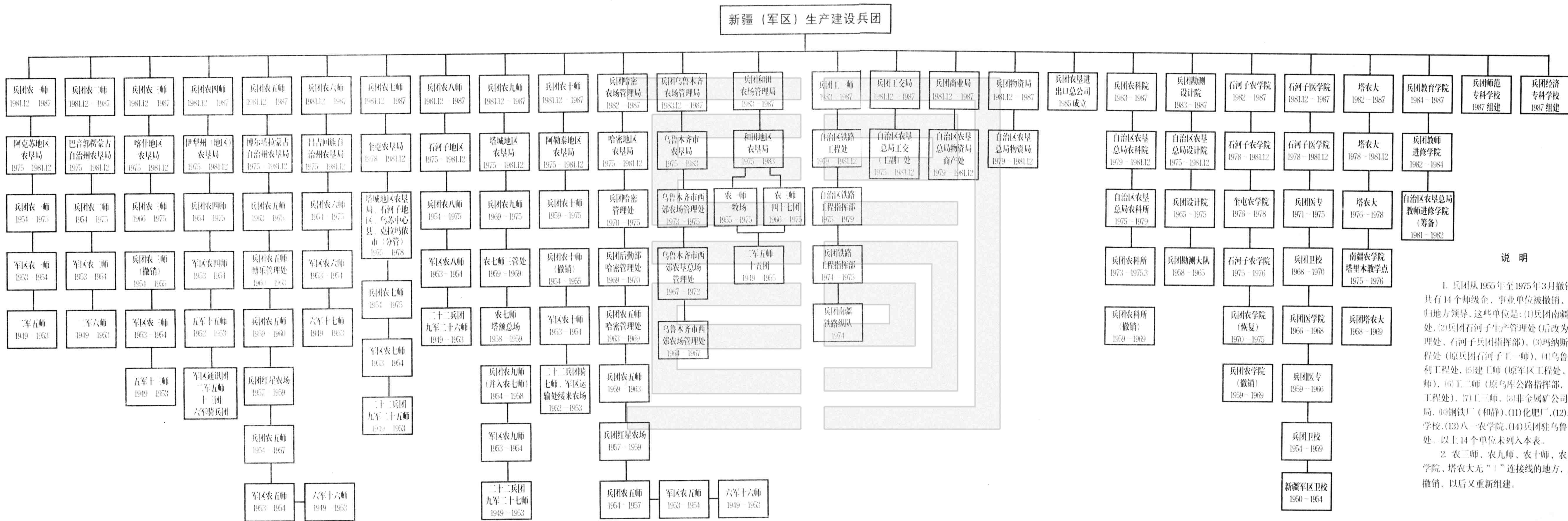
说 明

一、所公布的 5 个图表，系根据《兵团发展史》（初稿）、《新疆屯垦》（赵予征著）、《兵团农牧团场概况》、《兵团史料选辑》、《兵团简志·建筑材料篇》等有关资料反复对照考证编制而成，有关数据经兵团土地管理局核定，定稿于 1996 年。其目的是较集中地提供一份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关于兵团农业生产单位组织状况 46 年演变过程的简明资料。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变迁情况一览表》中的各团场变迁资料，来源于部分师、团志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概况》。本表所列均系各师局团级农牧场，营级或相当营级的农牧场（站）均未列入，但土地面积均在各师局总面积内。各团场驻地均系“自然镇”。因年久，资料不全，难免有误，敬请读者见谅。

三、拟稿：武耀中、王黎、刘效弟、漆开元。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师级单位沿革示意图（1949~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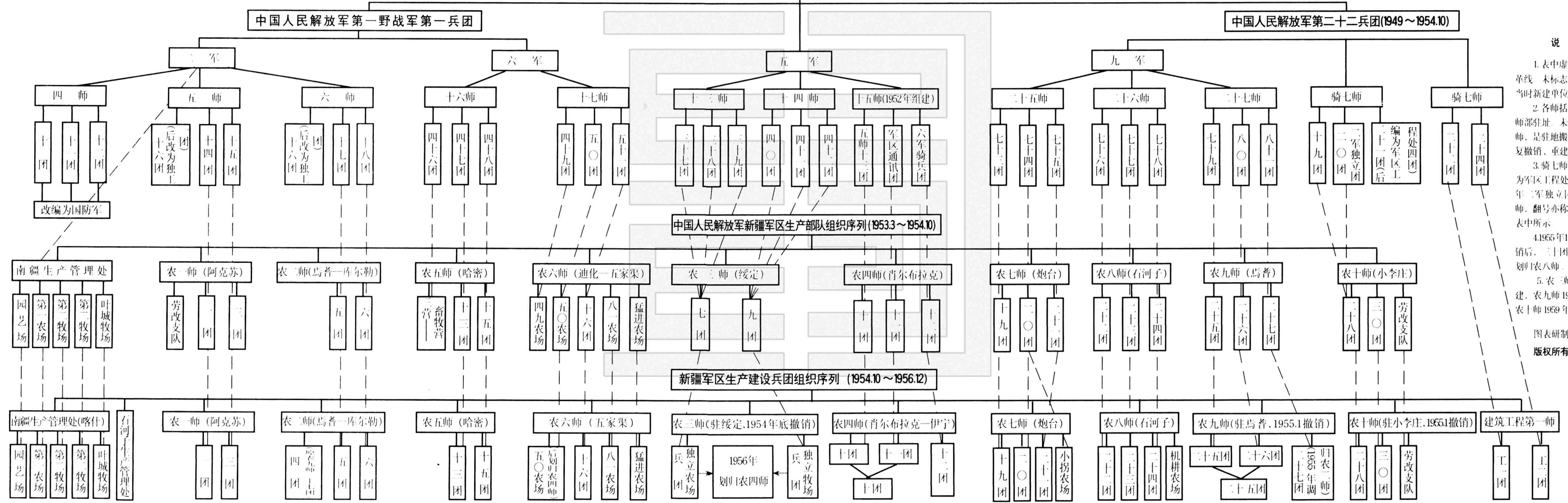
说明

1. 兵团从1955年至1975年3月撤销体制止，共有14个师级企、事业单位被撤销、合并或交归地方领导，这些单位是：(1)兵团南疆生产管理处，(2)兵团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后改为石河子管理处、石河子兵团指挥部)，(3)玛纳斯河水利工程处(原兵团石河子工一师)，(4)乌鲁木齐市水利管理处，(5)建工师(原军区工程处、兵团工一师)，(6)工二师(原乌库公路指挥部，后改第二工程处)，(7)工三师，(8)非金属矿公司，(9)矿务局，(10)钢铁厂(和静)，(11)化肥厂，(12)政治干部学校，(13)八一农学院，(14)兵团驻乌鲁木齐留守处。以上14个单位未列入本表。

2. 农三师、农九师、农十师、农科院、农学院、塔农大无“|”连接线的地方，系原单位撤销，以后又重新组建。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前后农牧团场以上组织序列沿革示意图 (1949.11~1956.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组织序列 (1949.11~1953.3)



说明

- 表中虚线为组织沿革线，未标志虚线的团为当时新建单位。
- 各师括号内地名为师部驻地。未标示驻址的师，是驻地搬迁过多或反复撤销、重建的师。
- 骑七师原二十团编为军区工程处二团。1952年二军独立团编入骑七师，番号亦称二十团，为表中所示。
- 1955年1月农十师撤销后，三十团、劳改支队划归农八师。
- 农三师1966年重建，农九师1969年重建，农十师1959年重建。

图表研制：王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变迁情况一览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农一师			阿克苏市	683.40	154.90	辖 17 个农牧团场	
一团	一团	1950 年	阿克苏市	56.50	16.05	前身三五九旅七一八团,1949 年 2 月改为五师十四团,1953 年改为农一师一团。	
二团	胜利四场	1956 年	阿克苏市新井子镇	37.29	11.69	1956 年胜利三场,1962 年改称胜利四场,1969 年 7 月改称二团。	
三团	胜利二场	1956 年	阿瓦提县哈拉库勒镇	38.25	11.06	1956 年 3 月胜利二场,1959 年改称胜利七场,1969 年 7 月改称三团。	
四团	胜利八场	1956 年	乌什县包孜镇	12.20	8.03	前身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一营,1949 年改为二军五师十四团一营,1953 年改编为农一师一团一营。1956 年胜利农牧场,1956 年改称胜利八场,1969 年 7 月改称四团。	
五团	胜利七场	1956 年	温宿县沙河镇	73.14	9.60	1956 年 6 月胜利七场,1959 年改称胜利九场,1969 年 7 月改称五团。	
六团	胜利五场	1958 年	温宿县荒地镇	24.15	6.60	1959 年改称胜利十场,1969 年 7 月改称六团。	
七团	胜利六场	1956 年	阿克苏市玛滩镇	23.36	9.58	原阿克苏县玛滩劳改农场,1956 年交农一师改称胜利六场,1958 年 12 月改称胜利十二场,1969 年 7 月改称七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八团	胜利十九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塔门镇	33.13	5.66	1958年改称胜利十三场,1969年7月改称八团。	
九团	胜利八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阿拉尔镇	45.68	10.93	1959年1月改称胜利十四场,1969年7月改称九团。	
十团	胜利九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科克库勒镇	32.61	8.02	1959年1月改称胜利十五场,1969年7月改称十团。	
十一团	工程大队		阿克苏市 花桥镇	24.47	7.19	1959年胜利三总队工程大队,1964年工程二支队,1970年8月改称十一团。	
十二团	共青团农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南口镇	35.99	12.35	该场系农一师职工、干部捐献建立的共青团农场,1969年改称十一团,1969年7月改称十二团。	
十三团	胜利十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幸福城镇	27.54	9.17	1959年改称胜利十六场,1969年7月改称十三团。	
十四团	胜利十二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夏合勒克镇	38.79	8.82	1958年兵团建筑工程处所属单位在此地开荒,时称农一师胜利十二场,1959年改称胜利十八场,1969年7月改称十四团。	
十五团	胜利十一场	1958年	阿克苏市 红桥镇	14.59	7.00	1959年改称胜利十七场,1969年7月改称十五团。	
十六团	十六团	1969年	阿克苏市 新开岭镇	22.95	8.49	由上游一场、上游水库管理处、工程二团、机运处农场合并建成十六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农二师			库勒勒市	1 107.40	87.23	辖 17 个农牧团场	
二十一团	十七团	1950 年	和静县 开来镇	47.13	7.53	前身二军六师十七团,1947 年在山东渤海建团。1953 年改称农五团,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一团。	
二十二团	八十一团	1950 年	和静县 才吾库勒 镇	82.11	8.67	原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1953 年 6 月为农九师二十七团,1956 年 2 月改编为农二师农四团,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二团。	
二十三团	种羊场	1960 年	和靖县 亚尔希根 查汗镇	18.68	4.48	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三团。	
二十四团	解放五场	1959 年	和硕县 夏尔托热镇	27.76	4.79	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四团。	
二十五团	七十九团	1950 年	博湖县 湖光镇	8.06	2.38	1950 年原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1954 年农二师师直农场,1958 年定名湖光农场,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五团。	
二十六团		1991 年	和硕县 城东	7.14	2.75		
二十七团	解放四场	1959 年	焉耆县 开南镇	37.17	12.5	1952 年原二军六师直属炮兵营及原五团扩建,1959 年并入种羊场称解放四场,1971 年和二十六团合并,1969 年 7 月改称二十七团。	
二十八团	博古西湖 农场	1956 年	库尔勒市 博古县镇	26.62	2.79	1958 年 1 月改称孔雀第一农场,1960 年改称兵团第二中级农业学校,1962 年撤销农校恢复原名,1969 年 9 月改称二十八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二十九团	十八团	1950年	库勒市 吾瓦镇	99.33	10.77	该团前身山东渤海教导旅三团,1947年11月编入二纵队,命名独立第六旅十八团,1953年改称农六团,1969年9月改称二十九团。	
三十团	孔雀四场	1958年	库勒市 双丰镇	65.45	6.26	1958年曾称库尔楚农场,1969年9月改称三十团。	
三十一团	共青团农场	1958年	尉犁县 英库勒镇	56.11	5.48	农二师干部、职工捐资组建,1969年9月改称三十一团。	
三十二团	塔四场	1958年	尉犁县 乌鲁克镇	32.50	4.23	1969年9月改称三十三团。	
三十三团	塔六场	1958年	尉犁县 库尔木依镇	62.10	4.72	1969年9月改称三十三团。	
三十四团	塔一场	1956年	尉犁县 铁干里克镇	88.75	4.24	1969年9月改称三十四团。	
三十五团	塔二场	1958年	尉犁县 卡拉米吉镇	56.90	3.90	1969年9月改称三十五团。	
三十六团	米兰农场	1965年	若羌县 米兰镇	54.77	5.00	该场原和巴州若羌县地方国营农场合并,1969年9月改称三十六团。	
二二三团	哈木呼提农场	1960年	和静县 哈木呼提镇	116.01 其中草地 64.50	2.51	1960年1月建场,1970年11月由地方移交兵团建筑工程师,1972年改称二二三团,1982年划归农二师。	
农三师			喀什市	1 206.39	84.20	辖 18 个农牧团场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四十一团	草湖农场	1950年	疏勒县 草湖镇	11.95	3.17	1950年二军教导团和联络部开荒,命名草湖农场,1952年称二军直农场,1953年称麦盖提农场,1956年并入前进一场,1966年划归农三师,1969年改称四十一团。	
四十二团	前进农场 岳普湖分场	1952年	岳普湖县 莫尔勒镇	21.26	4.45	前身二军四师十二团一营,1953年为农一师三团一营一连,1955年改称农一师前进农场岳普湖分场,1959年改称前进二场,1966年划归农三师,1969年改称四十二团。	
四十三团	麦盖提 农牧场	1953年	麦盖提县 棉丰镇	59.56	5.25	前身二军四师十团三营,1955年4月称前进农场麦盖提分场,1959年改称前进三场,1966年划归农三师,1969年7月改称四十三团。	
四十四团	前进四场	1966年	巴楚县 金墩镇	66.75	4.83	1968年10月前进七场与前进四场合并称前进四场,1969年7月改称四十四团。	
四十五团	前进五场	1966年	麦盖提县 博塔依拉克镇	55.53	5.84	由农二、八、六师抽职工组成,1969年7月改称四十五团。1970年8月四十五团和四十六团合并,撤销四十六团番号。	
四十八团	前进九场	1966年	巴楚县河 东新村镇	23.98	3.90	由兵团交部、石河子兵团抽人组成前进九场,1969年改称四十八团	
四十九团	图木舒克总 场二、四场	1958年	巴楚县 盖米里克镇	32.73	5.57	原自治区农垦厅图木舒克总场二、四场,1969年划归农三师,两场合并称四十九团。	
五〇团		1969年	巴楚县 其盖麦日镇	83.01	10.4	原自治区农垦厅巴楚总场的马扎湖分场(又名东方红农场)和夏河分场于1969年合并组成,改称五〇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迁
五十一团		1969年	巴楚县 图木舒克镇	211.6	12.12	原自治区农垦厅巴楚总场一部分,总场所属两个分场和畜牧场等1969年划归农三师,定名五十一团。
五十二团		1969年	巴楚县 齐干却勒镇	25.82	6.95	原自治区农垦厅巴楚总场齐干却勒分场和总场良种试验站1969年9月划归农三师,定名五十二团。
五十三团		1969年	巴楚县 皮恰克松地镇	18.49	8.19	原自治区农垦厅巴楚图木休克总场于1969年2月划归农三师,在原皮恰克分场的基础上组成五十三团。
伽师总场		1958年	伽师县 阿其克镇	90.20	6.19	1958年1月自治区农垦厅在伽师建场,1982年4月划归农三师。
农四师			伊宁市	996.16	155.02	辖19个农兵团场
六十一团	十三团	1962年	霍城县 小麻扎镇	157.98	12.35	1962年组建十三、十四团,1963年两团合并十三团,1969年改称61团
六十二团	东风农场	1962年	霍城县 金边镇	24.05	10.45	1962年11月由兵团机运处组建,1965年划归农四师,1969年改称六十二团。
六十三团	幸福农场	1960年	霍城县 榆树庄子镇	46.15	8.16	原兵团机运处幸福农场,1965年划归农四师,1969年改称六十三团。
六十四团	兵团独立农场	1953年	霍城县 可克达拉镇	54.45	12.31	1952年五军十四师四〇团,1954年称农三师七团,1956年划归农四师,1957年称可克达拉农场,1969年改称六十四团。
六十五团	清水河农场	1958年	霍城县 清水河镇	12.07	3.01	1969年改称六十五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六十六团	五〇团农场	1953年	霍城县 界梁子镇	35.72	7.99	前身六军十七师五〇团,1953年正式建立五〇团农场归农六师,1956年划归农四师称五〇农场,1969年改称六十六团。	
六十七团	察布查尔 一场	1959年	察布查尔县 裴新哈萨镇	91.12	3.63	1969年改称六十七团。	
六十八团	察布查尔 二场	1959年	察布查尔县 佛尔善镇	19.54	6.88	1969年改称六十八团。	
六十九团	共青团农场	1958年	察布查尔县 哈海镇	14.73	6.14	1958年职工捐献建立,1969年改称六十九团。	
七〇团	谊群农场	1958年	伊宁县 愉群翁镇	12.77	5.26	1969年改称七〇团。	
七十一团	十二团	1951年	新源县 霍斯乌特 开勒镇	24.30	10.16	前身六军骑兵团,1952年五军十五师骑兵团,1953年改编为农四师十二团,1969年改称七十一团。	
七十二团	十团	1952年	新源县 肖尔布拉克镇	39.04	7.48	前身红六军团,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二军五师十三团,五军十五师十三团,1953年改称十团,1954年与十一团合并称十团农场,1969年改称七十二团。	
七十三团	高尔基农场	1952年	巩留县 泊尔吉镇	43.02	3.20	原二军五师十三团二营机炮连,1953年改为十团八连,1958年改称十团农场高尔基分场,1960年组建为高尔基农场,1969年改称七十三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七十四团	红旗二场	1963年	昭苏县 坡马镇	116.79	6.84	1963年在自治区昭苏种马场坡马分场基础上改称红旗二场,1969年改称七十四团。	
七十五团	红旗一场	1959年	昭苏县 胡土呼尔镇	11.86	10.62	1969年改称七十五团。	
七十六团	红旗三场	1962年	昭苏县 吐尔根镇	89.78	19.04	1962年在昭苏县友谊牧场基础上组建,1963年昭苏县组成红旗四场,1964年并入红旗三场,1969年改称七十六团。	
七十七团	一牧场	1956年	昭苏县 科克吐拜镇	58.60	14.71	前身五军后勤供应站,后改称新疆军区第五生产合作社昭苏分社,1954年改编为兵团独立牧场第四牧场,1956年划归农四师改称一牧场,1966年称种马场,1969年改称七十七团。	
七十八团	四牧场	1959年	特克斯县 沿河镇	104.70 其中草场 42.83	1.23	前身兵团独立牧场第四分场,1956年归农四师改称一牧场,1994年3月改称七十八团。	
七十九团	二牧场	1953年	尼勒克县 则库镇	39.72 其中草场 33.90	3.68	前身五军十四师四十二团畜牧营,1953年兵团独立牧场二营,1956年划归农四师改称二牧场,1993年3月改称七十九团。	
农五师			博乐市	591.54	62.96	辖11个农牧团场	
八十一团	工程支队	1966年	博乐市 霍热镇	18.67	6.69	1964年五师组建工程支队,1966年,1968年红星三场、红星九场部分单位并入,1969年改称八十一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八十二团	精河农场	1959年	精河县 夏日托热镇	38.68	2.33	1965年1月工二师水工团艾比湖农场与兵团机运处农场汽一连合并称精河农场,1969年改称八十二团。	
八十三团	精博总场	1958年	精河县 沙山子镇	39.84	7.01	原农七师精博总场,1962年划归兵团工一师改称沙山子农场,1965年划归农五师,合并红星九场改称红星三场,1969年改称八十三团。	
八十四团	三牧场	1956年	博乐市 托里乡	133.21	8.01	原农四师三牧场,1963年9月红星十一场和红星十场合并改称农五师红星三牧场,1969年改称八十四团。	
八十五团	博乐牧场	1952年	博乐市 蒙古庙镇	52.54	2.38	原二十二兵团骑八师二十二、二十四团留守人员和一兵团部分人员组建为博乐牧场,属工一师。1955年划归农七师,与红旗牧场合并,1964年12月划归农五师称红星五场,1969年7月改称八十五团。	
八十六团	红星十六场	1960年	博乐市 青达拉镇	19.07	4.61	1963年改称红星六场,1969年7月改称八十六团。	
八十七团	红星十四场	1960年	温泉县 哈尔墩镇	42.89	5.95	1963年改称红星七场,1969年改称八十七团。	
八十八团	红星十二场	1960年	温泉县 博格达尔镇	72.09	4.96	1963年改称红星八场,1969年7月改称八十八团。	
八十九团	友谊农场	1959年	博乐市 塔斯尔海镇	35.21	11.22	1959年博乐县3个高级农业社合并建成地方国营农场定名友谊农场,1962年划归农五师,1966年改称红星九场,1969年改称八十九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九〇团	红星十五场	1960年	博乐市 塔格特镇	67.16	7.38	1963年改称红星十场,1969年改称九十团。	
九十一团	托托分场	1959年	精河县 托托镇	67.94	1.74	原农七师精博总场托托分场,1969年6月移交农五师改称九十一团。	
农六师			昌吉州五家渠	1 237.47	230.88	辖 19 个农牧团场	
一〇一—一〇二团	猛进农场	1952年	米泉 五家渠	14.84	8.86	1950年2月原六军农业指导处,1951年3月改编为六军军直农场,1952年1月六军十七师猛进农场,1969年7月改称一〇一—一〇二团。	
一〇二—一〇三团	八一农场	1952年	米泉 梧桐镇	50.72	12.53	1952年原名五一农场属新疆军区后勤部,1952年9月30日由彭德怀司令员批准命名八一农场,1969年改称一〇二团。	
一〇三—一〇四团	十六团	1953年	昌吉市 蔡家湖镇	81.87	14.37	前身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1953年改称农六师十六团,1969年改称一〇三团。	
一〇四—一〇五团	枣园农场	1959年	呼图壁县 枣园镇	24.43	7.55	1969年改称一〇五团。	
一〇五—一〇六团	马桥农场	1958年	呼图壁县 马桥镇	28.25	5.83	1960年8月天山十二场和天山十三场合并称马桥农场,1969年改称一〇六团。	
一〇六—一〇七团	天山牧场、 下新湖农场	1956年	吉木萨尔县 三台镇	120.65	11.50	1956年1月建场的天山牧场和1960年建场的下新湖农场于1969年6月合并称一〇七团。	
一〇七—一〇八团	天山第三、 第四农场	1958年	奇台县 湖沿镇	56.39	6.71	1960年9月天山三、四场合并为共青团农场,1969年改称一〇八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迁
一〇九团	天山二场	1959年	奇台县 骆驼井镇	6.69	4.81	1969年改称一〇九团。
一一〇团	奇台运输站 农场	1955年	奇台县 三十里大 墩镇	7.88	5.04	1955年兵团运输处奇台运输站农场,1957年改名兵团运输处奇台农场,1959年改称青年农场,1970年改为兵团后勤部二一二团场,1971年划归农六师,1972年改称一一〇团。
一一一—团	工一师牧场	1962年	呼图壁县 头道湾镇	6.64	3.14	1968年改称二二三团,1971年划归农六师称一一一—团。
芳草湖农场	地方国营农 场	1959年	呼图壁县 正繁户镇	142.37	51.84	1959年县红旗公社3个大队组成地方国营农场称卫星一、二、三场,1961年建立芳草湖总场,又将3个大队分别称一、二、三分场,属农垦厅管理,1982年划归农六师。
新湖总场	北五岔总场	1963年	玛纳斯县 新湖镇	138.48	47.20	1963年1月属自治区地方国营玛纳斯北五岔总场,1965年11月更名新湖农场属自治区农垦厅领导,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划归农六师。
军户农场		1958年	昌吉县 二畦镇	13.69	10.13	1958年12月由昌吉县河州二乡光明、奋斗高级农业社转为县办农场,1962年交自治区农垦厅领导,1978年交昌吉州农垦局领导,1982年划归农六师。
共青团农场		1959年	五家渠 芨芨槽子 镇	27.05	6.74	原昌吉州试验农场,1957年改为昌吉县农场,1959年改属农垦厅领导改名为共青团农场,1978年归昌吉农垦局,1982年划归农六师。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迁
土墩子农场		1965年	阜康县 土墩子镇	17.20	5.44	原乌鲁木齐专区牧场阜康羊场,1974年更名土墩子农场 属昌吉州农垦局领导,1982年划归农六师。
六运湖农场	柳荫湖 农场	1964年	阜康市 六运湖	9.05	4.38	1964年10月由天龙良种站和阜康县天峰公社友好大队 合并建立,属自治区农垦厅领导,1972年改为六运湖农 场,1978年归昌吉州农垦局领导,1982年划归农六师。
红旗农场		1964年	吉木萨尔县 四厂湖	99.60	14.16	原为县红旗公社,1964年转为天龙总场红旗农场属自治 区农垦厅,1978年10月归昌吉州农垦局,1982年划归农 六师。
奇台农场	奇台县农场	1958年	奇台县 四十里腰站	43.64	19.50	由县二区7个高级农业社创建,1963年归自治区农垦厅 领导,1978年归昌吉州农垦局,1982年划归农六师。
北塔山牧场	八一牧场	1952年	奇台县 库甫镇	337.91 其中草场 336.04	0.83	1952年新疆军区驻北塔山部队组建,1954年更名北塔山 牧场属农六师。
农七师			奎屯市	884.53	118.45	辖10个农牧团场
一二三团	二〇团农场	1950年	乌苏县 车排子镇	33.83	13.24	原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1954年更名农七 师二〇团,1969年改称一二三团。
一二四团	高泉农场	1958年	乌苏县高泉镇	141.98	11.21	1969年改称一二四团。
一二五团	柳沟农场	1954年	乌苏县 柳沟镇	70.71	15.13	原柳沟一、二(二十五团)、三场合并,1969年改称一二五 团。
一二六团	车排子一场	1960年	乌苏县 车排子镇	30.41	9.43	1969年改称一二六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一二七团	苏兴滩农场	1956年	乌苏县 苏兴滩镇	29.13	10.75	1958年改称车排子二场,1969年改称一二七团。	
一二八团	车排子四场	1958年	乌苏县 前山镇	85.00	17.07	1964年1月与车排子五场合并,1969年改称一二八团。	
一二九团	园艺农场	1960年	乌苏县 五五新镇	80.97	12.98	1964年1月改称农七师二管处直农场,1965年1月改称五五农场,1969年6月改称一二九团。	
一三〇团	共青团农场	1958年	乌苏县 六十户镇	84.17	15.78	1969年改称一三〇团。	
一三一团	奎屯农场	1956年	奎屯市	116.97	7.24	1958年改称奎屯总场,1969年改称一三一团。	
一三七团	乌尔禾农场	1958年	克拉玛依市 乌尔禾区	158.33	2.46 草地 133.00	1958年改称乌尔禾总场,农七师第三总场,工建师二四团,1969年归属农七师改称一三七团。	
农八师			石河子市	1 114.21	259.49	辖18个农牧团场	
一二一团	七十五团	1950年	沙湾县 炮台镇	68.43	21.77	原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及七十三团、七十五团,1953年农七师二十一团,1958年分成炮台农场、二十一团,1960年合并仍称二十一团,1969年改称一二一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一二二团	七十三团	1950年	沙湾县 下野地东 野镇	34.35	13.26	前身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1953年改称农七师十九团,1969年改称一二二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一三二团	下野地五场	1958年	沙湾县 红光镇	69.18	15.67	原农七师下野地五场,1969年7月改称一三二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一三三团	下野地四场	1958年	沙湾县 下野地桃 花镇	42.23	10.96	原属农七师,1969年改称一三三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一三四团	下野地三场	1956年	沙湾县 下野地镇	33.42	10.33	原属农七师,1969年改称一三四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一三五团	沙门子农场	1959年	沙湾县 沙门子镇	53.35	6.25	原属农七师,1969年改称一三五团,1975年划归石河子地区,1982年归农八师。	
一三六团	小拐农场	1953年	克拉玛依市 小拐镇	77.16	4.70	前身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原属农七师,1975年划归克拉玛依市,1982年划归农八师。	
一四一团	安集海七场	1958年	沙湾县 北野镇	31.19	13.10	1969年改称一四一团。	
一四二团	七十六团	1950年	沙湾县 新安镇	105.24	19.65	前身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六团,1953年改编为农八师二十二团,1958年改称安集海农场管理处,1965年复为二十二团,1969年改称一四二团。	
一四三团	七十七团	1950年	沙湾县 乌拉乌苏 花园镇	54.48	20.87	前身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后改称农八师二十三团,1969年改称一四三团。	
一四四团	二十三团四分场	1960年	沙湾县 钟家庄镇	38.45	12.99	1963年改称二十三团六分场,1966年扩建为三、六两个分场,将二十三团三、六分场划出组建一四四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石河子总场 (一四五团)	七十八团	1950年	石河子市 北泉镇	55.95	30.99	前身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八团,1950年改称二十四团,1951年扩编为二十二兵团机耕实习农场,1959年与石河子农场合并石河子总场,1969年改称一四五团。	
一四七团	三〇团	1953年	玛纳斯县 十户滩镇	33.72	15.32	原属新疆军区后勤运输部,三〇团1953年6月划归农十师,1955年划归农八师,1969年改称一四七团。	
一四八团	莫索湾二场	1958年	玛纳斯县 西营镇	46.28	18.81	1969年改称一四八团。	
一四九团	莫索湾五场	1958年	玛纳斯县 奈阜城镇	51.28	14.18	1960年莫四、五场合并称莫五场,1969年改称一四九团。	
一五〇团	共青团农场	1958年	玛纳斯县 西古城镇	67.61	15.58	农八师5000名青年党员、团员和青年组成,1969年改称一五〇团。	
一五一团	紫泥泉种羊 场	1953年	沙湾县 紫泥泉镇	201.46 其中草场 197.70	2.87	1953年陶峙岳将军亲自命名种羊场,1969年改称一五一团。	
一五二团	独立团	1965年	石河子市	63.40	3.68	1965年为兵团独立团,1982年划归农八师称一五二团。	
农九师			额敏县	588.64	128.79	辖11个农牧团场	
一六一团	十二团	1962年	裕民县 哈拉布拉镇	136.30	18.44	1962年10月与工二师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与农六师部分单位合编成十二团,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一团。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林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一六二团	叶尔盖提农场	1962年	塔城市 叶尔盖提镇	13.33	4.77	原兵团工一师建场,1962年10月改属农七师三管处,1969年5月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二团。	
一六三团	阿克桥农场	1962年	塔城市 阿克桥克镇	15.25	8.83	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三团。	
一六四团	乌拉斯台农场	1962年	塔城市 乌拉斯台镇	27.74	17.30	由工一师、工二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抽人组成,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四团。	
一六五团	达因苏牧场	1962年	额敏县 达因苏镇	100.41	12.91	由农六师锅炉厂、工程三大队、农七师三管处抽人组建,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五团。	
一六六团	锡伯特农场	1962年	额敏县 锡伯特镇	37.07	24.91	1969年改称一六六团。	
一六七团	麦海因农场	1962年	额敏县 麦海因镇	30.37	19.97	1962年农七师三管处二分场和麦海因五分场合并称麦海因农场,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七团。	
一六八团	乌什水农场	1962年	额敏县 乌什水镇	26.44	15.09	1958年10月,农七师额敏总场三分场,1962年迁至乌什水,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八团。	
一六九团	红星农场	1960年	额敏县 红星岗镇	4.08	2.89	1959年原兵团水工二团三工区红星农场,1962年划归工二师,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六九团。	
一七〇团	托里牧场	1952年	托里县 庙尔沟镇	15.90	0.31	原农七师二〇团托里牧场,1961年独立核算属农七师三管处,1969年划归农九师改称一七〇团。	
团结农场	团结农场	1963年	额敏县 水丰镇	6.52	3.60	原农七师三管处一分场与六分场等单位组建,1969年划归农九师。	
农十师			北屯	620.60	51.25	辖8个农牧团场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一八一团	二十八团	1952年	阿勒泰市 巴里巴盖镇	114.05	10.63	二十二兵团骑七师十九团及工军独立团部分官兵1953年6月定名独立二十八团,1969年改称一八一团。	
一八二团	二十九团	1959年	福海县 顶山镇	55.90	9.39	1959年组建二十九团和三十四团,1960年7月两团合并改称二十九团总场,1969年改称一八二团。	
一八三团	三十三团	1959年	福海县 双寨镇	79.52	9.39	1969年改称一八三团。	
一八四团	三十五团	1959年	和布克赛尔县 查干屯赉镇	103.03	1.98	1959年石河子水工团、农七师抽人组建。1969年改称一八四团。	
一八五团	哈巴河农场	1962年	哈巴河县 克孜勒乌英 克镇	0.82	0.49	1969年改称一八五团。	
一八六团	吉木乃农场	1962年	吉木乃县 老吉木乃镇	7.23	3.56	1969年改称一八六团。	
一八七团	北屯二场	1965年	福海县 丰庆镇	69.74	8.94	1969年改称一八七团。	
一八八团	北屯三场	1965年	福海县 海川镇	44.95	4.42	1965年5月师直农场与工程团生产营、工一师五团三营合并改称北屯三场,1969年改称一八八团。	
乌鲁木齐 农场管理局			乌鲁木齐市	391.97	30.56	辖6个农牧团场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一〇四团	天山九场	1954年	乌鲁木齐市 西山	340.24	4.29	1954年农六师奶牛场,1956年组建天山九场,1969年与南山牧场合并改称一〇四团,1982年划归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	
三坪农场		1964年	乌鲁木齐市 上四工镇	14.16	10.94	前身为乌鲁木齐市三坪区红专人民公社,1963年改称县办农场,1964年更名为自治区国营三坪农场,1976年划归市农垦局领导。	
五一农场		1957年	乌鲁木齐市 下四工镇	9.44	5.68	1958年属自治区农垦厅,1964年划归西郊农场管理处,1970年归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农场	八一机耕农场	1951年	乌鲁木齐市 大门院镇	13.29	5.18	最早组建的机械化军垦示范农场,属新疆军区生产办公室,1954年划归兵团农牧处,1956年属八一农学院,1964年属自治区地方农垦厅,1969年交乌鲁木齐市。	
西山农场		1959年	乌鲁木齐市 西兴坪镇	13.95	4.51	在原乌鲁木齐市东风人民公社三坪大队基础上组建,属自治区农垦厅基建工程处,后移交乌鲁木齐市农垦局。	
养禽场		1957年	乌鲁木齐市 宣仁墩镇	0.63	0.38	原兵团第一养禽场。	
哈密农场 管理局			哈密市	1 015.88	33.89	辖 11 个农牧团场	
红星一场	四十八团	1954年	哈密市 三道湖	22.45	3.29	前身六军十六师四十八团,1957年改称红星一场。	
红星二场	四十七团	1953年	哈密市 伙什泉	30.47	3.98	前身教导旅第二团,1949年2月编为六军十六师四十七团,1957年改为红星二场。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迁
红星三场	青年园艺场	1954年	哈密市 北郊	1.81	0.43	原农五师青年园艺场,1975年改为红星三场。
红星四场	红星四场	1959年	哈密市 巴木墩	48.13	2.77	原农五师红星四场,1971年与红星一场合并为二一三团一营,1982年划归哈密农场管理局。
黄田农场	黄田农场	1958年	哈密市 黄田	150.30 其中草场 44.55	4.05	1958年哈密县委、人民政府组建黄田国营农场,属地区农垦局,1983年6月划归哈密农场管理局。
火箭农场	劳改农场	1958年	哈密市 尖尖墩	15.76	4.30	由哈密县劳改农场与建新一社六队、建新二社合并组建。
柳树泉农场		1960年	哈密市 柳树泉	183.19 其中草场 53.91	2.97	前身三堡乡前锋人民公社,1960年5月转地方国营农场,后属自治区农垦厅和哈密县,1975年划归哈密地区农垦局。
红山农场	红山农场	1959年	巴里坤县 红山	90.36 其中草场 71.87	7.59	前身为巴里坤县建新社,归自治区农垦厅,1978年划归哈密农垦局。
淖毛湖农场	淖毛湖农场	1964年	伊吾县 淖毛湖	3.44	0.95	
红星一牧场		1952年	巴里坤县	403.59 其中草场 323.81	2.77	前身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三营,后为十六师独立营,1954年与三农场合并,改为农五师独立营,1956年改称红星一牧场。

续上表

现名	原名	建场时间	建场地点	土地总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变	迁
红星二牧场	红星牧场	1959年	哈密市 小堡镇	65.46 其中草场 56.73	0.65	前身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三营八连,1959年建场(营级),1964年升格为团级,1972年改编为营级。	
和田农场 管理局			和田市	193.10	5.58	辖3个农牧团场	
四十七团	墨玉分场	1953年	墨玉县 下勒迪让	20.30	1.86	原农一师前进农场墨玉分场,1969年归农三师,1982年划归和田管理局,后改称四十七团。	
一牧场	前进一牧场	1951年	策勒县 奴尔镇	121.66 其中草场 114.85	0.39	原农一师前进一牧场,1982年划归和田管理局。	
皮山农场		1958年	皮山县 阿凡提	51.74	3.32	原为皮山县地方国营农场,1982年划归和田管理局	
兵团直属							
二二二团	红星机械化 农场	1956年	吐鲁番市 交河	45.00	1.06	前身六军十六师一部分,1956年农五师红星机械化农场,1958年改称红星三场,1966年属工一师更名为艾丁湖农场,1970年改称二二二团。	
二二二团	天山十场	1959年	阜康市北 亭	28.09	8.77	原名农六师天山十场,1960年移交工一师改称阜北农场,1975年划归自治区建工局改称建工局农场,1983年划归兵团改称二二二二团。	

兵团撤销期间(1975~1981)自治区地、 州、市农垦局国营农牧团场一览表

归属农垦局名称	场数	原生产建设兵团		原地方国营农牧场	
		场数	名称	场数	名称
乌鲁木齐市农垦局	5	2	一〇四团、养禽场	3	五一农场、三坪农场、西山农场
昌吉州农垦局	19	11	一〇一团、一〇二团、一〇三团、一〇五团、一〇六团、一〇七团、一〇八团、一〇九团、一一〇团、一一一团、北塔山牧场	8	芳草湖农场、奇台农场、吉木萨尔红旗农场、阜康六运湖农场、阜康土墩子农场、昌吉共青团农场、昌吉军户农场、南湖农场(含6个分场、1个试验站)
石河子地区	20	20	一二一团、一二二团、一二三团、一二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一三六团、一四一团、一四二团、一四三团、一四四团、一四五团、一四六团、一四七团、一四八团、一四九团、一五〇团、一五一团、独立团、五七农场		
博尔塔拉自治州农垦局	11	11	八十一团、八十二团、八十三团、八十四团、八十五团、八十六团、八十七团、八十八团、八十九团、九〇团、九十一团		

(续上表)

归属农垦局名称	场数	原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		原地方国营农牧场	
		场数	名称	场数	名称
伊犁(州)地区农垦局	19	19	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六十四团、六十五团、六十六团、六十七团、六十八团、六十九团、七〇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七十六团、七十七团(尼勒克)、七十八团(特克斯)、七十九团(昭苏种马场)		
塔城地区农垦局	13	11	一六一团、一六二团、一六三团、一六四团、一六五团、一六六团、一六七团、一六八团、一六九团、一七〇零、团结农场	2	塔城工农兵农场、额敏示范农场
奎屯农垦局	9	9	一二三团、一二四团、一二五团、一二六团、一二七团、一二八团、一二九团、一三〇团、一三七团		
阿勒泰地区农垦局	12	11	一八一团、一八三团、一八三团、一八四团、一八五团、一八六团、一八七团、一八八团、一八九团、清河独立营、福海渔场	1	福海第一农场
哈密地区农垦局	11	6	红星一场、红星二场、红星三场、红星四场、红星一牧场、红星三牧场	5	哈密地区农场、哈密黄田农场、哈密柳树泉农场、巴里坤红山农场、伊吾淖毛湖农场
吐鲁番地区	1	1	二二一团		

(续上表)

归属农垦局名称	场数		原生产建设兵团 农牧团场		原地方国营农牧场	
	场数	场数	名称		场数	名称
						阿克苏红旗坡农场、阿克苏东方红农场、温宿共青团农场、温宿青年跃进农场、温宿水稻一场、温宿水稻二场、库车红源农场、库车塔里木农场、沙雅新垦农场、新和先锋农场、拜城大宛其农场、拜城查尔其农场、拜城大桥农场、阿瓦提丰收一场、阿瓦提丰收三场
阿克苏地区农垦局	31	16	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六团、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一团、十三团、十三团、十四团、十六团、沙井子民族农场		15	
巴音郭楞自治州农垦局	18	16	三十一团、三十三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二十五团、二十七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〇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二二三团		2	和静乌鲁斯台农场、和硕清河农场
克孜勒苏自治州农垦局	3	1	(乌恰)二牧场		2	伽师总场(含45分场、阿图什五七农场)
喀什地区农垦局	16	12	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四十五团、四十八团、四十九团、五〇团、五十一团、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二牧场(叶城)		4	英吉沙东风农场、阿克陶红旗农场、岳普湖农场、泽普农场
和田地区农垦局	4	2	四十七团、一牧场(策勒)		2	于田新源农场、皮山农场
合计	192	148			44	

兵团(含军区时期)农牧团场发展状况 统计表(1950~1974)

年 份	实有农牧团场数			开荒投资 (万元)	开荒面积 (万亩)	耕地面积 (万亩)
	合计	农场	牧场			
1950	13			1 670.40	90.00	96.00
1951	15			120.40	10.00	97.00
1952	27			1 449.20	70.00	167.00
1953	39	32	7	274.20	23.09	99.63
1954	43	34	9	340.00	22.32	115.89
1955	42	31	11	864.08	61.47	173.73
1956	54	38	16	3 696.78	77.38	238.34
1957	59	44	15	2 453.54	104.48	337.20
1958	100	85	15	2 539.50	292.40	621.73
1959	129	112	17	1 684.20	212.27	803.11
1960	166	143	23	1 955.49	347.17	1 035.51
1961	158	133	25	982.13	82.30	1 036.10
1962	167	139	28	500.99	36.28	1 055.32
1963	169	144	25	912.42	62.61	1 119.07
1964	161	137	24	714.14	38.24	1 148.39
1965	150	128	22	934.89	35.61	1 148.71
1966	158	137	21	2 092.78	76.89	1 212.85
1967	158	140	18	1 595.38	39.78	1 226.79
1968	158	140	18	900.48	16.10	1 121.28
1969	158	140	18	672.01	19.01	1 171.42
1970	157	147	10	427.00	26.31	1 169.03
1971	152	142	10	600.00	31.33	1 175.56
1972	155	144	11	1 521.00	24.23	1 206.96
1973	147	136	11	325.00	21.98	1 177.15
1974	147	136	11	1 478.70	11.81	1 160.7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 10 辑勘误表

类别	页数	位置	误	正
注词	插页 8	上方右	七七一团战友合 影于清 <u>河</u> 县城	七七一团战友合 影于清 <u>涧</u> 县城
注词	插页 9	下方	原六军军长、兰州 军区副司令员袁 学凯	原六军 <u>十七师政</u> <u>委</u> 、兰州空 <u>军副司</u> 令员袁学凯
正文	55	正 1 行	岁月如 <u>泥</u>	岁月如 <u>流</u>
正文	56	正 1 行	<u>夷</u> 庄镇	<u>韦</u> 庄镇
正文	56	正 16 行	地方老财	地 <u>主</u> 老财
正文	58	正 14 行	鬼子轰炸盐 <u>池</u>	鬼子轰炸盐 <u>城</u>
正文	78	倒 11 行	万 <u>元</u>	万 <u>亩</u>

图书在版编目(CIP)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11辑/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4

ISBN7-228-06385-6

I. 新… II. 新… III. 生产建设兵团—史料—新疆 IV. E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0314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

第11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编

(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5号 邮政编码:830002)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2.3印张 16插页 320千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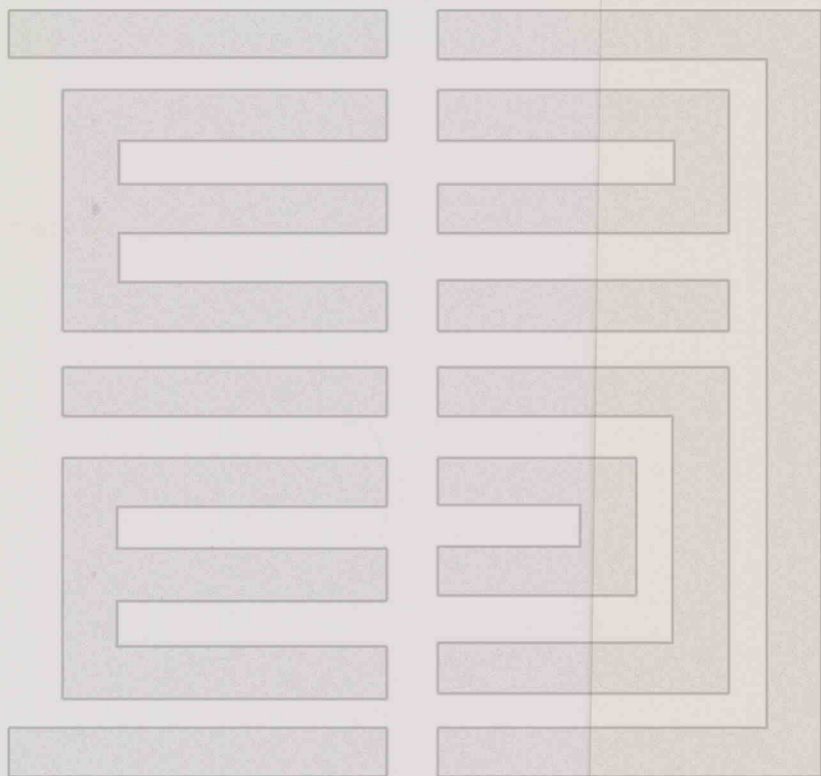
印数:1—3 000

ISBN 7-228-06385-6/E·55 定价:25元

责任编辑

王黎

王炳虎



ISBN 7-228-06385-6



9 787228 063857 >

ISBN 7 - 228 - 06385 - 6

E · 55

定价：25元

0086142